

屠格涅夫与《现代人》及与之相关的两场论争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最紧密的合作期长达近15年。其间他从初登文坛到最终成为继果戈理之后1850年代文学盟主,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现代人》上,且他参与该杂志之深远不是以所发表作品数量就可论断的。他因《前夜》与《现代人》杂志论争直至决裂的事件之后,《父与子》的发表,又在《现代人》与《俄国言论》《俄国导报》等杂志中间引起激烈争论。而这场争论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成为俄国思想史上关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论争,进而成为俄国社会政治领域讨论俄国道路的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屠格涅夫;《现代人》;《俄国言论》;《俄国导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01-08

在《现代人》三任主编30年的办刊历史中,有俄国众多重要作家参与其中。不过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作家与《现代人》的关系时,就会发现与其关系最密切、参与时间最长、引起事件与争论最多的作家就是屠格涅夫了。

1837年,屠格涅夫还在彼得堡大学时,将试笔之作《斯捷诺》交给任课老师普列特尼约夫,遭到否定性评价,不过得到了老师对其才华的某种肯定,这使他有勇气把几首诗作再送老师。普列特尼约夫选中两首,发表在其刚接手主办的《现代人》1838年第1期和第4期上。1843年、1844年普列特尼约夫主办的《现代人》又发表了屠格涅夫4首诗歌。这些小诗的发表,不仅是《现代人》主编对其才能的肯定,更是从此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从此结下了他与《现代人》的恩恩怨怨。

不过,屠格涅夫作为《现代人》真正重要的力量,是到了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时期。1847年《现代人》迎来了自己的新时期^①,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从普列特尼约夫那里接手杂志,别林斯基离开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加盟《现代人》并成

为其精神领袖。1843年初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相识,之后成为至交,直到别林斯基1848年去世。1839年至1846年间,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主笔“文学批评”栏目,屠格涅夫创作真正起步时(1843)的多篇作品皆由别林斯基发表在《祖国纪事》上。他与别林斯基在俄国和在柏林有过几乎每日见面或同住的亲密交往,从而成为别林斯基圈子的重要人物。因此,屠格涅夫参与到《现代人》这一“新的事业”中顺理成章。从杂志筹备伊始,他就直接参与其中,“他的那些见证了1847年《现代人》如何诞生的同仁,应当还记得,屠格涅夫为创办这个刊物是怎样奔波,花费了多少精力,出了多少主意,而且在杂志推广和巩固上,又做了多少事情”^{[1]333}。甚至,按照安年科夫有点不无夸张的话说,“他是整个计划的灵魂,它的筹划者组织者——当然,除了未来出版人(即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引者)带入杂志个人特点;他和他们一直分担所有复杂事宜和各种意外变故。涅克拉索夫每天都与他讨论;而后杂志上尽是他的作品”^{[1]387}。是的,1847年第1期《现代人》出版,屠格涅夫就发表了组诗《乡村》、文学评论

收稿日期:2018-0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俄罗斯宗教哲学教学、研究和翻译30余年。

《库科利尼克的悲剧〈帕特库尔中〉》、与涅克拉索夫合写的《当代人札记》,以及《猎人笔记》的开篇之作《霍尔和卡里内奇》——此篇作品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和好评,也为杂志带来了意外的声誉。这一期也刊登了别林斯基的多篇文章,如其重要文章《乞乞科夫的旅行,或死魂灵,果戈理的史诗》,以及与卡维林合写的《1846年俄国文学观察》;还有两篇推介新书的文章《俄国作家文集:1846年的奥泽罗夫文集和冯维辛文集》《1846年上半年〈高加索报〉文集》。别林斯基指出了“果戈理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为这一阶段的《现代人》确定了基本倾向。

这一阶段,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取得主导权(1856年)之前^②,杂志的合作者圈子是:核心人物别林斯基和30年代末40年代初期聚集在他周围的人——鲍特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格利戈洛维奇、赫尔岑、卡维林、谢德林等。这是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主要人物。稍后吸引了格拉诺夫斯基^③(1847年第9期),以及他的得意学生伊·康·巴布斯特(约1847年第10期);还有德鲁日宁(1847年第12期)、隆吉诺夫(1848年12期)。这些基本是早期主要成员。后来又有维·帕·加耶夫斯基(1849年11期)、费特(1850年第3期)、波隆斯基(1851年11期)、佩平(1854年第10期)、丘特切夫(1854年12期)、叶·雅·科尔巴新(1855年5期)等。巴纳耶娃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从1852到1855年,列·托尔斯泰一年发表一篇短篇,直到1855年第6期发表“塞瓦斯托波尔”短篇因土俄战事关系而受到更大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仅在新杂志第1期上刊登了《九封信的故事》,之后就因流放而中断了创作。

在这些合作者之中,屠格涅夫与他们多数人的关系后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别林斯基的关系始终如初。所以,从一开始,屠格涅夫进入《现代人》就不是所谓的外来人,像后来进入杂志的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或杜勃罗留波夫那样;而是与涅克拉索夫、巴纳耶夫、鲍特金等一样,作为别林斯基最亲密的朋友,作为自己人,成为编辑部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48年别林斯基去世,赫尔岑出国,以及后来赫尔岑与涅克拉索夫因奥加辽夫的庄园官司(大约1853年)的不和,部分因此事而产生的涅克拉索夫与格拉诺夫斯基之间的矛盾,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人》圈子的组成和力量。总体看来,从1847年至1855年,杂志的核心领导力量(除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之外)是别林斯基、鲍特金、安年科夫、德鲁日宁和屠格涅夫。他们的积极参与,使《现代人》得以维系。

可以说,屠格涅夫是参与程度最深的作家之一,尽管第1期出版后一直到1853年他或居住国外,或因发表悼念果戈理去世的文章被流放于原籍,但他不间断地寄来作品。从1847到1860年,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的合作极富成果,从成名作《猎人笔记》一直到《贵族之家》,连续14年,他在《现代人》上共计发表了25篇《猎人笔记》中的21篇,1组抒情诗,11篇中短篇(《犹太人》《佩图什科夫》《三次相会》《两个朋友》《木木》《寂静》《客栈》《罗亭》《浮士德》《阿霞》《贵族之家》),4部戏剧(《绳在细处断》《村中一月》《首席贵族的早餐》《别人的面包》)和11篇随笔、书评、文学评论(其中包括著名的评论《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些是我们翻阅《现代人》就可看到署名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全部,“还有许多散发在杂志最后一个栏目里的短评”^{[1]387}。

别林斯基的去世,虽然没有对编辑部总的人员构成造成影响,但却留下一个巨大空缺:以前总是别林斯基署名、代表杂志的文学观点和倾向、给杂志以思想定位的批评栏目失去了核心,德鲁日宁、安年科夫、卡维林、米留金、涅克拉索夫等成为该栏目的撰稿人,其他基本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甚至栏目变成了不署名的、搞不清作者是谁的集体之作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从纯文学批评变成了“杂”文栏目。而且恰在这时整个俄国社会进入通常所说的“黑暗七年”时期,舆论的管控和活动空间的压缩,使得杂志生存步履艰难。

这时即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却正是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最紧密的关系期。除了在上面发表的已知作品,正如尼·瓦·伊斯梅洛夫指出:“屠格涅夫之参与,远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深得多,远比反映在他的全集中的要多得多!”^[2]尽管已经有太多研究他的资料,但是“远没有弄清他为《现代人》所有栏目撰写的东西,尤其是他流放前,1847—1851年间。他参与到杂志中,作为小说、诗歌、‘猎人笔记’随笔、戏剧的作者,作为批评家、政论家,作为杂文作者,跟踪日常的文学、戏剧、社会等时事,主要是(至少我们知道)国外这些领域的时事,一句话,他参与到了杂志的所有栏目的”^[2]。时局的幽暗,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杂志上。这些年杂志也发表了一些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薄弱的作品,涅克拉索夫自己也撰写一些应急散文发表,没有这些,杂志也许就无法维继下去。他承认说:“我们能发什么就发什么。”^{[3]115}涅克拉索夫这样给屠格涅夫解释自己与巴纳耶夫仓促合作的《三个王国》:“如果您读到我的小说,不要太严苛地评判它:之所以写它,就是为了

杂志有东西可发——这是写出它的唯一原因。”^{[3]115}为了杂志得以维继，涅克拉索夫经常恳请屠格涅夫随便寄点什么发表：“怜惜一下《现代人》吧，朋友，再给我们寄来些您的大作，越多越好。”^{[3]122}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屠格涅夫——《猎人笔记》^④的作者——的支持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屠格涅夫本人也热心于《现代人》的事业，即便在国外，他也密切关注每一期《现代人》的内容，认为自己是这一共同事业的一分子。1856年10月他从国外给巴纳耶夫写信：“我答应你，我会尽一切努力，不仅以我自己的创作，还以各种新闻、资讯、可供翻译的书目等来支持《现代人》。”^{[4]212}屠格涅夫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作品首先且绝大部分发表在《现代人》上。他很高兴他对杂志的支持也得到了编辑部的理解和高度评价：“感谢你赞美我的活动和我对《现代人》的爱，我可以使您相信，我会像俗话说说的拉边套的好马，一刻也不卸套……”^{[4]220}

屠格涅夫参与《现代人》不只是作品的发表，他还不断地为《现代人》扶持新人、引进新作。在传统的文学史中一直被忽略而现在无法绕开的两位诗人都与他的指引分不开。一位是诗人费特。一次屠格涅夫去费特那里，碰到诗人刚刚完成诗歌《第聂伯河上的春汛》，听完诗人的朗诵，屠格涅夫说道：“我还担心您才思枯竭呢，可它的脉搏在您身上却跳动得更有力了。写吧！写吧！”^{[5]36}他将费特引进了《现代人》，并认真编辑他的诗歌，帮助他锤炼语言，完善诗歌技巧，并为费特的第三本诗集的出版付出许多辛劳。另一位是诗人丘特切夫。1854年2月，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他的庄园）给C. T. 阿克萨科夫写信说：“我在这里促成了两件好事：一是说服了丘特切夫出版自己的诗歌选集；二是帮助费特彻底理顺和修改自己的贺拉斯译稿。”^{[4]167}根据屠格涅夫的建议，《现代人》上出现了丘特切夫的诗歌。

如果说上述两位诗人是屠格涅夫直接扶持并引进到《现代人》中，那么还有间接被他吸引到《现代人》中的，这就是在创作上直接受他影响，以致将作品献给他、并投稿给《现代人》的新人托尔斯泰。翻开1855年第9期《现代人》，就会看到托尔斯泰的《伐林：一个士官生的故事》（献给伊·谢·屠格涅夫）。我们会惊奇，为什么这篇作品是献给屠格涅夫的？现在通行的所有版本里都没有了这一附带题词，或因后来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决裂，或因后来托尔斯泰盛名威震吧，作者不愿再标明是献给屠格涅夫的？1855年8月18日涅克拉索夫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现代人》第9期发表一篇献给你的士

官生的故事：《伐林》。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是一篇关于各色士兵（包括军官）类型的特写，也就是迄今俄国文学中还不曾有过的一篇东西。而且写得多好呀！在这些特写中完全是你的形式，甚至语句、比喻，都让人想起《猎人笔记》——而其中一个军官干脆就是穿着军装的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⑤。但所有这一切远不只是表面的模仿。”^[6]

在寄出小说《伐林》之前，1855年6月14日托尔斯泰曾给巴纳耶夫写信说：“如果屠格涅夫在彼得堡，那么问他是否允许一个士官生的故事的题词为：献给伊·屠格涅夫。我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为当我重读它时，发现了其中不由自主的对他的那些故事的模仿。”^{[7]315}

托尔斯泰非常熟悉屠格涅夫的作品，甚至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有了他以后，写作就有点难了。”^{[8]211}托尔斯泰自主接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可见一斑。他在日记的另一处（1855年3月21日）又写道：“接到玛莎（玛利亚，其胞妹——笔者）一封令人心醉的信，她描述了跟屠格涅夫相识的经过。这封珍贵的信，把我自己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它激励我去写作。”因此，虽然托尔斯泰说《伐林》是无意中模仿屠格涅夫，但在意识中，屠格涅夫显然已经是托尔斯泰的榜样了。另一方面，早在托尔斯泰寄给《现代人》的《童年》发表之后，屠格涅夫亦开始注意这位作者，他和涅克拉索夫都欣喜于又一个天才的出现。“这是个新的天才，而且看来很靠得住。”（涅语）“告诉他，我要向他鼓掌表示欢迎，并向他致敬。”（屠语）^{[8]210}屠格涅夫甚至开始打听他的情况。他了解到离自己的庄园二十来俄里就是托尔斯泰胞妹玛利亚的家，以后便与玛利亚一家有了经常往来，传递了对《童年》的赞赏和对托尔斯泰创作的关切。1854年10月29日，他给涅克拉索夫写信说：“我从她（玛利亚）那里了解到他哥哥的许多情况。”^{[8]212}在托尔斯泰曾收到的姑母的信中也提到：“而对此（即《童年》——笔者）最表示关切的是《猎人笔记》的作者屠格涅夫。他见人就打听，玛利亚是不是有个写小说的哥哥在高加索，还说，如果这个青年以后像一开始那样写，那他前途无量呢。”^{[8]211}当托尔斯泰得知屠格涅夫到访玛利亚的家，也高兴万分，请家人转告屠格涅夫，虽然他只是从作品上知道屠格涅夫的，但却感到有许多话需要跟他谈。而这恰恰与后来屠格涅夫的一封信相呼应。1855年秋屠格涅夫去玛利亚那里，托尔斯泰给塔·阿·叶尔戈里斯卡娅的信正好到达。屠格涅夫从信中得知托尔斯泰有可能离开军队时，当即在玛利亚的家就给他写信

说：“我早就想与您结识……首先衷心感谢您将《伐林》献给我——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的荣耀。想必令妹已经告诉您，我是多么推崇您的天才并对您寄予厚望。……倘若您能离开克里米亚，那该多好……军旅生涯不是你的职业，你的使命是文学家，思想和语言的艺术。家。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您在信中提到您有可能休假，此外是因为我太热爱俄国文学了，以致不愿想到您在枪林弹雨中。如果您有可能到图拉哪怕作短暂停留，我会专程从彼得堡到那里一趟，以便和您本人认识——当然这对您未必有多大诱惑，但说真的，为了您自己，为了文学，您回来吧。我还要再说一遍，你的武器是笔，而不是军刀……”^{[4]193}这是在两人没有见面之前就已经惺惺相惜。因此，待1855年11月托尔斯泰从高加索回来，直奔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的寓所并住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两人见面，相谈甚欢，尽管很快就有了分歧。屠格涅夫引荐托尔斯泰与涅克拉索夫见面，直至把他引进了整个彼得堡文学界和新闻界，介绍他认识了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阿·尼·迈科夫、波隆斯基、鲍特金、德鲁日宁、安年科夫；后在十二月党人起义30周年纪念日在家举办文艺晚会，使他与奥加辽夫相识，倾听奥加辽夫朗诵自己的诗歌《冬日之路》。总之，在屠格涅夫的热情安排下，托尔斯泰熟悉了当时俄国文坛上一切优秀的东西，而对他精神上最有力的影响是：在屠格涅夫的直接引导下，托尔斯泰热情地研读起别林斯基，迷上斯坦凯维奇，对赫尔岑其人和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兴趣。从此使得托尔斯泰也成为《现代人》重要的作者，这对《现代人》不得不说是件大事。

1854年4月，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巴黎出版，奠定了他在欧洲文坛的声誉；而在俄国文学界，他的声望也日益提高，将他看作当代最有天才、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看作果戈理的继承者（可以简单地说：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依次是“普希金时代”“果戈理时代”“屠格涅夫时代”）。作为《现代人》主编的涅克拉索夫非常倚重屠格涅夫，他给屠格涅夫写信说：“……我恳请求你为第1期和第2期写个短篇，篇幅短一些也行，或随便你写写什么，主要是要有你的名字。否则我们怎么开始这一年呢？”^{[8]206}但事情不仅限于此。涅克拉索夫不仅是把他当作已经享有盛名的作家，自己杂志的撰稿人，而是把他当作对《现代人》拥有话语权的人物。1855年涅克拉索夫打算出国治病时，把杂志事务交给屠格涅夫接管。他给刚来不久的托尔斯泰说：“屠格涅夫将代理我在《现代人》的职务。”^{[8]206}后来车尔尼雪夫斯

基也回忆说，“在什么样的诗歌、中篇小说或是长篇小说可以值得发表的问题上，屠格涅夫是有很大影响的”^{[9]469}。而屠格涅夫也把《现代人》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尽一切可能维护《现代人》。笔者在此前的文章^⑥里曾讲到1857年涅克拉索夫曾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格利戈洛维奇签订了一个四人“责任协定”，约定他们的作品保证发表在《现代人》上。这份协定遭到周围杂志的围攻。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这四位作家中，屠格涅夫起了主要作用。这份协定不仅密切了屠格涅夫与杂志的关系，更是他希望巩固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家朋友在杂志管理与运营中的影响，从而使《现代人》更具竞争力。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屠格涅夫参与《现代人》之深，关系之紧密。然而这种密切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与《现代人》之间全然没有纷争。这种纷争在车尔尼雪夫斯基1854年开始在《现代人》发表作品、屠格涅夫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大部头作品引起的不同评价、主编涅克拉索夫在新老撰稿人中间的游移与选择中已经潜藏着了。

二

1855年春夏之交，《罗亭》动笔之前，一群吵吵嚷嚷的文学家鲍特金、格利戈洛维奇、德鲁日宁到屠格涅夫的庄园斯巴斯科耶作客。大家骑马闲逛、打弹子、打地球、下棋、饮酒，没完没了的争论文学问题到天亮，最后编出一出喜剧《好客学派》搞家庭演出。台词中多有影射。应该说这出儿戏式的喜剧是贵族自由派作家敌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新生力量的首次表露。在这次滑稽的表演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描绘成“易动肝火的文学家”。其实，车氏进入《现代人》后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令原来相对一致的小圈子不无惊慌，这出闹剧只是这一情绪的宣泄罢了。自由派这班人这样戏耍了一番，隐藏了许多重要问题，而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对个人的戏谑。实质性分歧潜伏着。很快《罗亭》和《贵族之家》接连发表，引起的是“多余人”终结的问题。虽然各方评论肯定的声音居多，但是对于其中的“多余人”，作家们的态度也并非一致。

1856年第1期和第2期《现代人》发表屠格涅夫的《罗亭》。《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家斯·谢·杜德什金认为，罗亭只是奥涅金、毕巧林、别里托夫（《谁之罪》的主人公——笔者）的无力翻版。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在《现代人》上发文，认为罗亭这一形象塑造了出现在社会发展新时期的人。而屠格涅夫对罗亭有强烈的同情和钟爱，所以也强迫自己对罗

亭抱怀疑态度,但小说结尾则响起光明的调子,让罗亭死得其所。可这一结尾,他也想含糊其意。关于《罗亭》的结尾,屠格涅夫几经修改过。在杂志上发表时以及1856年他的三卷本文集中,罗亭并非死于巴黎街垒。到了1860年的版本,才修改成了这样的结局^⑦。但是他让巴纳耶夫转交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版本的样书时,请巴纳耶夫转达他的希望——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要对这个版本写什么文章的话,请不要刻意提起这个结局,亦即不要作这样的解读:罗亭参加了巴黎的人民起义,他英勇作战,而且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光荣牺牲。如果这样,那么他的整个文集就会遭到禁止。^{[9]480}可见屠格涅夫不希望作出特别激进的解读,甚至不要人们注意到这个结局。对《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屠格涅夫的态度同样复杂。拉夫列茨基与丽莎·卡琳基娜的爱情悲剧构成了小说诗意的基础,他们具有惊人的道德纯洁性,也包含了屠格涅夫极其重要的思想:他们两人都感到了“为了别的打算”而安排的生活的谬误,无法摆脱隐秘的羞耻感,这一羞耻感来自他们为了自己“不可原谅的幸福”而分手。但小说结尾同样响起新生的调子:寄期望于新一代。这一结局被很多人(包括《现代人》的批评家)理解为作者告别贵族时代、把年轻一代主人公看作“新人”的平民知识分子。但是作者本人对这些“新人”的态度则是复杂的。这表现在屠格涅夫接下来的长篇《前夜》(《俄国导报》1860年1—2期)中。在批评家与作者本人对文本理解的差异中,裂痕露出端倪。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决裂就是此前的经典案例。屠格涅夫因《前夜》与杜勃罗留波夫、进而与涅克拉索夫、最终与《现代人》彻底决裂,转向《俄国导报》(以后也与《读者文库》《欧洲导报》合作)等,则又是惊动俄国文坛的大事。

关于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决裂,因篇幅限制,在此不准详细论述更为复杂的因素,仅限于最直接的原因的讨论,即杜勃罗留波夫对《前夜》的评论引起的批评家与作者之间的冲突。即便是这一直接原因,大多研究者也简单化处理了。关于此事件的讨论,我国仅有的文章《旧事重提——从杜勃罗留波夫和屠格涅夫的争论谈起》和《批评家的勇气——话说杜勃罗留波夫与屠格涅夫的一场冲突》,虽然对事件粗线条的描述大致无误,但并没有揭示事件的细节,甚至相当实质性的细节,而且两者的引证材料仅来源于《巴纳耶娃回忆录》(汉译本)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汉译本);且后者也不属于学术研究文章。根

据后来的研究成果,巴纳耶娃的回忆是有误的,并不准确,可多数人的引用——屠格涅夫让涅克拉索夫作出选择的话:“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这大多源于巴纳耶娃的说法。所以,对于屠格涅夫与《现代人》决裂一事需要更详细的研究。通常的看法,即如在《旧事重提》中所述。但是,对于作品的不同解读,自然是人的价值观、审美观在起作用,可它们首先显现于个人日常生活风格和做派的差异,这种差异会使一开始就对某个人不接受。屠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之间的关系就正是如此。尽管早期与屠格涅夫关系还相对不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回忆文章中坚定地说:“我在谈论人们对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的攻击中总是坚持一条不变的原则,就是:他的所有思想都是正确的,所有他所写的也完全是好的”^{[9]472},可是他也不偏不倚地讲到,从一开始杜勃罗留波夫就对屠格涅夫态度冷淡,尽管屠格涅夫不断地试图接近、融洽两人的关系,甚至不无赞赏杜氏的才能和看问题的锐利,但杜氏始终拒他以千里之外。这样就形成了屠格涅夫在日常中始终感到杜氏对他一贯的侮辱态度。这种拒斥中自然包含了杜氏对屠格涅夫贵族老爷出身与派头的决绝的否定。他首先就以阶级出身决定论的态度判定了屠格涅夫的“死刑”,因而也毫不含糊地阐释屠格涅夫的《前夜》中革命的声音,这种革命正是要消灭贵族老爷的。

1860年第1—2期《俄国导报》发表《前夜》,杜勃罗留波夫随即在1860年第3期《现代人》上发文《论屠格涅夫的新小说》,为小说《前夜》高喊出他著名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该文是1860年2月中旬送稿审查的。2月19日审查员别克托夫告诉作者:“最亲爱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维奇,我想与您见面解释一下您关于伊·谢·屠格涅夫的《前夜》的批评文章。这样的批评文章很久没有读到了,它令人想起了别林斯基。以它现在的样子刊发是无论如何没有可能性的。我确信,照您写的样子发表,就意味着引起对卓越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即屠格涅夫)的追查,同样对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包括在下。”^{[10]96}可以看出,杜氏文章的社会政治思想令别克托夫不安:没有一个审查官会通过这样的文章,如果放行,无论是他还是编辑部,最主要的是作者本人,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作者本人会因这些思想而受到追查。就在同一天,别克托夫告知了屠格涅夫他将要陷入的危险,也告知了涅克拉索夫,所以才有了屠格涅夫给涅克拉索夫的那个著名的纸条,亦即被大家常常视为最后通牒的请求:“我坚决请求您,亲爱的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它除

了不愉快什么也不会给我带来。文章是不对的、偏激的——所以请尊重我的请求。”^{[11]41}别克托夫和屠格涅夫这样想有没有道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究竟写了什么？他说：“我们只想把那些在作家的作品里分散的，我们当作既成事实的，当作摆在我们面前的生活现象的材料归纳一下。”^{[12]260}其实他明白，《前夜》作者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毫不相干，但他有权分析作为屠格涅夫小说基础的那些生活事实，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作者想说什么，而是说什么被他说出来了，即便是无心地，即便这只是忠实再现生活事实的结果”^{[12]261}。他承认屠格涅夫“拥有一种能够体会和描写生动逼真的真实现象的本领”，抓住了社会思想和道德状况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他的作品就使人有充分理由去评判作家赖以写作某一作品的环境、生活和时代”^{[12]262}。

在《前夜》中，他“看到了作者本身的思想 and 想象不由自主地所受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自然进程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迅速猜到了新的要求，猜到了渗透进社会意识里的新观念，在他的作品中注意到了已经朦胧地扰乱着社会的问题”^{[12]263}。杜氏说，屠格涅夫对现代问题有敏感的痛切的关注，这一点使得他在读者中获得持久的成功，“他的活动里是这样强烈地反映着‘社会思想的一切动摇’”，“这正是他的才能最活跃的一面”^{[12]264}。这样的评价对于屠格涅夫来说甚至是非常受用的，会满足他的（或任何一位作家的）虚荣心。但同时也使他不安，因为越是这样铺垫，杜氏从作品的生活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就越有说服力越不可辩驳。杜勃罗留波夫经过长篇的论述最终得出结论：“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有容纳伟大思想和同情的天地，这些思想付诸实行的时候已经并不遥远”^{[12]326}，俄国的英沙罗夫——“这些新的人——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切优秀的人、一切清新的人，这样迫不及待地、热烈地希望出现的新的”，已经具备了出现的可能性，“此刻环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自己也在帮助这样的人出现”；他们已经竭尽全力要冲破社会环境的钳子，摆脱压迫，他们已经感到了它全部的沉重和荒唐。^{[12]329}

当然，杜氏这些伊索寓言式的话语意味的是“革命”及其“斗士”。杜氏将屠格涅夫依据一个邻居手稿中的故事而创作的作品，原本就没有想清楚其性质和出路的人物（杜氏也承认这一点），通过自己的阐释补写成了“完整的、鲜明而生动的”“俄国的英萨罗夫”了，预言他的出现不会等待太久。“这一天，它到底是要到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总共只有一夜之隔

吧！”^{[12]330}屠格涅夫不能同意这样的诠释，它不符合他对现实的理解，不仅有悖作者的意图，还会给他带来麻烦，而且抽打了屠格涅夫神圣的信念——“度”的坚守。因此他坚决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该文，但涅克拉索夫做出了有利于杜勃罗留波夫的选择，文章刊发在了《现代人》上。这也最终导致了屠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与涅克拉索夫关系的破裂。屠格涅夫于1860年10月写信给巴纳耶夫，正式提出退出《现代人》。至此，他与之已经合作了将近15个年头（不计普列特尼约夫时期）。这是和那些携带着别林斯基时代记忆的老朋友的断裂。其实这种断裂早已酝酿，除了我们这里讲到的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这一直接导火索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个人的好恶，某个事情的阴差阳错或误解，不同的阶层出身，迥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对未来俄国出路期许的不同，走向未来的道路和社会变革方式的分歧等，都最终导致分属两个阵营的人物分道扬镳。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1年第6期《现代人》上的文章《论争之美》，分析得非常经典：“屠格涅夫君越来越清楚了我们的思想方式，因此他不再赞成它了。我们也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君最近的几部中篇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并不像以前那么接近了；从前我们对他的倾向并没有这样清楚，而他对我们的观点也没有这样清楚。于是我们分手了。”^{[9]258}与他们先后分手的还有，格利戈洛维奇、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他们也都离开了《现代人》。至此，别林斯基所指称的“自然派”作品的创作者，一一离开了这个“流派”，不仅终止了这一杂志的整整一个时代，也是终止了俄国文学社会生活的一个时代。

在对《前夜》的评论中，读者也大致分为两大派：一派热烈赞成，另一派则提心吊胆，疑惑不解。青年学生和激进知识界欢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则十分冷淡，他们对“作者的情绪”感到惊奇，因为作者在这改革的前夜提出了“关于人民的权利这可怕的问题”。而另一个“可怕的问题”——“父辈与子辈的冲突”问题的提出，使得屠格涅夫虽然离开了《现代人》，但缘他而起的纷争并没有远离《现代人》，这就是随着他的《父与子》的完成（1861）和发表（1862）接踵而至的60年代俄国文学界又一场论争。分贝最高的争论即发生在《现代人》和《俄国言论》之间。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在《俄国导报》1862年第2期（3月面世）上发表，第3期（3月20日和4月6日送审，4月13日面世）《现代人》上就出现了马·阿·安东诺维奇的文章《当代魔王》；接着在《俄国言论》第4期上，皮萨列夫撰文《巴扎洛夫》。

前者被研究者认为代表了《现代人》编辑部的集体意见,尤其是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该文认为,小说是对年轻一代的讽刺和漫画式写作。后者则对小说和作者赞颂和辩护。对所有人来说,理念上相近的两份杂志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分道扬镳了。1864年,皮萨列夫又写一文《现实主义者》^⑧,在读者眼里,这篇文章表达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编辑部的集体意见,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正是与安东诺维奇论辩的。这篇文章实质上是“虚无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开端,标志的不仅是同为激进民主刊物的《现代人》和《俄国言论》的彻底分裂,而且也是《俄国言论》内部编辑们的分裂,因为不同意皮萨列夫文章的观点,德·德·米纳耶夫在《现代人》(1865年第1期)上公开声明脱离《俄国言论》^⑨。而这样的分裂,在前述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分裂中已经不陌生了。

正如屠格涅夫1862年12月在给《北方蜜蜂》的公开信中陈述与《现代人》断绝关系的原因时所说,“今后这份杂志对我的评论用不着再客气了”,果然“涅克拉索夫的杂志很快就不再客气了。恶意的暗示也立刻就出现了,并且以一切俄国式的进步所具有的敏捷转为明显的攻击”^{[13]348},其所指正是马·阿·安东诺维奇的文章。从屠格涅夫离开《现代人》起,他们不仅出于嫉妒屠格涅夫在其他杂志上发表作品,也出于与自己办刊“纲领”不合,敌视地对待屠格涅夫。关于《父与子》,安东诺维奇的文章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巴扎洛夫形象的原型就是影射杜勃罗留波夫,尽管屠格涅夫对这一揣测予以辟谣,直到1869年屠格涅夫还发表文章《有关〈父与子〉》,驳斥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关于杜氏是巴扎洛夫的原型的攻击。在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还讲到,当时他深为各方对《父与子》的反应而难过,他发现许多与他亲近的人对他冷淡,甚至达到愤怒的程度;与他敌对的人对他祝贺,近乎要来亲吻他^{[13]588}。这颇类似果戈理当年出版《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后的处境。无论怎样,屠格涅夫都不由自主地陷入这场争论的旋涡,其范围显然超出了一部小说正常出版而应有的反应。由此,我们看到当时文学批评所承载的“负荷”。

这中间及后来,安东诺维奇和皮萨列夫之间无论是就小说还是对彼此都进行过一系列攻击。皮萨列夫发表了《现实主义者》的第一部分(即《悬而未决的问题》)后,安东诺维奇发表简论《问〈俄国言论〉》(《现代人》1864年第10期,署名“旁观的讽刺作家”)。接着皮萨列夫从彼得保罗要塞转给格·叶·布拉戈斯韦特洛夫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未

被刊登,但是《俄国言论》10月号刊登了另一篇评论《答〈现代人〉》(《俄国言论》1864年第10期,出自布拉戈斯韦特洛夫之手,我们推测就是皮萨列夫之意);接着就出现了安东诺维奇的文章《致〈俄国言论〉:预先的声明》(《现代人》1864年第11期),接着又是一篇简论《致〈俄国言论〉》(《现代人》1865年第1期)。此后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上不止一次回到评判皮萨列夫论巴扎洛夫和《父与子》:《没有命中》(1865年第4期)、《伪现实主义者》(1865年第7期)。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1863年1—5期、9期,1864年1—3期)、《文学琐事》(1864年5—7期、9—10期、12期)、《国内观察》(1864年第4期)这些评论中也间接论及这个问题。皮萨列夫也同样不止一次在《俄国言论》上回到与安东诺维奇的争论:《大家看!》(《俄罗斯文学花园漫步》(1865年第3期)、《没有命中》(1865年第2、4期)——连文章题目都是争锋相对。

皮萨列夫的文章《现实主义者》再一次挑起了文学战争:批评家、政论家、作家们在决断,他们两人在评判小说时谁对谁错。这已经是批评的批评了。

关于《父与子》的论争,除了《现代人》与《俄国言论》外,发表《父与子》的《俄国导报》杂志的主编卡特科夫同样发出了声音。他在《父与子》刊登后发表文章《论我们的虚无主义——由屠格涅夫的小说说起》(《俄国导报》1862年第7期),从社会政治角度论述了作品及俄国社会的虚无主义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卡特科夫不仅成为《父与子》的第一位出版人,而且他在形成《父与子》的潜台词和思想基调方面起了明显的作用。《父与子》的发表成为俄国社会严肃讨论虚无主义问题的开端,作品问世后讨论和批评的热潮把哲学术语“虚无主义”转化为社会政治概念,这正是卡特科夫促成的。这样,就把对作品的讨论从个人情绪的发泄、文学形象的影射,提高到了对俄国社会意识中一种特殊现象、特殊世界观的认识——即平民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与情绪,从而作为社会政治概念的虚无主义带有了更为现实的具体历史特点,在俄国社会意识中固定了下来。这是关于《父与子》的论争在俄国社会思想上留下的最深的痕迹。由此我们也看出,无论是关于《前夜》还是《父与子》的论争,其批评方式给文学批评带来一种显著的变化——如果说在别林斯基阶段,俄国文学批评在作者原创与批评家再创之间还有一个模糊的边界,那么到了这一时期,这一模糊的边界消失了,文学人物被认为确有其人,批评家选择性地引用文本并加以阐释或补充,人物因此得到重塑,他

们从虚构中分离出来,成为活生生的人;加之以政治社会学的批评角度,进而探讨俄国社会的重大事件。由此奠定了俄国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模式。

纵览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关系,这不仅是屠格涅夫个人文学创作的成长、演变史,也是俄国社会19世纪40—60年代激荡的社会变革史与思想发展史。其中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各种人物关系相互纠结,各种思想倾向相互碰撞。因此对其中任何一种现象或人物都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论断,而应在具体复杂的关系中具体评判,也许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趋近一点点历史真实。

注释:

- ①这一时期长达20年,可分为别林斯基主笔、“黑暗七年”、车/杜主笔、最后的艰难——四个阶段。
- ②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从1854年就开始出现在《现代人》上,但还没有形成影响。
- ③格拉诺夫斯基,与别林斯基、赫尔岑、霍米亚科夫等人,被视为40年代中期俄国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
- ④《猎人笔记》的第一篇最初发表时,屠格涅夫本人并没有太多信心;不料反响热烈,才使他继续创作,逐渐成为有影响的作者,也成为《现代人》的支柱。
- ⑤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指的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涅克拉索夫说托尔斯泰的《伐林》中的主人公类型就是屠格涅夫的“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只不过穿了军装。
- ⑥见2017年第2期《中州大学学报》的《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杂志研究》第5页。
- ⑦参见:http://az.lib.ru/t/turgenev_i_s/text_0010.shtml关于《罗亭》的版本说明。
- ⑧最初因审查原因(作者处于彼得保罗要塞中),没有署名,以《愚而未决的问题》发表在《俄国言论》1864年第9期。

⑨见:Минаев Д.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865, № 1.

参考文献:

- [1] П. В. Анненк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 1983.
- [2] Н. В. Измайлов. Тургенев и круг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ЕВ/ОЛ]. Ленинград: Academia, 1930. <http://i-s-turgenev.ru/books/item/f00/s00/z0000015/st001.shtml>.
- [3]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в 15 т.) [М]. т. 14, СПбг. 1998.
- [4]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Собр. соч. (в 12 томах), Том12,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 М., 1958.
- [5] А. А. Фет, 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848—1889 (Часть 1) [М]. М., 1890.
- [6] <http://tolstoy-lit.ru/tolstoy/pisma-o-tolstom/letter-4.htm>.
- [7]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59 [М].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35.
- [8] 鲍戈斯洛夫斯基. 屠格涅夫 [М]. 冀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9]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二) [М]. 辛未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10] Заветы [J]. 1913(2).
- [11] Тургенев И. С.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М]. Письма, т. IV. М. - Л., 1962.
- [12] 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 [М]. 辛未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对译文有改动)
- [13]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 [М]. 张捷,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对译文有改动)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urgenev and *The Contemporary* and Two Related Debates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urgenev had closest cooperation with *The Contemporary* magazine, and it lasted for nearly 15 consecutive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he started from a novice i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then eventually became the literary leader of the 1850s after Gogol, most of his works were published in *The Contemporary*, in fact, his participation in this magazine was far from being judged by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works. After his famous controversy with *The Contemporary* magazine, which began from the dispute over *On the Eve* and then developed into rupture, he published *Fathers and Sons* afterward, and it caused fierce controversy in the *The Contemporary*, *The Russian Word* and *The Russian Messenger*. This debate had gone far beyond the scope of literature and gradually changed to the argument on the issue of nihilism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ideology. It then involved into one of the most intense problems in the Russian social and political field to discuss the Russian road.

Key words: Turgenev; *The Contemporary*; *The Russian Word*; *The Russian Messenger*

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

——以《陶渊明的幽灵》为例

张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文化交流是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的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完成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看似简单,实则艰难。造成跨越与转换艰难的成因诸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非均衡的政治经济因素主导文化传播走向;语言的异质性导致语义的不对等。这里以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的中英文版本为例,大量例证说明,跨越与转换虽屏障重重,但只要要求同,追求同感共情,即能清除障碍,完成文化跨越与文本转换,并最终点题——作为人类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代言人,作为文化象征,陶渊明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关键词:陶渊明;文化跨越;文本转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2

中图分类号:I206;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09-06

在生态文艺学研究领域,鲁枢元先生所撰写的《陶渊明的幽灵》是一部罕见的力作。这部著作自2012年6月出版,便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教授初读此书,便以电子邮件形式致电鲁枢元先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十分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追求的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诠释中国文学的最佳范本!”台湾著名生态批评学者黄逸民先生亦言称,鲁枢元教授的研究“立足于发掘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生态精神”,他的探索可能会“影响到生态批评今后的研究方向”^[1]。

《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以跨文化的生态视角,探讨了生命环境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精神世界的内里关联,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层分析,通过陶渊明的诗与人生,阐发了中国古代人的生态智慧,并充分地展现了这种智慧对当代世界所具有的价值。作者在中国经典的自然哲学的宏阔视域中,广泛而深

入地讨论了生命、自然、生态、人生、诗、生存样式、人类选择及人的未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进行了诗意的叙说与完备的诠释。2014年,该书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出于对这部著作呈现的生态普世价值的重视,对其文本展现的人与自然主题的高度认同,对其内容共享性的深度认知,以及对其在未来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极具建设性价值的考量,乐黛云教授极力向外文出版社举荐此书,将其列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中华学术文库”丛书,与世界知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力主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出版发行。

寻找称职的译者的工作随后展开。自2013年起,在确定本书的翻译者为孟祥春之后,历经数年的艰辛劳作,在作者鲁枢元、译者孟祥春、校对者巴兰坦(Carl Balantin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及境外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5月,鲁枢元先生的著作《陶渊明的幽灵》的英文版终于问世了,出版者是总部设在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书名由原来的

收稿日期:2018-03-05

作者简介:张月(1959—),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从事文艺学、艺术史、社会学研究及翻译30余年。

《陶渊明的幽灵》,改为《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

二

《陶渊明的幽灵》英文版的出版,是生态批评界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文化尤其是诗意形态与理论形态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又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作者通过陶渊明的个案研究,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一种东方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为其打开一种全新的精神视域,使其在此视域中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寻求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探索人类价值共享的始基,寻找不同地域的人的共同利益,探索东西方话语意义的沟通理解途径,使彼此能够成为真正的精神上的盟友,确立全球共建意义上西方与东方的联系,并探讨人与自然关系重建的可能性。

与以往国内学人的著作译成英文出版的图书那种沉寂的命运不同,《陶渊明的幽灵》的英文版出版伊始,便引起美国相关学术领域中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赢得了充满溢美之辞的评价。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中国后现代研究院创始院长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针对其研究成果评论道:“鲁枢元教授不仅精细入微地描述了陶渊明的思想,而且还将陶渊明置于与西方思想家的关系之中进行讨论,以此展现出陶渊明深邃洞见的价值。”^{[2]back cover}

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主编斯考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的评价则更加具体,“鲁枢元教授是中国生态批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这一鸿篇巨制探寻了诗人哲学家陶渊明在过去的1700年间对中国(乃至)世界环境思想的灵魂意义上的影响力。这一研究朗照陶渊明的思想,使之得以澄明,其视域宏阔辽远,纵横古今中外,令人感动而意味深长,从庄子到温德尔·贝瑞,既生动地展示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环境思想的深邃洞见,又呈现了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意义深远的碰撞交汇,从终极意义上看,这部著作透过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探究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性的意义”^{[2]back cover}。

特丽·威廉姆斯(Terry T. William)与布鲁克·威廉姆斯(Brooke William)夫妇,是美国生态文化界有广泛影响的学者、作家,特丽·威廉姆斯的《荒野的慰藉》在中国有着众多的拥趸。英文版的《陶渊明的幽灵》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他们为书中的内容所深深吸引,将《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作者视为精神盟友,并给予《陶渊明的幽灵》一

书极高的评价。在他们中国之行中,他们竟随身携带了这本书的复印本,并不时阅读,在其认为重要之处认真批注,写下读后感。他们甚至言称,这本书几乎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甚至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英文版尚未出版之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过程思想家、儒学家玛丽·伊芙琳·塔克就通读了《陶渊明的幽灵》一书,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并热情洋溢地为其英文版写了一篇充满诗意、意涵深邃的序言。她言称:“工业革命已抵达尽端,我们正在迅速地毁坏生态系统,成千上万种生物濒于灭绝,垃圾堆积如山,毒素侵袭污染了我们的身体和大地的躯体。”^{[2]viii}她为此感到忧心忡忡,“摧毁的层级仿佛看不到尽头。现代性已步入死局,为此我们必须转向”^{[2]viii}。迷途知返,路在何方?她认为《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的陶渊明为人类提供了回归之路,这回归之路可描述为“与万物共生”。

她写道:“鲁枢元在其杰出的新作中探寻了这类可能性(与万物共生),他认识到,在我们的世界里陶渊明的声音所具有的潜在能量与可抵达的极限。他在思索,16个世纪之后,在我们高度现代化的世界里,陶渊明给予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关于自然朗照万物之质的见解,这见解具有罕见的穿透力,它让我们的心智与灵魂得以澄明。此一回归令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如何隶属于自然。”^{[2]vii}在其序言的结尾处,她这样写道:“这部著作将向读者深度地展现陶渊明的世界,读者可以听其吟诗,可与之共饮美酒佳酿,可聆听他弹奏跨越十几个世纪的琴声。通过陶渊明,我们可以回归宇宙自然。”^{[2]x}

三

英文版《陶渊明的幽灵》的出版,完成了一次从东向西的跨越,实现了一次汉语言文化向英美语言文化的转换。从小约翰·科布、斯考特·斯洛维克、特丽·威廉姆斯与布鲁克·威廉姆斯夫妇以及玛丽·伊芙琳·塔克等人的表述来看,这种跨越与转换在初始阶段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与作者、译者、校对者与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与彼此的理解和默契配合,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所阐述的是广泛意义上的生态主题,这个主题为世界各国的文化界人士所悉心关注。《陶渊明的幽灵》看似个案研究,但作者却是通过个案来探索普遍性的问题。与东方的陶渊明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梭罗,两者关涉的都是人

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陶渊明的参悟看起来是纯粹东方式的,但他的自然观对于世人而言,却具有世界性意义。为了便于西方人理解陶渊明,鲁枢元先生并未将其作为东方的话题来处理,没有采用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对其加以讨论,而是择取了跨文化的、跨域界、跨国界的分析视角,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皆可理解的方式,对其加以解析。“跨学科、跨国度地阐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一丝清幽之光,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3]2}作者频繁引用西方知名学者的著述,对其观点和主张加以反复印证。据译者孟祥春的不完全统计,本书共引用的西方学者的著述多达60余种,引述达100多条,从柏拉图、荣格、梭罗、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德里达、吉登斯、莫斯科维奇,到西美尔、舍勒、斯本格勒、汤因比、史怀泽等。

为了便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理解该书的要旨,最大限度地避免误读,作者听从出版社的建议,对原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以适应西方人那种简明扼要直达要点(brief to the point)的理解方式,将原本30多万字的原著压缩成18万字的缩写本,并将原来颇具虚灵玄幻意味的书名《陶渊明的幽灵》,改为理性直白的《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使西方读者一望即知其中的内容。

优质的翻译是理解原著的基础,为了能够做到最好,译者孟祥春殚精竭虑,尝试综合各种翻译理念的所长,前后花费了两年的时间翻译此书,对每一段行文、甚至每一个语汇都进行细致入微的推敲,以避免因翻译而导致的对原意的曲解。即使译者本人感觉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但他仍然还是认为请精通中文的西人来把关更让人放心,避免因文化习性或民族无意识铸就的理解屏障,于是便邀请西人巴兰坦做校对,从西方人的视角审视其译本,实现更为精准的文本的文化转换,以便西方读者更为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原意。

原书作者、译者、校对者、出版社四方齐心协力的结果令人满意,从英译本的读者的反应来看,语言文化的转换顺畅无碍,通过阅读英文版本,读者准确地理解并把握住了原作的宗旨与内文的意涵。由翻译达成的文化跨越成效显著,令人欣慰。然而,以此作为一个话题,从深层来讨论东西方文化的跨越与语言文化的转换,人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表面上显现的那么乐观。事实上,这种从东方向西方的文化跨越历来都是艰难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

转换亦充满艰辛,东西方之间的误读、误解、曲解及由此生出的敌意甚至对抗与此有着深度的关联。

四

不同地域文化跨越的艰难,有着各种各样的缘由,如缺乏共同的关切、相互需要的缺失、兴趣的缺乏、彼此之间的重要性差别悬殊、观看的方式迥异、文化的异质性、傲慢与偏见、无知与狂妄、文化语言的不对应性等。但从根本上看,文化跨越的艰难,尤其是东西方文化跨越的艰难,在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不对等性。造成这种不对等性的成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经济因素主导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走向;二是文化的异质性构成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屏障。

自近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国家开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使其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发达国家,进而成为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仰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清咸丰十年即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开启了向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学习的漫长历程,其间不乏抗拒与不情愿,有着旷日持久的论争,但学习的进程却从未中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向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学习。不可否认,发达国家在对物性意义上的世界与对人的认识、判断、剖析,对物质化的自然的解释、利用、开发等方面,的确有着过人之处;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人文探索与发现,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我们的生活中,大至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医疗卫生、教育,小至日常生活用品,总能看到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深刻影响。

在此格局中,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俯就与轻看,而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仰望与重视。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必然发达,由此滋生出实实在在的优越感,甚至衍生出源于文化无知的傲慢与偏见;而欠发达国家的人也会无意识地认同这种主张,相对于发达国家人们的文化上的优越感,欠发达国家的人会产生自卑感,即使是那些坚守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在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也会因为传统文化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能效的低下,而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底气不足。本应对等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就会处于失衡状态。从经验的层面上,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了解与认识,远胜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对我们的了解与认识。发达国家在文化上对我们的影响力,远大于我们对于他们文化的影响力。

五

然而,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尤为如此。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优越,这是一种原本并不可靠的假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西方文化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始基的理性文化,而东方文化则是感性文化。以前理性文化见长,像中国的《易经》、印度的《吠陀经》《奥义书》即是诉诸于文字的前理性文化的象征。这种前理性文化即使是在当今的东方世界,依然深入人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分析心理学家荣格与物理学家卡普拉对前理性文化的优长有着准确的把握和深入的理解。对于东方文化,继马可·波罗之后,歌德、莱布尼兹、孟德斯鸠、黑格尔等都曾谈论过。前两位对东方文化的评价是正面的,而后两位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论说则多是负面的,其中不乏偏见。这与他们的观看方式、判别标准高度相关。时至今日,其充满偏见的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误读,依然对西方人产生着影响。

作为东方文化象征的中国文化,除了具有人类文化的普同性价值之外,另有其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抛开成见,不乏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外国人,如汉学家史华兹,哲学家海德格尔,科学家玻尔,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传教士理查德·威廉(卫礼贤),心理学家荣格,文学家托尔斯泰,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等。史华兹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在汉学研究界影响力巨大的著述《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海德格尔这位举世闻名的德国哲学家长期迷恋老子之道,曾和萧师毅合译老子的《道德经》,并多次引用老子的言说;玻尔是现代物理学家,他曾和另一位物理学家泡利深入探讨过《易经》和《道德经》,并将太极图设计在他家族的族徽的中心;李约瑟力排西人误认为中国古代科技落后的成见,倾注大量的心血,完成了第一部以系统翔实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理查德·威廉(卫礼贤)与荣格深谙中国前理性文化的奥秘,曾不遗余力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卫礼贤先后将《道德经》《易经》《列子》《太乙金华秘籍》等大量中国古代典籍译成西文,荣格则为其翻译的《易经》作序,为其所译的《太乙金华秘籍》作长篇评论,并与其合作,完成了《太乙金华秘籍》德文的注

译本,出版社更名为《金花的秘密》;文学家托尔斯泰后半生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大量阅读诸子的典籍,尤为喜欢老子、孔子和孟子,编辑过中国古代圣贤箴言录,写过《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的道德经》,并尝试把《道德经》翻译成俄文;物理学家卡普拉极为重视以古代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他在其著述《物理学之道》的再版序言中写道:“对于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与东方神秘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深刻的和谐性的认识,看来只是一场更大的文化变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场文化变迁将导致一种对于实在的新观念的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想、看法与价值观。”^{[4]2}然而,从人口比例上看,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由于其傲慢与偏见,发达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文化,往往并不了解,甚至不愿去了解。对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他们更是一无所知。这并不是说,多数发达国家的人不能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只要放下偏见,认真对待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就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六

一种文化及文明有所长,必有所短。相对于中国文化与文明,西方文化与文明在物的方面使人获益,借助的首要手段就是科学技术,但为获取这种发展与文明的成果,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巨大而高昂。人们运用科学技术获取的物质文明,建立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盘剥自然、役使自然的基础之上,它破坏了人与自然初始的天然的联系,恶化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导致了生态的失衡与危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探讨由科技高度发展及其过度使用而引发的全球问题,由奥利里欧·佩切伊(Aurelio Peccei)发起,创立了罗马俱乐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大批由人类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等组成的队伍聚集在罗马俱乐部旗下,对人类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甚至连以研究动物习性见长的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另一幅面孔——在文明、发达的背后,是野蛮和对生态的破坏。洛伦兹愤而写下了《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在历数文明人所犯下的罪过之后,他指出:“严酷的事实迫使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同自然界相处中存在的问题……人类活动所招致的‘自然界的报复’,归根到底导致人

类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因此,人类如不改变对自然界关系中片面的认识与态度,全球问题的加剧,‘人类困境’的严重化,就将是不可控制的。”^{[5]221}

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需要反省,找出问题,转换视角,寻求答案。西方人在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寻找相关的资源时,通常会追索到梭罗,讨论他的生命实践以及其著述《瓦尔登湖》,并将《瓦尔登湖》一书奉为经典。梭罗倡导回归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身体力行,陶渊明是梭罗在东方世界的同道,在回归自然方面他比梭罗做得更为彻底,他几乎毕其一生都在从事这一实践,并留下来丰富的充满深邃洞见的诗文。陶渊明回归自然、与自然共生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着一条主线,其思想的源头可上溯至老子和庄子。老子、庄子、陶渊明的主张不仅值得中国人珍视,也值得西方人学习和借鉴。鲁枢元先生将陶渊明介绍到西方世界初衷即在于此。把陶渊明进而把庄子、老子的自然观推向西方,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圣贤的主张与生命实践,认识陶渊明,认识老子、庄子,正视并认真对待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自然观,在人与自然一体的自然哲学的视域中,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身体力行。这在当下彼此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也许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七

文化的非同质性或曰异质性,是造成文化交流与传播不对等的另一个原因。世界各地的文化皆为构成世界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既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异质性。由于地域、资源、人种、民族、生存环境、习俗、信仰、语言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每一种文化皆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那种地域上、人种上接近,生活环境、习俗、语言上相似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有着较多的共享性和理解的基础,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通畅,且趋于对等。如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人,彼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上少有屏障;英德虽各有不同,但类同性多于差异性,作为文化载体的英语与德语同属一个语系;法语与英语虽语系不同,但法语中有数千个单词与英语中的单词意思相同,只是词形略有差异,发音不同而已;而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不仅同属一个语系,而且许多词形、词义和发音都很相似,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鲜有障碍。而那类地域上遥远,人种上殊异,生活环境、习俗、语言

上彼此不同的文化,则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彼此间的文化交流需要越过重重屏障。

以中国与美国为例,地域位置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中国人是黄种人,而美国人绝大多数是白种人(虽然也有着黑种人、黄种人等);一个有着长达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一个仅有着短暂的200多年的历史;一个重含蓄内敛,一个率性通达;一个拥有脱胎于象形文字的表意文字,一个使用的则是拼音文字……若详尽梳理,还可以找出诸多相异之处。虽彼此之间的文化有着相对的同质性,但这诸多的异质性无疑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带来了不少困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最基本的方式,是语言的交流。而讲汉语与讲英语的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精神文化上的交流会遭遇到重重障碍。如龙是中华民族图腾,象征祥瑞,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但在西方世界,龙却代表着邪恶。因此要跨越这类由语言文化的异质性衍生的障碍,就要付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对这一点,《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译者深有体会。孟祥春所写的译者序可以对此加以印证。从大的方面说,中国文化重虚灵与领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重实体与分析。中国语言尤其是传统中国语言具有很强的诗性、具象性、隐喻性、多义性,甚至在看似具象的背后,有着无以言说的丰富意义,如自然、道、天、地、气、心、象、天下、江湖;不仅如此,中国语言中那种抽象而多义的词,如义、法、理、趣、韵、神、意、境等,在英语中也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或表达方式;甚至就连“仕”“太太”“麻将”“叩头”这样意义并不复杂的词,要在英语中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也无法办到。有的译者为了不丢失其中的含义,采用音译,然后加注释。从极致的意义上说,且不言翻译成英语,仅就在汉语体系中弄清楚一些词的词义,也并非易事。从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02页到105页,其所列举的关于“韵”一字的意义考辨有15条之多。徐复观对其多义性逐一做了解读,并总结道:“综上所述,可知‘韵’是当时人伦鉴识上所用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美,而这种美是流注于人的形相之间的,从形相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把这种形神相融的韵,在绘画上表现出来,即是气韵的韵。”^{[6]106}“自然”是鲁枢元先生在其著述中使用的重要范畴,有关“自然”一词在中文中多义性的考辨,鲁枢元先生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也花去了数页的篇幅,从词性的差异到

词义的歧义都进行了文献翔实的解说。

八

翻译是文化跨越的必由之路。在翻译界素有要求译者遵循“信、达、雅”原则一说。“信、达、雅”由严复提出,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严复开篇即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接着又言:“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皆以为信也。”随后又曰:“修辞立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7]具体说来,所谓“信”指的是意义不背原文,即译文要准确无误,不歪曲,不遗漏,也不随意增减;所谓“达”指的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要明白通顺;而所谓“雅”则是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原文本身的意味与神韵。

除了“信、达、雅”一说外,翻译界还有其他诸多的主张,如鲁迅有“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朱光潜有“诗论说”,认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是翻译艺术的最高境界;钱钟书有“化境说”,认为翻译的最高标准为“化”;郭沫若有其“再创论”,言说好的翻译与创作等同,甚至可超过创作;傅雷有“神似说”,他主张翻译应当像临画,所求的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叶君健有“竞争说”;罗新璋有“三非说”;许渊冲则有“优化说”,认为翻译应不拘原文字句,达到最优化,发挥译语优势,“译本应该尽量避免劣势,争取均势,最好能发挥译语优势,使译本能和原本一样成为文学作品”。他相当认同傅雷的说法,“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8]。^[215]

以上的说法各有特色,也各有侧重。可无论如何,这些说法几乎都无法绕开“信、达、雅”这三个方面,有的说法是“信、达、雅”一说的另一种表述,有的则是侧重其一,有的看似超越了严复的翻译准则,但其主张只适用于某种文体的翻译。

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中存在着先天的不对应性,所以“信、达、雅”原则,依然是无法超越的翻译原则。在我看来,这一原则几乎就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原则。即使是翻译大家,也无法达到这种原则的要求,不仅如此,这种原则也未顾及到翻译者作为主体甚至创作者的维度,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与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显然不同,而郭沫若、钱春绮、董

问樵翻译的歌德的《浮士德》也差别不小,但各有千秋,风采各异。

其实,换一种思路,既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自身所承载的文化的维度,人们应该考虑在内,所以我认为,可以将翻译视为文化转换,视为追求同感性、同情性的、设身处地的文化转换。英语的“翻译”一词就有转化、转换之意,即从一种文化相应地转换成另一种文化,若无法达成转换的完全对应,则可退而求其次,这是一种务实的也相对而言便于实际操作思路。从作者鲁枢元、译者孟祥春与出版社达成共识,最终将原书名《陶渊明的幽灵》改译为《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即可看到相关三方的务实态度和对接受者的考虑。孟祥春在译者序中谈到了对许多词语的理解和自己翻译处理的理由,既明智,又合情合理。加上巴兰坦的校对,译文的质量最终得以保证。翻译是艰难的,翻译也是可能的,尽管翻译是门遗憾的艺术,但它毕竟是精神、思想、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桥梁,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经之路。译者作为文化的摆渡人,或作为不同文化之间桥梁的搭建者,恪尽自己的职责,完成不同文化之间语言转换,建构不同文化之间的通途,可谓功德无量。

通过孟祥春的翻译,英文版本的《陶渊明的幽灵》得以在西方世界面世,这为西方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的自然观及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可让他们了解陶渊明的深邃博大和远见卓识,使他们看到东方诗人哲学家言说的普世价值所在。英文版《陶渊明的幽灵》的翻译出版,也完成了鲁枢元先生一个长期萦绕于心的良愿,让世界上热爱自由、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们共享陶渊明这一无价的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古代智慧的代言人,作为提供有关人与自然相处的最佳方式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作为文化象征,陶渊明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 [1] 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 生态文化研究通讯[J]. 2017(4).
- [2] LU Shuyuan.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 Ltd and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Singapore, 2017.
- [3] 鲁枢元. 陶渊明的幽灵[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下转第 128 页)

文学报刊与文化散文的兴起

——以《收获》《美文》为例

刘 静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文化散文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文化视角来关照表现对象,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同时,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文化散文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它的出现与文学报刊的推动密不可分,其中《美文》和《收获》功不可没。

关键词:文学报刊;文化散文;80年代;90年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15-0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散文创作开始出现“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景象。与“十七年”的散文相比,散文作家更加重视抒情散文、美文、艺术散文的创作。这与当时强调“回归文学自身”的潮流有关。从恢复散文的真实性到探究宇宙、生命、人生的哲理,从描写客观世界到刻画作家内心,从散文创作艺术的革新到散文创作观念的变革,可以说,在新时期散文创作呈现出蓬勃多元的趋势。到了90年代,贾平凹等人开始强调散文创作要“大开门户”,因此在90年代,除了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外,许多小说家、诗人、学者也热情地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如季羡林、史铁生、王蒙、北岛等,他们更注重散文的思想性、文化性和知识性,由此带来了散文文体的变化。于是,这一时期就出现了“文化散文”,这类散文有着共同的特性,即浓厚的文化氛围、深广的文化内涵和自觉的文化意识。以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以及流行为标志,文化散文开始逐渐流行起来,形成了一种影响十分广泛的散文创作潮流。

文化散文在90年代逐渐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大致因素可概括为:

①文化散文的出现是“五四”散文精神的回归,

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这与“寻根小说”的思潮异曲同工,都表现了新时期作家文化意识的觉醒。

②文化散文的出现与散文观念的革新密不可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讲真话、抒真情”使散文开始回归“真实性”传统;到了80年代中期,又开始恢复“文学是人学”的属性。随着散文主体性的恢复,到了90年代初,散文创作开始表现为以“个性化”为特点的艺术革新,进一步矫正散文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偏离。随着散文观念的不断更新,散文作家的创作也不再局限于抒发内心的情感,而转向批判、反思传统文化,肩负起重塑和建设民族精神的使命。

③文化散文的兴起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90年代,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开始改变,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渐渐抛弃了精神文化。在此情形下,许多作家开始关注人生,“十分注重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宏观的考察,相当深入地思索散文本体论的问题,思索散文与人类文明的关系”^{[1]1694}。

④文化散文的兴起离不开报刊的推动。20世纪以来,报刊引领各文学文体变革,改变了文学的传

收稿日期:2018-01-20

作者简介:刘静(1994—),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文艺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批评。

播方式,也使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是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文学报刊是国家调节与规范文学的重要手段,是作家作品产生的摇篮,是文学论争的主要载体,是文学潮流积聚的主要平台,也是各文学文体发展的实验基地。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使“文化散文”这种散文创作潮流得以传播,并形成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学现象。

一、文化散文的概念及创作特点

(一)文化散文的概念及其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这种“文化寻根”热潮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就是文化散文的兴起。余树森先生曾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对“文化散文”的概念进行了描述:“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文化倾向。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关照的热点。由于这种关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之为‘文化散文’;由于这种关照多以非凡的机智,集中透视矛盾诸相,故行文常含幽默,还由于作者故作‘超脱’与‘旷达’,所以常有苦涩掩藏于闲适中。”^{[2]258}以文化为关照,以反思传统文化为主题,是文化散文区别于一般散文的主要特征。

到了90年代,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作家开始以现代意识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寻求人类精神家园、重塑民族精神为己任,开始了文化散文的创作。文化散文发端于1990年代初余秋雨在《收获》杂志所开设的专栏文章,其形成标志则是1992年作者出版的《文化苦旅》一书。就其内涵,学者石华鹏曾给出这样的定位:“文化散文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的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3]因为思辨的介入,以及对知识的强调,文化散文与历史散文容易混淆。其实,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历史散文有着明确的判断体系,借以知兴衰,考得失。历史散文的判断力主要朝向价值判断,审美判断的因素无疑是弱化的,因此,识见能力是考量历史散文的重要标准。文化散文同样触及到历史中的人物、故事、命运遭际,然而在价值判断之外,文化散文还拥有鲜明的情感判断,作家笔下有明确的情感代入方式,也可以说,文化散文是一种双维度的文体。在当代散文史上,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尽管后期的他在写作上遭遇了瓶颈。文化散文这一文体形式虽然难以再续辉煌,然而后继者不乏,至于

行进到何种程度,尚需观察。

(二)文化散文的特点

文化散文常常以文化的视角关照生活,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在内容和艺术方面呈现出与一般散文不同的特点。

在内容上,文化散文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内容:①要表现传统文化的根基,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迹或者历史文化名人,这样才能找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文化人格的构成;②作家要有当代文化意识,站在现代思想的高度,表现现代人的审美情趣;③作家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结合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散文。

在艺术方面,文化散文冲破了以往散文所表现的自我的“小感触”,转而表现历史文化、自然山水、民俗风情等恢宏磅礴的对象,进而表现出“大散文”的气度。“文化散文高扬理性精神和英雄主义理想,理性的凝重与诗意的激情浑然一体,风格博大沉雄,散发出夺人的力度和灼人的热度”^{[2]261}。气势磅礴的主体精神和激情澎湃的诗意相结合,造就了文化散文在章法结构上一气呵成,少了几分精雕细琢,添了几分潇洒畅达。

二、文化散文的兴起与发展

文化散文的兴起是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开始的。“文化苦旅”是《收获》杂志的一个散文专栏,后来被集结成散文集。这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品格。“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远大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气。”^{[1]169}

余秋雨散文的特点:①描述中国文化的沉重脚印和苦难命运。在《莫高窟》和《风雨天一阁》中,表现出一种历史的悲怆感。这些文化古迹千百年来经历风雨的侵蚀,依然顽强地存留至今,虽然有些地方已满目疮痍,但其艺术魅力依然震撼人心。②余秋雨的散文热情讴歌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柳侯祠》和《苏东坡突围》,写了以柳宗元和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文人的坚韧。他们虽然被贬、丧魂落魄,却依然正直。尤其是《苏东坡突围》,概括了整个封建时代文人的命运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余秋雨在其散文中的批判与呼唤,选择与重构,应和了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焦灼和呐喊,表现出五四科学、理性、民主与启蒙精神在当今时代的重新崛起与深化。”^{[2]2653}余秋雨的散文是

在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土地上寻找失落的文化灵魂。《洞庭一角》写了范仲淹在经历政治上的失利后,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西湖梦》,写出了—个极其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余秋雨的散文潇洒飘逸,汪洋恣肆,既有诗意,也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引发了国内文化散文的创作热潮。90年代中期,在文化散文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夏坚勇。1993年,《雨花》杂志推出他的散文专栏。1996年,他出版了文化散文集《湮没的辉煌》,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为散文界的翘楚。相对于余秋雨潇洒恢弘的气势,夏坚勇的散文则更加细腻深沉,考据充分,抽丝剥茧。《湮没的辉煌》一书以细致、感性的笔触,展示了历史的回眸—瞬,把历史与散文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既有荡气回肠的厚重感,又不乏细腻的文笔与精巧华美的妙句。作者细细剖析了每个朝代兴衰背后深刻的政治、文化、经济因素,旨在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

随着文化散文的不断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游记+历史典故+幽思”的创作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祝勇的“故宫系列”文化散文,完全不同于过往“文化大散文”的写作套路。祝勇的散文既延续了文化散文沧桑感与厚重感,又独辟蹊径,痴迷于描写那些被人忽视的角落缝隙,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从而完成对传统文化散文的超越。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共分为七章,每章围绕—卷画、—幅字,甚至—个人、—种艺术类型,进行时空的逆旅,沿着历史的蛛丝马迹,纵观人物—生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放眼看尽那个时代的浮沉变迁、命运辗转。而在《故宫的隐秘角落》—书中,更多的是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不仅写了康熙、乾隆、嘉庆、李自成、吴三桂等历史中的大人物、寿安宫中那位被历史遗忘的太子胤礽以及文渊阁中以戴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像,还写了后宫中皇后妃子的生活。祝勇笔下的这些人物,无论是皇帝、嫔妃、太监、宫女还是文人名士,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个体。祝勇立足于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维度,用全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他有宏阔的视野,执著的文化情怀,和对人性的深度观察以及对文体探索的激情。他的文字充满了睿智的思考和诗意的描述,将那些被尘封的历史尽数还原,同时也调动了读者的情感与想象,使历史重新变得鲜活。

文化散文从当初的横空出世,再到世纪之交因余秋雨的饱受争议而引起批评界的审视和批判,以

及后来者的邯郸学步所导致的格式化和套路化,再到当下的文化散文写作者的策略调整,构成了“文化散文”兴起、发展的曲线图。

三、报刊对文化散文的推动

新时期文化散文能够在众多散文流派中独树一帜,这与报刊的推动密不可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以文学报刊为主导的文学时代,文学刊物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对于“文化散文”的推动主要是以《美文》和《收获》为主。

(—)《美文》的推动

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散文也迎来—次热潮,各种散文集、散文选开始被大量编选出版,各种文学报刊也开始注重散文的发表,开辟了散文专栏,大大激励了—些作家投入到散文的创作中,—时间各种随笔、散文小品数量大增,散文迎来了“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报刊开始了对散文创作的讨论。

《美文》的主编贾平凹曾在《美文》的发刊词中说:“我们这份杂志,将尽力克服我们编辑的狭隘的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供版面。在这块园地上,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作生命的沉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所以,在《美文》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冰心、施蛰存、杨绛、萧乾、汪曾祺、流沙河等老—代作家的作品,也可以看到史铁生这类文坛中坚的散文佳作。

在“大散文”观念的感召下,不少知名学者在《美文》刊登散文,张中行、金克木、陈平原、周国平、余秋雨等人的作品,催生了学者散文的热潮。为践行“大散文”的观念,《美文》重视多种文体相互融合的实验:其—,鼓励小说家写散文,如莫言、池莉、叶兆言等小说家的散文。还有,如王祥夫主持的《山西作家散文小辑》,全部出自小说家之手。其二,鼓励诗人写散文,周涛主持的“新疆散文小辑”,几位作者都是新疆的青年诗人。其三,鼓励艺术家写散文,如吴冠中、黄苗子、韩美林、韩羽等画家的散文。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散文创作迎来了新的发展。许多作家的散文创作抛弃了传统散文短、小、精的特点,开始转向大题材、大篇幅、大主题的“大散文”。作家的创作不受限制,思路大开,跳出了以前描写客观生活、抒发自我内心的小圈子,开始对宇宙、文化、人生进行思考与批判,以现代的角度对传

统文化进行反思,以重塑和建设民族文化和民族品格为己任。散文作为一种相对自由的文体,更多的承担起了反思文化、思考生命的重任。

(二)《收获》的推动

新的散文观念的提出,得到许多报刊的纷纷响应,如《上海文学》1992年设置“蜂花散文”栏目,散文在刊物上的篇幅和地位开始明显上升,后又增设“人文随笔”栏目,推动了1990年代文化散文的崛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发表于此;90年代《散文选刊》遴选出大量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三十年的重量》《一个王朝的背影》等。而其中推动最突出的是《收获》。

散文历来不是《收获》的主打栏目,但在90年代有所改变,《收获》调整了办刊方针和思路,散文专栏几乎占据一半版面,与小说平分秋色。《收获》先后开设30多个散文专栏:如余秋雨“文化苦旅”(1988.1—6)、“山居笔记”(1993.1—1994.6)、“霜天话语”(1998.1—6)、“旧城迷藏”(2001.3—6)等专栏。其中他的前两个专栏后来分别集结出版。钱谷融、施蛰存、贾植芳、蒋孔阳、许杰、汪曾祺、柯灵、冰心、曹禺、巴金等三十余人参与的延续至今的“人生采访”专栏(1989.2—1992.5,1994—1998,2000—);李辉的“沧桑看云”专栏(1994.1—1996.6);持续二十余年的“河汉遥寄”专栏(1991.1至今),旨在缅怀故去的文化前辈;王蒙、沈从文、萧乾、巴金、柯灵等参与的“作家书简”专栏(1992.1—5);萧乾“玉渊潭漫笔”专栏(1996.1—6),陆键东“世纪流云”专栏(1997.1—6);阿城“常识与通识”专栏(1997.1—1998.6);余华“边走边看”专栏(1999.1—6);“走近鲁迅”栏目(2000.2—);张承志“鞍与笔”专栏(2001—2002);邵燕祥“尘土京华梦”

专栏(2002.1—6);冯骥才“田野档案”专栏(2004.1—6)与后来的“行动散文”专栏;李辉“封面中国”专栏(2005.1—2006.6)等。通过这些专栏,《收获》创立了“文化大散文”的概念,推动了“学者散文”的兴起与发展,使散文从单一的抒情向深厚的人文内涵拓展,成为精神探索的园地。

四、结语

总体上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以文学报刊为主导的文学时代,文学报刊是作家作品产生的摇篮,是文学争论的主要载体,是文学潮流积聚的平台。90年代,由于网络还没有大规模兴起,报刊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对“文化散文”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散文时代”(吴秉杰语),散文界开始出现年度评点、散文年度选本等,这些基本上立足于刊物,尤其是对某几个刊物的倚重,非常明显。像《收获》《美文》《雨花》这三份刊物对“文化散文”的推动和引领,《山花》对先锋小说的引领,《读书》《天涯》对思想性随笔的引领,皆是文学报刊对文学类型深化以及文学思潮涌现的具体贡献。

参考文献:

- [1]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 [2]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3]石华鹏.文化散文的命运[N].文艺报,2014-07-18.
- [4]李莞.“文化散文”的特征及其探源[N].四川教育学院报,2009-12-1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Rise of Literature Newspapers and Cultural Prose

—Taking *Harvest* and *Meiwen* as Examples

LIU J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prose appeared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aking care of the expression objects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which is not only full of thinking, but also of cultural concern and personal feelings. Using the image and emotion of literature to awake the sleeping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enrich the depth of prose with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Culture prose is full of intellectual thinking, there is no lack of cultural care and personal feelings. Its appearance i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journal of literature, which *Meiwen* and *Harvest* contributed.

Key words: journal of literature; cultural prose; the 80s; the 90s

我国中部城乡居民食品 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杨雪¹, 王菲², 冯念青¹, 尹新丹¹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郑州 450046;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建立 AIDS 模型,根据中国中部 8 省城乡居民 2000—2015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情况,对居民的粮食、肉类、蛋类、水产品 4 小类食品平均支出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中部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主要研究结论:中部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中粮食支出份额最高,城镇居民肉类消费支出较高;城镇居民蛋类和肉类的支出份额随真实收入的增加反而下降,农村居民则会随着真实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城镇就业者人口负担重的家庭对粮食和肉类的消费支出较高,农村劳动力人口负担重的家庭对粮食的消费支出较高。

关键词: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4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19-05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2017》的分类,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拥有区位优势性和综合经济优势。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影响下,研究中部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对促进中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近些年 CHU^[1]、LIU^[2]、ALMAS^[3]、周大超^[4]、王志刚^[5]、吴蓓蓓^[6]、郝凯^[7]、陈永福^[8]等的研究主要从总体消费趋势、消费支出结构和特定消费支出等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情况进行分析,但是对中部地区的研究较少。本文针对中部地区食品消费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AIDS 模型进行分析,提出促进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的建议。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一)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搜集整理了我国中部 8 省 2000—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内部结构的变化情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获

取完整性,选择居民食品消费重要的 4 个小类进行分析,分别为粮食、肉类、蛋类和水产品。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6 年)中的居民人均收入与支出、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以及《中国价格指数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情况。由于农村居民对食品 4 小类的消费支出情况目前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在此采用“人均消费量×价格”的计算方式,得到 4 小类食品的支出份额情况。其中,每小类食品的消费数据来源于 2001—2015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农村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情况,选取代表性商品的价格进行计算。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商品的代表性,选取粮食中的粳米、肉类中的猪肉、蛋类中的鸡蛋、水产品中的草鱼进行价格统计,数据来源于 2001—2015 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中的各地区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

收稿日期:2018-04-17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研究”(2016BJJ036);“河南省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研究”(2017BJJ062)

作者简介:杨雪(1966—),女,河南光山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二) 数据预处理

(1) 价格指数。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食品4小类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定基处理,其中 P_1 代表粮食消费价格指数, P_2 代表肉类消费价格指数, P_3 代表蛋类消费价格指数, P_4 代表水产品类消费价格指数。

(2) 真实收入。真实收入 = 名义收入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便于表达,记为 $M = V_{kt}/P_{kt}$,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粮食、肉类、蛋类、水产品等食品4小类的占比分别用 FW_1, FW_2, FW_3 和 FW_4 表示,文中相关计算在Eviews 6.0中实现。

二、模型方法

本研究采用AIDS模型进行居民消费需求系统分析,建模思路是:在给定价格体系和一定效用水平的条件下,消费者能够以最小化的支出实现既定的效用水平。采用我国中部8个省份2000—2014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具体的模型设定为

$$FW_{kt}^i = \alpha_{ki} + \beta \ln(V_{kt}/P_{kt}) +$$

表1 城镇居民食品4小类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变量	粮食		肉类		蛋类		水产品	
	系数	t 统计量	系数	t 统计量	系数	t 统计量	系数	t 统计量
C	-0.4039***	-3.9847	0.3536***	4.7024	0.4342***	14.7225	-0.1520*	-1.7504
lnM	0.0292	1.1387	-0.0412**	-2.1614	-0.0128*	-1.7133	0.0701***	3.8885
lnP ₁	-0.2800***	-4.3528	-0.2034***	-4.2616	-0.0438**	-2.3380	-0.1508***	-2.6841
lnP ₂	0.1305**	2.1697	0.1691***	3.7906	-0.0226	-1.2912	-0.0697*	-1.7797
lnP ₃	0.0127	0.1428	0.0532	0.8038	0.0074	0.2851	0.0116	0.2001
lnP ₄	0.1490**	2.3006	0.2477***	5.1554	-0.0240	-1.2752	0.0237	0.5129
X ₁	0.2448***	12.2962	0.0375**	2.5395	-0.0624***	-10.7717	0.0229*	1.6756
X ₂	-0.0010***	-3.0656	-0.0034***	-13.7288	0.0015***	15.6204	0.0002	0.2691

注:*, **, *** 分别表示在10%, 5%, 1%水平下显著。

首先来看表1中真实收入的系数,肉类和蛋类的系数在5%和10%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随着真实收入的增加,居民对这两类食品的消费份额下降,且蛋类下降份额高于肉类,说明在城镇居民的支出中肉类和蛋类的支出为优先选项。水产品真实收入系数在1%水平下为正,可能是因为当前多数城镇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以肉禽和蛋类为主,对水产品的消费水平还较低,但水产品的营养价值较高,当收入增长时城镇居民更愿意增加对水产品的消费,以改善食品消费结构。

其次,运用表1中4小类食品的价格系数,分析每小类食品价格分别对支出份额的影响。粮食价格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其支出份额还受肉类价格和水产品价格的正影响,表明肉类价格和水产品价格上升有利于城镇居民基本的粮食消费。虽然

$$\sum_{j=1}^4 \beta_{ij} \ln(P_{kt}^j) + \gamma \cdot X_{kt} + v_{kt}^i,$$

式中: FW_{kt}^i 中的 $i = 1, 2, 3, 4$,分别表示 k 地区 t 时期的粮食、肉类、蛋类和水产品的支出份额; α_{ki} 表示 k 地区食品消费第 i 种消费品支出方程的常数项; V_{kt}/P_{kt} 表示真实收入,其中 V_{kt} 和 P_{kt} 分别指 k 地区 t 时期的居民名义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 P_{kt}^j 中的 $j = 1, 2, 3, 4$,表示 k 地区食品消费第 j 类的价格指数,分别代表粮食价格、肉类价格、蛋类价格和水产品价格; X_{kt} 是控制变量,为地区的特定变量,代表居民人口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分别记为 $X_1, X_2; v_{kt}^i$ 为残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 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情况

基于整理的数据,构建城镇居民食品消费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分析采用Eviews 6.0软件,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1。

蛋类价格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肉类价格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居民对肉类具有刚性需求,但从系数大小来看,肉类价格系数小于粮食的自身价格效应,说明肉类的支出份额还受粮食价格的负影响。蛋类价格系数不显著,粮食价格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粮食价格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减少了对蛋类的消费。水产品价格系数并不显著,粮食价格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肉类价格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粮食和肉类价格的上涨使得居民对水产品的支出份额减少。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城镇居民4小类食品消费的影响。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显著影响粮食消费支出份额,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负担重的家庭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大; X_1 对肉类和水产品支出份额的系数分别在5%和10%水平下显著

为正,对蛋类支出份额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城镇化率对粮食和肉类的支出份额有负向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对蛋类有显著正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居民更偏向于增加对蛋类产品的消费,以改善食品消费结构。

(二)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情况

在中部农村居民4小类食品消费模型中,粮食和肉类消费为变截距模型,蛋类和水产品消费为变系数模型。为便于分析,将农村居民的粮食和肉类消费占比回归结果列于同一表中,蛋类和水产品消费情况单独列表说明。

1. 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食品消费情况

关于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消费支出情况,首先来看表2中真实收入的系数,粮食类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肉类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真实收入的上升,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份额下降,肉类消费份额上升。其次,运用表2中的4小类食品价格系数,分析每小类食品价格对支出份额的影响。粮食价格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有很强的刚性。粮食支出份额还受肉类价格的正影响,受蛋类价格和水产品价格的负影响,蛋类价格和水产品价格上升不利于农村居民基本的粮食消费。肉类价格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但从系数大小来看,小于粮食的自身价格效应,说明肉类的支出份额还受粮食价格的负显著影响。蛋类和水产品价格对肉类消费均产生正影响。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消费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人口负担显著影响粮食消费支出份额,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负担重的家庭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大;对肉类支出份额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农村儿童和老人的食品需求偏向于级别更高的蛋类和水产品,但其系数小于粮食的效应,说明农村人口负担重的家庭更偏向于粮食消费,更倾向于解决温饱问题。城镇化率对居民的粮食支出有正向影响,对肉类支出有负向影响。

2. 农村居民蛋类食品消费情况

关于农村居民蛋类消费支出情况,首先来看真实收入的系数,从表3可以看出安徽省和河南省的系数分别为0.0797和-0.1106,均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随着真实收入的上升,河南省农村居民对蛋类的消费份额下降,安徽省农村居民的蛋类支出则增加。湖南省真实收入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蛋类消费支出增加。

表2 中部农村居民粮食和肉类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变量	粮食		肉类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C	2.0513***	22.9987	-0.9950***	-12.3532
lnM	-0.3325***	-14.7883	0.2962***	14.5898
lnP ₁	0.5959***	6.6510	-0.5464***	-6.7536
lnP ₂	0.4373***	8.0622	-0.4418***	-9.0185
lnP ₃	-0.3101***	-3.5614	0.3673***	4.6715
lnP ₄	-0.4040***	-5.5075	0.3561***	5.3750
X ₁	0.3813***	11.9511	-0.3416***	-11.8558
X ₂	0.0015***	3.6057	-0.0023***	-5.9161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表3 中部农村居民蛋类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地区	lnM		lnP ₁		lnP ₂		lnP ₃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山西	0.0620	0.9361	-0.1005	-1.1085	0.0217	0.4156	0.1094	1.4663
吉林	-0.0484	-1.5590	-0.0151	-0.2003	0.0463	0.8651	0.1012	1.0859
黑龙江	-0.0344	-0.7917	0.0566	0.6495	0.0822	0.7740	0.0228	0.1940
安徽	0.0797**	2.3215	-0.1023	-1.4256	-0.0402	-0.6285	0.1505	1.5756
江西	-0.0166	-0.3906	-0.0423	-0.4226	-0.0202	-0.2916	0.2101	1.5047
河南	-0.1106**	-2.3306	-0.4196***	-4.9811	-0.1335**	-2.3005	0.3594***	3.2885
湖北	0.0155	0.4145	-0.0289	-0.3265	-0.0186	-0.2171	0.0398	0.3629
湖南	0.1241***	4.1259	-0.2319**	-2.3276	0.0543	0.9540	-0.0070	-0.0831

地区	lnP ₄		X ₁		X ₂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山西	-0.0373	-0.6283	-0.0119	-0.2827	-0.0023	-0.7047
吉林	-0.0486	-0.7334	0.0275	0.4629	-0.0009	-0.2508
黑龙江	-0.1980	-1.4141	-0.0631*	-1.9775	0.0021	0.3057
安徽	-0.0224	-0.1997	-0.0991*	-1.9661	-0.0035	-1.6152
江西	-0.0760	-0.8549	0.0246	1.3892	-0.0006	-0.7083
河南	0.1688*	1.7954	0.1323**	2.1093	0.0104***	3.7664
湖北	0.0024	0.0277	-0.0157	-0.2829	-0.0004	-0.2175
湖南	0.0262	0.2612	0.0300	0.1722	-0.0014	-0.501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其次,运用表3的价格系数来分析每小类食品价格分别对支出份额的影响。河南和湖南粮食价格系数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这两个省份粮食价格上涨会使农村居民减少对蛋类的支出。河南省肉类价格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0.1335,说明肉类价格上涨会使居民减少蛋类消费。蛋类价格对自身支出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河南省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为0.3594。水产品价格对蛋类支出的影响,只有河南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河南省水产品价格的上升,农村居民的蛋类消费支出增加。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蛋类消费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人口负担对黑龙江、安徽和河南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10%和5%。对黑龙江和安徽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河南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黑龙江和安徽两省农村人口负担越重,居民对蛋类的消费越少,而河南则相反。城镇化率对河南的影响较为显著,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

3. 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情况

用表4数据分析农村居民水产品支出情况。首

先来看真实收入的系数,吉林、湖北和湖南显著性较突出,分别在5%,1%和5%水平下显著。其中,随着收入的增加,吉林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减少,湖北和湖南两省则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水产品消费相应增加。相对于吉林居民的饮食习惯,这可能与湖南湖北有水产优势相关。

其次,运用表4中的4小类食品价格系数,来分析每小类食品价格对支出份额的影响。湖北粮食价格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粮食价格上涨会使农村居民减少水产品的支出。湖北省肉类价格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0.4565,说明肉类价格上涨使居民会减少水产品的消费。吉林、黑龙江和湖北的蛋类价格系数分别在1%,10%和5%水平下显著,随着蛋类价格上升,吉林、湖北农村居民蛋类消费支出增加,说明蛋类消费在这两个省份是刚性需求。黑龙江农村居民则是随着蛋类价格的上升,消费支出减少。水产品价格对自身支出份额的影响,吉林和湖北分别在1%和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

表4 中部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占比回归结果

地区	lnM		lnP ₁		lnP ₂		lnP ₃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山西	0.0332	0.2441	-0.1063	-0.5712	-0.0246	-0.2297	0.0259	0.1688
吉林	-0.1356**	-2.1271	-0.2265	-1.4633	-0.1593	-1.4506	0.6118***	3.1994
黑龙江	-0.0114	-0.1279	-0.0355	-0.1984	0.2026	0.9294	-0.4787*	-1.9835
安徽	-0.0001	-0.0018	-0.1033	-0.7015	0.0297	0.2257	-0.0891	-0.4547
江西	-0.0238	-0.2726	-0.1829	-0.8906	0.0103	0.0726	0.1954	0.6818
河南	-0.008	-0.0823	0.0508	0.2938	0.0122	0.1026	-0.005	-0.0221
湖北	0.2156***	2.8149	-0.3088*	-1.7003	-0.4565**	-2.5901	0.4742**	2.1085
湖南	0.1571**	2.5454	-0.2485	-1.2149	0.1603	1.3724	0.0115	0.0662

地区	lnP ₄		X ₁		X ₂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山西	0.0909	0.7456	-0.0107	-0.1239	-0.0004	-0.0587
吉林	0.4689***	3.4478	0.6046***	4.9631	0.0347***	4.7084
黑龙江	0.0756	0.2631	0.0054	0.0826	0.0215	1.4950
安徽	0.0830	0.3601	0.0916	0.8852	0.0057	1.2727
江西	0.0984	0.5390	0.0683*	1.8813	0.0012	0.7210
河南	-0.0862	-0.4468	0.1575	1.2231	0.0025	0.4415
湖北	0.3191*	1.7887	-0.1461	-1.2859	-0.0066*	-1.9823
湖南	-0.0646	-0.3134	-0.0393	-0.1101	-0.0029	-0.517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人口负担对吉林和江西两省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和10%。吉林和湖北的城镇化率对居民水产品支出份额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随着吉林城镇化率的提高,居民对水产品的消费支出增加,城镇化率对湖北居民水产品支出有负影响。

四、结语

通过构建 AIDS 模型,对我国中部8个省区城乡居民4小类食品消费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1)城镇居民食品消费中,肉类消费为刚需。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中,粮食消费为刚需,肉类、蛋类和水产品仍然为奢侈品,但其需求表现出一定刚性,说

明中部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处于低水平且急需提高。

(2) 城镇居民的支出中, 肉类和蛋类的支出为优先选项, 水产品消费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农村居民粮食的支出份额随真实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肉类的支出份额则随之上升, 表明增加居民真实收入能影响食品消费结构, 使农村居民的消费逐步转向肉类等高水平消费层次。

(3) 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人口负担越重的家庭, 对粮食的消费支出越高;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 居民对粮食和肉类的支出减少, 蛋类消费份额增加。就农村居民而言, 平均每一劳动者人口负担越重, 对粮食的消费支出越高。城镇化率越高, 居民肉类支出越减少, 对各省居民蛋类和水产品消费影响程度及显著性差异较大, 情况较复杂。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针对农村居民, 通过对种粮进行各种补贴, 比如良种补贴、使用农机具补贴、农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 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2) 培育城乡居民新的消费热点。要依据本省消费结构的转型趋势, 引导城乡居民培养合理的消费习惯, 刺激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形成良好的循环。

(3) 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二是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基

本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公路; 三是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

参考文献:

- [1] CHU R W, LIU M, SHI G J. How rural - urban identification influences consumption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grant worker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2015, 27(1): 40 - 60.
- [2] LIU H B, PARTON K A, ZHOU ZH Y, et al. At - home meat consump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9, 53(4): 485 - 501.
- [3] ALMAS I. International Income Inequality: Measuring PPP bias by estimating Engel curves for food[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2): 1093 - 1117.
- [4] 周大超, 朱玉春. 消费品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福利的影响[J]. *贵州农业科学*, 2013(7): 212 - 217.
- [5] 王志刚, 许前军. 探索农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规律[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1): 50 - 64.
- [6] 吴蓓蓓, 陈永福, 于法稳. 基于收入分层 QUAIDS 模型的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行为分析[J]. *中国农村*, 2012(4): 59 - 69.
- [7] 郝凯. 北京市城市居民食品消费分析[J]. *商业现代化*, 2006(13): 205 - 206.
- [8] 陈永福. 中国食物供求与预测[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姚虹)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entral China

YANG Xue¹, WANG Fei², FENG Nianqing¹, YIN Xindan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MDS mode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ata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per capita foo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eight central provinces of China, and the average expenditure data of food, meat, egg and aquatic products in four categor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changing trend and reason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entral China. The main research conclusion: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ve the highest share of food expenditur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in urban areas is higher; the share of expenditure on eggs and meat of urban residents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al income, while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will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al income; the consumption of grain and meat is higher in households with a high employment burden per worker in urban areas;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food is also higher in rural areas, where the burden of employment is higher for each labor force.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fluencing factors

基于地域文化的河南城市风貌规划问题研究

杨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艺术系, 郑州 450046)

摘要:以河南省郑州、开封和洛阳的城市风貌规划策略为研究对象,运用人文社会学、色彩设计学、城市规划学和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上述城市进行深入的剖析,指出城市面临的风貌规划问题,在战略层面对河南城市的风貌规划提出初步的研究策略,并提出解决城市建设的研究方法,以期对河南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城市风貌;地域性;色彩;文化底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24-04

河南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古都数量较多。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持续发展,但长期忽视文化建设,多数城市的建设在统一样板化的现代城市规划设计下,地域和文脉特征弱化甚至消失,出现“千城一面”的发展现象,无法彰显城市的个性特色和文化底蕴。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注入人文因素,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区域特色,不仅有利于延续城市的文化文脉传承,增加城市的软实力,更能增加城市的发展活力。城市风貌是否准确定位,规划控制的手段如何实现城市风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城市风貌如何有效控制,这些问题需要加强研究。

一、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调研分析的方法

1. 城市风貌的地域规划

在地理地域与自然环境方面,城市地域规划关注土地使用,规划许可、保护和利用环境,公共福利以及设计中的城市环境,包括空气、水和基础设施穿入或穿出的城市地区,如交通、通讯和分销网络。城市规划也被称为区域规划,它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包括社会、工程和设计科学。城市规划与建筑、景观建筑、土木工程和公共行政等相关领域合作,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早期的城市规划往

往是这些同源领域的组成部分,如今城市规划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该学科类别更广泛,包括不同的子领域,如土地使用规划、区划经济发展、环境规划和交通规划等。

2. 城市风貌的色彩因素

在城市环境和建筑的风貌规划方面,城市风貌规划色彩因素一般是指视觉知觉组织感受的裸露在外的公共空间中建筑、广告和一些形式结构与原材料所呈现的色彩关系,主要包括山石河流、花草树木、房屋建筑等,那些处于隐藏的地下建筑、各类管道设施等则不属于城市风貌规划的色彩设计范畴。城市基础色彩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流动色和固定色。流动色包括城市空间霓虹广告招牌、流动车辆、园林景观等,固定色包括城市的道路桥梁、河流山川等。(2)人工色和自然色。人工色如城市中广告标识标牌和灯光色彩、房屋建筑玻璃外墙色彩、交通工具色彩等,自然色包括园林景观(如绿植花卉)、山川湖泊等自然原色。

3. 城市风貌的人文因素

一个城市的基础色彩会受到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人文因素包括地域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建设技术,这些因素都会体现在城市的色彩上。

收稿日期:2018-04-15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视阈下的河南城市风貌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162400410205)

作者简介:杨冬(1977—),女,河南信阳人,硕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

在科技不发达的过去,我国诸多城市的色彩是由建材本色构成的,如古代为木色,近代为水泥色、砖瓦石色,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推出和应用,城市色彩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现代化城市多运用玻璃材质和钢化材料。城市的形象,不仅包括城市景观、街区、建筑、公共设施等硬件形象,而且包括政府形象、社会风气、风俗习惯、市民行为等软件形象。^[1]宗教文化对城市色彩影响较大,在一些宗教色彩浓郁的城市,有较多建筑会运用代表着神圣、超凡寓意的黄色,或代表佛性无暇寓意的白色等等。开封是一个回族居民较多的城市,清真寺的建设在选材和色彩上需要考虑其宗教色彩的运用。

4. 城市风貌的自然因素

石材丰富的区域和木材丰富的区域,其建筑物的选材比例是不同的,进而影响到城市基础色彩的表达。因此,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也应重视材料资源方面的选择。处于不同气候带的城市,其色彩偏好也不同。北方城市侧重温暖的暖色调,例如米黄色等,以期用色彩的视觉心理反应获得温暖的心理感受;南方城市倾向清凉爽快的冷色调,例如淡蓝色和淡绿色等。根据地域和文化的不同,本文选择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作为考察对象。三个城市皆属于偏北方城市,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这些城市现有色彩信息进行采集,使用现代技术定格城市现状风貌的色彩,注重城市色彩文化的厚重感和历史感,在此过程中直接掌握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确定并规划能体现其地域文化特征的城市风貌奠定基础。

二、城市地域文化风貌的准确定位

城市地域文化特色是经历了长期的经济、文化、社会变迁沉淀下来的文化体系,呈现出一座城市外在形象的文化底蕴。目前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城市形象的定义:城市形象是城市整体化的精神与风貌,是城市全方位、全局性的形象,包括城市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城市居民的整体价值观、精神面貌、文化水平等。^[2]通过综合城市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等,来确定城市色彩的倾向。

1. 城市风貌的历史文化标识

郑州古为商城,是商王朝的开国之都,“商都”是郑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文化标识。作为国际性交通枢纽和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的现代化特色比较显著,而历史文化风貌逐渐弱化,为此,近年来郑州启动了“郑州四大历史文化片区”建设,旨在保护郑州的核心文化价值,塑造城市文化新形象。洛阳是举

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遗留是彰显洛阳城市风貌特色的重要标识之一。洛阳依洛水而建,境内山川纵横,老君山、白云山等是其重要的自然景观,也是形成洛阳城市总体景观感受和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洛阳还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风貌体现出洛阳“古今交融”的风貌特色。因此,洛阳城市的地域文化风貌色彩应是多样的,不同功能区的主体色彩是不同的。开封位于华北平原与黄河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平坦,河湖交横错综,水系四通八达,是“北方水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城市商业繁荣,文化氛围浓厚,经济和交通便利,并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北宋时期繁荣的文化艺术更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因此,开封的历史文化特征也较为显著。

2.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风貌

当前人们越来越关注未来与水的关系,无论是“可持续的”“一体化的”或是“敏感的”,未来水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应与城市发展相适应。“水敏感城市设计”这个术语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可以将人、建筑环境、基础设施、生物生态系统、资源利用和水之间的理想关系的模糊概念联系起来,人们可以分享和比较他们对新兴水资源战略的理解,从而有助于确定和整合不同的资源来应对挑战。

三、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规划方法研究

城市风貌规划工作包括调查与分析、谱写主旋律及其谱系、规划编写区域风貌的应用、色彩管理4个基本步骤。

1. 城市规划调查与分析

城市的规划除了硬件设施,还有软件公共设施的设置。目前在郑州、开封和洛阳,老城区的街道、建筑、绿色植被等的规划设计以及城市风貌日趋形成,无法满足居民生活和交通的需求,新城区的建设则扩大了街道、道路和绿化环境的面积,如郑州郑东新区的森林公园、龙子湖和象湖的绿色规划,开封新城区以汴西湖为中心的规划,洛阳新城区以兴洛湖为中心的规划等,在城市扩展、缓解城市拥挤和交通堵塞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城市战略发展计划中公共交通起着关键作用,除了公交汽车和出租车外,地铁、单车和电动汽车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解决了很多能源环境问题和城市交通问题。郑州10余条地铁线的规划和建设运营为城市的轨道交通打开了新局面,如果电动汽车能够普及,就能

减少城市的废气排放污染。

2. 城市风貌谱写主旋律与其谱系

解读景观不仅能够识别城市风貌类型,而且也是谱写主旋律和谱系的关键。每个城市空间或系统都由标准定义,这些标准增加了关于某些景观的工作原理的知识。如郑州的嵩山少林寺和黄河文化,开封的汴梁宋文化和洛阳的龙门石窟文化等。景观是了解城市空间的重要方面,公园通常提供种类最多的项目,而花园往往侧重于被动应用。城市景观的规模与其所在城市的相对规模和人口密度有关。一个服务于居民相对集中的社区小公园,其内在价值不亚于为整个城市提供服务的大型公园。一定程度的园艺强度通常会定义花园与其他类型的景观。例如,郑州绿博园的植物调色板总体上相当有限,但却巧妙利用大面积播种的花园。绿色计划是一个城市发展必不可缺的关键,成功实施绿色计划需要提高公众的认识水平和参与程度,需要更透明的成本效益分析来促进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

3. 城市规划编写区域风貌的应用

城市编写规划理论是定义城市规划知识体系的主体。有8种规划程序理论仍然是当今规划程序的主要理论:理性全面方法、渐进方法、交互方法、交际方法、倡导方法、公平方法、激进方法和人文主义或现象学的方法。所考察城市的区域风貌规划各有特色:郑州现有7区5市1县,其中中原区有碧沙岗公园等,二七区有二七广场、德化街等,管城回族区有商城遗址等,金水区有河南省博物院等,上街区有铝城公园等,惠济区有黄河风景名胜区等,郑东新区有河南艺术中心、绿博园等。开封分为6区4县,有以相国寺为中心的鼓楼区,以龙亭公园、清明上河园和御街为中心的龙亭区,繁塔所在的禹王台区,朱仙镇木板年画为特色的祥符区,以金明池和小宋城为主的开封新区等。洛阳有7区8县1市,以国宝大厦和世贸中心为主的洛龙区,以牡丹广场酒吧街、美食街等为特色的涧西区,以经济、文化、金融和商贸中心为主的西工区,以历史文化风貌为主的老城区,以少数民族风情文化为特色的瀍河回族区,以休闲娱乐为主的伊滨区和以工业为主的吉利区等。

4. 城市风貌的色彩规划管理

在风貌处理上要遵循色彩构成的求同存异法则。在对城市建筑色彩进行规划时,要考虑到整体性,要与各个因素协调发展,要考虑到协调城市基调的因素,也要考虑到与城市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紧密结合,这样才能够对城市色彩有全面的把控,使城市各个色彩要素之间实现协调发展。建筑

材料对城市的色彩运用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建筑材料的运用与城市的气候和湿度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规划还需要保证城市建设过程中对色彩进行充分的掌控。城市视觉是城市的“体形、面孔和气质”,它需要把城市理念、城市精神等通过标语、口号、图案、色彩等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市徽、市花、市旗、吉祥物、城市别称等,都是形成城市形象识别的底色。^[3]郑州总体上是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更加需要保存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郑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分布比较集中,位于市中心城区的商都历史文化区内,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且分布集中,近现代革命建筑二七纪念塔全国闻名,是历史建筑特征与近现代建筑特征的完美结合。这种体现历史与现代传承、结合城市风貌色彩的做法也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不同功能区的色彩运用上。洛阳市内有多家文物保护单位,有多个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区、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及近现代工业遗产区等,这些区域周边建筑的规划应与历史风貌保持协调一致。市内洛河、瀍河、伊河、涧河以及邙山、周山、龙门山和香山等自然山体周边的建筑风貌应与自然界的风貌保持和谐。市内现代化城区的规划建设不仅要体现现代特征,也要保持与历史风貌的协调,体现延续性。开封市内文物保护单位众多,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该市做的也比较规范到位,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十分显著。近年来,开封通过郑汴一体化、自贸区建设等措施,城市在“古”闻名的基础上正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但在新城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古城风貌色彩的延续和传承、变换和过渡是需要考虑的重点和难点。

四、城市地域文化风貌的管理与监控

城市地域性风貌的管理与监控应关注风貌管理的主体和对象,以及风貌管理的依据和方法等。

1. 城市风貌管理

城市地域文化风貌管理主要是城市色彩管理,同时,“新媒体传播时就可以补充传统媒体的不足,新媒体不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传播,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基本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全方位的信息,并且不存在时间不够用的情况”^[4]。城市地域文化风貌管理还涉及建筑形制、建筑材料、场地环境的审核内容和色彩审批的流程,调整类、指定类的色彩审批结果以及城市风貌规划实施监督等环节。就公园规划而言,加拿大学者吉尔·格兰特认为,世界各地成功的公共场所不仅因为设计而且还因为管理而成功,这不仅仅是割草和捡垃圾,应让社区人员参与管理,将公园更多地视为户外社区中心,以便人们

开展活动,提高生活质量。^[5]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对于衡量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有形和无形收益越来越重要。非物质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往往被忽视,但在日益城市化的国家,维护文化生态系统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将场所感整合到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中的挑战之一是它与生态系统的抽象概念无关,但与感知的景观特征(如山脉或河流)有关。

2. 城市风貌监控

城市风貌监控主张对景观都市的资源保护,都市生活理论上主张景观风貌,而不是建筑,世界上大多数城市化景观正在扩展到农业用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景观规划要关注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如农业价值、财产价值、水文价值、景观价值、娱乐价值、生态价值等。许多人在听到“景观”这个术语时都会想到植物,混淆了景观在公共领域扮演的角色,比如公园、花园和街道等景观,还包括多式联运系统、雨水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空间开发、自然资源管理等。城市景观可以融入4种基本类型:公园、公民、花园和基础设施。公园主要是通过其功能而不是外观来识别的,被动和主动娱乐都非常重要。公民是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城市中的公共活动是城市灵魂的体现。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都有一些市民空间,无论是广场、商场还是图书馆等开放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花园是以园艺为重点的景观,包括明显的景观以及一些文化景观,如校园和博物馆等场地。基础设施是指有助于城市运作的景观,包括过境走廊和绿色基础设施系统,就像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城市森林和其他自然系统一样。这些景

观类型几乎从不相互排斥。城市的开放空间的价值非常高,而最成功的城市地区往往是那些兼具多种功能的城市。

五、结语

本文对城市地域文化风貌进行调研分析,用“色谱化”“图谱化”的方法,通过“主旋律”的理念定位城市的地域文化风貌,以我省三个不同特点的古都郑州、洛阳、开封为对象,阐述历史文化保存区、自然景观区、现代都市区等不同功能区的城域文化风貌规划设计的重点方向,提出了城市风貌管理和监控的色彩管理方法,为新形势下我省节点城市地域性风貌规划提供参考,以期提升我省在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 [1]郭小照.传媒中的城市形象研究:以“宿迁现象”为例[D].苏州:苏州大学,2009.
- [2]董娅南.从CI战略谈城市识别系统的确立与意义[J].齐鲁艺苑,2008(5):37-38.
- [3]张燕.论现代城市形象中的海报艺术[D].南京:东南大学,2009.
- [4]胡道宁.南京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策略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2.
- [5]吉尔·格兰特.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Regional Culture of Henan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YANG Dong

(Department of Ar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Zhengzhou, Kaifeng and Luoyang city landscape planning strategy in He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Using the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color design, city planning, psychology and related theori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se cities in-depth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urban city planning.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strategy for the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in Henan, and proposes research methods to solve the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hope of benefiting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Henan cities.

Key words: urban landscape; regional; color; culture deposits

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李 飞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财经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11)

摘要:从新时期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呈现出的新变化入手,对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探讨了未来发展趋势,对老龄服务产业升级措施进行具体的分析,为老龄服务产业在新时期背景下的持续稳定变革发展提供支持和借鉴。

关键词:老龄服务产业;升级;老龄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6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28-04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产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措施,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报告明确指出要想应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就要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服务产业。新时期应该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产业,满足人口老龄化战略发展需求、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一、当前中国老龄服务产业呈现出的新变化

(一)老龄服务成为投资新热点

2012年后,中国老龄服务产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并且在老龄化社会背景的驱动下逐渐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相关部门日渐认识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服务产业的重要性,并提出应该认识到老龄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并借助市场资源配置的支持有效推动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从2013年后,国家在统筹分析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老龄服务业发展需求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希望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规范,促进我国老龄服务业呈现出新的发展状态^[1]。我国卫生部门、民政部门 and 国土资源部门等相继制定了相关措施,希望能够将养

老用地逐步纳入到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为我国老龄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和保障。而随着民间资本投入到老龄服务产业中,一些地方服务机构也积极探索相应的改革措施,甚至部分境外资本进入到老龄服务市场中,为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各路资本纷纷涌入老龄服务产业

随着政策扶持力度的逐步加大和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拓展,在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过程中各路资本纷纷涌入到市场中,对老龄服务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央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资本参与到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过程中,促使我国老龄服务机构建设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养老机构设计许可办法》的制定和出台,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水平和普及程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三)医疗养护模式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现阶段,对我国老龄服务市场进行分析,发现医疗、养老和护理是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并且从近几年老龄服务产业的市场发展情况方面分析,医疗养护结合型的老龄服务项目发展相对较为迅速,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老龄服务机构中设置医疗机构、医院直接设置相应的老龄服务部门、一

收稿日期:2018-04-03

基金项目: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项目“基于创新视角下辽宁企业转型问题研究”(2016slktzjijx-05)

作者简介:李飞(1973—),男,辽宁辽阳人,大连广播电视大学财经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些专业的护理机构和老年病医院设置相应的服务体系。这一现象的存在对老龄服务产业在新时期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对医疗养护模式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并探索相应的改进措施,充分发挥出医疗养护模式的主要作用,全面提高医疗养护模式的发展水平。

(四)大型老龄服务项目受到重视

对当前我国老龄服务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发现老龄服务市场上的投资热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且在老龄服务市场中,大型、高端和综合性较强的服务项目受到投资部门的重视,如上海的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就在全面把握老龄群体特点的基础上对服务社区的功能进行适当的划分和调整,将独立生活、协助生活、记忆障碍和专业护理等作为标准对不同的居住资源进行系统的划分,为老龄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切实满足老龄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可见,新时期在发展传统老龄服务产业、促进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大型老龄服务项目的重视,并以此为切入点积极探索相应的措施,进而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

(五)小型项目、网络化项目和专业项目开始出现

顺应当前老龄服务产业的市场化发展需求,一些小型的、专业性更强的、呈现出连锁化发展态势的老龄服务机构开始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对老龄服务产业的专业升级产生了一定的促进性影响。因此,应该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一些专业的护理疗养院,针对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提供更为专业、具体的服务^[2]。可见,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全面提高的社会背景下,小型项目和专业项目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成为新时期发展和升级老龄服务产业的重要措施。

(六)智能化和信息化项目方兴未艾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过程中,远程医疗和电子健康等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产业发展和建设实践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在智能化网络服务平台和信息化服务产品的支持下,我国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政府部门开始借助智能化平台的构建,对老龄服务产业资源进行整合,或是构建智慧社区,将科学技术与老龄服务进行有机结合,促进我国老龄服务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

二、老龄服务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

(一)优先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已经转变为战略选择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的社会背景下,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会进一步提高,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相关调查研究显示,预计5年时间内,我国老龄人口仍然会以年均100万的速度递增,并且中国高龄失能人口已经超过3700万人,空巢老年人数量突破1亿人,失独老年人数量也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为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全面推进老龄服务产业能够带动其他相关行业、产业的发展,如老龄金融、房地产等等,因此能够看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老龄服务产业仍然会保持较为旺盛的发展态势,优先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老龄服务产业中的养老和健康服务成为重点

在老龄服务产业中,养老服务和健康服务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在开展老龄服务工作的过程中我国应该重点强调政府部门要在切实保证满足老龄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全面推动改革发展力度,保证社会相关力量能够得到充分调动,真正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养老服务和健康服务建设中,促进老龄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

(三)逐步满足中端服务需求成为行业发展主要态势

近几年,虽然我国老龄服务产业得到了持续稳定变革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关企业和部门将发展高端市场作为主要内容,如对老年养护业中的养老机构和康复护理机构等进行开发,尚未认识到中端服务市场的重要性,导致老龄服务产业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新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渐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呈现出完善化发展态势,老年人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再加上国家对老龄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视并提出一系列的政策扶持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老龄服务产业从传统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发展中端服务也会日渐成为老龄服务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中端服务市场的发展会转变为新时期老龄服务产业的基本发展态势^[3]。

(四)品牌化发展能够对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引领

随着当前我国老龄服务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的逐

步提高,市场竞争加剧问题也随之出现,并且老龄服务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集团化和连锁化发展态势,特别是新时期国务院相关部门保持对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高度重视,在全面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结合具体问题对有效促进和升级老龄服务产业做出进一步部署,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到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市场的日趋完善。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老龄服务相关企业只有借助规模化经营,并且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实现稳定发展。从目前我国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老龄服务的集团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更加明显。

(五)智能化和信息化服务发展成为主要发展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在老龄服务产业中开始得到相对广泛的应用,并且这种应用在远程医疗、健康管理和居家养老方面愈加明显。可以看出,在未来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智能化和服务化发展倾向,整体发展水平也会日渐提高,对老龄服务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4]。

三、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当前老龄服务产业的主要发展趋势,新时期背景下只有积极探索传统老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才能够促进老龄服务产业的稳定发展,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一定的力量。

(一)对老龄服务业产业和事业的边界进行明确

对当前我国老龄服务产业的政策导向进行分析,在全面加强老龄服务产业建设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兜底作用和市场的协调作用相对较为明显,但是如果政府全面退出市场,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制度的支持,要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对利益部门进行改革创新,进而实现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有效控制。在全面推进老龄服务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对产业和事业的边界进行系统的划分,促进市场决定作用的发挥,突出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并通过一定的措施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原则,在市场中加强老龄服务企业的品牌化建设,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市场资源的整合,切实保证新时期老龄服务产业的整体发展成果。

(二)全面推进照护保险制度建设

在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效需求无法得到全面供给是影响老龄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无法得到满足,并且在健康管理、居家养老、慢性病预防以及文化娱乐方面的服务能力有所不足。这直接导致市场不平衡问题出现,对老龄服务产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传统老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应该加强对照护保险制度建设工作的重视,为老龄服务产业在新时期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并且采取一定的措施循序渐进地提高老龄人群体收入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还应该针对具体的工作实践需求加强对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建设,并且对服务费用问题加以解决。对国内外先进经验进行分析,开展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设能够为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提供相应的保障,并且可以有效促进老年人购买能力的强化。所以,我国只有借助照护保险制度的支持,老龄服务产业才能够在新时期背景下取得新的发展成效,获得广泛认同,为我国老龄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三)出台相对具体的产业扶持政策

在加强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探索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在全面把握本国情况和本地区情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相应的优惠政策,借助老龄服务政策的支持,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在新时期背景下的良好发展。同时,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上,保证各项政策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只有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如医疗制度、老年养护制度等,才能够促进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而有效推动传统老年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四)全力打造老龄服务产业链

老龄服务产业的产业链建设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首先,加强老龄服务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配套和人才配套建设,逐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促进上下游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得到全面增加^[5]。其次,增强资金投入,通过不断提高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放宽民营老龄服务企业的贷款限制,适当减缓民营老龄服务机构的资金短缺方面压力,促进老龄服务业产业集群的构建,促使老龄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以完整的产业链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切实增强产业发展成效。

(五)积极培育多层次的老龄服务产业体系

在老龄服务产业升级过程中,产业体系的构建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结合当前我国传统老龄服务产业升级的实际需求,培育多层次的老龄服务产业体系。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其一,应该尝试对科学老龄服务产业体系加以构建,并针对老龄服务资源占有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源整合措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态势,促进服务机构整体作用的发挥。其二,针对老龄服务市场细分情况,具体结合不同的细分领域加强小型护理机构建设,满足当前我国老年人群体个性化服务需求,促进老龄服务产业升级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六)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重要作用

由于老龄群体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老龄服务产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要想满足市场的需求,不仅应该结合老龄群体的实际情况对服务产品进行开发和创新,还应该从服务的公益性角度争取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只有在统一服务标准和行业标准的限定下,老龄服务产业才能够逐步实现规范化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在全面分析各地区情况和不同老龄人群特点的基础上,结合老龄人对产品的独特需求,对老龄服务市场的产品创新进行引导和规范,并借助服务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限定,促进老龄服务产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部门积极加强行业发展规范建设,促进老龄服务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此外,积极促进行业组织市场监管作用的发挥,有效推动老龄服务产业的有序化发展,争取在新时期背景下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 [1] 王莉莉,杨晓奇.我国老龄服务业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分析[J].老龄科学研究,2015,3(7):6-17.
- [2] 郑俊亮.顺德老龄服务业发展现状与对策[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4-48.
- [3] 申群喜,王世斌.需求与反差:广东城镇养老服务业发展现状及问题探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6):118-120.
- [4] 武咸云,杨卫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冷思考”:以大连市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5(8):41-45.
- [5] 刘雅君.吉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商业研究,2016(7):89-9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Upgrading the Traditional Aging Service Industry

LI Fei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Dalian Radio & TV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11,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new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aging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new period,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aging service industry, and makes a clear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and also concretely analyzes the upgrading measures of the aging service industry, which provides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ed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aging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ging service industry; upgrading; aging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对策研究

——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例

王宇飞, 李靖靖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发展可以减少成本压力,提高品牌影响力。生物医药产业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工业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既存在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对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发展背景与现状进行全面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为促进郑州航空港区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城融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7

中图分类号:TU98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32-05

生物医药产业是当今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前沿成就与突破的集中体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主导产业。^[1]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创新性,对人才、资金、创新平台要求很高。通过产业园区的聚集发展,可有效缓解生物医药产业所需的高投入,降低其存在的高风险,有利于在产业园区内部形成一种完善的技术创新组织机制,并推动区域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市场影响力,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2]

一、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一)国外生物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近20年来,在生物产业迅猛发展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均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通过制定发展规划、网罗优秀人才、大量投入资金大力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在某些区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应运而生一批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生物产业起步较早,是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主要消费市场和生产研发主体,现已形成多个产业链成熟、

技术水平领先、成果储备充裕、发展势头良好的产业集群。据 Statisa 数据显示,2015 年美国占全球生物医药市场的份额为 40%,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已形成波士顿、圣地亚哥、旧金山等九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目前欧洲占全球生物医药市场的份额为 20%,逐渐形成了以德国莱茵河上游三角地带、法国巴黎“基因谷”、挪威挪瓦姆生物医学科技园、丹麦—瑞典生物谷等为代表的多个生物产业集群。日本积极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建设,形成了神户医药产业园区、大阪生命科技产业园区、北海道生命科技产业园区等 11 个以生命科学为重点的产业园区。^[3]此外,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生物医药也在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建成了印度勒克瑙生命科技园等多家生物医药产业园。

(二)国内生物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1997 年起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先后批准了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与火炬计划特色生物产业基地共 35 个。至 2013 年,我国共有 179 家省级以上园区将生物医药规划为主导产业。各生物医药园区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发展各具特色,增速迅猛。北京、上

收稿日期:2018-04-17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52400410316)

作者简介:王宇飞(1979—),男,河南夏邑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化工与医药方面研究。

海、武汉等地的园区由于起步较早、科研实力雄厚、资金与人才密集等原因已处于领先地位。如上海张江药谷、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武汉光谷生物城等已成为研发机构最密集、创新实力最雄厚、创新成果最突出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我国生物医药园区整体布局合理,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初步产生,进而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与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托。至2015年,我国正式运营的108家生物医药园区内企业总数占全国医药企业数的32%,总产值占全国的25%,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的人员占全国的40%。同时生物医药园区培养出42家全球医药百强企业,99家全国医药百强企业,153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4]

二、郑州航空港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背景

(一)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聚集现状

“十二五”以来,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居全国第5位,利润总额居全国第6位,主要经济指标在中部六省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全省共有456家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主营销售收入达1920亿元,同比增长21.2%,高于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平均水平与全省其他行业增长速度。目前,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呈现良好集群发展势头,建成郑州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和新乡、焦作、驻马店、周口、南阳等5个省级生物产业基地,规划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30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各园区生物医药企业总数占全省的70%以上。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在血液制品、疫苗、人体免疫球蛋白,以及中成药、检测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等领域开始呈现优势,保健品、康复医疗设备、功能食品、特色生态旅游等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培育形成辅仁药业、华兰生物、太龙药业、宛西制药、天方药业、安图生物、羚锐制药等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的建设与龙头企业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发展。

(二)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1.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生物医药产业是郑州市的七大工业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保持较快发展的态势。2015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66.5亿元,比2012年增长33.2%。全市拥有生物医药生产企业4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58家,拥有持证药品生产企业32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235家,兽用药品生产企业77家。产业领域涵盖化学制药、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兽用药品、医疗器械、健康产业等6大门类,生物医药产业体系已相对完善。其中注射剂

年产量达80亿支,已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容量注射剂生产基地;体外诊断系列产品由于起步较早,产品种类及规模均已位居全国前列;现代中药领域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势头强劲;兽用药品、血液制品、疫苗等领域也具有较强优势。

2. 产业聚集逐步优化,企业培育成效显著

郑州市正在积极推进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建设,资金、人才、政策等要素不断向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加快集聚。“十二五”以来,大力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成效显著。安图生物2015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6.9亿元,在体外诊断试剂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6年8月在上海主板成功上市;太龙药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0.2亿元,双黄连口服液、双金连合剂等产品全国驰名;润弘制药已成为国内水针剂领军企业,长春西汀(润坦)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远大生物的人用狂犬病疫苗,遂成药业的独一味颗粒、健肝灵片,郑州瑞龙制药的乳安片、心脑血管胶囊等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均居前3位。

3. 创新平台优势渐显,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多年来,郑州市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创新平台建设,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建设各种技术研发机构,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技术研发,引导生物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目前,全市生物医药领域拥有6家院士工作站,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28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5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8家省级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2015年,全市重点生物医药企业研发34项新产品,主导或参与5个产品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订。

4. 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是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增速较慢。生物医药产业仅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1.11%,在工业七大主导产业中位居末位,“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11.1%)也远低于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平均增速(17.4%)。二是企业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严重不足。全市仅有1家规模超10亿元的生物医药企业,10家规模超亿元的企业,无一家企业进入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三是研发能力较弱,创新能力不足。生物医药研发平台及公共服务平台较少,大多数制药企业以仿制药为主,缺少研发与成果推广投入,企业与郑州市所驻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现状

(一) 园区基本情况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国家批准的第一个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新区,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增长极,生物医药产业园是郑州航空港重点打造的八大产业园之一,是郑州市“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的核心区。该园区位于航空港区南部双鹤湖片区,规划总面积 8 平方公里,现已启动一期面积 2.1 平方公里。园区规划以打造全国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为目标,积极承接国内外龙头企业产业转移,重点发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化学创新药、高端医疗设备、新型医疗器械等生物医药产品,积极培育第三方检验服务、医疗诊断、药品冷链物流等新兴业态。

(二) 园区运行状况

郑州航空港区大力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完善,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现有 67 个项目入驻,涵盖化学药物、诊断试剂、医药流通、医疗器械、疫苗等多个领域。其中河南中泽新概念生物医药产业园、河南省干细胞库、河南越人医药物流园、郑州优特免疫体外诊断试剂项目等 10 个项目列入河南省重点项目。兴港投资有限公司航空港区医药产业园、河南美泰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靶向肝癌药物研发、河南质子医学园区、河南昂睿生物有限公司精准医疗产业园、河南牧翔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11 个项目被列为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 68 亿元。园区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3 个,引进中科院院士吴养洁、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常俊标、归国首席科学家杜锦发等 25 名知名生物医药权威专家作为发展智库人员。

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 面临的机遇

1. 巨大的市场推动产业快速增长

自 2000 年以来,全球生物医药处于大规模产业化的初始阶段,预计到 2020 年将进入快速发展期,并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5]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更加多变,健康意识逐步增强以及 13 亿多的巨大人口基数与老龄化趋势等多种因素将形成需求合力,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十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 25% 以上,预计到 2050 年,中国将成为全

球第一大生物医药市场。^[6]河南是拥有 1 亿多数量的人口大省,郑州市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以郑州为中心辐射半径 500 公里的经济圈人口数量达 3.6 亿。巨大的人口红利代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郑州航空港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2. 优良的政策释放产业发展潜力

政策环境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医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制造 2025》《中国制造 2025 河南行动纲要》及《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方案》都将生物医药列为重点发展领域。郑州市被列为第四批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工业七大主导产业之一。最近出台的《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积极打造“一基地两园区多布点”发展格局,加快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核心区)。这些政策将为郑州航空港区生物医药产业释放巨大的发展能量。

3. 突出的区位优势助推产业快速发展

郑州地处中部核心区域,已被国家明确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陆路交通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米字型高速客运铁路网建成后,以郑州为核心的 3 小时经济圈将覆盖全国经济总量的 2/5。郑州航空港区作为第一个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新区,是集航空、高铁、城际铁路、地铁、高速公路于一体,可实现“铁、公、机”无缝衔接的综合枢纽。港区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大力发展航空偏好型高端制造业。生物医药产品具有附加值高、重量轻、体积小等特点,非常适合航空运输,属于航空偏好型产业。突出的区位优势为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生物医药产品提供优越的载体与便捷的交通。

(二) 面临的挑战

1. 更加严格的行业监管

近年来,国际生物医药的行业监管日趋严格,欧盟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对所有输欧的西药制剂及其原料药实施欧盟 GMP(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同等的标准,并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核查出口企业。国内新版 GMP(2010 年修订)对生产过程要求更严格的动态管理,涵盖从原材料采买开始的所有生产环节,并且延伸到药品出厂后的后续追踪。国内外严格的行业监管使行业门槛和质量标准不断提高,对郑州航空港区这样起步较晚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带来巨大冲击。

2. 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加速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积极抢占生物医药产业制高点。国内各省市也在纷纷抢占生物医药产业资源,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发达省市凭借自身的地域和政策优势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出台各种激励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国内外医药巨头资源整合与兼并重组步伐加快,其完善的产业链和强势品牌效应集聚呈现,生物医药产业市场竞争已从产品、销售网络等延伸到文化、品牌、标准、技术、产业链等的综合性竞争。中部地区生物医药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研发、生产以及营销投入不足,缺乏市场策略,渠道网络狭窄,竞争手段落后,在市场竞争中将面临更大的冲击。

3. 薄弱的技术创新

国内外生物医药龙头企业都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竞相抢挖人才,不断运用各种创新产品、技术、工艺努力抢占制高点。我国生物医药产品大多依靠国外进口,缺乏自主产品。郑州市生物医药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研发投入不足,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郑州市的生物、医药类高校与科研院所较少,郑州航空港区尚无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进驻,缺乏产业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在人才引进、创新平台建设以及技术开发方面与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相比明显落后,竞争力薄弱。

五、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建议

(一) 精准定位发展方向,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做好园区的发展定位和功能规划。为此需要建立一支既了解国际市场又熟知省情市情,既懂得专业技能又具有广博知识的高层次多门类技术专家队伍,加强科学论证,避免盲目决策。要有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技术升级的高度,依托自身优势,瞄准市场格局中的“真空地带”重点开发建设,寻求产业的差异化发展,着力捕捉合作共赢的新商机。要发挥郑州航空港区已经形成的航空物流、电子信息产业优势与保税区、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在生物医药物流、血液制品、疫苗、检测诊断试剂、精密医疗器械和保健品等方面率先突破,与全国其他产业园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二) 加快产业集聚,优化发展环境

围绕“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大项目支撑”的郑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完善生物医药产业链条,强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加快郑州航空港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结合郑州航空港区发展战略,研究

制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政策,依托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在郑州航空港区推动“部省市”四级联动共建机制。对园区重点项目,有关部门要在立项审批、资金支持、土地审批、产品备案、GMP 认证、仿制药质量提升、药品采购、环评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加强生物医药行业准入监管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市场监管与经营环境净化力度,促进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加强政策扶持,构建和完善有利于生物医药资源向优势企业聚集的机制。

(三) 加强平台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技术中心,协调各部门资源,以新的体制建设协同创新平台与创新服务平台。以骨干企业为主体,加强产学研联合,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企业技术中心、海外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实习就业基地等技术创新平台。积极推动河南省(郑州)口岸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和郑州药品进口口岸建设,为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进出口提供快捷服务通道。推动成立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发挥其在交流协作、信息咨询、教育培训、政策制订等方面的作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升级。

(四) 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依托设立专项生物医药科研基金,吸引生物医药领域海外优秀的华人科学家与留学生回国创业,进一步完善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科研团队政策待遇,着力构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队伍保障体系。不断深化“校企政”合作,推动建立创新人才向生物医药企业流动机制,完善人才考评与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和活力,推进生物医药类专业人才培养。利用我省一些高校寻求发展空间的机会,引导生物、医药类院校或研究机构落户港区,以此搭建学术科技平台以带动产业发展,同时为港区培养企业急需的专业人才。

(五) 抓好重大项目,培育龙头企业

利用好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对接国药集团、上海医药集团、华东药业等国内医药工业百强企业,促进重大项目引进。紧追国际生物医药发展前沿,紧盯强生、诺华、辉瑞、罗氏等国际产业巨头,大力推动和支持海外招商,着力吸引科技型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落户园区创业。积极培育扶持重点企业,针对检测诊断试剂、精密医疗器械、血液制品、保健品以及生物医药物流等细分领域,分别培育1—2户龙头企业,打造年销售额超10亿元的生物

医药企业5家。引导医药和化工、医疗器械和装备、生产和流通企业的强强联合,扩展企业规模与产业链条,增强企业实力与竞争力,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龙头企业,以此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鼓励风险投资介入

加大财政资金对规划实施的支持力度,认真贯彻落实《郑州市建设中国制造强市若干政策》(郑政〔2016〕29号)等各项惠企政策,努力缓解和消除制约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国制造强市产业、主导产业等专项奖补资金。另一方面引导支持企业积极申报国家产业振兴与技术改造专项、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因此应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以加速行业发展。通过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期投入,引导风险投资机构资金介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投资信心,降低投资风险。同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大程度吸引社会各方面资金的投入,形成企业为主体、政府为引导、社会共同参与的投入新模式,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七)积极培育新兴业态,促进绿色集约发展

以“大健康”需求为导向,大力推动中药、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日化等向“大健康”产业领域延伸。培育催生移动医疗、远程医疗、在线医疗、第三方影像诊断等新兴业态。以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项目为基础,积极争取阿里、百度等互联网领军企业来郑布局,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与生物医药产业的融合创新。大力推行绿色集约生产,鼓励引导企业

开展清洁生产。以创建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为目标,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生产控制、装备智能化、环保监测等环节中的应用,提高园区环境承载力与两化融合度,积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绿色、集约发展。

(八)推动“产城融合”模式,营造特色软环境

“产城融合”是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发展新思路,它强调以产业为引领,以城市为载体,以人为根本,“产—城—人”三位一体,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破解当前产业园区面临的发展难题,推进园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全面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应推行“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规划产业、建筑、环境、交通时要充分考虑当地资源、文化、历史特色。同时,产业园区的绿化、水系配套及文化软环境的配套规划尽可能体现中国医学文化与当地风貌特色。

参考文献:

- [1] 翁锦玉.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趋势分析[J]. 科技与创新, 2017(1): 1-2.
- [2] 王慧. 南通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对策[J]. 菏泽学院学报, 2016(5): 40-44.
- [3] 吴磊, 陈立, 宋国梁. 国内外生物产业及园区发展现状分析[J]. 华东科技, 2016(10): 44-49.
- [4] 陈露, 褚淑贞.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工业园区现状及发展模式[J]. 现代商贸工业, 2016(9): 3-5.
- [5] 张擎. 生物医药产业2010年回顾与2011年展望[J]. 中国科技投资, 2011(2): 30-31.
- [6] 钱种明, 韩丽峰, 赵晖.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 科技通报, 2014(3): 72-78.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Biomedical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A Case of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y Zone

WANG Yufei, LI Jingjing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Biomedical industry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high technology and high input requir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industry park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st pressure, improve the brand influence.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y zone ha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There are both good opportunities and severe challenges for biomedical industry of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y zone.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status of biomedical industry ar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Next,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ar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providing a referenc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for biomedical industry of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y zone.

Key words: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y zone; biomedical industry; city integration

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王珺鑫

(山东女子学院 经济学院, 济南 250300)

摘要:对山东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整体性和阶段性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 1978—2012年, 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波动影响最大, 其次为化肥施用总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影响较小。在不同阶段, 对粮食总产量产生影响的三大物质投入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粮食种植面积在各个阶段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均为最大, 但化肥施用总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在不同阶段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则有不同。1978—1987年,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持续大量投入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 1988—2002年, 化肥的施用量逐年大幅增加促进粮食总产量持续增加; 2003—201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总量对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均有较大贡献。

关键词:粮食总产量; 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 山东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8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37-05

关于我国粮食生产波动问题, 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尹成杰^[1]认为, 粮食生产波动分为一般性波动和超常性波动, 应当客观认识并以平常心对待一般性波动, 但要尽量避免超常性波动。陈佑启^[2]、辛良杰等^[3]从粮食播种面积变化方面对粮食波动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除自然因素的影响外, 耕地面积和复种指数是影响粮食产量变化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从劳动力数量、农民受教育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方面对粮食波动进行了分析。郭燕枝^[4]通过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 在不同阶段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产生影响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既涉及耕地、水资源等基础要素, 也涉及资本、技术、生产者经营行为和扶持政策等保障要素。因此, 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 建立有利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长效机制。熊伟^[5]采用模型模拟的方法, 基于社会发展规划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情景与区域气候模型、水资源模型和作物模型相连接, 综合评估和分析未来我国农业水资源、土地利用、气候变化等要素对粮食生产状况的影响。从核心文献的梳理来看, 目前对山东省粮食生产的波动周期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基于此, 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山东省粮食生产的波动周期, 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山东省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山东省粮食产量持续稳定提高的对策建议。

一、粮食生产投入模型的建立

(一) 粮食生产的计量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用于分析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模型主要有四种: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超越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斯皮尔曼生产函数^[6]。本文拟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如下:

$$Y = AK^\alpha L^\beta \quad (1)$$

收稿日期:2017-12-30

基金项目:山东女子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山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中的妇女权益保护研究”(2015RCYJ02)

作者简介:王珺鑫(1986—), 女, 山东泰安人, 博士, 山东女子学院经济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1)式中 Y 为产出, K 代表投入资本, L 表示投入劳动, A 为生产效率系数, α, β 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由于对数据取自然对数不仅可以有效减小或消除异方差, 而且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 因此本文采用扩展的 $C-D$ 生产函数对数形式。

粮食产量波动是一系列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 实践表明, 粮食产量与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三大物质要素的投入最为密切相关^[7]。因此, 建立如下基本理论模型:

$$Q = AM^\alpha H^\beta D^\chi \quad (2)$$

(2)式中, Q 表示粮食总产量, M 表示粮食种植

面积, H 表示化肥施用总量, D 表示农业机械总动力。对以上各变量取自然对数, 其形式分为 $\ln Q$ 、 $\ln M$ 、 $\ln H$ 、 $\ln D$, η 为随机误差项。因此得到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为:

$$\ln Q = A + \alpha \ln M + \beta \ln H + \chi \ln D + \eta \quad (3)$$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8—2013)《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山东统计年鉴》(1979—2013)。数据均为处理后的标准化数据。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1978—2012 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及各影响因素的统计数据

年份	粮食总产量 (万吨)	粮食种植面积 (万公顷)	化肥施用总量 (万吨)	农业机械总动力 (十万千瓦)	年份	粮食总产量 (万吨)	粮食种植面积 (万公顷)	化肥施用总量 (万吨)	农业机械总动力 (十万千瓦)
1978	2288	880.8	63.89	88.96	1996	4333	823.7	280.15	323.36
1979	2472	873.5	93.7	101.95	1997	3852	808.3	284.59	350.58
1980	2384	847.5	108.54	109.97	1998	4265	813.3	296.83	381.77
1981	2312.5	815	114.5	119.5	1999	4269	809.9	302.23	439.44
1982	2375	768.5	122.13	124.74	2000	3838	777.2	285.24	473.51
1983	2700	779.5	134.37	141.89	2001	3721	715.3	272.16	488.26
1984	3040	783.3	137.8	153.29	2002	3293	691.2	271.5	500.41
1985	3137.7	798.4	136.51	169.12	2003	3436	641.5	254.99	491.34
1986	3250	844.8	144.51	194.19	2004	3516.7	631.39	264.25	512.79
1987	3394	821.5	147.96	206.4	2005	3917.4	671.17	292.32	575.1
1988	3225	809.4	153.05	218.66	2006	4093	699.91	324.58	633.21
1989	3250	805.8	169.76	236.02	2007	4148.8	693.65	329.56	653.31
1990	3570	815.2	183.89	241.27	2008	4260.5	695.56	307.78	668.81
1991	3917	808.8	199.68	243.05	2009	4316.3	703.01	308.44	722.72
1992	3589	791.9	205.99	246.6	2010	4335.7	708.48	311.27	761.58
1993	4100	821.3	271.4	268.94	2011	4426.3	714.58	311.47	795.66
1994	4091	801.4	240.66	276.79	2012	4511.4	720.23	313.92	823.15
1995	4245	813.2	271.87	301.4					

(三) 变量平稳性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 只有平稳或具有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数据才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否则易出现伪回归现象, 首先应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广泛采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 大部分经济时间序列非平稳的原因是包含单位根, 因此可以通过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来检验时间序列过程的稳定性, 检验单位根最常用的方法是扩展的迪基—富勒检验 (ADF)^[8]。下面通过计量软件 Eviews 采用 ADF 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ADF 检验值	Mackinnon 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K)	结论
$\ln Q$	-6.58393	-4.28458	1% level	平稳
$\ln M$	-7.42105	-4.27328	1% level	平稳
$\ln H$	-10.5794	-4.27328	1% level	平稳
$\ln D$	-7.44115	-4.27328	1% level	平稳

注: 化肥施用总量按折吨法计算, 检验类型中字母含义: C 常数项、T 趋势项和 K 滞后阶数。

二、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整体性估计

由上述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ln Q$ 、 $\ln M$ 、 $\ln H$ 、 $\ln D$ 分别在 1%、1%、1%、1% 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 不存在单位根, 即数列具有平稳性, 可以直接进行回归。通过 Eview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3。

表 3 1978—2012 年山东省粮食总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Variable (解释变量)	Coefficient (系数)	Std. Error (标准误差)	t - Statistic (t 统计量)	Prob. (P 值)
$\ln M$	1.07	0.20	5.26	0.00
$\ln H$	0.31	0.07	4.28	0.00
$\ln D$	0.18	0.06	3.15	0.00
C	-1.70	1.43	-1.19	0.24
R^2	0.92			
\bar{R}^2	0.91			

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ln Q = -1.70 + 1.07 \ln M + 0.31 \ln H + 0.18 \ln D \quad (4)$$

$$R^2 = 0.92, \bar{R}^2 = 0.91, F = 115.6178, DW = 0.97$$

结果表明,可决系数 $R^2 = 0.92$, F 值为 115.6178, 远远大于临界值, 方程整体拟合较好, 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方程(1)可以看出, 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系数均为正, 说明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粮食总产量呈正相关关系。由统计分析结果可知, 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总产量增加的贡献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P < 0.01$)。由以上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即播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具有重要影响, 前者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后者就会增加 1.07 个百分点; 化肥的使用对粮食总产量具有较大的贡献, 化肥施用总量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粮食总产量将会增加 0.31 个百分点; 农业机械总动力也会影响粮食总产量, 前者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后者就提高 0.18 个百分点。这表明, 在上述三个因素中对粮食总产量波动的影响: 粮食种植面积最大, 化肥施用总量次之, 农业机械总动力最小。

(二) 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分阶段估计

由于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即 1978—2012 年粮食总产量, 其时间跨度长达 35 年, 在此期间粮食产量波动较大, 因此, 在不同阶段, 三大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有所不同。

根据山东省粮食产量增减的波动(图 1), 可将山东省 1978—2012 年这 35 年的粮食生产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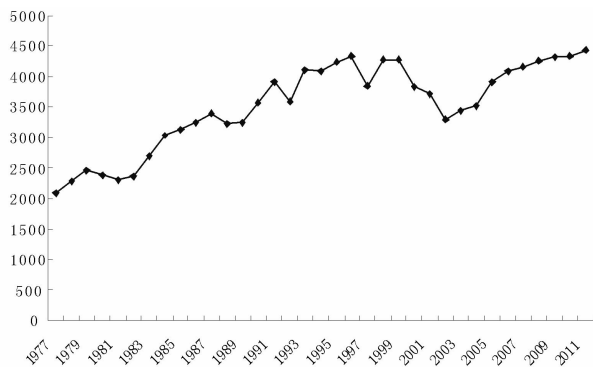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2 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变动 (单位: 万吨)

第一阶段: 1978—1987 年。1987 年山东省粮食总产量达 3394 万吨, 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粮食产量高峰。这一阶段粮食产量增加速度快, 增产幅度大, 是山东省粮食生产快速增长期。

第二阶段: 1988—2002 年。1987 年以后, 山东省粮食总产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虽然在 1996 年粮食产量到达了新的历史高点, 但到 2002 年粮食产量又退回到 80 年代中后期的水平。^① 这一阶段视

为山东省粮食生产增长徘徊期。

第三阶段: 2003—2012 年。这一阶段山东省粮食持续十年增产, 2012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是山东省粮食生产持续增长期。

1. 1978—1987 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

通过 Eview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估计结果见表 4。

表 4 1978—1987 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Variable (解释变量)	Coefficient (系数)	Std. Error (标准误差)	t - Statistic (t 统计量)	Prob. (P 值)
LnM	0.31	0.58	0.53	0.02
LnH	0.17	0.21	0.82	0.05
LnD	0.68	0.16	4.28	0.01
C	3.30	4.25	0.78	0.47
R^2	0.92			
\bar{R}^2	0.87			

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LnQ = 0.31LnM + 0.17LnH + 0.68LnD + 3.30 \quad (5)$$

$$R^2 = 0.92, \bar{R}^2 = 0.87, F = 21.96, DW = 1.38$$

结果显示, 可决系数 $R^2 = 0.92$, F 值远大于临界值, 方程整体拟合较好, 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由统计分析结果可知, 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总产量增加的贡献达到了显著水平 ($P < 0.05$)。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这一阶段, 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最大, 农业机械总动力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粮食总产量增加 0.68 个百分点; 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具有较大的贡献, 种植面积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粮食总产量增加 0.31 个百分点; 化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小, 化肥施用总量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粮食总产量增加 0.17 个百分点。

通过表 1 可以发现, 这一阶段粮食种植面积呈小幅减少的趋势, 而化肥的使用总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大幅增加。化肥和农业机械动力的持续大量投入使粮食单产提高, 进而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②

2. 1988—2002 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

通过 Eview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估计结果见表 5。

估计结果显示, 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但 LnD 未能通过 t 检验, 剔除变量 LnD 后再进行回归分析, 最终估计结果见表 6。

表5 1988—2002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Variable (解释变量)	Coefficient (系数)	Std. Error (标准误差)	t - Statistic (t 统计量)	Prob. (P 值)
<i>LnM</i>	0.92	0.38	2.40	0.03
<i>LnH</i>	0.46	0.10	4.44	0.00
<i>LnD</i>	0.10	0.11	-0.94	0.37
<i>C</i>	0.21	2.70	0.08	0.94
R^2	0.86			
$\overline{R^2}$	0.83			
<i>F</i>	24.67			

表6 1988—2002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最终估计结果

Variable (解释变量)	Coefficient (系数)	Std. Error (标准误差)	t - Statistic (t 统计量)	Prob. (P 值)
<i>LnM</i>	1.20	0.23	5.25	0.00
<i>LnH</i>	0.37	0.05	7.93	0.00
<i>C</i>	-1.82	1.62	-1.12	0.28
R^2	0.85			
$\overline{R^2}$	0.83			
<i>F</i>	36.90			

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LnQ = -1.82 + 1.20LnM + 0.37LnH \quad (6)$$

$$R^2 = 0.85, \overline{R^2} = 0.83, F = 36.90, DW = 2.21$$

估计结果显示,可决系数 $R^2 = 0.85$, F 值大于临界值,方程整体拟合较好,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该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这一阶段,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最大,面积每增加1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会增加1.20个百分点;化肥施用总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会增加0.37个百分点。

通过表1的数据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在这一阶段的前十年粮食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800万公顷左右,而化肥的施用量逐年大幅增加。因此,1988—1999年的粮食总产量整体上持续增长。而在2000、2001、2002三年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跌导致粮食种植面积的迅速减少,虽然化肥的施用总量依旧逐年增加,但不能抵消粮食种植面积的迅速减少所带来的损失,最终使粮食总产量减少。

3. 2003—2012年山东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与计量分析

通过 Eview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估计结果见表7。

输出方程得:

$$LnQ = 7.33 + 0.82LnM + 0.50LnH + 0.54LnD \quad (7)$$

$$R^2 = 0.98, \overline{R^2} = 0.96, F = 92.14, DW = 2.7$$

估计结果显示,可决系数 $R^2 = 0.98$, F 值远远大于临界值,方程整体拟合较好,粮食种植面积、化

肥、农业机械动力对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P < 0.05$)。得到的结论是:2003—2012年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大,粮食种植面积每增加1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就会增加0.82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重新成为粮食总产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农业机械总动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将会增加0.54个百分点;化肥施用总量对粮食总产量具有较大的贡献,化肥施用总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将会增加0.50个百分点。

表7 2003—2012年山东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Variable (解释变量)	Coefficient (系数)	Std. Error (标准误差)	t - Statistic (t 统计量)	Prob. (P 值)
<i>LnM</i>	0.82	0.31	-2.63	0.03
<i>LnH</i>	0.50	0.14	3.51	0.01
<i>LnD</i>	0.54	0.07	7.70	0.00
<i>C</i>	7.33	1.53	4.81	0.00
R^2	0.98			
$\overline{R^2}$	0.96			

三、结论与提高粮食产量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对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1978—2012年共35个生产年份中,山东省粮食总产量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就其影响力而言,粮食种植面积最大,化肥施用总量次之,农业机械总动力最小。第二,在不同阶段,对粮食总产量产生影响的三大因素(粮食种植面积、化肥施用总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各个阶段,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均为最大,但化肥施用总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发挥的作用在不同阶段则有所不同。1978—1987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持续大量投入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1988—2002年,化肥的施用量逐年大幅增加促进粮食总产量持续增加;2003—201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总量对粮食总产量增加均有较大贡献。实证结果表明,粮食生产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且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因而针对各种影响因素应进行“对症下药”。由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在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中,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严格控制各类非农建设用地,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尽量少占、少用耕地,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同时,应调整、优化耕地利用结构,进一

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另一方面要保护地力,持续改造中低产田,保证土地的可持续使用,并且要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继续重视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国家实施的粮食高产创建项目中,加强农业机械与农艺结合,进一步强化标准化农业节水节肥高产示范区规范化农田建设,带动中低产田实现高产高效,保证粮食旱涝保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 进一步提高化肥施用效率

在大部分时期,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通过施用化肥提高粮食产量是必要的农业生产手段。但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化肥的施用总量控制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并没有大幅增加或减少,说明化肥投入后的边际产量逐步减小并有可能已经接近于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控制化肥施用总量,提高化肥施用效率成为目前和今后农业生产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建议在以后的粮食生产过程中,继续控制化肥施用总量,优化化肥品种,改进化肥施用技术,做到因地制宜,配方施肥,科学施肥,提高化肥利用率。

(三) 加大适用性农业机械的研制与推广

通过分析发现,只有在1978—1987年这一时期,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达到显著性水平,其他时期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并不是很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农业机械研发过程中,并没有与农业生产做到完全对接;另外,使用农业机械的主要目的是替代人力,所以对于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度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要进

一步增加农业机械方面的研发投入,加快研制和推广符合农艺要求且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新型农业机械。

注释:

- ①2002年山东省的粮食总产量比1987年低101万吨。
- ②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更加注重精耕细作,提高了粮食单产。

参考文献:

- [1]尹成杰.粮安天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 [2]陈佑启,Peter H Verburg,唐华俊,等.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建模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0(4):22-25.
- [3]辛良杰,李秀彬,朱会义,等.农户土地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及其解释的印证:以吉林省为例[J].地理研究,2009(5):1276-1284.
- [4]郭燕枝,郭静利,王秀东.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S1):24-27.
- [5]熊伟,林而达,蒋金荷,等.中国粮食生产的综合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10(4):397-405.
- [6]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7]尹成杰.关于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思考与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3(10):4-9.
- [8]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WANG Jun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made a comprehensive and stage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outp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rea of grain planting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fluctuation of total food production, followed by the total amoun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grain production play different roles at different stages. At each stage, grain growing area contributes to grain production significantly, but the effects of the total amount of fertilizer applied and the total power of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n the total grain yield are different. From 1978 to 1987,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ower was the main factor to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 rapidly. From 1988 to 2002, the continuing large number of inputs of fertilizer was the key factor to raise grain production. From 2003 to 2012, fertilizer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ower have been two main factors to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

Key words: grain production; influence factors; empirical analysis; Shandong province

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优化策略

郑 新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系,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文章分析了传统音乐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对旅游开发中传统音乐的内涵进行了介绍,结合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目的在于更好地对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传统音乐;旅游开发;优化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09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42-03

我国传统音乐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传统音乐中包含的历史信息以及音律等,更是岁月变迁的重要见证。在加大保护基础上,积极将传统音乐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既能够充分利用传统音乐的价值,提高传统音乐的影响力,加大传统音乐传承力度,还能够促进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1]。

一、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性

当前很多传统音乐的传播流行,带动这座城市被人熟知,从而吸引很多爱好传统音乐的旅游者去当地进行游览观赏。20世纪80年代,郑绪岚的音乐《太阳岛上》,将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太阳岛传唱到大江南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太阳岛也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一首《太阳岛上》为哈尔滨旅游发展提供了恰当的契机,当人们进入到太阳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钢琴雕塑,人们看到钢琴雕塑的一刻,就会想起歌曲,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曲,“猎手们,忘不了心爱的猎枪……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幸福的花靠汗水浇,朋友们献出你智慧的力量,明天会更好”。传统音乐文化蕴含丰富的内涵,能够激起人们对音乐的热情,吸引着人们的关注^[2]。

传统音乐中,一些歌曲直接以地点命名。《青藏高原》这首歌曲:“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

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呀拉索,那可是青藏高原?”从歌词中就能够感受到青藏高原的雄伟,使人全身心地融入其中,被青藏高原的风貌所震撼。作曲者非常巧妙精准地将对青藏高原的情感阐述出来,利用高亢嘹亮的歌曲风格,歌颂青藏高原,让人们对青藏高原的真貌充满好奇,非常想去看一看青藏高原的真容。

二、传统音乐在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传统音乐文化越来越感兴趣^[3]。传统音乐文化的开发,为旅游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遇,但是也出现很多问题,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传统音乐旅游开发逐渐偏离正轨。

(一)不尊重历史事实

传统音乐中包含很多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开发期间必须加以保护。但是个别旅游景区,传统音乐旅游开发期间,不认真对待历史,过度对旅游价值进行挖掘,误导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严重扭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是对传统文化极不尊重的表现。一些具有浓厚历史色彩的旅游地点,为了增加旅游地的影响力度,过度宣传其中的历史文化,将一些不够清晰明了的历史音乐添油加醋,误导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传统音乐

收稿日期:2018-01-10

作者简介:郑新(1981—),女,河南邓州人,硕士,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讲师。

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中的重要组成,但是一些旅游景点将借鉴西方音乐形态的音乐归类到我国的传统音乐中,并且在地区旅游上大肆渲染。比如很多地方性的学堂乐歌,被地方旅游十分重视,但是其中很多元素都借鉴了西方音乐,所以误导了人们的正确认识。^[4]

(二) 过度开发

过度对传统音乐进行开发,开发目的不明确,造成文化资源浪费,降低了传统文化应用价值,为旅游产业带来不良影响。盲目开发传统音乐的现象屡见不鲜,逐渐降低了其中隐藏的艺术价值,将传统音乐艺术转变为经济化形式,失去了本身的文化价值。一些旅游公司,以欣赏传统音乐艺术为由,将游客引到高消费地区,半强迫性地要求游客欣赏音乐或者购买相关纪念品等,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三) 资金不足

传统音乐旅游开发资金不充足,开发力度达不到理想状态,导致开发效果不好。很多旅游景区,资金方面并不是非常充足,对于品牌性的传统音乐文化开发来讲,基本都处于低层次、低水平的状态,这样不仅不能提升传统音乐旅游品牌影响力,还会因为资金短缺无疾而终,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也会影响旅游产业的正常发展。^[5]

三、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优化策略

(一) 坚持以民族精神为传统音乐文化开发导向

传统音乐文化,是传统文化与传统精神的高度结合,作为文化传播载体,传统音乐文化中隐藏着民族精神^[6]。比如说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其中隐藏着蒙古族的民族精神。蒙古族音乐历程多变,尤其是民间音乐,从最初的狩猎文化,历经长时间的转变成草原文化,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生活的变迁,也是见证历史发展、民族精神进步的重要基础。比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独的白骆驼》两首传统音乐,将蒙古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情况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利用激昂的音乐、歌词凸显出蒙古族顽强不屈、勇敢无畏的精神。传统音乐文化能够对历史发展进行讲述,结合这种方式对旅游行业发展进行推动,让游客能够在增添旅途快乐基础上创造适当的文化氛围,帮助其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体会到其中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时达到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目的。很多带有民族精神的歌曲都受到群众的喜爱,《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响彻我国大江南北,其中的精神更是鼓舞着中华儿女冒着

敌人的炮火勇敢向前。从精神作用上来讲,这首歌曲就是精神原子弹,一直鼓舞着中华人民坚持不懈地去战斗。亦或是《歌唱祖国》,将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以歌曲的形式来表达,真挚热烈。所以开发传统音乐文化期间,一定要尊重民族精神,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精髓,全方面推动旅游产业,达到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

(二) 清楚认识到网络传播的重要性

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于网络产生强烈的依赖性,网络音乐文化逐渐形成,其传播速度更快,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交互性、反复性以及自由性特点^[7]。不断加强对传统音乐文化开发力度,积极渗透网络传播,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传统音乐文化创作的背景,同时能够对旅游地点旅游资讯进行了解。将传统音乐文化制作成视频形式,对区域文化进行宣传。不断在地区宣传的自然风光、饮食文化中渲染传统音乐文化,积极对旅游地点的服饰文化、风俗人情等进行直观传播,这样就能够提升区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引导人们在理解传统音乐文化基础上,对区域文化也进行了解,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帮助旅游产业更加健康地强大起来,丰富旅游产业的发展内涵^[8]。

比如,大理的山歌非常出名,其中《送郎调》利用简单的词汇将赶马哥上路时小两口辞别的动人情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同时搭配曲调,唱出了情侣之间依依不舍之情,当地的《送郎调》流传版本达到五六种之多。还有脍炙人口的《绣荷包》《月亮出来亮汪汪》等,旋律十分优美,委婉缠绵。将这些传统音乐文化开发,搭配着大理的风景,制作成小视频,让人们欣赏歌曲期间,就能够观赏到大理的秀丽山河。可以制作专门的网站,加大网站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到网站中欣赏传统音乐,同时了解大理。

(三) 建立传统音乐文化旅游开发保护制度

传统音乐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开发期间,一定要建立完善保护体系。传统音乐旅游开发期间,需要提升传统音乐文化保护意识,一定要掌握好尺度,合理利用传统音乐文化。保证开发具有规划性、针对性以及目的性,一定要张弛有度,有完善、全面的法律规章制度。对于篡改历史或者杜撰历史的现象必须严惩,一定要在尊重历史发展基础上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开发利用,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9]。

(四) 树立传统音乐文化精品意识

通过传统音乐进行文化旅游开发,要树立传统音乐文化品牌意识,加强对品牌的保护,在此基础

上,对传统音乐文化有选择地开发利用。传统音乐文化开发期间,需要秉持尊重精品意识的原则,积极对传统音乐文化精髓进行挖掘。对音乐表达的细腻功夫进行探索,对音乐进行高度提炼,利用传统音乐文化的感召力,对旅游地点进行开发推送,积极树立健康优秀的旅游品牌,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10]。浙江西湖旅游开发期间,对《千年等一回》《渡情》等音乐进行传播,不断挖掘其中隐藏的音乐魅力。苏州地区传统文化丰富,传统音乐类型多样,很多旅游地点都会囊括一些昆曲、昆剧、苏州评弹等。传统音乐文化自身包含让人探索的价值,将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大力传播与挖掘,既能够丰富游客历史文化知识,还能够提高旅游地点的吸引力。传统音乐文化中内涵的挖掘,帮助旅游产业提高开发质量,在加强旅游地对人们的吸引力基础上,还可以树立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传统音乐积极进行旅游开发,利用传统音乐文化,帮助旅游产业开拓发展渠道,为旅游产业提高竞争力,更多地吸引游客的关注。传统音乐在帮助游客舒缓心情基础上,引导游客观赏大自然的美景,同时还可以对我国历史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间接传播爱国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 [1] 韩沙霖. 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海南民族音乐文化产品的新型开发策略研究[J]. 科教文汇(下旬刊),2013(6).
- [2] 董海燕,万克夫. 对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宏观思考[J]. 企业经济,2013(8).
- [3] 刘斐. 宜春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民间禅宗音乐的作用初探[J]. 戏剧之家,2017(1).
- [4] 张瑞梅. “刘三姐歌谣”的旅游开发[J]. 传播与版权,2016(12).
- [5] 褚晓冬. 基于文化创意视角下传统音乐文化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J]. 黄河之声,2017(1).
- [6] 梁婧. 对传统音乐进行旅游开发的宏观思考[J]. 戏剧之家,2017(4).
- [7] 虞阳,戴其文. 基于游客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5(4).
- [8] 路瑜,李珊. 桃坪羌寨羌族传统音乐文化之当代化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
- [9] 汪黎明. 旅游开发对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以云南大理白族“绕三灵”节祭音乐文化为例[J]. 民族艺术研究,2011(2).
- [10] 李朋朋. 湘西土家族音乐文化在旅游产业开发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16(7).

(责任编辑 许峻)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Music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ZHENG Xin

(Department of Arts, Shangqiu Polytechnic, Shangqiu Henan 476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music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combines traditional music with problem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strategy aimed at better tourism for traditional music. So as to develop and promote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music; tourism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strategy

双层股权结构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高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州 511400)

摘要:双层股权结构是一种非常规股权结构,一方面,它满足了“异质化”股东的多元偏好,有利于防止恶意收购,创新公司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它又背离了股份平等和“一股一票”原则,造成公司监督机制“失灵”。在讨论我国允许双层股权结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上,美国和加拿大双层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及监管经验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国可以在创业板中试行双层股权结构,并采取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限制双层股权结构的实现方式、实现程序和并购条件,平衡不同表决权股东间的利益,实现融资与投资的“双赢”。

关键词:双层股权结构;美国;加拿大;启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0

中图分类号:DF41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45-07

双层股权结构,是相对于单一股权结构而言的一种非常规股权结构。在单一股权结构下,公司发行的是具有同等表决权的普通股,所有股东均按照“一股一票”原则行使表决权。在双层股权结构下,公司向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是“一股一票”的A类股,而向公司创始人发行的是具有超级表决权的B类股,并附着数倍于A类股的表决权。

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①,导致许多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新经济公司^②赴美国上市。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活跃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部分境外上市公司正考虑从境外证券交易所退市,转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掀起了一股“中概股”^③回归的热潮。仅2015年一年间,就有32家境外上市公司宣布即将实施或已经实施了私有化退市方案,其中12家采用的是双层股权结构^④。未来这些公司回归A股市场时,能否继续采用双层股权结构?进一步说,如何吸引和留住新经济公司在我国境内上市,增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能力,成为资本市场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双层股权结构的优势

双层股权结构给公司融资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创始人可以在保持公司控制权的前提下向市场融资。这也丰富了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持有双层股权结构公司的股份,共享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无论对于投资者,还是公司创始人而言,他们各自拥有的资源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实现了投资与融资的“双赢”。

(一)满足“异质化”股东的多元偏好

传统的一股一票是建立在股东同质的假设上的,事实上,股东存在异质化的倾向。股份公司的股东大致可分为投资性股东、投机性股东和经营性股东。投资性和投机性股东的目的在于尽快实现投资收益,他们往往对不能立刻产生收益的投资项目不感兴趣,导致公司投资行为短视化。公司创始人作为经营性股东,他们更在乎的是公司的控制权,而非立即获得现金收益的权利。双层股权结构满足了“异质化”股东的多元偏好,它分离了股东的表决权和收益权,使得经营性股东通过拥有较多的表决权,从而锁定对公司的控制权,并免受一些短视投资者

收稿日期:2018-04-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济法实施的激励机制研究”(16CFX057);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科技创新背景下广州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对策研究”(2018GZYB138)

作者简介:高菲(1982—),女,河南汝州人,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法、证券法。

的压力,实现公司的长远利益,而投资性股东和投机性股东最终也会因为公司长远利益的实现而获得现金回报。

(二)防止恶意收购

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战略,这些安排如果因为遭遇恶意收购而被强行打断,必然会使企业的经营受到干扰和打击。另外,在恶意收购中,收购与反收购的争夺在客观上会造成人力、财富的巨大损耗,同时也会破坏公司的长期发展计划。双层股权结构能够帮助公司更有效地防范恶意收购的风险,使得管理团队可以放心地实施有利于公司长远利益的发展战略。

(三)创新公司治理模式

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下,股份公司的创始人与其他股东之间是“资合”关系,而双层股权结构下的公司治理体现的不仅是资本的集合,更多的是创始人与其他股东的人身信任,它在创始人与其他股东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代理,创始人是因为这种人身信任关系而成为公司的控制股东。因此,双层股权结构突破了大股东作为公司控制人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赋予了公司创始人更高比例的表决权,为那些持股较少的创始人保持公司控制权提供了新的选择。

二、双层股权结构的不足

虽然双层股权结构在保持公司控制权方面的优势明显,但是这违反了“同股同权”和“一股一票”的公司法基本原则,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

(一)违反“同股同权”的股份平等原则

公平及平等对待股东是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各交易所上市规则的一般原则,主要表现为股东权利内容的平等,即“同股同权”。然而,双层股权结构创设了表决权上的特权阶级,在拥有同等数量股份的情况下,公司创始人享有比普通股股东更多的表决权,但是他们却没有承担同比例的财产收益或风险,这违反了股份平等原则。这种情况下,创始人很有可能滥用控制权,并在利益冲突交易中为自己谋求私利,从而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背离“一股一票”的股东民主原则

在公司法领域,股东民主原则具体体现为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即“一股一票”。然而,在双层股权结构下,基于表决权的不平等,公司创始人持有的股份享有超级表决权(如一股10票),而普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享有低级表决权(如一股1票),这违反了“一股一票”的表决权行使原则,导致股东大会决议可能仅代表少数人的意志,而不能体

现多数股东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及管理层如果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团队,那么公司将会从中受益,但如果选举产生的是一个无能并且谋取控制权私利的团队,公司及普通股股东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双层股权结构使得公司决策寄托于选出带领公司发展的“明君”上,最终将出现“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应当寄托于制度的建构与完善,而非人的能力上。

(三)公司监督机制“失灵”

一方面,双层股权结构剥夺了普通股股东在选举董事等公司重大决策上的决定性权利,公司创始人持有的超级表决权股使得其可以控制董事会的选举,并决定公司的管理层。这样,董事会与管理层便形成利益一致的团体,削弱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及其对管理层的内部监督功能,造成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另一方面,公司收购被认为是监督现有管理层的有效手段。若管理层经营不善,则会引起外部投资者收购的注意,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转让股权,变更公司控制权,将现有管理层“踢”出公司。为保持控制权,现有管理层必须勤勉尽责,为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服务,这势必对现有管理层产生约束和监督。然而,双层股权结构的反收购功能大大增加了并购交易的难度。由于创始人牢牢掌握公司控制权,他们不需要顾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决策和经营,即使管理层错误决策,或谋求控制权私利时,股东也无法借收购之机替换管理层或获得补偿,从而导致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失灵”。

三、美国双层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与监管经验

美国是双层股权结构的发源地,也是目前双层股权结构公司的主要上市地。据统计,1995—2002年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中,有6%的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这些公司的市值占到2002年全美上市公司总市值的8%。^[1]

(一)双层股权结构的出现

在美国,双层股权结构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1925年,道奇兄弟公司向公众发行了债券、优先股和150万A类无表决权优先股,公众投资者的投资总额高达13亿美元,而公司的控制权却掌握在投资银行Dillon Read and Company手中,他们只花了不到225万美元,就购买了250001股B类有表决权的普通股。纽交所批准了道奇兄弟公司上市,引起了机构投资者的强烈反对。由于接连受到投资者的批评,纽交所于1926年首次拒绝了无表决权普通股的上市。尽管如此,在1927—1932年间,仍然有288家公司发行了无表决权或限制表决权的股票。1940

年5月7日,纽交所“优先股”表决权的上市要求声明中写道“自1926年起,纽交所就拒绝无表决权普通股上市”,这是纽交所首次关于禁止无表决权股的正式声明。自此,纽交所宣布禁止双层股权结构,这一原则一直坚持了40多年。

(二) 双层股权结构的适度监管

当时,美国较具影响力的交易所除纽交所外,还有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和纳斯达克(NASDAQ)交易系统。AMEX对是否允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上市采取个案判断的方法,而NASDAQ并不要求股东拥有平等的表决权,并且一直没有规定有关股东表决权的政策。1976年,Wang Laboratory打算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纽交所通知它,如果公司发行不同表决权的股票(A类股一股1票,B类股一股0.1票),交易所将不批准其上市。而AMEX则同意Wang Laboratory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上市,但必须遵守以下规则:(1)不同表决权股的表决比例不能超过10:1;(2)低级表决权股股东有权选举1/4以上的董事;(3)禁止发行无表决权股。上述有关双层股权结构的规则又被称为“王氏规则”,并成为AMEX允许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规则。直至1985年8月15日前,共有21家公司采用“王氏规则”在AMEX上市。1985年7月,NASDAQ曾经提出建议,要求所有公司遵守“一股一票”原则,但是:(1)已经上市的公司可以保持原来的制度设计不变;(2)如果公司打算发行不同表决权股份,必须取得2/3以上股东同意;(3)超级表决权股份需要受到“日落条款”^⑤的限制,最长不能超过十年;(4)不同表决权股之间的最大比例不能超过10:1,等等。但是,上述监管建议最终没有被接受。

(三) 交易所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恶意收购活跃,双层股权结构作为一种防御收购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采用。家族或创始人控制的公司需要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但是他们也避免控制权被稀释。由于AMEX和NASDAQ对双层股权结构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吸引了大批有上述需求的公司到这两家交易系统挂牌。更严重的是,一些已经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也打算发行不同投票权股份,并威胁“若纽交所不改变现行交易规则的话,就要转移上市地”。在交易所竞争的压力下,1984年,纽交所委托其附属的“股东参与和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标准”委员会考虑不同表决权股上市交易的问题。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1985年1月,委员会向纽交所推荐了一个新的上市标准。根据该标准,如果符合以下

条件,上市公司可以发行不同表决权的普通股:(1)2/3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发行不同表决权股。(2)在公司董事会就发行不同表决权股进行投票时,如果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多数席位的,应得到这些独立董事的多数批准;如果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不占多数席位,则应得到所有独立董事批准。(3)低级表决权股与超级表决权股的表决比例不能超过1:10。(4)两种类别的股份除表决权外,其他权利应当相同。1986年7月,纽交所理事会批准了一个新的上市标准修改建议,这一建议比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更宽松,它不需要上述(1)、(3)、(4)项条件,仅仅要求双层股权结构取得多数股东及多数独立董事的同意即可。^[2]仅仅在1986年3月至1987年5月间,纽交所就有34家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3]

三家交易所有关股东表决权规则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它们为吸引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不断降低上市标准。于是,美国参议院督促三家交易系统举行会议进行磋商,讨论是否能遵循一个统一的上市标准,可惜最后未能达成共识。针对这一局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1987年6月颁布了19C-4规则,禁止已经上市的公司稀释当前股东的表决权,但是新股发行、因为善意的并购而进行的发行不受规则约束。19C-4规则实际上是为公司上市确定了一个最低标准,该规则一出台,32%的评论意见表示反对,包括美国律师协会和商业圆桌会议。1989年,商业圆桌会议向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9C-4规则无效。1990年6月12日,法院判决SEC越权,宣布撤销该条款。这样,确定公司上市标准的权力又回到了各证券交易所和各州手中。

(四) 现行规则

目前,美国各州法律均接受“一股一票”原则作为股东行使表决权的默示规则,但是公司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1992年6月9日,纽交所提出了一个新的上市标准,明确允许不同表决权股上市交易,美国机构投资者协会将其总结为:只要(1)大部分独立董事同意,(2)大部分无利害关系股东同意,公司就可以采用双层股权结构。而按照AMEX的规定,如果一个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必须取得无利害关系股东2/3以上多数同意,1/3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必须是独立董事,1/4以上的董事须由低级表决权股股东选举产生,等等。但是,上述规则存在许多例外,例如,已经上市的公司、外国发行人、IPO、公司合并等均不受股东同意的限制。NASDAQ则一直没有股东表决权方面的限制,允许公司在章程中自

由做出约定,交易所将根据个案情况判断是否允许该公司上市。

由于纽交所于 2009 年并购了 AMEX,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包括纽交所和 NASDAQ,它们均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根据纽交所上市公司手册 330.00 款和 NASDAQ 上市规则 5460 款有关表决权的规定:“公司不能通过任何行动或发行来减少或限制已公开交易的普通股股东的投票权。(交易所)意识到资本市场和企业面临的环境和需求随着时间在不断改变,因此会考虑这些行动或发行的经济后果和被赋予的投票权。……对超级投票权股票发行的限制主要适用于新股,如果公司已经存在双层股权结构,将一般被允许增发已经存在的超级投票权类股票。”^[4]

四、加拿大双层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与监管经验

加拿大证券市场是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证券市场。据统计,1995—2005 年间,多伦多证券交易所(Toronto Stock Exchange,以下简称 TSE)7.5% 的 IPO 是少于 1000 万美元的公司,市值小于 200 万美元的上市公司数量甚至是英国的 5 倍。20 世纪 40 年代,双层股权结构开始在加拿大出现,其后迅速发展。30 年前,只有大约 5% 的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现在,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约占 TSE 上市公司数量的 20%—25%。^[5]

(一)员工持股与外商投资限制——双层股权结构的推动力

与美国不同,在加拿大,双层股权结构迅速发展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交易所竞争,而是因为加拿大政府有关员工持股和外商投资限制政策的变化。

20 世纪 60 年代,双层股权结构被广泛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它使得公司员工在分享企业利润的同时,又没有稀释公司创始人的控制权。例如,直至 1958 年,加拿大轮胎公司的员工共持有公司 12% 的股份,公司创始人因担心员工持股比例过大,会威胁到他对公司的控制权,于是在 1960 年,将公司股份划分为两种类别,A 类无表决权股由员工持有,B 类表决权股由公司创始人 A. J Bille 持有。这样,既能使员工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使员工能够分享公司收入增长带来的收益,又不会威胁到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

双层股权结构在加拿大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推动力是政府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 20 世纪初到 50 年代,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稳步增长,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投资占加拿大投资总额的比重从 1900 年的

13.6% 上升到 1950 年的 75.5%,并且外商投资多采用设立企业等直接投资的形式。由于担心外国资本过度控制加拿大的经济,威胁到加拿大在政治上的独立性,1973 年底,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外商投资审查法案。根据该法案,任何通过“非合适人士”(包括外国人以及由外国人控制的外国公司)收购加拿大企业的控制权,或者直接投资成立新的企业,或者扩大现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均需要接受加拿大政府部门的审查。为得到政府的许可,外国投资者须向外商投资审查机构(FIRA)提交申请,表明即将进行的交易将对加拿大产生重大利益。由于审查的标准较为主观,联邦政府通常采用个案判断的方法,FIRA 也希望企业能够成为“加拿大”企业,以避免受到上述法案的严格审查。在阿尔伯塔省的 Sulpetro 公司案中,律师建议,保持公司“加拿大”身份的最佳方法是,将公司控制人的股份转换为无表决权股,保留股份参与分红以及破产时分配剩余财产的权利,但是上述股份不享有表决权。这样,外国股东就不是公司的控制人,从而规避了加拿大政府的审查和监管。

(二)强制性燕尾条款——双层股权结构受到的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双层股权结构与共同遵守的公司核心价值,如公司利益最大化、降低代理成本等相背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双层股权结构带来的问题,各个监管机构纷纷采取不同的手段对双层股权结构进行监管。例如,证券监管部门——安大略证券委员会(OSC)主要采用信息披露导向的方法,TSE 则采取强制性“燕尾条款”^⑥,自律组织——投资交易人协会也要求完全的信息披露。

1984 年,OSC 主席 Peter Dey 提出:当超级表决权股东明显侵害普通股股东利益时,OSC 应当进行干预。他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应当采取更积极的监管措施,而不仅仅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要求。同年,OSC 发布了临时政策附加条款(1.3 条)(征求意见稿)。首先,OSC 认为,如果招股说明书中没有表明,限制表决权股东和普通股股东享有公平的要约收购机会,那么,公司将被禁止公开发行人股份。其次,如果发行人的资本结构即将作出重大变化,也就是将普通股转变为限制表决权股的,则需要获得少数股东^⑦中的多数同意,这也被称为“少数中的多数”原则。最后,一旦向限制表决权股东作出自愿性收购要约后,公司应当遵守证券法有关要约收购部分的规定。总之,没有包含保证不同表决权股公平要约收购条件的“燕尾条款”,将被视作违反法

律。结果,OSC 收到了 46 份回应。但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提出批评,认为 OSC 超越了法定权限,对法律的修改必须得到立法部门的同意。因此,OSC 随后又举行了一次公开听证会。听证会后,OSC 修改了上述政策,删除了要求同等收购条件的“燕尾条款”,仅保留了“少数中的多数”原则以及自愿性要约收购的监管要求,并重新回到信息披露导向的政策上。政策咨询委员会认为,关于限制表决权股东的要约收购保护措施,或者说是否要求“燕尾条款”,最好留给私人协商,而不应当作强制要求。1984 年 12 月 21 日,最终版的 1.3 条出台,它规定:(1)限制表决权股东及未来购买者与普通股股东有着不同的表决权;(2)限制表决权股东有权收到与普通股股东同样的信息资料;(3)限制表决权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股东召开的会议,并发表意见;(4)发行限制表决权股,必须取得少数股东中的多数同意。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证券监管委员会也采取了相同的监管措施。

(三) 现行规则

虽然证券监管部门拒绝了强制性的“燕尾条款”,TSE 却在随后发生的加拿大轮胎公司要约收购案件中提出了同等要约收购条件的要求。1987 年 6 月 30 日,TSE 发布公开声明,对所有持有无表决权股和限制表决权股的股东采取要约收购保护措施。TSE 规定了强制性的燕尾条款,作为限制表决权股上市交易的先决条件,任何人或公司意图规避该措施将会受到惩罚。同时,TSE 还建议蒙特利尔、温哥华等省证券交易所采取同样的措施,以保持政策的统一性。另外,TSE 还采取了其他监管双层股权结构的配套措施,例如,低级表决权股股东至少有权选举 1/3 的董事,表决权的比例不超过 1:4,或者创始人的最低持股数至少占 20% 以上,禁止发行无表决权股,等等。

五、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和加拿大在对待双层股权结构问题上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适度监管”的发展过程,为我国监管部门思考双层股权结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接纳双层股权结构的必要性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交易所竞争是纽交所重新放开双层股权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随着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各国企业正在不断进行“监管套利”,各国资本市场也正在上演着激烈的制度竞争。^④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 A 股市场共完成 436 宗 IPO,共筹资 2304 亿元人民币,分别比 2016 年同比增加 92%

和 53%,跃居世界第一位。虽然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同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例如,近年来中国内地最有活力、发展速度最快的“独角兽”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腾讯等,没有一家在内地 A 股上市。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美国上市的 168 家中国内地公司中,共 34 家(20.24%)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他们的市值已超过所有美国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市值的 70%。^[6]在交易所竞争的压力下,在“中概股”回归的背景下,为留住更多“潜力股”在中国境内上市,吸引更多的新经济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我国有必要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

从加拿大的经验来看,员工持股和外商投资限制是加拿大接纳双层股权结构的推动力。一方面,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截至 2017 年底,已有 500 余家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它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有助于帮助企业留住人才,是新型的股权激励方式。但是,对于股权分散型公司而言,员工持股的比例越高,创始人的控制权越有可能受到威胁。通过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创始人锁定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可以大胆推进员工持股计划,和员工一起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股权意味着股权比例上的“国退民进”,而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肩负着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双重职能,如国有股减持超过一定比例,国家将失去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职工权益可能会受影响,还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如果国有资本退出比例过小,国有企业即使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无法获得非公企业特有的活力。因此,为保持国有资本的控制地位,我国应当接纳双层股权结构。

(二) 双层股权结构的实施

从美国双层股权结构的发展历史来看,双层股权结构在美国的复兴正是从 NASDAQ、AMEX 等新经济企业的融资平台开始,继而扩展至大型企业的主要上市地——纽交所的。同时,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作为中小企业为主的交易所,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比例也特别高。这是因为,与传统企业相比,新经济公司在初创阶段的资金需求量很大,其参与市场竞争就需要不断“烧钱”,因此需要不断对外融资。一旦引入风险投资等外部资金,创始人的持股比例就不可避免地会被稀释,甚至面临

丧失控制权的风险。双层股权结构解决了公司创始人的“融资难题”，契合了新经济公司的融资需求。按照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划分，创业板主要是创业型企业、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平台，我国可以先在创业板试行双层股权结构，待发展成熟后，再将其推广应用至主板市场。

（三）双层股权结构的监管

从美国和加拿大的监管经验来看，接纳双层股权结构的前提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因为双层股权结构违反了“同股同权”“一股一票”的公司法基本原则，造成公司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失灵”。法律需要平衡的不仅是不同类别股东间的利益，还需要平衡公法与私法的利益，在契约自由、尊重自治的私法规则基础上，完善投资者保护的公法干预措施。参考美国和加拿大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现实经济和法律环境，我国可以采取下列监管措施，对双层股权结构实施一定的限制。

1. 实现方式的限制

理论而言，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权重置或者发行新股的方式实现双层股权结构。股权重置是指，公司修改公司章程，通过交换要约、特别分红、投票权转换等方式，使创始人持有的股份从“一股一票”转变为“一股多票”，而其他股东则维持“一股一票”的表决权规则不变。由于同次发行的股份从平等的表决权直接转变为不平等的表决权，这相当于剥夺了其他股东的表决权，是违反股份平等原则的。从美国的监管经验看，SEC 曾颁布 19C-4 规则，禁止上市公司通过任何形式剥夺现有股东的表决权。虽然上述规则因 SEC 越权而被判决无效，但是美国、加拿大交易所的上市规则随后也禁止了上市公司通过股权重置的方式实现双层股权结构。新股发行则不同，与原有的股份相比，无论是 IPO，还是增发新股，都是不同批次的发行，且发行的也是不同类别的股份。并且，认购股份的是公司的新股东，在完全信息披露的条件下，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购买时就已经知道，公司采用的是双层股权结构，其持有的股份拥有低级表决权，而不愿意接受低级表决权的投资者不购买公司的股票即可，这符合契约自由和“买者自负”原则。因此，我国应当仅允许公司通过 IPO 或增发新股的方式实现双层股权结构。

2. 程序限制

美国和加拿大均规定，公司发行不同表决权股，除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外，还应当经过大部分独立董事的同意。在我国，独立董事除履行普通董事的职责外，还有权对提名、任免董事和管理层、关联

交易以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实施双层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普通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中小股东）权益的重大事项，按照现有立法规定，需要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书。这意味着上市公司若发行不同表决权股，除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外，还应当经过多数独立董事的同意。

3. 收购条件的限制

一般而言，当发生并购活动时，公司控制人在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方面存在信息和谈判上的优势，有利于其获得更好的交易对价，双层股权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创始人在控制权转让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为保证股东平等，加拿大监管部门规定了“燕尾条款”，要求双层股权结构公司发生并购交易时，不同表决权股东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包括同等的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交易条件。因为投资者最初向双层股权结构公司投资，是出于对公司创始人的人身信任。公司控制权变更后，创始人不再拥有公司控制权，投资者也就失去了人身信任的基础。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有必要参考加拿大的规定，要求双层股权结构公司发生并购交易时，必须保证其他股东与公司创始人获得同等的交易条件。

此外，美国、加拿大的监管措施还包括限制超级表决权股东（创始人）选举董事的席位数量，限制不同表决权股间的投票权比例（例如 1：4 或 1：10），限制公司创始人的最低持股数量，规定双层股权结构转变为单一股权结构的事项，等等。这些限制有利于平衡公司创始人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防止创始人滥用超级表决权谋取控制权私利，值得我国监管部门认真研究，参考借鉴。

六、结束语

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改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大批代表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方向的新经济企业正在逐渐发展壮大。双层股权结构表决权与收益权分离的特点契合了新经济公司融资与控制权保持的需求，为公司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我国可以先在创业板试行双层股权结构，同时建立并完善双层股权结构的配套制度，对双层股权结构实施适度的监管和限制，不断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①《公司法》第 103 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按照“一股一票”行使表决权，但第 126 条又规定，“同股同权”的前提是同种类别的股份，如果股份的种类不同，股东权利的内容当然不同，且第 131 条还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

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这就为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预留了制度空间。

- ②目前,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对新经济公司的定义及其范围达成一致意见。根据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关新经济公司的定义,新经济公司应具备以下多于一项的特点:(1)能证明公司成功运营有赖其核心业务应用了新的科技、创新理念和/或业务模式,亦令该公司有别于现有上市公司,与众不同;(2)研发将为公司贡献一大部分的预期价值,并以研发为主要业务及占去大部分开支;(3)能证明公司成功运营有赖其专利业务特点或知识产权;(4)相对于有形资产总值,公司的市值/无形资产总值较高。
- ③这些境外上市公司有的在中国注册,如中国移动,有的虽然在国外(如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注册,但因其主要经营业务和关系均在中国境内,因此也属于中国公司,如阿里巴巴,国外资本市场将它们称为“中国概念股”。
- ④这12家上市公司分别是昌荣传播、盛大游戏、完美世界、中国手游、世纪互联、久邦数码、搜房网、人人网、迈瑞医疗、奇虎360、陌陌、创梦天地。
- ⑤即公司上市后经过一定时间,需要将双层股权结构转变为单一股权结构。
- ⑥燕尾条款(Coattail Provision),根据该规定,收购者只有以同等的条件收购超级表决权股和低级表决权股,股份的转让才发生效力。
- ⑦这里的少数股东指的是因受到公司股权重置的影响,其持有的股份从普通股转变为限制表决权股的股东。
- ⑧例如,2017年2月,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宣布正研究

推出“国际板”,允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大型国际公司在伦敦上市。同时,新加坡交易所宣布就是否引入双层股权结构发表市场咨询文件,也被视为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扫清最后的法律障碍。2017年12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宣布将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主板上市。

参考文献:

- [1] Paul A Gompers, Joy Ishii, Andrew Metrick. Extrem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Dual - class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 93.
- [2] Joel Seligman. Equal Protection in Shareholder Voting Rights: The One Common Share, One Vote Controversy [J].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987, 54: 688.
- [3] Douglas C Ashton. Revisiting Dual - class Stock [J]. St. John's Law Review, 1994, 68: 894.
- [4] 蒋小敏. 美国双层股权结构: 发展与争论 [J]. 证券市场导报, 2015(9): 72.
- [5] Stephanie Ben - Ishai, Poonam Puri. Dual Class Share in Canada: An Historical Analysis [J]. Dalhousie Law Journal, 2006, 29(1).
- [6] 高菲, 周林彬. 上市公司双层股权结构: 创新与监管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Double - level Equity Structu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GAO Fei

(Department of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1400, China)

Abstract: The double - level equity structure is an abnormal share structure. On one side, it satisfies the diversified preferences of “heterogenization” shareholders, and prevents hostile takeover, innovates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side, it deviates the share equality and “one share one vote” principles, and causes failure on the company's supervision system. When discussing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supervision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provid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s for us. In China, we can adopt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in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and take necessary investor protection measures to limit the realiz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of the dual - class share structure, and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onditions in dual class share companies. This can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differential shareholders, which will achieve a “win - win” situation for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Key words: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United States; Canada; enlightenment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制度之构建

靳建丽,赵贝贝

(郑州大学法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刑事审前阶段最容易发生如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侵权行为。因此,为了遏制程序性违法和保障人权,我国目前亟需从域外的司法中汲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逐步在我国审前程序中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主体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前阶段中构建程序性裁判制度,并由其行使审前程序性裁判权,使审判程序中的控、辩、裁三权制衡的结构完美地应用于审前程序中,使之更符合程序契约的原理,更加科学化,从而在尊重人权和维护程序公正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刑事审前程序;裁判权主体;人权保障;程序公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1

中图分类号:D92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52-05

刑事审前程序犹如一座房子的根基,如若没有科学的制度构造,那么之后的审判程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结构应该包括控诉方、辩论方和居中审判方,而我国目前的审前程序偏于行政化,不具有诉讼意义上的控辩审三方稳定构造。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对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制度进一步创新,从而使审前程序与审判阶段的程序一样具有控辩审三方结构,以期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一、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的现状

“所谓‘裁判’,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的实体问题或者某些程序问题作出确定结论的活动过程。”^[1]裁判一般表现为判决、裁定和决定三种形式。刑事裁判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主体是人民法院;客体是刑事案件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功能是对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之间的实体争议和程序争议进行解决。因此,刑事裁判权可以定义为,是指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对案件情况清楚的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对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之间的实体争议和程序争议作出公正且合理裁判的权力。^[2]

与审判阶段的裁判权主体不同,刑事审前程序

中的裁判权主体主要负责对刑事审前程序所涉及事实问题和程序问题的行为和争议进行评判并作出公正的处理。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裁判机关审查和处理案件实体或者程序有关事项;其二,在审判程序中,对追诉权主体和辩护权主体在刑事审前程序中的活动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认真评价并作出公正的裁判。程序性裁判与实体性裁判同属于裁判且两者并不矛盾,因此在某些学者的著作中经常能够看到将审前程序性裁判权称为“审判之中的审判”。综上所述,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可定义为人民法院依据其所享有的管辖权,在查清案件事实并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程序法规的要求对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出现的程序性问题进行评价、解决,并在此事实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性处理。

(一)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立法现状

在立法方面,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三个机关有各自的管辖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除逮捕外公安机关对其他的强制措施都有决定权,检察机关除了对其自侦案件的有关强制措施有决定权外,还有对逮捕的批准权,人民法院负责审判阶段的裁判权。据此可知,人民法院裁判权的运用仅限于

收稿日期:2018-04-11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科技侦查及其法制化发展研究”(142400450289)

作者简介:靳建丽(1967—),女,河南清丰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诉讼法、仲裁法研究。

审判程序,但这并不能表明在刑事审前阶段中不存在审判权主体。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行使着一些具有裁判性质的行为,如审查批捕、复议、复核等活动,检察机关在这些活动中事实上享有着裁判职能,是运用裁判权的主体^[3]。

我国立法所确立的刑事审前程序诉讼构造,是一种利弊共存的格局。其优势在于可以减少向有关机关报请与批准的环节,及时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有效地控制和打击犯罪嫌疑人。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除逮捕这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性处分公安机关都可自行决定,这就导致了在强制性处分权的行使上存在许多的便宜性和随意性。这样也可能导致对犯罪嫌疑人处分权的不当使用。另一方面,由于追诉机关同时拥有强制性处分的决定权和实施权,无需其他机关的批准,容易导致审前程序的诉讼结构失去平衡。

(二)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权的特征

基于审判阶段裁判权的特征,笔者认为,刑事审前裁判权应具有以下特征:

1. 启动上的被动性

与追诉权的启动方式不同,受控审分离原则的影响,我国的裁判权具有被动性的特点。但是裁判权的这种被动性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为了追求司法公正,法院在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主动进行一些司法活动的。裁判权启动的被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障裁判权主体的中立地位,若裁判权主体具有启动上的任意性,则会使其产生追诉的倾向。我国的追诉机关和人民法院同为国家机关,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利益的同位性。我国控辩双方之间地位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此时再把裁判权主体分给追诉机关,那与我国目前所追求的提高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是背道而驰的。

2. 审判时的多方参与性

程序参与原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中有显著的表现。此项原则给予那些可能受审判决定所影响的人参与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项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英国有句至理名言,意思是说正义不但应该实现,并且应该以我们都能看得到的方式实现。对于参与者所享有的参与权不应是形式上的参与权,而应该是实质上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参与权利,应拥有说“不”的权利。裁判只有在控辩审三方的积极参与下,并在控辩双方为了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裁判而举证并进行主动的说服和辩论的情况下,

法院作出的裁判才更具公正性和易接受性。

3. 裁判结果的确定性和权威性

法院一旦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其结论就是终局性的,这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程序性裁判上的体现。^[4]裁判权的确定性和终局性是由我国的司法制度所决定的。裁判权的此项特点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若判决的内容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仅不利于定纷止争,而且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最后,出于维护司法权威考虑,若裁判不具有确定性和权威性,那么就与我国司法制度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相违背。

4. 审判内容主要是程序性问题

审前程序不同于审判程序,审前程序是对案件整体实体和程序作出决定性裁判。譬如,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要裁判某项诉讼程序是否有效,诉讼程序是否继续进行,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程序得以公正、有序地进行,而不是对案件作出结论性的评价。当然,由于案件的程序性问题与案件的实体性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某些程序性的裁判,也会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案件的实体。

二、构建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必要性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在我国,受“有罪推定”的影响,侦查机关为获得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以至于因审讯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刑讯逼供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不间断地进行审讯,使用各种严酷的械具,限定休息时间与禁水禁食,这些折磨人的方式足以使一个意志坚定且无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刑讯逼供实质上是“用一种违法手段去对抗另一种违法,不仅违背了程序理性原则,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期望值和信任度”。因严刑逼供而引起的冤假错案在如今是屡有发生,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都是非法取证行为的牺牲品。特别是被改判无罪的聂树斌案,从21岁冤死到洗清冤屈,之间经过了21年。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改判除了抚慰两个一直在承受痛苦的家庭,再也不能挽回一条年轻的生命。为了确保悲剧不再出现,公正不再迟到,对审前阶段的改革已是众望所归。

(二)拘留超期限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侦查中是经常使用的,它对侦查机关及时侦破案件,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在拘留等羁押措施的运用上还存在

一些问题,如羁押期限届满或者无正当理由仍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等情况时有发生。就其发生的原因而言,一方面是侦查人员法律素质不高,不能对法律条文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以至于在执行过程中对法律条款产生歧义。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安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将拘留期延长至三十天,三十天不等于一个月,若理解为一个半月肯定会引起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另一方面是侦查阶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主体,对于检察院自侦的案件,逮捕是由检察机关自监自执的,在这种情况下监督就是摆设不起任何作用。

(三) 权力监督缺位

依据我国立法规定,对侦查权的限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内部监督,即在侦查机关内部实行从上而下的审批制度,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进行内部监督;二是外部监督,即由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就第一种情况来说,自我监督具有本质上的弊端,缺少外在的有效制约,不能在实质上对侦查机关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就第二种情况来说,在我国,检察机关不仅是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追诉机关,在某种程度上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任务,这种共同体的监督难以从实质上抑制侦查违法行为。此外,检察机关对追诉活动的监督主要是书面的监督,依据有关部门向其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查监督,这种书面监督是很难真正发挥作用的。

三、域外法中刑事审前裁判权的考察与借鉴

(一) 英美法系国家的考察

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中,推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张控辩双方是平等的当事人,构成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以公正第三人身份进行审判这样一个“等腰三角形”的诉讼关系,较为关注当事人之间地位的平等和个人权利的保障,据此英美法系国家在程序性裁判权上实行的是令状主义制度。现代意义上的令状制度起源于英国,根据英国《人身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被羁押人若认为国家机关对其的关押无正当理由,有权向王座法院提出解除羁押的申请。此外,羁押机关还要对羁押的理由、期限进行详细说明,由中立的法院根据案件的有关事实来判断羁押合法与否。^[5]令状原则的本质是通过法官衡量该令状是否有合法根据的存在,来限制侦查权力的行使。在英国,警察实施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性处分,理应取得作为裁判者的法官签发的逮捕证、搜查证等令状。在美国,以逮捕为例,除法律规定的可以无证逮捕的情形外,逮捕必须首先由警察

或者被害人向有权机关提出控告书,说明犯罪事实和理由并附有被逮捕人的姓名、身份等基本信息,地方法官或者其他有权的司法官员在存在有可成立的理由时,即签发逮捕证。经授权执行逮捕的,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行逮捕,同时,对其他的强制性的处分也有类似的规定。

(二) 大陆法系国家的考察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实行预审法官制度。在法国,刑事案件的侦查一般由司法警察负责,预审法官主持并进行司法审查。预审法官在进行司法审查时可视情况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尽管预审法官所具有的较高的内在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强制措施的实质公正性,但预审法官类似超级警察的外貌却总让人产生个人专断的怀疑。在德国,依据法令的规定,检察官是追诉活动的指挥者,即可亲身侦查也可领导侦查。一般是警察先接触案件并进行简单的侦查,当侦查到一定程度时再移交给检察机关继续侦查,其侦查构造显示出审检结合的特点。在这种模式中,检察机关身负两职,如果没有中立第三方的介入是很容易滋生腐败和侵犯人权的。据此,德国令状主义模式的特点也就显而易见了,在赋予追诉方权力的同时,在程序规则上对其进行严苛的要求,并赋予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法院对追诉者权力进行限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德国等国家的刑事审前程序中,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及其他权利的事项,如羁押、扣押、身体检查、搜查等,都需有作为裁判者的法官的裁断。

(三) 符合我国国情的借鉴

依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除逮捕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对其他的强制措施可自行进行;而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其可以自己决定拘留、逮捕、搜查以及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刑事侦查阶段直接涉及整个刑事诉讼的开始,在此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若是可以从根源上完善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则整个刑事诉讼中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提高。现今大多数国家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规定了令状原则,并在相关法律中作出完善的规定。

四、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的令状主义原则之构建

(一) 学界的不同观点与构建思路

所谓“令状”是指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记录。令状原则是指在决定是否使用强制措施时,强制措施是否正确,应由法院评估和签署,执行这项强制措

施时,令状应提交给受惩罚的人。实行令状原则,目的在于使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裁判人,就强制性处分进行评价并作出合理的裁判。令状原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公诉人无权自行决定强制措施的执行;另一方面,强制措施的决定权由中立第三方法院作出。

1. 学界的不同观点

令状原则对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优势显著,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不可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欠缺引入的前提。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还任重道远,法院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地方各级利益集团和其他权力的影响。其次是欠缺引入的保障。在侦查程序中引入中立的司法第三方需要一支精英化的法官队伍为保障,而我国法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平良莠不齐,很有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最后是制度不健全。若赋予法官过多的权力,而无相关制度的保障和法官个人职业操守的约束,就极易导致司法腐败,司法腐败最易危及国家的政权。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考虑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时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部分程序性争议可以由检察机关来行使裁量权,并在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基础上引进西方令状主义,创建由检察院审查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司法令状制度”。由具有追诉倾向的检察机关统一行使处分其与被追诉一方有争议的事项,因检察机关所处的地位使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的绝对超然,程序正义也难以保障。笔者认为,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的角色与检察机关有很大的不同,法院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追求,决定了由法院来充当中立的第三方对程序性事项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进行裁定是较为合适的。

2. 构建思路

可以任意使用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理应有具体的法规去规制权力的适用,法律也要有足够的内容去规避权力的滥用。令状原则实际上就是对上述方面需要的平衡与妥协。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的绝大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已经转隶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前提下,对强制性处分措施实行令状主义原则,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现阶段可通过修改相应法律明确规定由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性处分措施进行审查、批准;第二步,在条件成熟后,通过立法或者修改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由法院来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行使程序性裁判权,追求审前程序的诉讼化。

(二)构建的理论基础

1. 人权保障理论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于2004年写入我国宪法,成为我国根本大法中的一项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其实就是一部人权保障法,因此素有“小宪法”之称。^[6]在人权保护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人权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不仅要要对被害人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因此,必须加强对国家追诉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实体性权利及与之相配套的程序性权利的实现,均离不开程序性裁判活动这一保障机制,因为它能够对控权和维权的平衡起到显著的作用。人权保障不仅是刑事诉讼的一项任务,更应是刑事诉讼立法和执法的理论基础。

2. 程序正义理论

公正是司法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刑事审判程序只有在符合公正的要求下,才是一种合理完善的程序。不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若刑事审判程序不具有公正性,那么也就不是好的程序。通常情况下,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判断法律程序是否公正:(1)“自然正义”原则;(2)“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自然正义”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根据自然正义的第一项要求,法官应在审判中维持第三人的公正地位。根据自然正义的第二项要求,法官应当给予所有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相关的一切权利,进而使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确保判决是以双方意见的综合考虑为基础的。程序上的正当主要是通过有关法律的实施和权力的行使来实现的,它的要求是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冲突的解决必须是合法且公正的。

我国在程序立法上只注意到程序的工具价值,而忽略程序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程序公正要求实体结果的产生必须只能建立在严谨的法律程序之上,公正的程序并不能一定得到所追求的公平结果,但公正的程序具有接受的容易性,具有维护社会安定的效果。就拿美国黑人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来说,在客观上他可能就是杀害妻子的凶手,但由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违反了法定程序,最后导致了判决辛普森刑事上无罪。美国民众对这样的判决觉得合法合理,反观我国,这样的无罪判决是很难作出的,广大民众也是很难接受的。就其区别而言,主要是在对待程序公正上的态度不同,我国亟须向相对工具主义的方向上靠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离不开程序正义这一理论基础。

(三)与之配套的可行性制度建设

1. 程序性裁判权的启动规则

由于法院是我国的司法裁判机关,对于审前程序性裁判权的启动应和审判程序保持一致,即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如果要充分发挥司法权的作用就必须主动地去推动它,依法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或者自诉,然后由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或者自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公正的裁判。法律这样规定司法权的被动性肯定是实践经验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优点是限制了司法机关的权力,保护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其缺点是从诉讼效率方面来看,审判机关的司法权具有被动性,在及时发现犯罪、惩罚犯罪嫌疑人方面是不利于司法的。但法律又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拥有主动的追诉权,弥补了司法权被动性的不足。因此,审前程序的裁判也应具有被动性,裁判权的启动,必须基于提出主张的主体的申请,也就是说原则上应当以追诉一方或者辩护一方的请求为前提。

2. 行使裁判权规则

审判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一方面控辩双方必须有机会提出主张和证据,并就自己主张的成立进行论证和抗辩;另一方面法官所作出的裁判应当在裁判权主体充分听取追诉权主体和辩护权主体双方陈述的理由和有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公平地作出。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的审判不是由法官自己查清案件事实,独自实施实体法的单方行为,而是应由法官和控辩双方共同参与并促进裁判依法作出的活动。

3. 救济规则

确立对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意味着当侦查权的滥用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时,当事人可将滥用侦查权的一方诉诸法院,由中立的司法机关依法予以裁

判,形成一个由控、辩、裁的三方组合的格局。侦查行为的可诉性为诉讼权利人防御侦查权的不法侵害提供了一件有力的武器,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当事人也有了一条救济途径。确立这一程序权利的救济规则,对于进一步完善审前程序阶段控辩裁三方格局的形成意义匪浅。

五、结语

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法制建设相对落后,传统的强调实体和忽视程序的理念仍然存在,立法上也没有合理完善的程序性裁判制度。但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中逐步前进的。因此,就我国目前来说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前程序性裁判制度,强化程序性裁判的中立地位、权威和监控力度,对于法律这座大厦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 [1] 陈光中,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48.
- [2] 陈瑞华. 程序性制裁理论[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99.
- [3] 钱唐. 正确认识把握监察机关性质和职责[N]. 浙江日报,2017-12-03.
- [4] 李诏楠. 审判中心下的被告人质证权保障[J]. 怀化学院学报,2017(3):84-86.
- [5] 宋英辉. 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研究[J]. 法学研究,2000(3):73-86.
- [6] 陈光中. 刑事诉讼法[M]. 6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al Judgment System

JIN Jianli, ZHAO Beibei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criminal pretrial stage is prone to infringements such as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or abusing coercive measur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curb procedural violations and safeguard human rights, it is urgent for China to gain experience from the extraterritorial judiciary that suits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gradually introduce an independent third-party main people's court into the pre-trial procedure in China, and establish a procedural adjudication system in the pre-criminal phase. It exercises the pre-trial procedural right of trial so that the structure of control, defense, and refusal in the trial procedure is perfectly applied to pre-trial proceedings, to make it mor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rocedural restraints and to be more scientific, thu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and safeguarding procedural fairness.

Key words: pre-trial procedures; subjects of jurisdictio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rocedural justice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创作及民族复兴思想

曹发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德育教学部, 郑州 450044)

摘要:蒋廷黻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于1938年创作的《中国近代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该书以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为宗旨,对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和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近代史》主要从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尝试、近代化与民族复兴、外交问题与民族复兴等三个方面对民族复兴问题进行探讨。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蒋廷黻对近代化的理解,对于近代史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回到原来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又会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看法也有合理的一面。

关键词: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民族复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2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57-04

蒋廷黻,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于1938年创作的《中国近代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通过浅显的文字向时人介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完整地再现了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图景。《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历经十多年的思索及研究的成果,该书以民族复兴为主题,以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为宗旨,对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和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及如何开展外交关系这两个对民族复兴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展开探讨,阐述了作者的民族复兴思想,表达了作者作为炎黄子孙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

一、蒋廷黻及其《中国近代史》

(一) 蒋廷黻——旧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

幼年时期,蒋廷黻便进入私塾学习,十岁开始进入新式学堂及外国在华开办的教会学堂学习,初步接触到西方文化及近代自然科学。1912年2月,时年十六岁的蒋廷黻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在哥伦比亚

大学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时代的蒋廷黻主修历史学,除了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外,他还选修了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以增强及培养其科学思维模式。读博期间,蒋廷黻系统地接受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进化史观,逐渐成为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1923年,蒋廷黻学成归国,就职于南开大学,与梁启超一起创建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并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系首任主任。1929年5月,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蒋廷黻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当时的清华大学尽管“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学府”^{[1]137},但在历史教学和研究方面和国内其他大学一样,仍然沿袭传统的治史方法,历史学者大多是“治史书而非治史学”,他们能对各种版本的史书的真伪做出鉴定,能对史书中的章句进行阐释,但他们却不能讲清我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实际情形,不能讲清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国内“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历史资料”。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中,大部分历史已经经过科学的彻底的研究过若干个世纪了”^{[1]139}。针对这种情况,蒋廷黻甫一上任,就在清华大学大刀阔斧

收稿日期:2018-05-10

作者简介:曹发军(1968—),男,河南信阳人,博士,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德育教学部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地开展教学和治学改革。他放弃了具有很大局限性的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将盛行于西方的现代治史方法引入国内,构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为一个学者的蒋廷黻,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和外交使的研究。他先后编撰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在《清华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性、政论性的文章。他的这些论著对近代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并奠定了蒋廷黻在历史学界的地位。蒋廷黻通过重大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描述,为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叙述设置了一个基本框架,此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叙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及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论著,有近半数都因袭了蒋廷黻的观点与看法。”^{[2]13}

(二)《中国近代史》的出版及其写作宗旨

在蒋廷黻众多的论著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中国近代史》。最初,《中国近代史》仅仅为《艺文丛书》的一个章节,它的出版与当时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当时中国正处于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通过回忆国家过往被动挨打的痛苦经历,来号召国人团结起来,为民族独立及国家富强而奋斗。关于此书的写作宗旨,蒋廷黻在该书的总论中提到:“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3]4}抗战建国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关键,蒋廷黻希望通过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能对抗战有所贡献,从根本上说,也是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对民族复兴大业有所贡献。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后一再复印,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陈旭麓指出:“通过蒋廷黻的描写,我们不但看到了民族的惰性,而且也感受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中古’的面貌,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4]49}

(三)《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的局限,蒋廷黻对近代史上一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和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偏差。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该书把近代化简单的理解为西洋化。其实近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发展

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就是以近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5]3}。西洋化只是近代化的一个范例,而近代化可以有多种模式。二是该书片面的褒扬中国近代史上在中外冲突中主张妥协退让的人物,而对那些在外敌入侵时主张坚决斗争的人则多有微词。例如,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宣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多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些战争的爆发只是因为当时国人对国际环境的不了解,妄自尊大的结果。蒋廷黻认为“主战派”是妄自尊大的代表,他对林则徐的事迹不以为然,认为“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名声或将与叶名琛相等”^{[3]203}。对于中法战争,蒋廷黻认为“打了不久就讲和,不久又打,最后还是接受了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还大大削弱了我国防力量”^{[3]76}。他对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表示不屑,在他看来左宗棠的胜利是一种侥幸。在蒋廷黻眼中,“主和派”才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鸦片战争中主张讲和的琦善、奕訢、李鸿章等“看清了中外强弱的悬殊,而士大夫阶层不信他”^{[6]61}。他认为,战败以后而讲和,吃亏远大于不战而和,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便是甲午战败引起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在国家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言战事。很显然,他的这些在中外冲突中片面强调妥协、退让的“主和”立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会遭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批判和质疑。

二、《中国近代史》对民族复兴问题的探讨

(一)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尝试

蒋廷黻创作《中国近代史》的宗旨就是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借鉴。因此,他在撰写《中国近代史》这部书时将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篇章进行阐述。第一、二章为“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讲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野蛮行径,同时还悉数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作者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要摆脱危机,首先应实行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加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第三、四章为“自强及其失败”与“瓜分及民族之复兴”,着重阐述了近代中国出现的四次民族复兴运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及资产阶级革命。在著作中,蒋廷黻着重向读者说明了这四次运动都是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形成的,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

兴作为一个主题贯穿近代中国的始终。可见,《中国近代史》的前两章是“因”,后两章是“果”,整个篇幅层次清楚、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历史逻辑性。蒋廷黻认为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领导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民族复兴运动,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场自强运动仅限于器物层面,不是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至于戊戌维新,蒋廷黻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民族复兴运动,尽管这个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3]96},但是,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使得其无法付诸实施。蒋廷黻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民族复兴运动,不过由于义和团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背道而驰,是“反近代化、反西洋化”的,它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在此,蒋廷黻进一步指出民族要进步与发展绝不能开历史倒车。最后,蒋廷黻提出“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3]106},只有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

(二)近代化与民族复兴

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是蒋廷黻一以贯之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这部书中,蒋廷黻进一步强调:“一切国家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3]3}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战争大多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侵略者都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化,而中国仍然滞留于“中古”。

由此,蒋廷黻断言:“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3]2}对于这一问题,蒋廷黻充满信心,他认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表明中华民族完全能实现近代化。“铁路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等都表明中国已经在近代化的大道上迈进,以至于“抗战前全世界无不承认中华民族已经走上复兴之路”^{[3]123}。

由于将能否顺利实现近代化视为中化民族能否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因而中国近代上一切关于近代化的人和事都成了蒋廷黻探究的对象。在《中国近代史》这部著作中,蒋廷黻从近代化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进行了分析,是否把国家民族引向近代化成了蒋廷黻评价近代史上一切人和事的重要标准。

关于洋务运动,蒋廷黻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次自强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救国救民的方案。蒋廷黻指出洋务运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军事建设为主,如购买炮舰、创建水师,建立江南制造局等,特别是咸丰时期京师同文馆的创设乃中国新学的开端。“求富”为第二阶段,清政府为此创办了大批的民用工业。对于洋务运动的局限性,蒋廷黻引用了梁启超的一段话作为对洋务运动的评判:“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3]97}也就是说,洋务运动只是推动了国防近代化,而近代化不仅只是武器的完善,还应包括教育、交通、工业等的近代化,近代化的关键应是政治与国民的近代化。所以,蒋廷黻认为洋务运动尽管走的路线不错,但终究未能拯救民族危亡。基于此,尽管在书中蒋廷黻充分肯定了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人物的历史地位,甚至把李鸿章写给恭亲王的一封信,说成了“中国十九世纪最伟大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章”^{[3]56}。但对于洋务派的局限性,蒋廷黻在行文中也有充分的揭示:“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向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3]60}不过,对于洋务派的不彻底,蒋廷黻没有一味的苛责,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辩解:“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地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3]97}蒋廷黻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等人不是没有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实在是“不敢”或者是“不能”也。

对于戊戌变法,蒋廷黻把它看作是旨在推动中华民族政治近代化的一场救国运动。蒋廷黻认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以近代化的君主立宪政体替代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旨在通过变更政治制度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3]106}。尽管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由于其政治主张,尤其是维新派提出的有关国家近代化的主张与蒋廷黻有相通之处,蒋廷黻在行文中给予了维新派很高的评价。

对于义和团运动,蒋廷黻则痛斥其为“拳匪”。他对义和团运动评价如此之低,可能存在阶级偏见,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蒋廷黻认为义和团是一场“反西洋化、反近代化”的运动,和他的国家近代化的主张背道而驰。

对于孙中山及其倡导的“三民主义”，蒋廷黻推崇有加。他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一个“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民族复兴方案，如果能在中国实现，将能极大地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到那时，中国的近代化程度将远远超过欧、美，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唯一路径。

(三) 外交问题与民族复兴

通读《中国近代史》一书，读者不难发现，对近代史上中外关系的阐述贯穿该书的始末。书中蒋廷黻通过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的各种谈判来阐述其外交思想，把近代中国对外交问题的处理放在左右民族复兴的高度来着力加以探讨。由于长期受西方思想影响，在国际冲突上蒋廷黻一向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譬如，对于鸦片战争的爆发，蒋廷黻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这是由于满清政府在外交上不给予外国以“平等”地位而造成的，即国人不知国际通行的礼节。在蒋廷黻眼中，李鸿章、琦善、奕訢等都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人才，他认为琦善是近代中国大变局中的第一位外交总长，“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和权衡厉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3]214}。蒋廷黻认为奕訢真心为国图谋，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之贤能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訢受任守卫卫京都，在其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局势为之一变。对于《北京条约》的签订，蒋廷黻认为“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能让中国早日融入国际生活。”^{[3]32} 蒋廷黻

片面强调外交在中国受屈辱时期的重要作用，这种认识很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也是我们在学习中所要注意鉴别的。

三、结语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为抗战建国提供借鉴。那么，蒋廷黻在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是什么呢？蒋廷黻认为，中华民族要走上复兴之路，首要的问题就是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走向近代化。尽管他对近代化的理解、对于近代史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回到原来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又会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看法也有合理的一面。

参考文献：

- [1] 蒋廷黻. 蒋廷黻回忆录[M]. 长沙:岳麓书社,2017.
- [2] 刘文沛. 从《中国近代史》看蒋廷黻的史学思想[J]. 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
- [3]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 [4] 王金晶. 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看其“韬光养晦”策略[J]. 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6).
- [5]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6] 陈卓. 读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J]. 史学研究,1999(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Jiang Tingfu's Cre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His National Revival Thought

CAO Fajun

(Department of Mor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Jiang Tingfu is a famous historian in modern China.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hich he wrote in 1938,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work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book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self strengthening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Manchu governmen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ainly discusses the national revival in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attempt to realize the national revival,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the diplomatic problems and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spit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Jiang Tingfu'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zation and views on some characters and events in modern history seem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today, but back to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situation, we will find that his views and views also have a reasonable side.

Key words: Jiang Tingf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ational revival

论法学视阈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员犯罪惩罚从重

杜俊华,周与欣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心,西安 710048)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依法依规加强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党员采取犯罪从严惩处,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条例中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在司法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积极实践,尤其是对曾经有功于革命的党员干部、犯罪分子黄克功和肖玉璧按照法律进行了严惩,这不仅加强了根据地的党员队伍建设,更充分体现了依法治政的精神。

关键词:法学;抗战;陕甘宁边区;党员;从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3

中图分类号:D9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61-0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政党,高度重视党员队伍的建设,并对党员干部严加要求,制定了相关的法规条例,在实践中严格依法从严惩处党员中的犯罪分子,但以往学者从法学的角度探讨较少,本文拟对之探析。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干部从严要求的法规条例之制定

法是有阶级性的,其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执政党、立法者在立法中往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限制自己的利益的立法是比较少见的。但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益,也要限制自己的眼前的、表面的、局部的利益。抗战时期,毛泽东及共产党人为了抗战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党员做出更重的处罚,这是一个革命的、处在上升时期的政党的正确选择。因为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代表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所以毛泽东对他们严格要求,要求各根据地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条例,采取严厉措施惩治党员队伍中的坏分子。

首先是1939年2月1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①,其中的第11条规定:“发扬艰

苦奋斗,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②,是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政府的法律文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根据抗战和根据地的实际对党建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是关于党员干部提出了廉政原则和党员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8条明文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2]335}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多次议案中,也涉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就有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党员,严厉惩治党员干部犯罪的规定。在党员犯罪从重处罚的问题上,毛泽东一反封建社会“官当”的做法,提出了对执政者更严格的法律要求,这是一个政党为了根据地社会长治久安的英明做法。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了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追缴办法。规定处刑标准“贪污数目在一千元以上

收稿日期:2018-01-22

作者简介:杜俊华(1971—),男,重庆人,博士,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社会变迁。

者,处死刑”,并追缴其贪污所得财物。^[3]这使抗战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治色彩。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并制定相关的法规条例严惩党员干部中的腐败分子。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规定,对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者,给以惩戒撤职查办或向法院提起公诉。^[4]

相比较而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员以外的民众则处罚要轻一些。比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7条规定:“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2]334}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司法实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从严治党,严惩党员犯罪分子,以确保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促进党的群众路线工作落到实处。最为典型的司法案例是黄克功因杀人被判死刑,以及肖玉璧因贪污被判死刑的实践。

(一)法律视角下的黄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5日,在延安发生了黄克功枪杀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刘茜的事件。黄克功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队长。15岁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爬雪山、过草地,冲锋陷阵,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案发当年才26岁,在抗日的战场上大有可为。虽然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中,自古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在司法制度上也有“官当”的规定,实践中也是官官相护。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也规定:“凡是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5]但毛泽东为了革命从抗战大局出发,不徇情枉法,没有执行功可减罪的原则。

1. 黄克功在法院公审中被判处死刑的司法程序公正

1937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操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在审判之前,审判人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有单位代表——抗大政治部、边区保卫处的负责同志和边区高等检察官共同作为公诉人,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4名学生作为人民陪审员,有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万余人参加,最大程度地让人民群众知晓、参与

和监督司法。

经过讯问被告人黄克功,证人出庭证明,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后,审判长问黄克功:“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人们从他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左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黄克功请求说:“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最后,审判长庄严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并向大会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6]110}

2. 中国共产党对黄克功执行死刑的法律依据

之所以对黄克功采取死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黄克功案件的恶劣影响。一个行为,如果只是个人的单纯行为,社会是不关注的。而之所以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刑法严厉惩罚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因为它“触犯了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在于行为的社会影响。黄克功事件当时在国内外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就国民党而言,在延安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的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总是找理由加以攻击,以混淆视听。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对这件事大肆宣传,污蔑根据地。说是“延安发生的桃色事件”,边区是“封建割据”,共产党“无法无天”“践踏人权”。因此,对黄克功执行死刑可以回应和反驳国民党的污蔑。在陕甘宁边区,许多从国统区千里迢迢到达延安参加革命的与刘茜有着同样理想的年青男女,以及根据地的老百姓也都对黄克功的乱杀人不满意。其二,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一些红军干部,在根据地政权建立以后,确实少了长征时期的危机感,在婚姻和其他生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与老百姓的关系,所以杀黄克功可以警告干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提到:“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6]110}其三,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要树立法治政府形象,以法办事。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般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法律。”^{[6]111}其四,黄克功的主观思想。毛泽东认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

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很显然,这里毛泽东已经不是就某一个人的处理,而是站在全党全军的高度,从从严治党治军的立场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开始局部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黄克功的严肃处理,也是加强执政党建设、依法治国执政的良好开端。

3. 黄克功杀刘茜被判死刑与国民党党员张灵甫杀妻被蒋介石释放之对比

与黄克功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将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张灵甫杀妻但蒋介石并没有处死他,而是让他将功补过。抗战前,张灵甫因怀疑妻子吴海兰不忠,从腰间拔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手枪,对着吴海兰的后脑勺猛然扣动了扳机。“呼”的一声枪响,花容玉貌的吴海兰顿时血流满地,玉殒香消。张灵甫枪杀妻子后,连尸体也不收拾掩埋,便返回了部队。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命令胡宗南将张灵甫撤职查办,押送南京。张灵甫到了南京后,上书蒋介石要求当面说清“杀妻”的缘由。蒋介石心里有气,哪里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下了一道口谕,将张灵甫关入“模范监狱”,判处10年徒刑。监狱对张灵甫不予收监,让他住进监狱的招待所了事。张灵甫原准备银铛入狱,没想到会受到如此优待。抗战爆发后,张灵甫以立功赎罪的名义被释放。

(二) 肖玉璧贪污被法律严惩的司法实践

肖玉璧,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体现了司法对党员干部犯罪从严惩处的原则。

1. 肖玉璧贪污犯罪事实清楚

1938年初,肖玉璧结识在靖边太黄口开店之军官张某,张某即要肖玉璧为他招募新兵,说“招满一营即为营长,招满一团即为团长”。该犯利欲熏心,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前后两次挪用公款2520元借给张某,企图达其升官发财之迷梦——用多收少报之方法欺骗上级。1939年2月间,经财厅发觉,当派员与之清算,该犯籍口出发讨账,复拐带公款250元税票18张,实行逃跑逃至宁条梁,将税票以72元卖给徐二。但因税票期间已过,不能使用,徐二又复退回该犯。同年4月间,肖玉璧潜至绥远东胜县桃力明地方会晤张某——此时张某已在某部当连长,该犯仍受命回宁条梁为张某招兵,后招兵不着,无以为生,乃潜回清涧原籍,当被发觉捕获。后被依法判处死刑。”^[7]

2. 依法处理定刑适当

当时,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处分相当严厉,1943年公布的《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直接写信向毛主席求情。当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毛主席时,毛主席并不看信,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主席沉思了一阵,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主席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肖玉璧被依法执行了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从严治党的成效及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仅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查出贪污案件1157件,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延安乃至全国的威望大大提高。对此,中外媒体无不称颂陕北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一个真正为民众的政府。1942年1月14日的《解放日报》报道:“前边区财政经济处财政科出纳员刘合明,身为共产党员,遗失公款,隐匿不报,似此情形实有重大贪污中饱之嫌疑,经边府审计处黄、刘处长呈送请高等法院究办,昨经高等法院批交延安市地方法院办理。再比如,1942年2月11日的《解放日报》报道^[8]:“边区建设厅运输局职员宋桂年,前在该局点收各县公盐代金中,遗失公款500余元,经侦察,发现宋桂年于该点征收公盐代金时,窃取100元,详细追问后,又发觉宋于去年冬曾由吴堡家乡带来鸦片一斤余在延安出售。建设厅以宋桂年身为公务员,竟敢违反政府法令私售鸦片,屡窃公款,解送司法机关查办,现延安市地方法院已处宋桂年7个月徒刑,并责令归还窃款512元2角2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从严治党的司法实践也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的从严治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应该是毛泽东继民主革命时期处置肖玉璧之后依法从严治党的又一力作。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

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间,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十分明显,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态度与抗战时期处理肖玉璧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 ①1939年1月17日至24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在陕甘宁边区特殊环境下,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它是一个地区自治性宪法文件,以三民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不仅对陕甘宁边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 ②又称《五一施政纲领》,是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政治纲领,共21条,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行为,规定了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以及有关婚姻家庭、民族、外交、侨务等各方面政策。它比《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更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对

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规定了具体政策。

参考文献:

- [1]《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142.
- [2]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31-32.
- [4]陕甘宁边区各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N]. 解放日报,1943-05-16.
- [5]俞荣根. 艰难的开拓[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58.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7]肖玉璧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已经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N]. 解放日报,1942-01-05.
- [8]边区建设厅职员宋桂年、李文源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公款,被送县究办[N]. 解放日报,1942-02-1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Strictly Punishing of the Criminal Party Members in Sh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from Legal Perspective

DU Junhua, ZHOU Yuxin

(Marxism and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 Research Center,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he CPC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punish the criminal Party members strictly, especially party cadres. Special provisions have been made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Program in Sh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and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in Punishing Corruption*. In judicial aspects, the CPC has carried out active practice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The CPC has severely punished the criminal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volution such as Huang Kegong and Xiao Yubi. This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members, but also fully embodies the spirit of rule of law.

Key words: law;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h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Party members; strictness

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雷 霄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学工部,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文献分析,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对老年人心理需求结构进行构建,并在此基础上编制适用于60周岁以上人群的心理需求量表。采用质性(访谈法)与量化(问卷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老年人心理需求理论构想编制量表,并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共23题,包括5个因子,总量表的Cronbach为0.937。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各项信、效度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供60周岁以上老年人心理需求研究和实践应用。

关键词:心理需求;老年人;量表编制;信度;效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4

中图分类号:B844;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65-05

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何养老并健康养老长期受到广泛关注。在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窗口期。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但目前我国存在养老体系建设不均衡,养老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老龄工作体制不健全等问题。

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不仅生理机能退化,并且因为退休、丧偶等现实事件,社会群体交往缩小,自我效能感降低,容易引发抑郁、孤独、苦闷和失落等情绪,产生心理问题^[1-2]。在《“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第八章“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专门指出:要健全老年人精神关爱、心理疏导、危机干预服务网络,督促家庭成员加强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和心理沟通。因此,养老不仅仅是保证老年人吃好穿好、身体健康,更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提高老年人的主

观幸福感。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中国心理学大辞典》中把需要和需求两种概念分别论述:需要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得到满足的心理倾向,是有机体自身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头脑中的反映;需求则是人体内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对维持发展生命所必须客观条件的反应。由此可知,需要更多强调的是精神驱力或者缺乏,需求则是指物质上的最优选择方案,是最适合个体生存必不可少的,是使欲望能达到有限最大满足的最佳物品。由此,心理需求的概念就应运而生,即,心理需求是人类深层次的需求,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性需要。也就是说,除了生理需求(维持个体生命)以外的一切需求,均称为心理需求。

国内外老年学家对于老年人的定义有多种,根据我国老年人口的现状和经济发展情况,在本量表的编制中,我们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即把老年人定义为年满60周岁的个体。

笔者把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定义为:凡年满60周岁的个体除生理需求(维持个体生命)以外的一切需求,主要包括情感需求、人际交往需求和自我发展的需求。

收稿日期:2018-04-15

作者简介:雷霄(1987—),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学工部助教,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二、访谈过程和题目编写量表的编写程序

(一) 确定题目, 查阅相关文献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不断增多,其中也有一些关注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近几年来关于老年人心理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内容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老年人因生理及社会角色的变化,心理需求的显著变化特点。例如吴捷等人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多数老年人养老意愿较传统,居家养老仍占主流,生活中面对的心理问题的主要现实来源为身体健康状况、内心的孤独感及社会关注度降低。研究也发现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在尊重需要、经济需求、学习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身体状况老年人在参加社会活动需求上也存在显著差异^[3]。

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对象研究。主要以老年人心理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分别以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心理需求的特点。例如周珊珊在针对失能老人心理需求的实证研究中指出,不同养老模式下失能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居家养老的失能老人心理需求最高,而在公寓养老和托老所养老模式下的失能老人,则更应该关注其生理需求和交往需求^[4]。

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应用研究。基于老年人不同的心理需求探讨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制度建设的研究。例如张晴晴在《老年人心理需求对城市公园景观设计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满足老年心理需求的景观是园林设计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城市公园设计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安全需求、审美需求、空间需求等^[5]。在《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需求的公共图书馆适老化研究初探》中也指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文化信息的需求和社会参与的渴望并未因此消退,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对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使用方式也发生显著变化,老年人逐渐成为公共图书馆物理空间使用的重要人群,并针对公共图书馆提出适老化策略^[6]。由此可知,科学研究老年人心理需求,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养老服务建设在功能层面、设施层面、服务层面及空间层面却可提供适老化参考。

综上所述,研究老年人心理需求在我国老龄化加剧的大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为我国养老设施建设提供参考,也可以为不同养老模式下的服务内容提供指导性建议。但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在国内有关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实证研究中,标准

化的量表较少,多数都采用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由此对调查结果的普适性具有一定影响。而被较多采用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傅双喜在2009年编写的《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问卷》,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我国老龄化和养老模式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缺乏时效性。在有关老年人心理需求的研究中,相关量表是量化老年心理需求的必备研究工具。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关于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的研究更倾向于研究老年人心理需求的某一具体方面,如对孤独感、抑郁和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多,在这些研究中,也更倾向于采用 UCLA 孤独量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等,针对老年人心理需求的研究由于专业量表的缺乏而少之又少。

(二) 通过访谈,进一步搜集资料

根据前期搜集到的资料,围绕相关核心概念及其理论基础提出访谈提纲,主要以个别访谈的形式,在成都市和郑州市随机抽取了10位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访谈,收集他们对“心理需求”的理解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需求。

(三) 根据访谈结果,构建理论模型,编制问卷

根据访谈的结果,编制了《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的初始问卷,评定的内容共分为5个维度,分别是老有所亲,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初始问卷共有34项,每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其中“完全符合”记5分,“比较符合”记4分,“一般”记3分,“不太符合”记2分,“完全不符合”记1分。

(四) 考察项目的可读性

量表编制完成后,首先对项目的可读性进行考察,选取河南省老干部大学的10名老年人对项目的可读性进行评价,对每个题项的评定采用4点计分法,其中“4”表示“完全明白”,“3”表示“基本明白”,“2”表示“基本不明白”,“1”表示“完全不明白”,其中,“完全明白”和“基本明白”的题项占总项目数的99%，“完全不明白”的题项占总项目数的0%,在项目可读性考察中,主要针对第13题做了些修改,其他项目则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三、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的施测和结果分析

(一) 被试

在四川省成都市和河南省郑州市共发放问卷320份,有效回收率为93%。其中男性143人,女生154人,平均年龄65.2岁。

(二) 程序

受访者按照自愿原则完成问卷,完成一份问卷

的平均时间约 15 分钟。使用 SPSS 17.0 中文版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项目鉴别度分析

通过两次预测,采用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初始问卷,共含有 34 项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法,其中“完全符合”记 5 分,“比较符合”记 4 分,“一般”记 3 分,“不太符合”记 2 分,“完全不符合”记 1 分。

从河南省老年干部大学,河南省委家属院和河南省供销社家属院共抽取 45 名老年人作为样本,年龄均大于 60 岁,共发放问卷 45 份,回收有效问卷 31 份。

对两次预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求出所有被试在所有题项上的总分,找出 27% 的高低分组,采用独立样本 T - test 检验高低分组在每个题项上是否存在差异,删除了 CR 值达到显著性水平,即 sig 值大于 0.05 的题目 8 项,最后保留 23 个题项,均 Sig = 0.000。

(四)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 1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KMO	0.707
近似卡方	625.545
Sig	0.000

对量表中最终确定的 23 项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表 1 可知,KMO 值为 0.707,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625.545,达显著,从这两个指标可以得知该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表 2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合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9.931	43.180	43.180	6.427	27.943	27.943
2	3.152	13.705	56.885	3.628	15.774	43.717
3	2.104	9.148	66.033	3.462	15.050	58.767
4	1.483	6.449	72.482	2.504	10.888	69.655
5	1.106	4.810	77.292	1.756	7.637	77.292

由表 2 可知,经过主成分分析,共提取 5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转轴前的特征值分别是 9.931, 3.152, 2.104, 1.483 和 1.106,解释的变异量分别是 43.18%, 13.705%, 9.148%, 6.449% 和 4.81%, 累计可以解释总方差为 77.292%。转轴后的特征值分别是 6.427, 3.628, 3.462, 2.504 和 1.756,解释变异量分别是 27.943%, 15.774%, 15.05%, 10.888% 和 7.637%, 累计可以解释的总方差为 77.292%。

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数均在 0.4 以上,得知第一个因子包含四个题项,第二个因子包含七个题项,第三个因子包含四个题项,第四个因子包

含四个题项,第五个因子包含五个题项。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符合笔者编制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的理论结构,即 23 个条目负荷量的主要因素可以解释的总变异为 77.292%。将第一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用”,即老年人自我价值的需求;第二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乐”,即自我发展需求的第三个子维度;第三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亲”,即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第四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教”,即自我发展需求的第二个子维度;第五个因子命名为“老有所学”,即自我发展需求的第一个子维度。

(五)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河南省郑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市另发放包含 23 个题项的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 3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其中男性 146 人,女性 154 人;平均年龄 66.2 岁。总体样本(n = 300)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老年人心理需求量表各因子题项和载荷

自我价值需求		自我发展需求				个人和社会情感需求			
老有所用	老有所亲	老有所教	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题项	载荷		
12	0.812	1	0.675	8	0.817	6	0.822	4	0.827
13	0.724	2	0.866	9	0.605	7	0.721	5	0.782
14	0.825	3	0.781	10	0.733	17	0.698	18	0.815
15	0.672	16	0.813	11	0.718	21	0.818	19	0.866
								20	0.781
								22	0.614
								23	0.710

(六)信度分析

采用 Cronbach 系数,对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 4,由所得结果可知该量表信度较好。

表 4 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

维度	自我价值的需要	自我发展的需要	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要	总问卷
系数	0.883	0.889	0.918	0.897

四、讨论

(一)问卷的信效度

通过统计分析,该问卷结构和预想结构相符,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老年人自我价值需求,自我发展需求及个人和社会情感需求,三个维度的解释力均大于 5%,累积解释总方差为 77.292%。另外,对该问卷的分半信度检验, Spearman - Brown 系数均达 0.9 以上,总 Guttman Split - Half 系数为 0.917,进一步验证了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良好。虽该问卷从测量学角度分析各指标良好,涵盖内容也较全面,但其稳定性仍需在各不同的样本中验证和检验。

(二)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

在该研究中累积两次预测和正式施测方法问卷380份,对象分别为四川和河南省会城市的离退休老年人,涉及到取样范围狭窄,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另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排除文化程度、健康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老年人,该行为进一步限制了该问卷样本的代表性。

(三) 问卷的适用范围及其启示

在当代社会体制中,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究竟是什么,老年人哪方面的心理需求最高,哪方面的需求最低,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国关于老年人心理需求研究的重点。但由于国内缺少权威的测量老年人心理需求的专业化量表,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采用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在此自编问卷中,较多编入了研究者自身关注的心理需求的某些方面,而缺少对老年人心理需求全面的测量。例如在刘颂的《城市老年人群精神需求状况的调查与研究》^[7]一文中,通过对南京6城市和2所老年大学的1200为老年人进行了自编的《老年精神问卷》调查,该问卷由基本状况(即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有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家庭模式和退休前的职业种类)、精神生活状态、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三部分组成,研究者并没有对该量表的信效度进行说明,仅测量其研究中比较感兴趣的那部分内容,并且研究者发现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生活安全需求、社会尊重需求和行为意义需求。

另外,在傅双喜的《中国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报告》中指出,老年人心理上对不同因素的需求程度是受其年龄、文化程度和年轻时从事的工作等方面的影响的。且在其报告中,傅双喜采用了自编的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问卷,共17题,采用了likert—5级评分,五个等级依次为“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题项相加得分代表心理需求水平,分值越大,表明心理需求水平越高。问卷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维度:生理需求、交往需求、认同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并对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进行了检验,且符合心理测量的标准,但在效度方面却未做进一步的检验。

由上述可知,在有关老年人心理需求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自编老年人心理需求问卷多数都没有经过标准化的检验,缺乏统一的测量标准,且多数都是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但是该理论中

的生理需求并不属于研究中界定的心理需求的范畴。因此,笔者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及 Ryan、Deci 的自我决定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老年人心理需求测量的三个维度,即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自主发展的需求和自我价值的需求。

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主要是指:老有所爱、老有所伴和老有所亲,即归属感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和亲情友爱的需要。主要指的是个体对家庭和朋友的需要,希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对人与人之间亲密情感的需要。老年人因为退出了工作岗位,社会活动范围变小,并且子女已经成家立业,忙于各自的小家庭,所以老年人在情感上难免会感到丧失和缺乏,如果这种渴望亲密感情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感到孤独、空虚甚至影响身体健康。建立亲密团结的生活氛围,可以带领老年人尽快从离退休带来的失落感中走出,使其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另外,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老年人会对周围的许多朋友和亲人甚至配偶的去世,感到更大的丧失感和孤独感,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了,进而产生忧郁失落的情绪。所以,让老年人无论是在单位、家庭还是日常生活中,时常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支持,有助于身心健康。总而言之,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就是指老年人与社会交往的需求,有共同活动的对象和同伴,在遇到困难和难过时能够获得朋友、亲人的支持。现代的老年人对个人和社会情感的需求越来越高,例如崔丽娟^[8]的研究表明子女和街道、社区的支持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情感和认知方面的支持最为所需。

自主发展的需求主要是指:老有所学、老有所教和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主要是指老年人对知识认知的需要,即再学习的需要。例如,参加各种技能学习班,老年大学或者定期听讲座等。我们也许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年过60不学艺”,许多老年人认为自己已经在世上生活了那么多年了,该会的也就都会了,不会的再怎么学也可能学不会了,已经没有再学习的必要了,这是对自我的一种消极负面的感知和评价;还有一句话是“活到老,学到老”,这就与前面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老年人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对知识的渴望也会越来越强烈,很多时候为了“不服老、不认老”就会产生希望再度学习的需要,促进自我发展,希望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并不因为生理机能的下降而让自己的生活由他人做决定,这是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充分体现。“老有所教”主要是指老年人希望能把自己毕生所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或者其他年轻人,

同时这也是老年人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希望通过向他人传授知识从而获得他人的尊重,消除自己因为年老而带来的自卑感,有些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如若得不到满足容易产生自卑、软弱和无能等体验从而影响身心健康。“老有所乐”主要是指老年人希望能发展自己除了工作能力以外的业余兴趣和特长,例如参加老年活动团体、参与健身或进行旅游等休闲娱乐活动。

自我价值的需求主要是指:老有所用、老有所为和老有所成。“老有所用”主要是指避免老年人因为自己已经不再工作而产生无用感,树立“老有所用、余热生辉”的信念,现在很多老年人仍愿意发挥自己的余光和余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甚至希望得到原工作单位的返聘,重回工作岗位,有的老年人则希望能在家照顾孙子女,替子女减轻生活的负担,继续为社会和家庭做贡献。“老有所为”主要是指有的老年人希望能够继续年轻时未完成的梦想,例如去国外旅游或者上电视表演等。“老有所成”主要有些老年人希望通过自己老年的努力,能够再创辉煌,取得其他别样的成功的需要,具有较强的成就动机。

因此,在该问卷的编制过程中,笔者力求站在更客观的角度,查阅资料,综合有关理论,希望通过该问卷能对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做出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测量。

参考文献:

- [1] 林岳卿,方纪乾.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老年人量表简化版的研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
- [2] 王希华,周华发.老年人生活质量、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3).
- [3] 吴捷,李幼穗,王芹.离退休老年人心理需求状况[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8).
- [4] 周珊珊.失能中老年人不同养老条件下的心理需求[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12).
- [5] 张晴晴.老年人心理需求对城市公园景观设计的影响[J].城市公共艺术研究,2017(12).
- [6] 陈刚.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需求的公共图书馆适老化研究初探[D].天津:天津大学,2016.
- [7] 刘颂.城市老年人群精神需求状况的调查与研究[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0(1).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Preliminary Formulation as well a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xamination on Psychological Demand Questionnaire of the Aged

LEI Xiao

(Students' Affairs Divis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build a psychological demand structure of the aged and on this basis to formulate a psychological demand scale applied to those over sixt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ogether with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relevant theories both home and abroad. **Method:** Based on the idea of psychological demands of the aged, this paper will formulate a scale and test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namely, interviewing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Result:** There are twenty – three questions in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 scale, including five factors. The Cronbach of the whole scale is 0.937. **Conclusion:** Indexes on reliability and vitality of the scale are in keep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sychometrics and can be applied to psychological demand study and practice for the aged over sixty.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demand; the aged; scaling; reliability; validity

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与学术出版社的品牌建设

——基于新闻传播学著作的考察与分析

祁 涛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学术出版物已经数量庞大不可胜数,用户必须拥有科学有效的选择机制。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是出版社协助用户建立选择机制、获得品牌效应的重要方式。以新闻传播类学术著作为例,可以发现学术著作存在着部分著作的重复出版与稀缺著作的绝版、热门议题著作出版的集中性和知识谱系性出版的欠缺、纸质著作的高价格与电子著作资源的不完整三重矛盾。学术出版社需要提高与用户特别是高影响力学者的协商效果与效率,就学术精品的认定达成共识,推进稀缺学术专著的再版,规划高质量学术文库,建设完整的电子著作系统。学术出版的精品化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报偿,也使出版社能够吸引核心用户,并在用户中培育良好的印象和记忆,培育信赖感和依赖感。

关键词:学术出版;学术精品;出版品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5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70-05

学术出版是以“推进科研、探究学问、弘扬学术、传播新知为根本宗旨,以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等为基本形式,以学术成果的发布、展示、传播以及交流为基本内容,遵守出版管理规定与学术规范,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种形态”^[1]。它既包括学术论文的发表与学术著作的出版,也包括开放存取的网络出版和在社交媒体的数字化发表。学术出版与学术研究息息相关,就如原斯坦福大学校长肯尼迪所说,“出版物就像硬通货,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2]。它既牵涉到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也关系到专家学者的成长和研究机构的声誉,还关涉着学术出版机构的品牌形象甚至经营状况,其整体状态则展现着国家民族的科研实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本论文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与学术出版社的品牌建设层面,因为即使从研究者即学术著作的主要用户的角度来看,学术出版物也已经数量庞大不可胜数,

更别谈普通用户的感受了。这使得用户必须获得一个科学有效的选择机制,找到必读的和可读的作品。提供了这种选择服务,出版社必将在用户中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赢得用户的忠诚和信赖。本论文以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为考察对象,探讨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与学术出版社的品牌建设。

一、当前新闻传播学著作出版中存在的矛盾

新闻传播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由于历史根基较短,知识积累不足,一直受到新闻无学论的困扰。但是历经数代新闻传播学者筚路蓝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新闻学逐渐成为了显学”^[3],其中一个典型的表征就是,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进入繁荣状态。以“新闻”和“传播”在读秀学术进行搜索,分别可以得到14286种和6255种著作,加上“媒体”搜索得来的7235种、“传媒”搜索得来的2011种、“宣传”搜索得来的4333种、“广告”搜索得来的6633种(还

收稿日期:2018-04-22

作者简介:祁涛(1977—),男,河南滑县人,新闻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报道规范与新闻媒体运作。

未包括“报道”“真相”“舆情”“电视”“网络”等相关词汇),即使剔除重复计量,剔除出版的教材和作品集,以万计数新闻传播类学术著作当是个保守估计。数量的快速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用户的阅读能力,结构上的问题更是增加了用户的选择难度,使新闻传播类学术著作的出版面临三重矛盾。

1. 部分著作的重复出版与稀缺著作的绝版

重复出版是指出版社“反复、重复、雷同地出版同一题材图书”^[4]。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不计教材),重复出版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选题集中,跟风出版。特别是在新媒体领域,只要出现新的媒体平台,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一批专著。微信出现不到7年,在读秀学术搜索中就可以找到368种著作;微博的火爆仅有8年,出版著作已达291种。多数著作仅仅告诉读者新媒体的传播特征,虽然署名不同,同质化却非常严重。二是明星著作反复出版。国内有知名学者出版了一部质量很高的专著,已经由两家出版社出版了3次,他还将其修订为教材,在多家出版社出版了6次。威尔伯·施拉姆等人所著的《传播学概论》已经出版了7个版本,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至少有5个版本。与重复出版相对比,部分重要著作处于稀缺甚至是绝版状态,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在孔夫子旧书网已经卖到300元以上,约翰·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的《媒体考古学》、杨保军的《新闻事实论》等已标价至200元,有些绝版书已经没有存货。

2. 热门议题著作出版的集中性和知识谱系性出版的欠缺

每个学科固然有其核心议题和关键领域,但是“科学史证明,相距较远的学科领域的相互交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与源泉”^[5]。新闻传播学特别是传播学属于交叉学科,学术出版应当考虑相关学科的支撑作用。但是目前,除了与其具有直接源流关系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等的著作之外,新闻传播学出版的知识谱系性相对不足。这些与新闻传播学科相关的知识谱系非常广泛:在新闻事实层面,涉及康德的理性事实论、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论,以及法学中的证据性事实论;在新闻表达层面,牵涉到巴尔特的符号学、福柯的话语理论、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在新闻与人的关系层面,有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理论、马斯洛的人格与需求理论、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等。这些著作并非没有出版,但是它们只能在其他学科类别中找到,更有甚者,许多新闻传播学著作也只能在

其他学科类别中寻找,例如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等都是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出版的。这种状况使得用户只能依靠个人兴趣偶然搜索获得相关的出版成果,对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学术视野的开阔,都是不利的。

3. 纸质著作的高价格与电子著作资源的不完整

我国图书价格管理比较严格,图书价格相对用户购买力较高,学术图书价格相比通俗读物更高。^[6]除了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之外,个人用户少有能力也少有意愿拥有完整的专业资料。用户常见的选择是拥有部分经典性著作,其他临时使用和具体检阅的文献则依靠互互联网,依赖较多的是读秀学术搜索、超星发现系统等数字图书馆系统,新浪爱问共享、新浪微博微盘等也可搜索部分资源。目前的电子著作供应平台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资料不完整。供应平台依据用户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提供资源,著作出版时间较长。新闻传播学知识更新非常快,最新出版的著作恰恰没有资源。二是平台比较分散。用户找到原著全文全凭机遇,很难确定能不能找到文献,也很难知道会在哪个平台找到文献。三是平台提供的资料多是人工扫描版,漏页、缺页和页面不清晰等质量问题比较明显。四是资料多是单本收费制,价格偏高,往往付费之后才会发现所选文献不合适。对出版社而言,在纸质出版面临诸多营销难题,电子版权受到诸多渗透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利用自身数据优势和版权资源,为用户提供资料完整、质量精良且优惠可靠的电子文献服务,对各利益相关方都是非常有利之事。

二、新闻传播类学术精品协商式出版策略

解决上述三重矛盾,在保障出版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需要强化学术著作出版的精品意识。学术精品拥有哪些品质?由谁来进行判定?如何证明和检验?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在学术著作出版和使用的过程中,上乘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依然是可辨识的。^[7]学术精品的产生,固然有赖于学者的深厚学养和潜心钻研,有赖于学术氛围的自由与包容,还依托于学术出版机构的支持与慧眼,以及装帧方面的精心设计。我们关注的则是学术精品在销售与消费层面的获认。在销售层面,对于学术出版机构而言,学术精品意味着出版物吸引了高质量的用户,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并在其间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在消费层面,对于用户而言,学术精品则呈现为必读文献和必引文献。从这种获认意义

上讲,学术精品是出版机构和用户之间协商的结果,任何学术精品获得承认,都需要在此协商过程中取得共识。对于学术出版机构而言,在市场竞争与新媒体挑战如此激烈的情形之下,若想实现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以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提高与用户特别是高影响力学者的协商效果与效率,从选题开始就要努力促成这种共识的形成,这要求学术出版机构具有数据收集意识和把握市场全局的能力。

1. 定期对全国新闻传播学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在读博士进行需求调查

“重视读者需求是当今出版企业的活力之源,发展之本”^[8]。学术精品固然不等于用户广泛需求的出版物,但是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使用需求与学术著作的精品属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新闻传播学界,掌握着学科核心议题和知识前沿的有三个群体:一是新闻传播学优秀院校中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位居学科建设高端,掌握着学科核心议题和前沿话题的定义权,对于何为新闻传播学经典著作和精品著作拥有话语优势。二是新闻传播学优秀院校的在读博士和刚毕业的博士。他们拥有新闻传播学最新的知识结构和最具创造性的科研能力,对前沿知识和交叉学科的知识最为敏感。三是海外留学的学者和在海外从事教研工作的学者。他们接受了来自其他国家的专业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对国外的研究现状最为了解。学术出版机构每年可向这三类学者进行问卷调查,由他们列出“必读的专业著作”“必读的相关专业著作”“迫切需要的学术著作”各15本,同时列出“最优秀的专业学术论文”15篇,经过统计分析,取共识最多者进行学术出版的选题策划。这样,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公认的新闻传播学精品著作即可基本囊括在内。

2. 与全国主要图书咨询交易平台合作进行数据分析

与用户协商并非要与其进行直接的交谈,用户购买学术著作、查询学术文献以及科研中引证学术文献,都是其需求的表征,更是学术著作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出版社认真收集并分析这些数据资料,可以与用户实现比日常接触更有效的虚拟性协商。这些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利用当当网、京东网等重要学术出版物销售平台的数据,收集新闻传播类学术著作的销售情况,以及新闻传播学术著作与其他学科著作交叉购买的情况,用以了解当前该专业学术著作的市场需求状况,以及学科知识的谱系性消费情况。二是与孔夫子旧书网以及淘宝网

等旧书销售平台合作,收集并分析专业旧作的销售状况,特别是价格高涨的专业旧作的供需状况,了解本专业急需的稀缺出版物的情况。三是调查用户在读秀学术搜索、超星发现系统等平台进行的搜索与咨询情况,收集并统计分析学术研究对各专业著作的使用和依赖情况。四是与中国知网开展合作分析,对当年或者近半年的专业学术论文特别是权威期刊专业学术论文进行引证分析,确定处于引证核心的专业著作以及交叉学科的著作。依据这些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学术出版机构首先可以推出稀缺学术专著的再版工作,规划高质量学术文库的出版,以及交叉学科学术著作的谱系性出版工作,还可以出版高引证指数的专业学术论文和相关学科的必读文献。

3. 联合建设内容完整、查询便捷、使用可靠的电子文库

在问卷调查和虚拟协商的基础上,利用新媒体平台近乎无限的容量空间,学术出版机构可以假定所有新闻传播学专业著作均有传播价值,并为之建设一个完整的电子文库。学术出版社可以共同联合,或者由数家实力较强的出版社成立联盟,或者从国内互联网核心企业融资并联合成立公司,再与其他出版社进行知识产权谈判,将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制成电子文档,通过统一的电子文库平台向用户开放,特别是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推介。文库选择也可以依据各电子图书交易和查询平台,选择达到一定交易数量和查询规模的著作进行,寻找用户需求的公约数。对于与学科相关的知识谱系的数字出版,则依据所得数据设置标准,达到标准以上者纳入电子文库。这样的电子文库需要解决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资料的完整性,即能够让用户形成明确的期待,可以在该文库中获得想要的资料。二是文库与纸质图书保持格式的同态性,因为用户查询和引用格式依然是纸质标准。三是该文库的文献查询要比较便捷。当前各个文库中,读秀、超星可以查询章节,但不可以查询页码,其他的连章节查询也没有设置,非常不方便。在产品过剩的年代,一个内容完整、查询便捷、使用可靠的电子文库,必将受到用户欢迎。

三、精品化支持的学术出版社品牌建设

品牌形象理论构建者大卫·奥格威认为:“品牌是一种复杂的象征,它是产品、品牌属性、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的无形总和,品牌同时也因

消费者对产品使用的印象,以及自身的经验而有所界定。”^[9]品牌实质上是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与用户对该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体验相结合的产物,其结果是确定企业产品和服务获得用户选择的几率。企业品牌的构建,在于提升用户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获得感,同时要着力降低使用过程中的付出。出版业总体上属于内容产业,内容产业的品牌建设即获得用户认同和选择的基本路径,执行威尔伯·施拉姆提出的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即获得的报偿/费力的程度。具体到学术出版而言,获得较高的报偿意味着学术出版物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科研资料和研究方法,降低费力则意味着用户接触学术出版物更容易、更便捷,即学术出版物相对价格更优惠,寻找文献所需时间更短,查阅内容更快捷。学术出版的精品化恰恰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报偿,同时也为出版机构的品牌建设提供支持。

1. 学术精品能够使用户对出版社留下良好的印象和记忆

品牌是用户记忆中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所有体验的总和。如果产品和服务体验良好,该体验就会给用户留下良好的记忆并在其他场合通过联想方式得到激活。学术出版也是如此,如若出版社的学术出版物能够让用户获得良好阅读体验和使用经验,用户就会对该出版社产生兴趣,并对该出版社持续保持良好的评价。以新闻传播学专业著作为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不多,但是其出版物都属于精挑细选之作,如“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和“文化和传播译丛”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既有学术水准,又有可读性,既可做专业教材,又可成为高层次研修类读物,出现了好几种绝版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是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出版重镇,文献丰富,涉及广泛且占据前沿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传播学文库”、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基本上集纳了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最新优秀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在经典译著方面着力颇多,“未名社科·大学经典”和“清华传播译丛”颇受好评;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学术性非常强,如今很多书店都买不到了。这些学术精品成为出版社的标签和名片,用户只要读到这些著作,就可以联想到这些出版社;只要想到这些出版社,就会记起这些著作。

2. 学术精品能够使用户对出版社产生依赖感和信赖感

“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会决定其对品牌的偏好,并最终决定对品牌的选择和购买”^[10]。也就是说,品牌的实质是基于信赖感而降低消费决策成本、提高消费选择效率的标准,如果产品和服务达到了效用标准以上,用户即可根据消费经验和使用体验,对其未来的消费和使用形成稳定的预期,并养成消费和使用习惯。学术著作的阅读和使用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学术评价日益量化以及科研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这一趋势更趋强化。许多学者在购买和引证学术著作时,选择出版社都有偏好:在电子平台选择购买最新著作时,倾向于浏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的出版物;在引证时如果遇到同类内容著作的重版,也更倾向于引用权威出版社的版本;学术期刊在审核学术成果时,“编辑从引文的权威性、时效性、准确性、有效性就可以大致判断文章质量的优劣”^[11],虽然属于不成文的规范,文献的出版机构是否权威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这就说明,学术精品的出版是对出版社信誉的保证,出版社的信誉反过来也是对学术出版质量的保证,二者的良性循环吸引用户的消费和使用偏好。

3. 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是出版社吸引核心用户的关键

在学习终身化和阅读全民化的背景下,学术出版物固然可能吸引普通用户,但是其核心的消费和使用群体依然是科研工作者,这是学术出版物消费和使用量最大并且消费和使用周期很长的群体,在高等教育发展和国家科研支持的背景下,该群体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仅以新闻传播学为例,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681所大学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而“985”“211”大学中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的比例高达55.9%。这些学校拥有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教师6912人(其中硕士以上2943人),设有1244个本科专业点,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3个,在校本科生超过22万人,部分高校在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规模超过本科生。^[12]且不说专业教师和在读博士的学习和科研需要高频率使用专业文献,许多地方的硕士研究生必读的专业书已近百余种,本科生的必读书也在数十种之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也是质量要求很高的需求,它要求学术出版物的经典性和高质量,而电子出版物则要求文献的完备性和可接近性。如若出版社能够为其提供

高报偿、低成本的服务,就能够得到这个群体持续的支持,也能够获得高持续性的发展动力。

四、结语

学术著作的精品化出版是出版社协助用户建立选择机制、获得品牌效应的重要方式。学术出版社需要提高与用户特别是高影响力学者的协商效果与效率,就学术精品的认定达成共识,推进稀缺学术专著的再版,规划高质量学术文库,建设完整的电子著作系统,从而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报偿,也使出版社能够吸引核心用户,并在用户中培育良好的印象和记忆,培育信赖感和依赖感。

参考文献:

- [1]刘永红.关于学术出版的几点思考[J].现代传播,2016(2):55-61.
- [2]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29.
- [3]李蕾,高海珍,章淑贞,方汉奇:新闻事业的守望者[J].新闻与写作,2014(3):24-28.
- [4]曹建.对于重复出版问题的思考[J].中国出版,2009

(7):73-74.

- [5]王媛媛.封闭与开放:走向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J].高等教育研究,2010(5):47-49.
- [6]徐来.我国2005—2015年图书定价水平走势与特征观察[J].出版广角,2016(12):24-26.
- [7]马克昌.打造学术精品、推动学术创新漫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5):520.
- [8]王桂贞.论读者需求与出版责任[J].编辑之友,2010(1):60-62.
- [9]刘世忠.品牌策划实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42.
- [10]王枫,张宁.品牌形象认知与品牌选择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77-82.
- [11]张惠.论学术期刊编辑对稿件质量的把关——以文献引用为视角[J].出版科学,2011(2):42-45.
- [12]张昆.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纂的必要性论析[J].现代传播,2016(11):141-144.

(责任编辑 姚虹)

Quality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and Brand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Press

——Research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Work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QI Tao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number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is huge, users must have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election mechanism. The fin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publishers to assist users in establishing selection mechanisms and obtaining brand effects. Tak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cademic works as an example, the reprinting and the out-of-printing of scarce works, th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r topics, the lack of publication of knowledge pedigrees, high price of paper works and incompleteness of resources for electronic works are three contradictions. Academic publishers ne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consultation with users, especially high-impact mechanics. To consen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ademic products, promote the reprint of scarce academic monographs, plan high-quality academic libraries, and build a complete electronic book system. Academic publishing can provide users with more rewards, and also enable publishers to attract core users, foster good impressions and memories among users, cultivate a sense of trust and dependence.

Key words: academic publishing; academic fine works; publishing brand

合作网络视角下的基因编辑领域科研团队识别及产出绩效测度

王菲菲¹, 陈晓璇¹, 杨辰毓妍²

(1. 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24;

2.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20)

摘要: 基因编辑是近年来生物学界热点话题, 科研合作对于共享信息、传播知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旨在通过综合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作者合作发文共现分析、网络指标与产出绩效相关分析等方法对基因编辑领域的核心科研团队进行识别, 并实现团队合作模式发现与产出绩效测度。结果显示, 桥梁型团队合作模式, 可将不同专业特长的众多小团体结合在一起, 有利于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性, 相比三角型和网架型合作模式, 在基因编辑这一特定领域下的团队产出绩效更高。

关键词: 合作模式; 基因编辑;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6

中图分类号: G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8)03-0075-06

基因编辑是指对基因组进行定点修饰的一项新技术, 其中被业内誉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 基因组编辑技术曾入选《科学》杂志公布的十大科学突破。利用该技术, 可以精确地定位到基因组的某一位点上, 在这位点上剪断靶标 DNA 片段并插入新的基因片段。^[1] 现如今, 基因编辑已经投入基因功能研究, 基因治疗, 构建模式动物以及改造和培育新品种等方面, 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未来的发展中, 基因编辑技术必将成为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研究与应用的重要工具, 《科学》杂志称其“将会给许多领域带来持久的兴奋和乐观”, “势必对研究产生革命性影响”。

在大数据背景下, 科研工作的合作不断增强, 科研人员的合作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 合作成了研究中的普遍现象, 对于新兴的基因编辑领域来说更是如此。因此, 通过对合作规律的研究和分析, 我们能更全方位地把握某一领域发展轨迹, 进一步探索现有结构, 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有的科研团

队是作为一个研究实体而存在的, 但是更多的科研合作从外部难以识别, 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往往是通过产出论文的共同署名来体现的。^[2] 因此, 在合作网络视角下, 通过对合著论文进行计量分析,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可视化工具发现团队, 研究团队合作模式成为一种常用手段。^[3] 而如何衡量合作模式的优劣则通常利用绩效测度的方法, 即研究怎样改变与利用影响团队表现的因素来提高团队绩效, 大大丰富了科研团队的研究内容, 为提出可行建议提供依据。

本文将借鉴前人经验, 对基因编辑这一热点领域中科研人员的合作模式进行研究, 对团队绩效进行测度, 以期为该领域人员选择合作对象和合作模式提供一定参考, 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基因编辑领域当前研究脉络, 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源于“Web of Science”数

收稿日期: 2018-04-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多维信息计量分析的学术影响力综合评价研究”(15CTQ023)

作者简介: 王菲菲(1985—), 女, 山东滨州人, 管理学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计量与科技管理。

据库,按“gene edit * or crispr”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段为1980年至2015年,检索时间为2015年12月25日。共检索文章10503篇,截取 article, proceedings paper, review, book review 四种文献共9020篇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

(二) 研究方法 with 工具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合著网络中科研团队的发现,探索团队的网络结构,确立其产出绩效因素,提出对科研团队建设的有效建议。社会网络分析法是对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主要分析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4]该方法已经被证实可以应用于作者合作关系分析以及网络结构阐释。^[5-6]本研究使

表1 发表10篇以上的核心作者群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1	Brennicke, A	55	13	Simpson, L	30	25	Bock, R	24
2	Barrangou, R	54	14	Nishikura, K	29	26	Chan, L	24
3	Doudna, J A	40	15	Seeburg, P H	29	27	Kim, J S	24
4	Davidson, N O	37	16	Honjo, T	28	28	Maas, S	24
5	Knoop, V	36	17	van der Oost, J	28	29	Muramatsu, M	24
6	Nemazee, D	36	18	Small, I	27	30	Reenan, R A	24
7	Koonin, E V	35	19	Stuart, K	27	:		
8	Yamamoto, T	34	20	Holmes, M C	26	170	Sternberg, S H	10
9	Zhang, F	34	21	Marraffini, L A	26	171	Weissman, J S	10
10	Hanson, M R	33	22	Takenaka, M	26	172	Wissinger, B	10
11	Sakuma, T	33	23	Joung, J K	25	173	Zhang, L	10
12	Gregory, P D	31	24	Araya, A	24			

二、基因编辑领域科研团队识别

本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基因编辑领域作者合作网络进行如下几个步骤的分析:选定有173位作者构成的核心作者群作为研究样本;利用VBA编程自动构建核心作者间的合作矩阵;使用NetDraw绘制合作网络图;根据凝聚子群分析结合网络图确定核心作者团队;进行网络特征分析;对每个团队进行绩效测度指标计算及分析。

(一) 构建作者合作关系网络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团队识别及其绩效测度,故已经对图进行了进一步处理,排除了孤立点,使得图像更加清晰,但是为了保证研究准确性,进一步使用了凝聚子群的方法对团队识别进行进一步排查。

该网络由基因编辑领域核心作者共同发文而形成的一个个子网组成,虽然有较大的桥梁型结构网络以及一个网架型网络,但是整体而言连通性不够好。网络中每一个顶点代表一个该领域研究人员,顶点的大小和作者的发表论文章数量成正比,圆点越大,该作者产出越多;顶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

用SPSS和Ucinet作为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

(三) 研究对象界定

发文量是衡量一个研究者科研水平和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领域的核心作者自然是在该领域产出较多,取得较高成就的带头人,故而在确定数据样本之后,将文献的所有作者提取出来。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基因编辑领域发文量较大的作者中中国研究者占很大比例,另外考虑到国外作者在署名时姓名缩写的问题,故而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对发文量大于等于10篇的作者共210人进行全名-机构人工比对消歧的方法,最终确定该领域173位核心作者如表1所示。

的合作发表文章的关系,线条的粗细与研究人员合作发表文章的频次成正比,线条越粗,研究人员合作发表论文章频次越高。^[7]大型桥梁型网络和网架型网络属于高产作者聚集较多和合作频次较高的网络,但是该大型桥梁型网络中桥梁节点较多,故采取凝聚子群法对网络进行进一步划分与合作关系网络图进行对比分析。

(二) 凝聚子群分析及团队识别

为了确保团队识别的准确性,以及排除在构建可视化网络时作图的误差,本文还将凝聚子群法中N-clique法运用于团队发现的研究中。N-clique即n-派系,是指如果在一个团队中,任何两位作者之间在整体交往中的距离最大不超过n,就称为n-派系。^[8]将当n值为2,最小节点数为3时得到的多个团体的作者进行合并处理,可进一步归结为12个小团体,这也与NetDraw绘制的社群图一致,分别为:

团队1 网架型: Gregory, PDHolmes, MCUrnov, FD Rebar, E J Miller, J C

Wang, J B Doyon, Y Zhang, L

团队 2 三角型: Harris, R S Neuberger, M S Petersen - Mahrt, S K

团队 3 桥梁型: Araya, A Maeder, M L Reyon, D Cathomen, T Blanc, V Joung, J K Davidson, N O Navaratnam, N Voytas, D F Anant, S Carlson, D F

团队 4 桥梁型: Stuart, K Salavati, R Panigrahi, A K Read, L K Lukes, J Benne, R Sloof, P

团队 5 网架型: Marusawa, H Chiba, T Kinoshita, K Honjo, T Muramatsu, M Nagaoka, H

团队 6 网架型: Jantsch, M F Levanon, E Y Eisenberg, E Rechavi, G Amariglio, N

团队 7 网架型: Higuchi, M Maas, S Seeburg, P H Sprengel, R

团队 8 三角型: Gallo, A Keegan, L P O'Connell, M A

团队 9 三角型: Gualberto, J M Bonnard, G Grienberger, J M

团队 10 三角型: Vartanian, J P Wain - Hobson, S Henry, M

团队 11 桥梁型: Weissman, J SDoudna, J A Staals, R H J Jore, M M Wiedenheft, B Severinov, K Westra, E R Fineran, P C Semenova, E Brouns, S J J van der Oost, J Makarova, K S Wolf, Y I Gasiunas, G Charpentier, E Horvath, P Banfiel, J F Siksnys, V Fremaux, C Barrangou, R Moineau, S Koonin, E V Zhang, F Terns, R M Li, H Terns, M P

团队 12 桥梁型: Prangishvili, D She, Q X Shah, S A Garrett, R A Backofen, R Small, I Randau, L Okuda, K Nakamura, T Sugita, M Sugiura, M Kossel, H Maier, R M Marchfelder, A Knoop, V Brennicke, A Wissinger, B Schuster, W Zehrmann A Verbitskiy, D Takenaka, M

12 个核心科研团队,人数为 3—26 人,差别较大。第 11 和 12 号团队之间联系也较密切,也可视为一整个比较庞大的桥梁型团队,但是根据凝聚子群分析结果,以及 11 号团队中多名成员贡献和其他团队成员比较,将其分为由 26 人组成的团队 11 和 21 人组成的团队 12。需要说明的是,根据 Ucinet 带有的凝聚子群分析算法得出结果,有部分团体并未在合作图中显示,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为了使合作图清晰,在作图时使用阈值进行筛选,有的合作关系实际强度不是非常显著,故而被排除。并且本研究利用合作发文量作为合作指标,实际科研活动中,产出并不仅仅是文章的发表,也会有专利等其他类型产出。

(三) 团队网络模式分析

根据上文团队识别结果,确定基因编辑领域存在上述 12 个核心作者合作团队。根据团队成员的数量以及成员间的关系特点,可以用三种团队类型来描述,分别是三角型、网架型以及桥梁型。^[9-10]三角型团队是由三个作者相互合作形成的子网络,虽然也可实现某种程度上不同学科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合作,但是团队规模太小,不利于资源的传递和新知识的传播。网架型团队由多作者合著关系构成,成员之间合作非常密切,信息共享程度较高,但是缺少成员的流动,难以实现新知识的引入和融合。桥梁型团队也是由多作者的合著关系所构成,但是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多个团队构成,但是有的团队成员起着桥梁的连接作用,这类网络结构有利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研究者的交流,实现跨领域运用技术,知识融合。

表 2 各类型团队分布情况

团队类型	数量(个)	所占比例
三角型	4	33.33%
网架型	4	33.33%
桥梁型	4	33.33%
合计	12	100%

如表 2 所示,三种团队类型所占比例一样,但是明显有两个桥梁型团队较为庞大,分别是团队 11 和团队 12。虽然桥梁型团队具有跨学科合作的优点,有利于小团体之间优势互补,使得知识跨领域扩散融合,产生创新的动力,但是和其他团队不同的庞大的规模使得有必要通过数据指标对所有团队进行绩效测度分析。

三、基因编辑领域科研团队绩效测度

进行科研团队合作模式的研究,最大的目的是研究哪些具体的因素影响到团队的表现,怎样改变

这些因素才最有利于团队进行工作,提高其产出,这也是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试图发现网络的结构特性对团队效率的影响,所以采用网络的主要特征作为输入对象,如密度,聚类系数和距离^[11]。团队的输出采用了5个指标,分别是团队总发文,人均发文,总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次以及文章均被引频次,其中团队总发文与总被引频次属于绝对指标,而人均发文、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属于相对指标(见表3)。^[12]

表3 输入输出指标

输入指标	输出指标
密度	团队总发文
	人均发文
聚类系数	总被引频次
	人均被引频次
距离	文章均被引频次

(一)输入指标测度

(1) 密度:网络图中实际拥有的合著关系(连线)与可能拥有的合著关系(连线)之比。其表达式为 $\frac{m}{n(n-1)/2}$,其中 m 代表图中实际存在的线数,而一个拥有 n 个点的无向图最多可能拥有 $n(n-1)/2$ 条不同的线。

(2) 聚类系数:衡量网络的聚集性,在合著网络中表现为作者的所有合作对象里也存在实际合作关系的概率。网络的聚类系数为所有作者的聚类系数的平均值。假设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i 有 k_i 条边将它和其他节点相连,这 k_i 个节点就称为节点 i 的邻居。显然,在这个节点之间最多可能有 $k_i(k_i-1)/2$ 条边。而这 k_i 个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 E_i 和总的可能的边数之比 $k_i(k_i-1)/2$ 就定义为节点 i 的聚类系数 C_i ,即

$$C_i = 2E_i / (k_i(k_i-1))$$

整个网络的聚类系数 C 就是所有节点 i 的聚类系数 C_i 的平均值。

(3) 距离:两点之间的距离指的是连接这两点的最短路径长度。我们把关联图中最长的距离叫作图的直径。网络中两个节点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d_{ij} 定义为连接这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上的边数。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的最大值称为网络的直径,记为 D ,即

$$D = \max_{i,j} d_{ij}$$

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 L 定义为任意两个节点之

间的距离的平均值,即 $L = \frac{1}{2N(N-1)} \sum_{i \neq j} d_{ij}$,其中

N 为网络节点数。

分别对12个团队的密度,聚类系数和距离进行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二)输出指标测度

本文采取不区分作者排名的方法计算发文量。所使用的有作者发文量,团队总发文,人均发文,总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次以及文章均被引频次五个产出指标,结果见表5所示。

表4 三项网络特性输入指标计算

团队	密度	聚类系数	距离
1	7.4643	7.464	1.000
2	5.0000	5.000	1.000
3	1.2182	4.433	1.320
4	2.1429	2.419	1.524
5	7.2000	9.872	1.267
6	5.3000	7.933	1.200
7	6.8333	6.833	1.000
8	9.3333	9.333	1.000
9	11.0000	11.000	1.000
10	11.6667	11.667	1.000
11	1.4277	4.934	1.855
12	1.1143	4.978	3.233

表5 五项团队产出指标计算

团队	总发文	人均发文	被引频次	人均被引	文章均被引
1(8人)	70	8.75	5838	729.75	83.4
2(3人)	33	11	3363	1121	101.909
3(11人)	137	12.455	7955	723.182	58.066
4(7人)	79	11.286	3156	450.857	39.949
5(6人)	44	7.333	5760	960	130.909
6(5人)	48	9.6	1499	299.8	31.229
7(4人)	56	14	7558	1889.5	134.964
8(3人)	30	10	1119	373	37.3
9(3人)	29	9.667	1006	335.333	34.690
10(3人)	16	5.333	503	167.667	31.438
11(26人)	294	11.308	20569	791.115	69.963
12(21人)	249	11.857	10316	491.238	41.430

(三)输入-输出指标关联测度

在研究输入指标与输出指标的关系之前,先对输入指标做一个相关性研究分析,然后对输出指标也做一个类似的相关性分析,最后对团队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挖掘。

(1)输入指标分析

表6 输入指标 Pearson 相关分析

输入指标	密度	聚类系数	距离
密度	1	0.910**	-0.648*
聚类系数	0.910**	1	-0.449
距离	-0.648*	-0.449	1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0.01;*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0.05。

网络特性的输入指标分析主要讨论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见表6。密度和聚类系数:正相关系数达到0.910,随着密度的增加,网络的聚类系数成急剧上升趋势,密度侧重于网络中各个点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定义为图中实际拥有的连线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线数之比,而聚类系数衡量的是网络的聚类性质。密度和距离:负相关系数达到0.684,随着团队中作者合作强度的增加,网络平均路径长度快速下降。聚类系数和距离:负相关系数0.449,随着网络聚类程度的提高,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下降,但下降速度不是很高。

(2) 输出指标分析

表7 输出指标 Pearson 相关分析

输出指标	总发文	人均 发文	被引 频次	人均被 引频次	文章均被 引频次
总发文	1	0.428	0.902**	0.022	-0.085
人均发文	0.428	1	0.431	0.551	0.212
被引频次	0.902**	0.431	1	0.340	0.273
人均被引频次	0.022	0.551	0.340	1	0.901**
文章均被引频次	-0.085	0.212	0.273	0.901**	1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0.01。

五个相关输出指标团队总发文量,人均发文量,团队总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次,文章均被引频次中,团队总发文量,团队总被引频次以及文章均被引频次衡量了团队整体绩效,而人均发文量,人均被引频次则衡量了团队中个人的研究绩效,分析结果见表7。从研究来看,团队总发文和团队总被引频次,还有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团队总发文量和文章均被引频次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另外通过研究我们也发现,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明显,比如总发文量和人均被引频次间的正相关系数为0.022,几乎没有相关性,还有总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间相关性也较弱,这也证明了引入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被引频次两个指标的重要性。

(3) 网络特性与团队产出的影响因素挖掘

表8 网络特性与团队产出指标 Pearson 相关分析

指标	总发文	人均 发文	被引 频次	人均被 引频次	文章均被 引频次
密度	-0.755**	-0.638*	-0.652*	-0.168	-0.036
聚类系数	-0.555	-0.718**	-0.485	-0.268	-0.077
距离	0.800**	0.300	0.536	-0.148	-0.215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0.01;*表示显著性水平达到0.05。

本文将先从单个的网络特性指标来挖掘其与团队产出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见表8。

①密度:一般而言,会认为团队成员联系越密切越有利于科研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成绩,但从得到的分析数据来看,密度与团队总发文量,人均发文量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较为显著,这说明科研团队的密度越大反而越不利于团队产出,密度与被引频次之间达0.652的负相关系数也说明密度的增加也不利于团队产出的质量。而密度与人均被引频次及文章均被引频次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说明密度很大程度上与均被引频次无关。

②聚类系数:网络按组群分布,组群内的节点之间有密集的联系,而组群与组群之间的联系则较少,这种特性类似于关系网络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性,这种属性称为网络的聚类特性,聚类系数可以用来量化网络的这种属性。聚类系数与团队人均发文的负相关系数达到了0.718,随着团队聚类程度的提升,团队人均发文显著下降。与传统认知不同,聚类程度越明显,团队成员的合作程度越高,反而影响了团队的产出,只有对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影响不大。

③距离:距离与总发文量、人均发文量和团队被引频次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与总发文量,正相关系数达到0.800。随着网络距离的增大,团队的产出反而迅速增长,而人均被引频次和文章均被引频次与距离几乎没有太大关系,这也与上文关于密度这一维度的分析相互佐证。

四、结论

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于科研团队的识别及绩效测度研究中,从网络的角度为科研团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结果显示,与传统思路不同,在基因编辑领域内,团队联系的密切还有高频的合作反而使团队产出效率降低,即连通度高的网架型团队结构不再适应基因编辑这一新兴领域的需要,过于紧密的联系降低了团队成员的自由度,使人员流动程度减弱,新的知识较难传播。通过数据推测,桥梁型这把众多小团体结合起来的合作模式使不同专长的团体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性,团队产出绩效较高。

基因编辑领域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最近十年,把这样的新热点领域作为样本得出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得出的不同于传统的高效合作模式也可被其他领域研究人员参考。

针对本研究对影响科研的绩效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在现今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背景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科研团队绩效:

(1)大力推进外延式团队合作,促进不同学科方向的团队之间的合作,提高知识的交流程度,推广跨领域技术的运用。通过开展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方式为研究者合作提供机会,设立专项基金对跨国跨领域跨机构的团队进行奖励以及提供保障,也可建设多样化学术交流平台,以期激发研究者知识的融合和创新。

(2)在继续保障团队合作的基础上,适度给予团队成员一定的自由度,不能让团队成为一个封闭的组织,鼓励团队内部成员多对外进行交流,学习新的知识,引入更多技术和思路。

(3)建立更为完备的监督体系,如建立新的私密平台供研究者备份研究思路和进度,对研究成果的审核严格要求。以往团队之间交流较少,团队内部抱团较严重的成因包括部分学术道德低下的研究者会利用交流的平台偷取其他研究者思路和成果,建立更为完备的监督体系为团队成员毫无顾忌对外交流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也为建设优良研究风气起着推动作用。

在后续研究中,可深入研究团队合作动机,细化团队划分,使研究对象更加准确;也可更加细化绩效指标,如考虑计算发文量时引入赋予不同权值的方法;还可以引入更多绩效测度指标,如论文影响因子,更加全面、准确地测度团队的整体及平均绩效;此外,还能引入更多维度来对团队研究内容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丰富该新兴领域合作网络的研究,以期对该领域研究者和合作模式研究者提供更多参考。

参考文献:

- [1] 刘蓓,尉玮,王丽华. 基因编辑新技术研究进展[J]. 亚热带农业研究,2013,9(4):262-269
- [2] 温芳芳.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外图书馆合作模式比较研究[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1):76-83.
- [3] 李纲,李春雅,李翔.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科研团队发现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4,58(7):63-70,82.
- [4] 李远明,谭世明. 高校科研团队的识别与网络分析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1):147-150.
- [5] Otte E, Rousseau 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powerful strategy, also for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6, 28(6):441-453.
- [6] Kretschmer H, Aguillo I F. Visibility of collaboration on the Web[J]. Scientometrics, 2004, 61(3):405-426.
- [7] 吴菲菲,段国辉,黄鲁成. 基于团队识别的3D打印技术发展前景分析[J]. 情报杂志,2013,32(8):62-67.
- [8] 邱均平,王菲菲. 基于SNA的国内竞争情报领域作者合作关系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10,30(6):34-40.
- [9] 汤建民. 学术研究团队的可视化识别及评估方法研究:以科学学研究领域为例[J]. 情报学报,2010,29(2):323-326.
- [10] 刘蓓,袁毅, Boutin Eric. 社会网络分析法在论文合作网中的应用研究[J]. 情报学报,2008,27(3):409-411.
- [11] 刘军. 整体网分析——UCINET 软件使用指南[M]. 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26.
- [12] 刘璇,朱庆华,段宇锋. 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于科研团队发现和评价的实证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1(3):32-3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Detection and Appraisal of Gene Edit Research Teams Based on Cooperative Networks

WANG Feifei¹, CHEN Xiaoxuan¹, YANG Chenyua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2. Institut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020, China)

Abstract: Gene edi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of author cooperation in science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change ideas and knowledge. In this paper, the detection and appraisal of gene edit research teams have been explored by the ma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authorship and the relative analysis of effect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ridge-type team cooperation model can combine many small groups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expertise, which is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the creativity of team members. Compared with other triangle-type and grid-type cooperation models, it is in the specific area of gene editing, the team's output is more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operation mode; gene edi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新时代中青年干部如何实现素质跃升

——《政务运作与素质跃升》编后记

吕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 郑州 450044)

摘要:良好的素质既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也是个人成长进步的“资本”。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青年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站在新方位、拥抱新时代、接受新挑战、走向新征程,从五个方面与中青年干部交流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为新时代中青年干部素质跃升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新时代;中青年干部;素质跃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7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81-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青年干部大多文化程度高,接受新事物快,熟悉机关工作又有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但也有部分干部理论功底和基层阅历浅,政务运作和依法行政能力相对弱,尤其是没有经历过艰苦环境和复杂局面的考验,解决基层问题的思路不宽、办法不多。姚待献根据自己多年来党政工作岗位的实践,就如何提高政务运作水平、提高综合素质这一主题,写出《政务运作与素质跃升——与中青年干部交流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1]一书,对提升中青年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大有裨益。笔者有幸成为该书的编校者之一,书中对中青年干部素质跃升既有方法论,也有鲜活的案例。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从坚定信念,着力把握“四维度”,身体力行,探寻实践“四途径”,到修身养性,潜心学会“四修为”,强本固基,升华素质“四标准”,字字句句都是作者从事党政工作几十年来的切身体会和由衰感悟,是一部教导中青年干部如何实现素质跃升的参考书。

为题,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四有”要求。作为有追求的青年干部,必须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四有”既是高标准严要求,又是基本标准底线。在现实工作中,中青年干部要把握好理想信念与精神状态、综合素质与领导能力、眼光视野与学历学识、实践历练与卓越绩效。

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阅历的丰富、心智的成熟一步步成长。人生要想收获什么样的果实,取决于我们当初播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取决于我们是否对它自始至终地精心呵护。中青年干部正处于树立人生理想信念的关键时期,必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对党忠诚,必须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

众所周知,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要有敢的勇气、创的魄力、韧的精神,沉下去、实着干,细着做、见成效。党的十九大明确宣示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等等,党在新时代所承担的重大主题、宏伟目标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干事创

作者姚待献以“坚定理想,着力把握‘四维度’”

收稿日期:2018-04-02

作者简介:吕村(1971—),女,河南泌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艺术教育。

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党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不断推进伟大事业的活力源泉和重要法宝。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劲,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只是代表个人、照亮个人,而且能照亮别人,感染和鼓舞部下坚持不懈、义无反顾地克服困难,实现既定目标。好的精神状态,有利于挖掘人的全部潜力,便于更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和创新创造。“一个主要领导干部精神状态好,他所在的单位和系统就会一片新面貌。”以笔者所在工作单位为例,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学校主要领导良好的精神状态,离不开他们的超常努力和奉献!超常的努力必然会有超常的回报,超常的奉献必然会有长足的发展。

姚待献在书中写道,中青年干部不但要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创新跨越、倾心奉献,亲力亲为、敬业精业,更要有昂扬向上、勇争一流的精神状态,有敬业奉献、创新创造的职业操守,有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不懈斗志,有“无论晴雨、终身向阳”的崇高品质。要有一股子气、一股子劲,靠骨气挺起脊梁,靠正气树立形象,靠朝气迎来希望,靠勇气迎接挑战,靠志气实现理想,靠才气书写华章,靠人气凝聚力量。^[3]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矛盾关口不回避,在坎坷路上不颓废,大事难事担当起。以苦砺志,以苦为乐,以苦掘进。要打破传统、突破陈规,提出新观念、新见解、新创造,开拓新思路、新视野、新局面。要有干事创业的决心、雄心,立大志、干大事、求大成。要精虑无失、深谋无虞,百折不挠、孜孜以求。凡事先人一步、快人一拍、胜人一筹,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有新谋划、新变化、新跃升。

毛主席曾经说过,评价优秀领导干部的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是政治远见,二是工作能力。姚待献认为,新时代在新的党情、国情和世情下,中青年干部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一是政治敏锐性,二是科学理性精神,三是民主法治精神,四是高效执行能力,五是开拓创新能力,六是交际协调能力,七是慧眼识才能力,八是拒腐防变能力。提高中青年干部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有赖于加强实践历练,丰富其内涵。他指出中青年干部要坚持苦学为先,做素能过硬的表率;要注重实践锻炼,做求真务实的表率;要加强团结协作,做合作共事的表率;要为人谦和大气,做凝心增力的表率;要善于创新创造,做与时俱进的表率;要坚持依法行政,做厉行法治的表率;要坚持廉

洁从政,做清正清白的表率;要牢记执政为民,做践行宗旨的表率。

二

当今世界,全球正进入一个知识经济变革的时代。中青年干部要想在新的时代准确把握各种有利机遇顺利发展、脱颖而出,需要不断学习掌握最前沿的知识,科学思考和分析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开辟人生事业发展的新航道。姚待献提出中青年干部要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切实把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中青年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要善于安排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少一点酒酣耳热,多一点伏案而思;要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工作责任、精神追求好境界的要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血液里,融会到从政行为中。

在学习理论方面,中青年干部一定要端正学习态度,并持之以恒。要克服“怕难怕苦”的畏难情绪、“忙而无暇”的懒惰思想,纠正“读书无用”的错误观点,消除“为时已晚”的消极心理。要以“韦编三绝”“悬梁刺股”的毅力,以“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的劲头,发扬古今贤哲勤奋学习的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主动自觉,深入持久,尽最大努力扩大知识半径,力求学出效果、学出水平。要向书本学习,向社会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姚待献说,读书学习一定要熟读而深思,善于思考和鉴别。读书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思考认知的过程。要做到读与思结合、读与问结合、读与做结合。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认真研究问题,积极解决问题。要学会质疑,学会辨别。学习永无止境,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读书是多多益善,但吾生有涯,而知无涯。领导干部读书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三个方面的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读书的目的在于应用,最终必然落实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增长才干上来,落实到增强思辨能力、廓清思想迷雾、提高政治觉悟上来。中青年干部每到一个新的岗位,面临新的任务,都要注重自

加压力,始终坚持学习,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实践总结提炼出来,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谋得更深、做得更实。

中青年干部提高业务素质,重在刻苦学习,默默下功夫研读文件、讲话,要注重平时实际工作的积累。姚待献提出,要做好工作谋划,在工作中有明确思路。一是吃透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精神,吃透领导意图;二是善于动脑,反应灵敏;三是办事能力强,效率高;四是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五是熟悉分管工作的业务。

中青年干部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办法。在实际工作中,要直面矛盾和困难,讲究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做解决问题的实干家。第一要扑下身子搞调研,第二要科学求是定决策,第三要安排部署讲好话,第四要督促检查做落实。讲话就像泼水,泼出去的水无法再收回,讲过的话也一样收不回来,所以出口之前,一定要慎思。特别是丧志的话不能讲,抱怨的话不能讲,损人的话不能讲,自夸的话不能讲,机密的话不能讲,隐私的话不能讲。他认为中青年干部提高讲话水平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富有全面性,立意要新颖,抓住关键点;二要结构严谨,善用段首句,语言要简练;三要深入浅出,避免深入浅出、浅入浅出,杂乱无序,貌似高深;四要做到宜长则长、宜短则短,长短适宜,做到长篇大论有内容,短篇精深亦充实;五要讲关键话、重点话,学会提纲讲话、腹稿讲话、无稿讲话和即席讲话。

三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姚待献指出,日常政务运作繁琐庞杂,中青年干部做好机关工作,不仅要做好具体琐细的小事,也要把握关乎大局的要事;不仅要了解当下面临的发展形势,也要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要知悉能够直观看到的显现事物,也要洞察不易察觉的潜在矛盾;不仅要尊重服从上级肩负重任的领导、专家的教诲和指导,也要体察关怀基层艰苦辛劳的干部、群众的意愿和心声。以办公室工作为例,做文字工作虽然辛苦,但是通过给领导同志写材料,能够学习领导同志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从政经验,不但能够提高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过程,自己得到了全方位的学习和提升。所以,中青年干部要把文稿写作当成岗位履职尽责的要务,尽量多动笔、多思考,下苦功夫钻研和学习,通晓公文写作规范,提高文字写作水平,能够熟练驾驭文字、办理公文,要努力做到

以文立身、以文立业。

写作的语言有着无穷的能量。我党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笔杆子的作用。毛主席视笔杆子同枪杆子一样重要。他曾给作家丁玲的一首词中曰:“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不会拿笔杆子,这个领导就是很有缺陷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青年干部练好笔杆子,不仅是为了提高文字水平和文化素质、改善机关学风和领导作风,更是一项关乎治国理政基础的必修内功。^[4]但是,写材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领导讲话,需要有个个人能力素质、经验、知识积累,还要有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创新能力等。这些都需要在工作中磨炼,日积月累,不断提升。

姚待献以公文的块状结构和条状结构为例,道出块状结构就是“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条状结构就是开门见山讲几个问题。行文要有针对性,要把框架搭好,要有高度,要锤炼语言,要把好政治观,传达出的信息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对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有悖于党的方针政策等。

作为领导者,有责任劝说和激励下属,使他们的办事更加有效;应该懂得如何去促进工作,了解激励下属的方式,并确认自己在激励下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5]应能创造促使下属达成各自目标的条件,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在主动作为,勤于办事上,姚待献认为,属于职责范围的事务,要早点办,主动办,尽力办。在日常事务中,要认真做到:急事稳办,要遇事不慌,稳中求快,实现速度和效率的统一;大事细办,要心细如发,一丝不苟,始终关注大事中的一切细节问题,确保周全;轻事重办,要举轻若重,关注细节,坚持不懈把每一件小事做得周全得体、万无一失。要讲办事效率,努力做到今日事今日毕,确保事情不在我手里延误、任务不在我手里积压、责任不在我手里耽误、工作不在我手里中断。“心思缜密的人、勇于探索的人去办事,总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

“修身养性,潜心学会‘四修为’”。诚如姚待献所言,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系统,领导诚干部面临的公共行政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对领导者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领导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职业的声誉,更是一个风险与责任并重、压力与挑战交织

的岗位。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处在时风流变的交汇处,面对纷繁声、色、物、事容易炫惑心神。“善守静者,心宽似海,心明如镜,心坚如钢。当诱惑和逆境如疾风袭来时,只见草木扶摇,我似泰山不动。”要达到这种境界,中青年干部就要潜心学会纳与行、度与衡、雅与悦、健与静四种修为。作者在讲到“纳的胸襟”时,对我们常常说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做了论述,也讲到了“一亩三分地”典故的由来,并指明了当今社会我们必须打破“画地为牢”“一亩三分地”这种思维定式,树立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要有协调协同意识,配合整合观念,将工作、发展放到全局、大局、“大盘子”中去谋划。这就是吸纳,要“协同作战”“抱团前进”,共同发展才有活力,优势互补破除利益壁垒,才能实现双赢、共赢的新局面。

在纳言与谏言上,姚待献写道,有多大的胸怀就有多大的舞台。能不能正确对待下属和群众意见,对今天的党员干部而言,是检验党性原则、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的试金石。不可否认,有凭“来头”、看“势头”、观“风头”的纳言者:有纳“上”不纳“下”,对上级提出的建议就言听计从,对下属反映的则无动于衷;有纳“亲”不纳“疏”,对亲朋好友、“圈内人士”之言入脑入心,对基层群众的意见则漠然视之;有纳“近”不纳“远”,对能立竿见影的建议就认真对待,对利益关系复杂、需要作长远谋划的建议便充耳不闻;有纳“急”不纳“缓”,对上面盯得紧、社会关注度高的行动迅速,对工作周期长、各方面关注少的能拖则拖;有纳“喜”不纳“忧”,对“悦耳”之言欣然纳之,对“刺耳”之语避而远之;有纳“表”不纳“里”,看似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实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等等。这样的纳言态度,不仅容易堵塞言路,疏远党群干群关系,有损党员干部形象,而且还有可能给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曾言:千人之许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的是有许多人说恭维、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人讲真话,直言不讳。谔谔之言,就是谏言、纳言、真言。讲谔谔之言难,听谔谔之言更难。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强调,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现实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确实存在着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也不屑听取不同意见。更让人担忧的是,因为有的领导干部拒绝听取不同意见,下属又“意会”而顺从之、讨巧之。如此,可能就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问

题,由此埋下了隐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关注。

领导干部要避免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关键是要虚怀若谷,敢于和善于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日渐养成听取不同意见的习惯。领导干部的许多智慧有时就可能在那些不同意见之中。^[6]不同的意见,并不等于都是“唱反调”的。所谓的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所处位置不同,其阅历、视野、角度、修养、气质等不同而形成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纳言就是倾听,要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听思聪”,讲的就是既要听清自然界的风雨,也要听清社会的“风雨”。君子要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既要听出对和错、利与害,还要听清话外音、言外意。作为领导者,善于倾听,更加重要。

五

领导干部素质跃升是一个全方位锻造的过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实践历练,丰富内涵,充实底蕴,磨砺品格,升华境界。姚待献指出,中青年干部提高自身素质要在崇尚德品、增长才干、强健体魄、追求绩效等方面下功夫。他说,德能正其身,在决定人的命运的诸多因素中,德的因素是第一位。做事先做人,为官者先修德。“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把官员的道德修养列在建功创业、著书立说之前。孔子曰:“修己以敬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说,自身修养搞好了,就有了敬业精神,把事情办好,就可以安定百姓。孟子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提出人的修养是一种学习、磨炼的过程,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故担当“大任”的人,都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样才能忍得下来、平得下去,在工作生活中有些不明白的人和事,经过痛苦的磨炼能够领悟,犯过的错误也能及时改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讲道,“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国无德不兴,德乃立国之基。领导干部德行好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极大。德既是立身之本、为官之魂、为政之要,同时也是立国之基。德不但可以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也可以决定国家的生死存亡。人们常说有大德方能成大业,所以中青年干部一定要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用道德的力量感染

人、鼓舞人。

在德才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为我们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才固然重要,但德与才相比,德更根本更核心更重要。能力可以让你暂时得到这个位置,但只有德行,才能决定你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德常常可以弥补才能、学识的不足,但才能和学识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对一个干部来说,除了自己的生命外,他身上所背负的地位、权力、财富、名誉等,都是外在表象、身外之物,若要守住保住这一切身外之物,与自己的自然生命相始终,唯有靠德行来支撑。如何践行“德能正其身”?姚待献说道,中青年干部第一始终做到政治上要过得硬,第二坚定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第三持之以恒增强品质纯度,第四坚守一身正气的官德。他始终把“慎独”作为座右铭,“独,今天还应当包括一种特殊的权利地位”。他把“独”上升了另一个境界。这种权力地位,可以使自己自主决定、自由裁量,而无需同别人商量,或无需让别人知道,或无需报告行为结果。无论什么身份,人一旦处在特殊的权力地位时,容易随心所欲、自我膨胀,容易产生不正确的做法。^[7]

六

成长中的中青年干部,有着用不完的干劲,也有着用不完的勇气,但存在着缺乏经历和缺少经验的不足。一个人能力素养的增长既不可能与生俱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和

实践磨砺。成功的过程取决于科学,决定成功开始与结束的,是个人的心态和格局。如姚待献所言,任何事业都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拼的是远见与决心,中间拼的是业务技能与管理模式,最后拼的是专注与坚持。前后拼的都是人心和创新,中间才是科学管理。新时代中青年干部要不负众望,成为新时代有理想和使命感,有德行和爱心,有胆量和眼光,有智慧和见识,有担当和责任心的一代人。

参考文献:

- [1]姚待献. 政务运作与素质跃升——与中青年干部交流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Z]. 2018.
- [2]姚待献. 领导干部要学会纳行、度衡、雅悦、健静[J]. 领导科学, 2010(27):19.
- [3]姚待献. 郑州:创新干部素质跃升路径显成效[J]. 中国人才, 2009(19):73-75.
- [4]舒炜. 笔杆子的进步,难不难[J]. 廉政瞭望(上半月), 2016(10):24-26.
- [5]张璐,张克永. 学生会管理之主席团九“要”[J].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11(1):175-176.
- [6]赵畅. “听取不同意见”是一种领导智慧[J]. 今日浙江, 2012(15):62.
- [7]周文彰. “三严三实”的内涵和意义[J]. 时事报告, 2015(3):31-51.

(责任编辑 姚虹)

How the Young and Middle – aged Cadres Achieve a Leap of Quality in the New Era

——Afterwords on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ffairs and the Leap of Quality*

LV Cun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Good quality is not only a prerequisite for success, but also a “capital”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progres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pened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iddle – aged and young cadres. How to stand in a new position, embrace a new era, accept new challenges, and move toward a new journey, this article exchanges leadership art and working methods with middle – aged and young cadres from five aspects, pointing the way for the leap of quality of young and middle – aged cadr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young and middle – aged cadres; leap of quality

高有鹏学术思想研究

解 浩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郑州 450044)

摘要:高有鹏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少有的具有大师色彩的优秀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以历史文献中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等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研究;深入研究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努力发掘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意义;深入研究地域文化性格的生成因素及其与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关于中国古典神话的历史文化研究,钩沉历史文化文献,梳理中国古典神话谱系,勾勒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神话时代。

关键词:高有鹏;学术思想;文化;民间文学;古典神话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8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86-05

当代学术格局呈现多重变化。有人着重于古典文明的研究,整理历史文献,力求完整体现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努力挖掘中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有人则承接当年盗火者的文化精神,延续文化使者的大同精神,让中国不仅看到自我,还要看到世界。更有人追求中外文化的融会贯通,把本土文化放在全球化中,看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术出现正本清源的可喜局面,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悄然登场,埋头耕耘,以大无畏的精神建构自己的学说。高有鹏就是这些学者的典型。对于高有鹏现象的研究,本世纪之初,就有学者关注。^[1]研究这一现象,对于把握当代学术发展格局,透视文化发展规律,增强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高有鹏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历史文献中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等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研究;二是深入研究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密

切联系,努力发掘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意义,地域文化性格的生成因素及其与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三是关于中国古典神话的历史文化研究,钩沉历史文化文献,梳理中国古典神话谱系,勾勒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神话时代,提出中国古代神话是民族古老的信仰的论点,提出神话是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此考察中国古典神话与文化艺术发展的联系。同时,高有鹏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文化传统,将学术研究、长篇历史小说和书法艺术的创作融为一体。^[2]

改革开放更新学术体制。在这一背景下,高有鹏坚持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与科学考察,参加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项目,如1990年代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原神话研究”,成为中原神话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2001年他独立承担国家社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第一次详细梳理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脉络与格局,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进行系统研究。近年来,高有鹏主持、参加、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如“中国古代戏曲与民俗”“中原民俗图绘”“中国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8-04-14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自贸区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机制研究”(2017B379);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15GGJS-298)

作者简介:解浩(1979—),男,河南西华人,文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与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等,主持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黄河流域民间文化类型及其分布规律研究”,主持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图系”等,从民间文学的视野打开一扇扇窗口。他成为学术的先觉者,也是学术的先行者,是全国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一方面,他集中精力就某一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持久的探索,取得学术研究的重要突破,以鸿篇巨制为标志,意味着学术事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影响,促进学术的生长,为学术发展营造出健康而持久的生态。

二

学术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的关照和把握。古人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在历史的把握中,可以看到学术的脉络与问题的出现背景、原因。

高有鹏特别强调对学术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的必要理解,他提出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对人文科学的研究生的培养,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基础性训练。创新机制应该建立在对此“三史”的牢固把握的基础上,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3]他先后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中国民间文学史》等。在他的一系列文学史著述中,体现出其特立独行的学术立场。

高有鹏把历史上重视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以为“礼失求诸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规律。围绕这一思维主题曾经出版《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发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近年来,持续出版《狂欢季节》《遍地神灵》等著作,发表《〈李自成〉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宋代民间“说话”的形成与民间信仰》《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问题》等系列论文,细致剖析中国文化发展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他深入比较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古今演变,特别是故事类型在当代文学艺术形态中的具体转换,发现中国文化的叙事特点。他特别重视民间艺术作为文化遗产与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双重价值,强调整体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作为现代文化艺术学科体系的建立与民族命运的联系,提出民族文化特质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继承与发展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尤其重视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联系。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对中国

民间文学发展进行从古至今全方位的历史总结,获得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他着力于文学史发展的宏观世界鸟瞰文艺发展的规律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坚持古代典籍考据、田野作业和现代学术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勾勒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发展轨迹,把中国民间文学不同历史阶段视作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整体,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他认为,从远古到现代,中国民间文学汇聚起各个历史阶段的民众思想情感、理想愿望、意志、信念和情操,以追求自由、平等、幸福和美好,形成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历史上,民间文学口耳相传,是千百万民众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他们传承民族文化、教育子孙后代、铸造民族精神的重要生活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形成不同特色,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他勾勒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主要依据我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民间口头文学,从神话传说与民间歌谣时代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一个时间段,对于不同社会阶段历史时期的民间文艺进行论述性介绍。民间文艺历史阶段典型作品的选取,如秦汉之前的中国神话传说时代,秦汉时期民间歌谣与民间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文艺形态、乐府民歌,宋元笔记中的民间文艺,明清笑话等,大致勾勒出我国古代民间文艺的发展历史。其中,既有具体民间文艺文本的介绍与论述,又有不同时期民间文艺理论问题的展示与述说,如汉代王充等人的唯理论、明代冯梦龙的民歌理论等,对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联系等问题展开论述,揭示民间文学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意义,是全方位的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盛赞该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生活史”^[4-5]。海外刊物《文化中国》也给予赞誉。

高有鹏坚持文学人类学、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2011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的《论〈李自成〉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问题》,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置之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进行文学人类学意义的“发掘”与“发现”研究。他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被称赞为“具有开拓性的贡献”^[6];《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荣获2002年河南省优秀图书奖,被称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重要成果”^[7]。

三

民间古庙会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一方面其蕴含着原始文明、宗教文化等古老的历史文化,另一

方面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地方社会民间艺术等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

高有鹏较早开展庙会文化研究。1990年代出版《民间庙会》《中国庙会文化》《沉重的祭奠——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等,近年来出版《民间社会的文化存在》《文化现象的兼容情感》《庙会与中国文化》等学术著作,其中《庙会与中国文化》堪称我国庙会文化研究的集大成。

高有鹏把古庙会的发生与原始文明、原始艺术联系起来,把民间信仰视作庙会发展变化的基础,把民间文艺视作古庙会的审美发生动力。他笔下的庙会,是中国文化的缩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典型。他研究庙会,重视各种文献,包括香火碑等文物发现,他特别重视田野作业,通过实地考察,感受庙会的魅力,努力揭示出中国民间文化的奥秘与价值。高有鹏提出,庙会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在一定时间和领域,以一定仪式纪念某种神祇的聚会。它起源于远古,包含着原始信仰崇拜的重要内容,被称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宗教文化渗透于民间庙会,表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庙会因时举行,是农耕文明的晴雨表,是一定地域民间文化包括各种民间艺术的集散地、狂欢节,不同人群在此获得不同的需要。今天,时代发生了重要变化,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共处民间庙会,人们依然对它充满浓郁的情感。民间庙会作为文化遗产,被赋予新的内容,形成文化产业开发的有利平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如司马迁所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洛河之间”,这里的庙会具有更为独特的内容和价值。海内外华人来此寻根问祖,庙会形成一道格外亮丽的文化风景。他特别论述道,原始崇拜指原始社会的人们对所信奉的事物加以尊崇和敬拜,从而表达感恩思想,祈求所信奉的事物能够帮助自己得到幸福,解脱灾难。崇拜的形式有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天体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渗透进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而且并不因为社会各个阶段的更替而消失或变更。在社会发展中,诸种崇拜常常互相结合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最突出地体现在民间节日里。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太昊陵庙会,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当地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其时间之长和人数之多,不是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指民间文化生活)所能够比拟的。

高有鹏提出重视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学术探索方式,主编《河南民俗》《民间生产》《神话!神话!》等著作,同时,策划、主编“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书系”等丛书。在《文学评论》《中国音乐学》《民间文化论坛》《民族文学研究》《文化遗产》《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100多篇论文,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年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新华文摘》等转载转摘。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生活视作文化,又把文化视作生活,生活与文化是一个整体。他最早提出来信仰是文化的核心。

四

高有鹏是国内外有影响的神话学者。早在1980年代初,高有鹏就发表《淮阳太昊陵庙会考察报告》《女娲城庙会采风思索》等系列论文。其深入研究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神话,提出中国古代神话是民族古老的信仰的论点,提出神话是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源,以此考察中国古典神话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联系。高有鹏出版《神话之源》《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神话气象》《开天辟地——中国古典神话时代及其类型》等系列神话研究著作,发表《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中国神话的炎帝神农时代》《朱熹对〈楚辞集注〉中神话传说理论的阐释》《河南灵宝阳平“八大社”庙会与夸父神话考察》《班固的神话传说民族志书写》等。高有鹏提出中国古典神话时代与神话群分布等概念,提出神话分布于一定的区域,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与族群特征的“语域”概念。他在国内较早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神话主义、中国神话主义诗学理论,提出神话重构与神话是历史的巫术化等理论。

高有鹏的神话研究,既是历史文化的古老记忆,也是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构。在《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等著述中,他把神话视作中华民族的神圣信仰,努力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神话的踪迹,看到文明的发生与演变规律。在他看来,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心中都重若千钧,它所要表白的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刻的记忆,和世界各国民族一样,神话传说是对本民族的历史重新的整合和诉说。他认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记忆和流传并不是简单的故事的流传,还包含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总结,尤其对自己精神品格的认同与发展,我们弘扬的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可以使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也使我们这个民族展现出特殊的魅力而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时代,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整个社会进行的文化整合所提出来的,在每一个神话故事的背后都有着—个特殊的文化历史阶段。中华民族之所以非常重视神话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记忆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解剖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记忆方式。所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对历史文化有着特殊的理解,前面说到的中国心实际上就是用神话传说这些特殊的记忆,作为我们民族最古老的学问所形成的一种诉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 56 个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文化认同。

在中国民间文学作为历史文化的梳理过程中,高有鹏把目光放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关注学科发展态势,提出许多新的概念和思想理论。诸如他针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区域流传特点,早在 1980 年代初,就提出了“语域”等概念;针对神话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源头意义,提出了“神话群”“神话时代”和“神话主义”等概念。高有鹏结合田野作业与典籍文献的考察,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完整勾勒出中国古典神话时代,描绘出人类文明史上的“中国阶段”和“中国特色”:一、盘古时代。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开端,标志着天地的生成。二、女娲时代。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女性占据特殊地位的阶段关于人类诞生的文化阐释的体现,生育成为这一时期的母题内蕴。三、伏羲时代。它的主要内容是文化(文明)初创,包括渔猎文明的发生。四、炎帝神农时代。这是农耕文明的开创时代。五、黄帝时代。这是中国神话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它一方面是原始文明的集大成,一方面第一次以无比辉煌的神性业绩,形成文化整合,构成庞大的神系集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六、颛顼帝喾时代。其神话内容主要在于绝地天通,这一时代的文化内核是巫成为社会文化的支柱。七、尧舜时代。这是关于政治理想的神话,以禅让为核心。八、大禹时代。治理洪水神话成为大禹神性业绩的基本背景;同时,这一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神话时代的终结。这不仅是一种学术发现,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贡献。^[8-9]

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关于“神话”的概念,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以为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概念,是从日本引入的。高有鹏考证出我国明代就已经明确出现这个词汇,明确见于汤显祖对《虞初志》的评注。他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关于“神话”概念的使用及其非常特殊的文化背景。他指出,我国近代社

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陈季同、章太炎、梁启超、夏曾佑、蒋观云、刘师培、章太炎、孙毓修等学者积极关注民族命运,他们的神话传说研究结合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他们主要围绕以“三皇五帝”为重要标志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述说,对在不同民族中流传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而且自觉将神话研究与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古史重建即“新史学”为重要内容的文化选择与表达。他指出中国近代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极其特殊的一页,新旧转型是其基本特色。自 1840 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民间口头创作表现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故事和民间艺术所表现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传统的民间文艺包括神话传说继续存在并流传,另一方面,许多新的民间文艺形态出现。同时,我国留学生群体包括外交官的民间文学思想与民间文艺理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民间文学,包括中国古典神话的考察与研究,都使我国现代文化充注大量簇新的内容。高有鹏尤其强调了神话在构建民族精神中的特殊意义。

五

高有鹏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文艺学。他独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他强调指出,今天的文化发展进入多元化,林林总总,绚丽多彩。他指出,时代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情感、人民的审美,都成为文化发展的前提。这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必然的联系,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思想文化基础,其实就是人民大众的需要,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只有脚踏实地地面对民众,走进民众,满足人民大众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日日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我们迎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 20 世纪世界风云突变中,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在各国无产者追求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等思想理论,被合理吸收进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富有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

系。中国有礼失求诸野和通过风俗观察民心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总是强调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社稷安危的密切联系,强调亲民、富民。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非常重视团结和教育广大民众,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西方人类学等现代文化理论的吸收运用,又有李大钊、鲁迅、茅盾、瞿秋白、郑振铎、胡愈之等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学说中建立起来。一个优秀的文化学者,不但是文化的先知者,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实践者。2005年12月,高有鹏提出“保卫春节,守护传统文化”,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反响;2006年春节,高有鹏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过年”,受到社会好评。并接受法国巴黎国际广播电台、韩国国家电视台、香港阳光卫视等媒体专访,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意义。

高有鹏不但进行民间文艺学研究、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而且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和书法艺术创作,出版《袁世凯》《清明上河》《1916》《大宋风月王安石》《大宋风月苏轼》等,以文学人类学重视社会风俗生活的文学风格受到社会好评。^[10]2011年《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开辟“高有鹏长篇历史小说研究笔谈”栏目^[11],《中国出版》《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表评论,称赞其文化风格与艺术成就。高有鹏的书法作品以大篆闻名,曾经在贵州、河南等地举办书法展。出版《大篆论语》《大篆道德经》等书法著作,《金融时报》《党

的生活》等报刊高度评价其书法成就。

参考文献:

- [1]王治峰. 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血脉——高有鹏民间文化学术思想述略[J]. 洛阳大学学报,2002(1):125-128.
- [2]宋立民. 有鹏起兮 载欣载奔[J]. 名人传记,2005(8):66-78.
- [3]高有鹏.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从研究生教育中的“三史”教育问题说起[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64-167.
- [4]韩树林. 高扬民族精神 树立文化自信[N]. 中国文化报,2017-04-13(2).
- [5]郝文勉. 一部民族的心灵史[N]. 解放日报,2017-04-08(2).
- [6]刘锡诚.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序[J]. 民间文化论坛,2004(4):101.
- [7]白庚胜. 民间文艺卅年胜景[N]. 光明日报,2009-01-09(2).
- [8]张乐林. 理性把握的尝试和突破——评高有鹏著《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学术特色[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1):2.
- [9]袁士迎. 《中国民间文学史》学术价值简论[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155-156.
- [10]袁士迎. 走出历史沼泽地——评高有鹏的《袁世凯》[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45-47.
- [11]张先飞. 历史小说的“入学”追求[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1):62-65.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Academic Thought of Gao Youpeng

XIE Ha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fo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Gao Youpeng is one of the few outstanding master scholars in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n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folklore and folk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as the main content; b. in-depth study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with folk culture as the main content, strive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duct in-depth studies on the factors of gene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s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e and art; 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n Chinese classical mythology, hooking 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iterature, sorting out the classical Chinese mythology, and depicting the unique Chinese classical myth era.

Key words: Gao Youpeng; academic thoughts; culture; folk literature; classical mythology

“文化自信”背景下外宣翻译理论及 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创新

章彩云

(信阳师范学院 跨文化语言研究中心,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我国外宣翻译理论及话语体系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是要看是否具有原创性与主体性的“我”的东西。其理论与实践支点就在于“自觉与自信”:要保持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新的学术自觉,包括问题研究可能的自觉、问题研究方法论的自觉、翻译实践价值观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性又取决于自觉地创新,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理性审视西学理论,突显文化自信,立足于中国实践,并为之作为自我精神站位和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观点、术语、概念、体系等,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语言管理体系,中国翻译理论及实践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和话语软实力,最终让我们的话语及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文化自信;外宣翻译理论;创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19

中图分类号:H059;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91-05

外宣话语是我国向国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舆论前沿,更是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中国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先生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1]因此,用中国的翻译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再以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的外宣翻译理论,把“中国思想”旗帜鲜明地展示出来,把“中国主张”掷地有声地讲出来。这应是我们外宣翻译话语走向国际话语舞台的根本“精神站位”。

一、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新“文化自信”的自觉

强烈的国家关怀与现实关怀是外宣翻译重要的内蕴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每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必然带有那个国家的民族特色、国家特色和时代特色,天然地留下自己的、有别于人的东西。就此来看,外宣翻译实践及学术走向必定受到国家发展阶段、发展道路以及民族文化个性的影响,必须自觉立足于中国特色实践和中国民风民情。而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着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这是我们外宣翻译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我们外宣翻译所存在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也是我们现代化中国“精神立国”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外宣翻译只有在不断地回应中国梦伟大实践的时代命题和时代难题之中,才能做出有意义的学术探索,才能确立一个真正的中国外宣翻译的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外宣翻译理论及话语体系创新的确立,是需要在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上给出系统的回答。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伟大实践是我们外宣翻译研究的一个基本价值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价值前提,研究成果再大,也必然缺少了为国家服务的理论自身建设意义。如,在外宣翻译实践中,有许多具有政治环境特色的外交新词,对其翻译及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西学主流翻译学对照下的“机械拿来主义”;一种是立足于国学与中国实践下的推陈

收稿日期:2018-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用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6BY029)

作者简介:章彩云(1968—),女,河南正阳人,硕士,信阳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跨文化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词汇学、翻译学和语用学。

出新。前一种情况,源于学术心理的唯西学意识,无论写什么东西,都要从西学理论中寻求学术精神安慰,不考虑民族性和国家价值,而机械粘贴别人的东西,还往往成了国内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尚,这是很危险的,会动及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根本。其实,这种学术心态下的研究并非复杂,直接将西学翻译理论的概念、框架、话语等简单拿过来套用和实践,看上去很有可信度,却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2]后一种情况,其取向源于对翻译的历史自觉和内省下的文化自立意识,把立足自我、保持主体性作为外宣翻译理论创建的刚性约束,因此该取向的研究会较为艰难些。因为,虽有中国传统译论做直接基础,但中国传统译论并非是一种系统化的著述,零碎且分散,因此建立能够指导当代中国外宣翻译实践的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是没有现成的理论与经验可供参考的,但仅靠“拿来”更是不行了的,必须在保持文化自信不动摇的刚性约束下大力气去探讨翻译的社会本质问题,“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3]这样理念下的创新工作一旦成功,将是突破性的,会为我国外宣翻译理论建立以及为中国话语形成软实力并走出去做出贡献。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我国社科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落后于别人,中学不如西学,总想用西方理论体系来指导、改造东方文化及其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渐渐地被疏远了,在年轻一代精神世界里好像也变得陌生了。这种中华文化自我迷失、文化血脉可能自我断裂的危险现实,正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失去个性,乃至失去走向世界竞争力的根由。这就需要我国翻译界重拾文化自信的自觉,对理论的传承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注重翻译实践的开拓和外宣传手段的创新,重建外宣翻译在当代健康发展的文化生态。切不可邯郸学步或削足适履,徒苦地用中国的特色实践去为西学做注脚,更不可取的是把西方经验简单拿来而生搬硬套在中国发展实践上,其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而应尊重外宣工作的规律,自觉地将中华丰富的宝藏作为外宣翻译创新的滋养土壤,把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当做自身的历史责任和自觉行为。

也只有对一个个根植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社会发展原理、国家独特形象与旋律等问题给出阐释,我们自己的外宣翻译理论科学体系及话语体系才能屹立于学林。习近平于2016年11月31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

话》中说:“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3]这无疑也给我们外宣翻译研究以重要的方向性启示。

在翻译研究界,也存在这样的一种顾虑,那就是:若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是否会使我们的外宣翻译研究封闭化或是孤立化,不利于它的传播与交流,最终无法与国际学术相融合呢?其实,这是不必要地杞人忧天,原因有三:(1)外宣翻译的理论及话语走出去,其根本是基于把自身问题作为研究的立足点,以自身个性视点来考察世界问题,并以此为根脚走向世界。(2)西学是在它自己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能以普遍性与终极性话语来叙述世界问题,抢占世界话语的制高点,虽说与其所进行的全球性扩张有关联,但根本原动力在于他们的学术理论及话语表现了鲜明的自身特色。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说:“社会科学——无论是对自身的研究或者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无不带有自己民族和文明特色。”“其独特性所以能转化为普遍性,恰恰在于其坚守自己特色,并在这一前提下借助文化扩张战略以及培养大批说自己话的海外知识阶层有很大关系。”^[4]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会使我们的外宣翻译研究封闭化或是孤立化”本来就是伪命题。我们不仅不能弱化中国特色,而是要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加强“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的特色研究^[3],从国家层面注重系统的文化战略,以恒久的大视野、大战略耐心培养外宣翻译人才,包括国外人才;不仅要利用我们自己的人才,也要利用所培养起来的通晓汉语的海外学者去运用中国特色的概念、命题、话语等来研究世界问题,扩大自我外宣翻译话语的软实力及辐射力,让我们的外宣话语成为叙述世界问题的尺度和典模,并最终为国际理论学术界所认可、所接收、所使用。到这时,我们自身的外宣翻译理论科学体系的“普遍性意义”就形成了。^[5]

二、外宣翻译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创新的学术自觉

构建当代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是我国和平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文化自信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大国外交创新发展的需要。近代历史实践表明,立足于中华文化与中国实践以及当代核心价值观来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保持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新的学术自觉,是拓展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增强国际

舆论话语权的理论基础。

(一) 问题研究可能的自觉

在当今译学界,总有一些人对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命题的确立持怀疑态度:一是有没有必要构建,二是有无可能构建。这一论调所依据的思维基础是:国家的强大不是靠话语讲出来的,民族的复兴伟业须靠雄厚的实践来实现。这种认识的实质是把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与国家实力展示问题剥离开来,这是形而上学的片面论、静止观、孤立观。实际上,一方面话语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力量元素,是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国家若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合理的外宣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语境中就会丧失话语权,必将影响国家外交的信度和效度,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权益也必然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外宣话语体系与国家实力也并非简单的互为线性层递关系,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去了,对外交流的话语权也未必自然随之提升。如清末时期的中国经济实力位居当时世界前列,可国际话语权几乎为零,反而成为西方列强刀俎下的鱼肉;当今中国经济实力虽与美国处在伯仲之间,但软实力、文化力、舆论力、话语权仍处在国家语言影响力的沉默状态。因此,构建适应当代中国大国外交走出去的外宣翻译话语自我体系,应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迫切必需,也是中国核心利益与价值的承载诉求,是中国实践与方案表达的概念体现,是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成败与否的助推器。

(二) 问题研究方法论的自觉

在构建当代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上,不仅要有问题意识上的自觉,还要有问题研究上的自觉。外宣翻译活动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较强的话语活动,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性站位和思想性自觉,即要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方法论自觉,要有立足于中华文化和传统国学的文化自信,从而构建体现民族本土文化思想元素的话语符号理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用以指导当代中国外宣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实践。在当今翻译界,一些人对持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抱着怀疑态度,这是社会主义学者所存在的极大误区。习近平指出:“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6]在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一些人在对待西学译论及话语分析方法论上,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之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中国文化的重构,但习惯于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问题,生搬硬套的

结果是所用理论与中国实际相脱离。^[7]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外宣翻译也是实践的产物,其话语表达着“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目的和意义”^[7],而西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符号学理论过于注重语言逻辑的分析,往往用数学的思维坐实来看待翻译问题,在方法论上大多与中国特色实践及其语言文化实际相脱离。在如此状态下所展开的外宣话语翻译及翻译研究,必然难以解决中国外宣翻译实际问题的。故此,我们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中华传统文化与译论为理论基础,合理吸收国外科学、先进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与中国当代实际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地改造,将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考察,最终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支持。

(三) 翻译实践价值观的自觉

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宣传的前沿阵地,肩负着我国有关发展“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以及一系列反映我国政策、方针、执政理念等方面上的关键话语翻译的重任。因此,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一定是反映着中国人利益与意义的表达系统,是体现着中国人价值观范畴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与灵魂。而在当代国际话语语境里,话语权仍掌控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里,为保持对这种话语霸权的持续拥有,他们积极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国内不少人包括学界著名人物思想上深受其害,行动上全盘拿来,从思想观念与学术理论两方面不加明辨地一概接受。这就导致了“部分中国学者带着西方的有色眼镜打量自己的祖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7]在这些人眼里,中国什么都不好,西方什么都好,不仅找各种理由否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还以各种解说曲解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本土元素,间接地或直接地成为了西方价值论和人权观的维护者。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在建立外宣翻译中国话语体系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正”好价值观这个“名”。而正好这个“名”,就是要把当代社会主流文化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话语体系建立的信念以及外宣翻译的行为规范准则。^[8]

三、外宣翻译话语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支点

研究问题的自觉性取决于自觉地创新。而在翻译中所进行的创新必须是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自觉的创新必须有用,对外宣翻译的走出去有

用,是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的宗旨,否则就是“有术无道”。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8]这一讲话的核心就是“创新”二字,只有创新,我们的理论发展才有生命力。按照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实质,翻译理论创新是翻译学科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翻译理论永续发展、进而走出去的不竭动力,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的关键所在。就翻译理论创新来说,它应该包括学科创新、学术创新、话语创新和语言管理创新等,它的理论建成,主要取决于翻译理论研究者对翻译实践的思考、概括、凝练、总结和创新。

而创新的本质,就是要立足自我、博采众长、吐故纳新。要做到这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彩点就是具有原创性的自我特色,“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我们的翻译理论及话语体系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是要看是否具有原创性与主体性的“我”的东西。跟在别人的后面,“邯郸学步”不行,“鹦鹉学舌”也不行,那是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对外宣翻译研究来说,我们伟大的国家就是一个丰富的矿藏,原因有三:一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极其厚重的文明传统,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文明体,这是世界的唯一。这为我们开展外宣翻译理论创新提供了国家和民族性的精神血脉。二是,在中华文明进程的长河里,我们已形成了独具鲜明特色的人文哲学思想体系,包含了历代中国人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认知智慧和价值思辨。在外宣翻译构建中要体现出这种独特的国家优势。三是,当代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实践性和生命活力。这种前无古人的宏大而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实践,许多东西是西学理论所无法诠释得了的,必将给外宣翻译的理论重建与学术繁荣提供创新动力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并以为之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观点、术语、概念、体系等,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语言管理体系,中国翻译理论及实践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和话语软实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创新不是简单的“改”,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许多人把“创新”与“改”简单地画上了等号;创新也不是一味地求全、求大,一个关键地方的关键点,做好了,“四两拨千斤”。如,提

出一个观点,引发某种思考是创新;揭示一条规律,深化现有认识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发展完善已有理论是创新;发现一种方法,提高认知与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是创新。对于到达翻译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心理及表征状态,可以借用孔子的一句话“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来形容,以此来看待创新,钱钟书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艺之至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用心汲取传统营养,使之应用至翻译理论上,必然能给我们的理论创新带来新境界。孔子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就话语本身来说,这是孔子主观意识与人生准则相融一体的于一定框架内活动的行为定律,“从心所欲”体现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逾矩”体现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一方面,心中要敢想,有想法,不做思想上的奴隶,也只有让思想自由驰骋,才算得上真正的“从心所欲”;另一方面,又要守“道”,尊重客观规律,不能漠视规矩。^[9]也只有了解了在自己所从事行业内的所有规矩,才能有在其中游刃有余的发挥及在不超越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创新。换个说法,就是“顺心而为,自然合法,动念不离乎道”。

对照外宣翻译,道理亦然。特别是在建立翻译的文化自信及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孔子的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冲破对西学权威的盲从,还要有在“破”后的大树大立,树我们自己的思想,立我们自己的言说,这是翻译创新的开始。其次,要把握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间的精密关系,在“欲”与“矩”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中,进行有效的平衡。要对翻译里的“矩”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里面包括明的矩、暗的矩、成文的矩、不成文的矩等,都要有全面的认识。2015年新华社把“十三五规划”制作为“十三五之歌”,用中国式话语译文向世界传播,让这个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话题风靡海外,使众多的国际朋友记住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其中“十三五”是一个颇具中国政治文化特色的概念,歌词译为汉语拼音 shi san wu,就是中国故事的源头、中国实践的标志,体现了中国式话语特色,能激起海外朋友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兴趣与欲望;若直接译成 ten three five 或 thirteen five,显然不能把这一中国话语所包含的个性内容表达出来,这就是对“矩”所存在片面认识的结果,也许译者主观上不想逾矩,客观上却逾矩了。

中国语言突出的特点是凝练,用最少的字词表达出最全面的意义,简单的形式承载着丰厚的内涵,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简洁的形式凝练为寓藏丰富思想情感的意境;写作思路,注重想象的

发挥,不偏重理性逻辑的章法,时空穿越常见,语句不仅有系统化、抽象化的理性意蕴,更多的是音乐化、韵律化的情感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许多表达形式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文化精神。这是与西方话语所不同的地方,西方语言注重科学性下的理性逻辑,艺术性让位于科学性。在西方的德文、法文、英文等之间在词汇对等上,各自约有90%的词语可直接互换,因此翻译理论中的“对等法”在西方语文翻译中是个较普遍的策略。但中国语文与西方语文有迥异之处,对照西文,它存在大量的词汇空缺,据许渊冲分析,约有50%以上,翻译时只有一小半可以用“对等译法”。因此,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我们不能用英语文化的“矩”对译中文,要设计自己的议题并用富有中国特色的译文表达出来,让它成为国际社会所熟知的话语方案,让它们成为国际社会表述中国故事的源头、读懂中国实践的标志。

我们的外宣翻译及研究工作,其目的最终是为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务的,之后才有对世界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服务。就当代外宣翻译工作者来说,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必须自觉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这个宏大的主题相联系,必须自觉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也只有在这样的主题方向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才能产生尊严与骄傲,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5]。

参考文献:

- [1]张维为. 中国超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6.
- [2]谢天振. 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2014(1):8.
- [3]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12-01(2).
- [4]许渊冲.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2016(5):93-99.
- [5]苏长和. 学术自觉与社会科学自主创新[C]//苏长和. 中国话语与国际关系.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5.
- [6]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5-19(2).
- [7]赵士发.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要避免的几个误区[N]. 光明日报,2016-11-02(14).
- [8]习近平.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N]. 人民日报,2016-05-18(1).
- [9]许渊冲.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诗词翻译与中国文化梦[N]. 光明日报,2015-04-28(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ZHANG Caiyun

(Intercultural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To build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and discourse system, there needs to embody the original elements of China. The key of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lies in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in the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and discourse system includes aspects, such as consciousness in research question, research method and valu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source of confidence derives from innovation. This consciousness, in turn, depends on self-conscious innovation. In specific translation practices, absorbing essence of western theory, highligh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and use it as a self-centered st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 to propose academic viewpoints, terms, concepts, and systems with “subjectivity and originality” and build a translation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syste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ystem can form its own unique advantages and discourse soft power, and ultimately allow our discourse and culture to go global.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theory; creativity

积极话语分析视域下政府形象构建的话语策略研究

——基于《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张红,周迪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以积极话语分析视角为切入点,辅助于数据库 Power Conc1.0,对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进行解读,旨在分析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的语言技巧,探究语言背后折射出的意识形态,以剖析政府形象的构建过程。研究发现:政府使用高频词和物质过程进行剖析,政府塑造出“人民福祉的创造者”的形象;政府多次运用模糊标记词、强化标记词和参与标记词,构建出“诚实负责的奋斗者”的形象;政府使用放射型语篇模式塑造出“凝聚人心的感召者”的形象。总之,政府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综合运用多种话语策略,塑造出亲民、务实、负责任的整体形象。

关键词: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积极话语分析;政府形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20

中图分类号:G206;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096-04

一、研究背景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按照法律规定,于2018年3月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上一年度政府工作的总结并对下一年度的工作进行部署。政府工作报告既展示政府任职期间所做的政绩,是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窗口,又详细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乎民族、民生大计^[1]。

目前,国内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翻译领域,如:胡开宝(2014,2015),王铭玉(2014),陆仲飞(2016)等;政治管理领域,如:陈瑞欣(2016),陈天祥(2017)等;文体学领域,如:崔亚妮(2010),刘玉坤(2012),丁爱兰(2014)等^[2]。而国外的研究聚焦于:政治话语方面,如:Fairclough, Wodak, Schiffner等;认知话语方面,如:Van Dijk, Chilton, Scollon等;评价理论方面,如:Martin, Thompson等^[3]。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文体、话语或翻译学理论等对语篇或某个用语进行深入的剖析^[4]。本文聚焦于系统功能语法,从积极话语分析视域尝试着对《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展开研究,以此探讨政府形象塑造与构建过程中的话语策略。

二、理论基础

1979年,“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概念出现在 Roger Fowler 的著作《语言和控制》中。随后, Fairclough 指出了批评话语分析是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1996年, Caldas Coulthard 主张构建出一个没有性别、种族、年龄的和谐社会,同年, Kress 对批评话语进行了反驳,认为不应该只有批评而没有积极的改进方法,应该从批评、消极的行为中解放,并转化为有建设性的、积极的行为。

于是,澳大利亚学者马丁于1999年在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展示中率先提出“积极话语分析”的全新命题,并在2000年指出,需要在语篇分析中寻找新目标,并非致力于批评,而聚焦于设计。设计即撇开消极想法,有意识地勾勒出美好的蓝图。2002年, Luke 支持 Kress 的想法,主张通过建设性的手段运用权力^[5]。

总之,积极话语分析旨在构建话语双方的关系,从语言设计角度使用积极态度对待事件,旨在解决冲突、矛盾,促成和谐。积极话语分析有三种分析方

收稿日期:2018-04-23

作者简介:张红(1965—),女,山东鱼台人,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英语教学法。

法:一是多模态式的研究,既包括语言文字的研究,又包含对图片、声音等的研究;二是多层次的研究,它可以从语音、语义、词汇等方面进行研究;三是多功能的研究,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三功能出发,向四周进行辐射和拓展。系统功能语法是从语言特有的社会性角度对语言功能展开研究,以此剖析语言的基本特征,阐释语言的意识形态。因此,文章在积极话语分析视域下,采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展开分析。

三、政府形象构建的话语策略研究

(一)“人民福祉的创造者”形象的构建过程

概念功能是说话者依靠语言的及物系统及语态分析经验和逻辑功能。值得肯定的是,及物系统能够直接反映演讲者的所作所为和意识形态^[6]。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共计594句,文章根据概念功能对该语料的及物系统进行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及物性系统六大过程统计表

过程类型	物质过程	关系过程	心理过程	行为过程	存在过程	言语过程
数量	506	63	12	2	11	0
百分比	85.1%	10.6%	2.0%	0.3%	1.9%	0

根据表1统计可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主要以使用物质过程为主,数量占85.1%,因此,文章主要从物质过程入手对政府构建形象的过程进行分析。

1. 物质过程

物质过程指做某事的过程,包括动作发出者,动作动词和动作目标。文章使用PowerConc1.0对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主要动词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

文章使用PowerConc1.0对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词频累计20次的主要动词进行统计发现,政府通过使用积极有力的词汇,能够表现出政府的决心。以具体文本为例:

表2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动词使用频数统计表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动词	频数
发展	142	坚持	35	投资	26
改革	97	实施	35	开放	24
推进	67	完善	33	实现	24
创新	55	推动	31	继续	22
加强	50	支持	29	扩大	21
建设	49	促进	28	落实	20
提高	36	深化	28	优化	20

例1. 政府指出,2018年将深入推进对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例2. 政府将大力深化我国人才发展的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鼓励企业提高相

关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

根据韩礼德的著作《系统功能概论》一书中对物质过程的理解,他认为,物质过程即施动者做某事的动作,可以将其理解为“do something”。根据具体的例句,可以发现,政府在演讲中高频次使用了积极有力的动词,如例句中“推进”“建设”“深化”“鼓励”“提高”等一系列动作动词,大量动作动词的使用能够突出政府推动我国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决心。虽然在2017年,政府已经完成各项任务,各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政府仍然坚持为国家经济、政治等发展提供服务。总之,政府高频次使用物质过程进行演讲,塑造出一个务实、服务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形象。

2. 高频词分析

对演讲文本的高频词分析,既能够把握语料的整体词汇信息情况,又能够对突出的某一现象进行分析。文章借助于PowerConc1.0软件对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整理情况如表3:

表3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前20项高频词数量统计表

高频词	频数	高频词	频数	高频词	频数	高频词	频数
发展	142	社会	65	建设	49	工作	41
改革	97	创新	55	企业	48	人民	39
经济	78	全面	54	政府	43	政策	39
推进	67	加强	50	中国	43	市场	37
						提高	36
						增长	36
						坚持	35
						实施	35

依据表3,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的前20项高频词中,11个高频词为物质过程,其他9个作为物质过程中动作的发出者或接受者出现。以报告为例:

例3:依据2018年政府的工作报告显示,主张发展并壮大新经济动力能源。

例4: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提出,需要改革并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的管理制度。

例5:政府即将在2018年为国民减税,促进国民经济转型,激发市场活力。

根据韩礼德的著作《系统功能概论》一书中对物质过程的理解,物质过程可以理解为“do something”。因此,根据例4,聚焦于位居高频词首位的“发展”一词,“发展”作为动作动词,施动者是政府,动作目标是新经济动力能源。在例5中,“政府”作为施动者,“改革”和“完善”作为动作动词,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管理制度则是受动者。在例6中,“经济”和“市场”作为受动者,施动者是“政府”,动作动词是“转型”。而作为受动者的名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动作的象征。根据以上三个例句的分析,可以发现,政府运用“发展”或“改革”等动词,或者“经济”“市场”等作为名词受动者,既可以展示出政府的所作所为,即:将继续发展新经济动力能源或改革

完善制度等,造福人民,又显示出政府的决心。总之,政府通过多次使用动作动词以及受动名词,塑造出一个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形象。

(二)“诚实负责的奋斗者”形象的构建过程

人际功能是说话者通过语言建立人际关系,韩礼德指出,它是由三部分组成,情态系统、语气系统及人称系统^[7]。而马丁教授拓展了人际功能,进一步提出了有关评价理论的相关支撑,它集中于“情感”“情态”和“强化”三方面,由态度系统、介入系统和级差系统组成。因此,文章将利用 PowerConcl.0 软件从模糊标记词、强化标记词、参与标记词三个方面挖掘政府形象构建的话语策略过程。

1. 模糊标记词

模糊标记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百分比、具体数值或其他措辞。

它主要以凸显说话人的地位为主,使信息以观点形式呈现,而非客观事实。说话者在阐述事物时,会多方面兼顾考虑,如:语言的准确性、可靠性等,为听话人提供商量的余地^[8]。因此,政府在对 2017 年工作总结的前提下,将会对 2018 年的工作进行部署,而模糊标记词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政府将做的部署。文章借助于 PowerConcl.0 软件对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模糊标记词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整理情况如表 4:

表 4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模糊标记词使用数量统计表

模糊标记词	频次
基本	8
左右	7
以内	3
以上	17
以下	7

根据统计,“基本”一词在语料中共计出现 34 次,去除不表示模糊意义的频次,共计 8 次表示模糊标记意义。模糊标记词的具体使用意义以文本为例:

例 6:政府将在 2018 年积极发挥供给结构的投资,预计将在公路和水运方面投资 1.8 万亿元左右。

例 7:政府指出,2018 年把城镇调查的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把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控制在 4.5% 以内。

由于未来因素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恰到好处地使用模糊标记词对 2018 年的既定目标进行模糊化,为其工作留下余地。例句中的“左右”“以内”等词,突出了政府在工作中不妄下海口、夸夸其谈,这不仅强烈地展现出政府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而且突出强调了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因此,政府通过使用模糊标记词塑造出一个严谨、认真、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

2. 强化标记词

强化标记词,与模糊标记词截然不同,指说话者对内容的确定性。它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出现:“必须”形式、“一定要”形式,形容词或副词形式,特殊句式等。以具体文本为例:

例 8:政府认为,一定要用高度负责的精神,服务人民和国家。

例 9:政府决定在 2018 年必须得破除市场要素配置障碍。

政府工作报告对 2018 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必须”“一定”等词显示了政府的坚决态度。政府在部署工作时,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而强化标记的使用恰好能够满足政府报告的目标。同时,强化标记词的使用,能够使人民紧跟政府的步伐,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因此,强化标记词能够展现出政府在部署工作时坚定、果断的工作态度,从而塑造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3. 参与标记词

参与标记词是说话者直接进行情感诉诸的主要手段,说话者通过互动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说话者通常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或者“我国”等形式实现参与标记。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有两种分类,内包和外排,而参与标记侧重于前者。以具体文本为例:

例 10: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拥有高度负责的精神竭力为党和国家做好各项工作。

例 11:政府认为,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共使用参与性标记共计 42 次,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形式在报告中,发挥了两大作用,其一,以例 13 和例 14 为例,“我们”代表政府机构全体人员,一方面对国家及人民进行承诺,显示政府阶层的治国策略和决心,另一方面突出了政府的所作所为,造福人民的显著成就。其二,“我们”包含着广大人民,这样体现了政府的亲民形象,缩小与人民间的距离。因此,政府通过使用参与性标记塑造出一个亲民、负责的政府形象。

(三)“凝聚人心的感召者”形象的构建过程

语篇功能借助于主位述位系统和信息结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语篇整体的发展。布拉格学派最先提出语篇的主位、述位概念,前者是信息的出发点,后者是语篇剩下的部分。韩礼德将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分为:放射型语篇模式、交叉型语篇模式、阶梯型语篇模式和聚合型语篇模式。放射型语篇模式指语篇主位相同,述位不同的模式;而聚合型语篇模型指语篇主位不同,述位相同的模式。交叉型语篇模

式指前一语篇的主位是下一语篇的述位的模式;而阶梯型语篇模式指前一语篇的述位是下一语篇的主位的模式^[9]。

文章对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主位推进四种模式进行分析时发现,放射型语篇模式是政府工作报告的整体框架,同时,也贯穿于工作报告内部不同的层级。以具体的文本为例:

例12:在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工作回顾情况中,政府报告以“五年来”作为每段的起始,增强了报告的演讲气势。随之,先后用以“坚持……”和“过去五年……”为起始的句型作为每段的起始。

例13:政府在对2018年工作部署中,主要以内部层级出现的放射型语篇模式为主,政府在计划减轻企业税收方面的建议时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通过例句发现,放射型语篇模式一方面能够清楚地向人民传递信息,另一方面能够增强整体语篇的气势,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号召人民积极投入到政府的工作部署中,支持政府的工作。因此,政府采用放射型语篇模式进行工作报告,可以塑造出一个“凝聚人心的感召者”形象。

四、结束语

文章以积极话语分析视角入手,对政府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塑造出的政府形象进行解析。研究发现,政府使用高频词和物质过程进行剖析,政府塑造出“人民福祉的创造者”的形象;政府多次运用

模糊标记词、强化标记词和参与标记词,构建出“诚实负责的奋斗者”的形象;政府使用放射型语篇模式塑造出“凝聚人心的感召者”的形象。总之,政府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综合运用多种话语策略,塑造出亲民、务实、负责任的整体形象。

参考文献:

- [1] 江潇潇. 语言三大元功能与国家形象构建[J]. 外语研究, 2017(1): 11-15.
- [2] 辛斌, 高小丽. 批评话语分析: 目标、方法与动态[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4): 1-4.
- [3] LUCAS, STEPHEN E.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 [4] 王振华. 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C].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25.
- [5] 胡壮麟. 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互补性[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7): 3-7.
- [6] 王和私, 王芙蓉, 尹丕安. 美国国情咨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4): 49-52.
- [7] 曾亚平.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解读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获奖演讲[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2): 19-21.
- [8] 潘艳艳, 董典. 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建构中国形象和大国关系的话语策略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3): 50-56.
- [9] 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6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tudy on Discourse Strategy of Government Imag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The Governmental Work Re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8*

ZHANG Hong, ZHOU D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80, China)

Abstract: With an active discourse analysis perspective as an entry point, assisting in the database Power Conc 1.0, interpret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report in 2018,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language skills used by the government in work reports and explore the ideology reflection in the language, so as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 imag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government uses high-frequency words and material processes to analyze the government's image of "the creator of people's welfare". Th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used fuzzy markup words, enhanced markup words, and participation markup words to build an "honest and responsible fighter". The government uses a radioactive discourse model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one to unit people". In a word, the government comprehensively uses a variety of discourse strategies to shape an amiable, pragmatic and responsible image.

Key words: *The Governmental Work Re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8*;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the image of the government

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英译本为例

卢 静,成汹涌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牵动世界各国的目光。翻译作为沟通各国的桥梁,肩负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翻译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传播水平。翻译策略是影响翻译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研究有助于提高文化交流质量。从语境顺应理论出发,分析语境因素对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译者动态顺应不同的语境因素,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语境顺应;翻译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21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100-04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报告全面、快速、准确、直观地阐释了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智慧和力量。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意味着中国正阔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不仅关乎13亿多中国人民的福祉,也牵动世界各国的目光。翻译作为沟通各国的桥梁,肩负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其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外传播的水平。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有文化差异、译者的基本功等^[1],而翻译策略也是影响翻译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文化交流的质量。所以,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要涉及翻译策略的研究。

什么是翻译策略?翻译策略指从事翻译活动时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法^[2]。翻译界对翻译策略

的分类众说纷纭,不少学者把归化和异化既称作“策略”又称作“方法”,把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混为一谈,这对翻译策略的研究和翻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进行区分,很有必要。

一、语境顺应及翻译策略

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 Verschuere 首次提出“顺应论”,并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详细阐释其意义。语用学把顺应论分为四个方面:结构顺应,语境顺应,动态顺应和意识凸显。其中,语境顺应是顺应论的核心。Verschuere 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狭义语境)和交际语境(广义语境)。语言语境即上下文;交际语境包括: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指的是交际者的心情,欲望,意图和其他影响心理感情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3]。认知因素即大脑通过学习经验和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通常以概念化的形式呈现。情感因素是人在交际过程中对他人和客观事物好恶倾向的内在心理反映,是维持和渲染交际的态度性前提;“社交世界”指交际者在社交场合和社会环境中应遵守的准则,这些准则通常受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影

收稿日期:2018-04-27

作者简介:卢静(1993—),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响^[4]。“物理世界”主要指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系^[5]。

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是翻译过程中主要的参与者,两者处在翻译活动的两级,译者对这两者的取向不同,翻译策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根据译者对两者的取向,翻译策略可分为“原文作者取向”的异化策略,和“译文读者取向”的归化策略^[6]。换言之,异化策略以原文作者为导向,注重保持原文的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使译文向原文靠拢,使译文读者充分领略原文的异域风味;归化策略以译文读者为导向,注重用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原文的意义,使译文易于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翻译方法是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具体手段,属于翻译策略之下的范畴。两种翻译策略分别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异化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方法有:直译,音译,逐词翻译等;归化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方法有:意译,仿译,改译等。

二、语境顺应关照下的译本分析与讨论

(一) 心理世界顺应

1. 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一般指的是认知过程或认知活动,包括信念、思维和想象。认知过程是大脑根据经验学习和实践活动形成知识体系的过程。认知因素是沟通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桥梁,通常以概念化的形式呈现,如下例中的“意识”:

①推动全党尊崇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We urge them to strengthen their consciousness of the need to maintain political integrity, think in big-picture terms, follow the leadership core, and keep in alignment.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受不同思维模式、文化背景和认知背景的影响,形成了迥异的语言风格和语言习惯。中国人受“和谐”哲学思想的影响,经常使用重复四字格结构增强文章结构的对称美、韵律的和谐美,如例①中发言人选择重复的四个“意识”,增强其发言的韵律和气势。但是译文读者受相关认知背景限制,他们意识不到四个重复结构的美感,反而觉得冗长复杂。在处理诸如此类由于不同认知背景引起的不可译现象时,为了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译者选择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将例①中四个重复“意识”译成西方人喜闻乐见的动宾结构,既传“情”又达“意”。

2. 情感因素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共性,人

类文化和人类语言也存在诸多共性^[7],正是由于人类基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才使得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8]。文化和语言的共性决定了情感类和态度类词语的可译性,如:

②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We must uphold long term and steadily strengthen China's socialist democracy, make active and prudent efforts to advance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③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We will never allow anyone, any organization, or any political party, at any time or in any form, to separate any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from China.

我们从例②中的文字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持和信心,中国共产党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信念。对于这些情感类和态度类词语,译者选择以原文作者为取向的异化策略,借以“must”“long term”和“steadily strengthen”等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再现原文坚定的情感、信念。例③运用6个排比结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任何形式“台独”的决心。译者同样选择异化策略指导下的直译方法再现原文反对“台独”坚定的情感、态度。译语中几个并列否定结构气势恢宏,语气坚定,不仅准确地还原了源语的语言结构,同时也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待“台独”的强硬态度。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在处理有文化差异的认知因素时选用归化策略,保证译文读者取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归化策略有助于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加快译文在目的语国家的传播速度,提高影响力;在处理有共性的情感因素时选择异化策略指导下的直译方法来达到既把握原文内容,又能保持原文形式的目的。直译翻译方法在保留源语语言结构、文化特色和诗学特征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保证源语的语言风味。

(二) 社交世界顺应

1. 文化背景

文化的含义不一而足,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地理因素、历史因素、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也可以指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必然衍生出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因此也就产生了

文化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一些文化词的不可译性。不可译性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9]。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把不可译转化成可译。如:

④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Our political environment will, through tireless efforts, like seas fallen calm and rivers running clear, be clean and free of corruption.

⑤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

We will act on the policy requirements to help those most in need, to build a tightly woven safety net, and to build the necessary institutions.

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如今早已形成了成熟且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软实力,为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家领导人经常在各种访问和演讲场合大量使用成语和熟语等文化词,如例④中“海晏河清”这一成语:用来形容大海风平浪静,黄河清澈见底的样子,常用来比喻天下太平。例⑤中“兜底线”意味着:兜住人民基本生活水平这一底线。诸如例④中的成语和⑤中的熟语等文化词就是不可译的代表,译者均采用了保留原文异域风味的异化策略实现原文和译文社会文化因素的顺应:例④译文中明喻这一修辞很好地顺应了原文中的成语;例⑤译文中三个不定式结构很好地顺应了原文中三个排比修辞。

2. 社会制度

语言是反映习俗、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等文化因素的一种特殊方式,文化也是影响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10]。来自不同语言环境的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交流过程中会进行不同的语言选择。社会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社会制度必然衍生出不同的制度词。诸如“一国两制”“台湾同胞”等词均是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中衍生出来的中国式制度词。

⑥抓住“关键少数”

We must focus on oversight over the “key few”, by which we mean leading officials.

⑦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It is imperative to fully and faithfully implement the polici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例⑥中“关键少数”指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全国各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较小。译者为了使译文对照原文的语言特点,选择了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并结合增译技巧解释这一术语,指出关键少数即领导干部;例⑦中“一国两制”是针对

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政治概念,译者同样借助异化策略指导下的直译方法还原“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意义。

以上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词和政治术语均有着它们深刻且独特的文化内涵,考虑到源语和目的语社交世界的差异对其语言选择造成的影响,译者选择异化策略达到丰富目的语的表达和保留原文异域风味的目的。异化策略固然能很好地保留源语的原汁原味和异域风味,但异化并不代表一味的生搬硬套,如果译者在保留原文异域风味时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那么,诸如增译的翻译技巧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弥补这一缺憾。

(三) 物理世界顺应

物理世界主要指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系。时间即谈话、演说或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包括物理世界中双方的位置,与言语行为相关的肢体语言和身体姿势、手势等^[11]。

⑧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We will carry out extensive Fitness - for - All programs, speed up efforts to build China into a country strong on sports, and make smooth preparations for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Games.

2022 年北京申奥成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2022 年”是公认的参照时间,故原文省略了这一时间指示语。本着严谨和顺应译文读者物理世界的原则,译者选择了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的归化策略,通过增译时间状语的方法顺应译文读者的物理世界。

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

We must...deepe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s, and encourage fellow Chinese on both sides to oppose all separatist activities.

物理世界中有“绝对空间关系”,如“南 - 北”、“西 - 东”和“前 - 后”和“相对空间关系”。绝对空间关系常常有很高的规约化程度,如例⑨中的“两岸”。译者在顺应原文的物理世界时应注意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政治误解,避免译文重复冗杂,翻译时译者采用归化策略顺应目的语简单、多变的语言习惯,例⑩中三个“两岸”分别被译为“cross - Straits relations”“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s”和“fellow Chinese

on both sides”。译文既顺应了目的语避免重复的语言习惯,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达到顺应双方物理世界的要求。

基于归化策略译出的文章,减去了原文的陌生感,增加了译文的亲切感和可读性,顺应了读者的语言习惯,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是,归化策略也限制了源语语言、文学、文化要素的传播,剥夺了读者领略原文异域风味的机会,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源语的语言优势,不利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互通有无和学习交流。故采用归化策略时,译者一定要慎重权衡这一策略的利弊。

三、结语

翻译是一项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该活动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模式、认知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是一种思维模式转换成另一种思维模式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翻译理论、方法和技巧的辅助。本文厘清了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异同,介绍了不同语境因素对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的选择权不在于译者的主观臆断,而是由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因素及语境因素决定的。译者应根据其各自语言的内在规律及特定的语境因素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而提高译文质量,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张霞. 浅谈影响翻译质量的三个因素[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5(4): 22-23.
- [2] 韩江洪. 国内翻译策略研究述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1): 75-76.
- [3] 杨俊峰. 语境顺应与语用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1): 49-51.
- [4] 何自然, 于国栋. 语用学的理解: Verschueren 的新作评介[J]. 现代外语, 1999(4): 432-435.
- [5] 蒋楠红, 戈玲玲. 指称在语篇中的顺应性解释[J]. 南华大学学报, 2007(1): 121-123.
- [6]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 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3): 84-85.
- [7] 李爱华, 施皓. 翻译中的文化特征: 异化与归化[J]. 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4): 104-105.
- [8] 贾红瑜. 翻译动机对异化与归化策略的影响[J].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3): 134-135.
- [9] 刘敏, 张伶俐. 论文化的不可译性[J]. 理论月刊, 2013(12): 90-91.
- [10] 耶夫维索尔伦. 语用学诠释[M]. 钱冠连, 霍永寿,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00-102.
- [11] 黄晓丹. 从顺应论的角度解析作为强势模因的流行电影台词[D]. 重庆: 四川外语学院, 20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ual Adaptation Theory

—Tak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as an Example

LU Jing, CHENG Xiongy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China is moving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China's developmen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ranslation, as a tool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taken on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going global” in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affects China'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level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o a large extent. Researching on translation strategy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contextual adaptation theory,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factors on translators'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it reveal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rategy according to various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contextual adapt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的生态话语分析

曲春玲

(河南工程学院 外语学院, 郑州 451191)

摘要:艾米莉·狄金森创作的1700多首诗歌中,有500多首是围绕与自然和生态相关的主题。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采用功能语篇分析方法,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艾米莉·狄金森的《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原诗语篇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旨在考察诗人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她对自然的体验和感受的,并通过对诗歌建构的生态话语分析,唤醒读者反思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和破坏,激发读者唯有通过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感悟自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重返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树立与整个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及物性系统;《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自然;生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22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104-04

一、引言

诗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作为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被视为意象派诗歌鼻祖和现代派诗歌先驱^[1]。狄金森的诗歌涵盖了生活情趣、自然、生命、信仰、友谊和爱情等,诗歌语言简洁凝练、质朴清新,意象新颖奇特,结构别具特色^[2],因此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诗人无比热爱大自然,将自己的满心热爱寄于自然中,并从自然中收获了大量的创作灵感。狄金森喜欢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官去描述、赞美和感受自然,使读者有深刻的带入感,唤起其共鸣。诗人将自己的体验与认知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诠释^[3],赋予诗歌超时代意义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是所有生物的家園,人与自然和谐共存^[4]。在狄金森1700多首诗歌中,至少有500多首是谈论自然以及生态话题。从生态语言学视角来看,这些关于自然的诗歌都可以被视为生态语篇(ecological discourse)^{[5]61}。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中,充满了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幅美妙的意象画面^[6]。《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是一首描写自然的诗歌,运用拟人和隐喻等修辞手法歌颂自然之美^{[7]114};颂歌体的应用以及虚构和夸张等的大量使用^{[8]102},使这首诗歌充满了诗人对大自然和家乡的热爱之情,也展现了诗人勇敢豪放的性格。诗人把“自然”比作“美酒”,并狂饮“自然”之酒,酒醉后沉浸并享受自然之美^[9];此时主人公也由淳朴活泼的乡下女孩变成了一个酗酒的醉汉^[10]。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原诗语篇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旨在考察诗人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她对自然的体验和感受的,以及诗人是如何让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和谐共生的,从而体会在这种内在联系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

二、及物性系统理论

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收稿日期:2018-05-28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2017SJGLX481);2017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英语听说能力构建之语篇功能途径”(2017-JKGYB-0190)

作者简介:曲春玲(1982—),女,吉林通化人,硕士,河南工程学院外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生态语言学。

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由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等提供诠释的语义系统,其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 是由语篇,而不是孤立的语句来实现^[11]。如图 1 所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系统体现的是人类的主客观经验^[12],通常包括物质过程 (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 (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 (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 (Verbal Process) 和存在过程 (Existential Process) 等六种过程类型^[13],由上述过程和各种逻辑关系组织起来就成为语篇^[14]¹⁷⁰。韩礼德最先运用及物性理论分析了小说《继承者》,现今及物性系统已经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如新闻报道、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分析中。申丹^[15]、韩艳芳,陈令君^[16]和宋海波^[17]分别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及物性系统分析了《在路上》、国内外“关于中国梦”117 篇新闻语篇、短篇小说《苍蝇》等,证明及物性系统的广泛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本文深受黄国文、陈旸^[5]¹⁶¹启发,亦根据生态话语分析的思路,对全诗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遵循“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原则,重点探究诗人如何运用语言形式传达她对自然的真切体验和感受,并潜移默化影响读者,使其产生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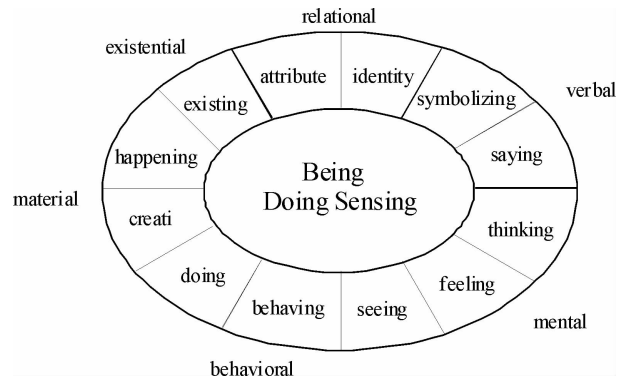


图 1 Halliday 的及物性过程类型^[14]¹⁰⁸

三、《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之及物性系统分析

(一) 诗歌韵律特点

狄金森的诗歌多采用类似教会赞美诗的格律:每节四句,第一、三句八音节,第二、四句六音节,音步是最简单的“轻、重”,第二、四句押韵。诗歌《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就是由四个诗节构成,每节四行,二、四行押韵,充满韵律美^[7]¹¹³。

(二) 诗歌的及物性系统分析

1. I [Actor] taste [Material Process] a liquor never brewed [Range]—/From Tankards scooped [Embedded Clause] in Pearl—/Not all the Vats [Actor]

upon the Rhine/Yield [Material Process] such an Alcohol!^[18]⁸⁰ [Goal]

我 [动作者] 品尝 [物质过程] 未经酿造的 [范围] 美酒,从珍珠镂成的 [嵌入句] 大酒杯里;并非莱茵河畔 [动作者] 所有的酒桶都成盛产 [物质过程] 出这样的醇醪!^[18]⁸¹ [目标]

2. Inebriate [Attribute] of Air - am [Relational Process] I [Carrier]—/And Debauchee [Attribute] of Dew—/Reeling [Material Process] - thro endless summer days—/From inns of Molten Blue [Time]—^[18]⁸⁰

我 [载体] 陶醉于 [关系过程] [属性] 清新的空气,我豪饮 [属性] 那晶莹的露水,在漫长的夏季 [时间],我常从熔蓝的酒店蹒跚 [物质过程] 而归!^[18]⁸¹

3. When “landlords” [Actor] turn [Material Process] the drunken Bee [Goal]/Out of [Circumstantial Element] the Foxglove’s door—/When Butterflies [Actor] -renounce [Material Process] their “drams” [Goal]—/I [Actor] shall but drink [Material Process] the more!^[18]⁸⁰ [范围]

当“店主人” [动作者] 把酩酊的蜜蜂驱赶 [物质过程] 出毛地黄花 [环境成分] 的门庭,蝴蝶 [动作者] 也不再细斟 [物质过程],我 [动作者] 却更要大口 [范围] 狂欢^[18]⁸¹ [物质过程]!

4. Till Seraphs [Actor] swing [Material Process] their snowy Hats [Goal]—/And Saints [Actor] - to windows [Circumstantial Element] run [Material Process]—/To see [Mental Process] the little Tippler/Leaning against the - Sun^[18]⁸² [Phenomenon]

直到天使 [动作者] 摇晃 [物质过程] 着白色小帽 [目标],和那些圣徒 [动作者],奔向明窗 [环境成分],争看 [心理过程] 这小小的酒徒斜倚着这太阳^[18]⁸³ [现象]。

全诗共有十个主要过程 (参见表 1), 第一行中的物质过程动词 brewed 和第二行中物质过程动词 scooped 都是出现在嵌入句中,这里不做讨论。这两个过程动词不包括在其中。其中物质过程八个,占 80%,其次是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各一个,分别占 10%。一般来说,关系过程和关系过程描述意义,而物质过程则叙述意义。可以看出,诗歌《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的创作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描述为辅。这种朴实生动的叙事手法通过诗歌的载体,衬托出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家乡的赤诚之心^[8]¹⁰³。

表1 及物性系统分析

Process 过程		Participant 参与者	Circumstantial element 环境成分
①物质过程	taste	Actor;I	Range;a liquor never brewed
②物质过程	Reeling		Time;thro endless summer days from inns of Molten Blue
③物质过程	drink	Actor;I	Range;the more
④关系过程	am	Carrier; I	Attribute; Inebriate, debauchee
⑤物质过程	Yield	Actor;Not all the Vats	Goal; such an Alcohol
⑥物质过程	turn	Actor;landlords	Goal; the drunken bee out of
⑦物质过程	renounce	Actor;Butterflies	Goal; their “drams”
⑧物质过程	swing	Actor;Seraphs	Goal; their snowy Hats
⑨物质过程	run	Actor;Saints	to windows
⑩心理过程	see		Phenomenon ;the little Tippler/ Leaning against the Sun

从对这首诗歌的及物性系统分析可以看出,从参与者与过程的关系看,与诗人“我”有关系的是三个物质过程和一个关系过程,物质过程是①taste:表示味觉;② Reeling:表示身体动作;③drink:表示动作姿势;关系过程则是④am;这三个物质过程中taste和drink,都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范围”,而Reeling虽然省略了参与者,但却有表示时间的环境成分。另一个关系过程am,有两个参与者“载体+属性”。

作者通过运用过程动词“taste”“drink”将自己对自然的热爱与沉醉比作饮酒的美好体验,值得自己细细品味和啜饮。拟人化主要体现在过程(动词)类型的选择和参与者角色来展现,如在第三诗中,诗人将自然拟人化为参与者店主人“landlords”,将参与者蜜蜂“the drunken bee”和蝴蝶“Butterflies”拟人化为沉醉于美酒的酒客。诗人通过选择物质过程动词“驱赶”“turn…out of”和“浅酌细斟”“renounce”来描绘酩酊大醉于自然美酒的蜜蜂和小酌自然美酒的蝴蝶不忍离去。

比喻体现在诗歌的每一个过程中。诗歌的第一节中有两个过程:I taste(物质过程)…Yield(物质过程)…由于第一行的brewed、第二行的scooped都是出现在嵌入句中,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在第一节中,诗人把“自然”比作“美酒”,并狂饮“自然”之酒,将自己沉浸于饮酒的体验中,并想象自己是在用精美的珍珠酒杯来品味这杯未被酿造的美酒,沉醉于自然中恍若是在畅饮琼浆玉液,陶醉之心溢于言表,即使莱茵河畔最醇香的美酒也无法与她所心驰神往的自然美酒相比。

诗歌的第二节中有两个过程:am(关系过程)I

…Reeling(物质过程)…在第二节中,诗人夸张地将酒徒对美酒的贪恋比作她对自然的陶醉。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和晶莹剔透的甘露,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无不让诗人心旷神怡,酣畅淋漓。而天空恍若一个大酒肆,酒香四溢,使诗人从一个酒肆离开又进入到另一个酒肆,畅饮并徜徉在无尽的夏日中。

物质过程am, Yield, turn, renounce, swing虽然动作者各不相同,但都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范围”。物质过程run也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环境成分”。心理过程see省略了感知者Saints,但也有一个参与者“现象”。

诗歌的第三节中有三个过程:turn(物质过程)…renounce(物质过程)…drink(物质过程)…在第三节中,诗人将蜜蜂和蝴蝶也形象地比作酒客,两者酣畅地饮用大自然的花蜜和露珠。而当店主人将它们赶出毛地黄花的酒肆时,诗人自己仍然在狂饮自然赐予的美酒,完全沉醉于大自然之中。

诗歌的第四节中有三个过程:…swing(物质过程)…run(物质过程)…see(心理过程)。在诗歌的第四节中,诗人将自己斜倚着落日,沉迷于自然中不能自拔比作斜靠着灯柱、流连忘返于酒肆嗜酒如命的酒徒,连天使和圣人都拿这样的酒徒没有办法。从第一个诗节到最后一个诗节,诗人层层递进地表达出自己对自然深深的眷恋和热爱,清新的空气、晶莹的露珠、湛蓝的天空、勤劳的蜜蜂,以及美丽的蝴蝶等一切自然景象都令诗人陶醉不已。

三、结语

本文在生态话语分析的框架中,以及物性系统为视角,对诗歌《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进行分析和讨论。功能语言学认为,概念功能作为三大元功

能之一,主要是由经验功能体现的。而及物性系统作为体现经验功能的语义系统,就是通过六种过程类型把人们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体验表达出来。本文通过对这首诗歌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发现诗人通过八个物质过程 taste, Reeling, drink, Yield, turn, renounce, swing, run, 一个关系过程 am, 一个心理过程 see, 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真切体验以及内心对自然无比的热爱,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类不可以完全脱离自然而存在,不可以过度开采、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更要摒弃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应该主动寻求与自然关系的改善,停止对自然的蹂躏和践踏,顺应自然规律,平等、敬畏地对待自然万物,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全身心感受自然的美好,增加对自然的感悟,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系统功能语言学者肩负着通过构建生态话语分析,反思和批评过度掠夺、摧残的职责自然,呼吁并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汪汉利. 狄金森的大海与爱情[J]. 世界文化, 2017(9): 8-10.
- [2] 刘玲玲, 蔡宁. 艾米莉·狄金森和她的诗歌艺术[J]. 时代文学, 2011(2): 151-152.
- [3] 赵晓凤. 人与自然的情感相遇: 生态批评视角下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四首自然诗[J]. 外国文学, 2010(9): 79-81.
- [4] 覃美静. 研究从伊甸园到和谐自然: 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生态伦理思想[J]. 安徽文学, 2015(7): 33-35.
- [5] 黄国文, 陈旸. 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J]. 外国语文, 2017(2):

61-66.

- [6] 田占敏. 谜一般的才女, 谜一般的诗: 谈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其人其诗[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5(6): 120-121.
- [7] 姜玉威. 析艾米莉·狄金森的《我品尝未经酿造的美酒》[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2(2): 114.
- [8] 王立言. 解读狄金森: 我品尝一杯从未酿造的酒[J]. 新西部, 2012(5): 102.
- [9] 李宜燮, 常耀信. 美国文学选读: 上册[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303.
- [10] 汪虹.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狄金森自然诗歌[J]. 鸡西大学学报, 2016, 16(3): 100-103.
- [11] 崔沙沙.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篇分析探究[J]. 语文建设, 2017(11): 62-63.
- [12]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4.
- [13] 何伟, 魏榕. 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发展综述[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1-20.
- [1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2nd ed. London: Arnold /Bei 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08.
- [15] 申丹. 及物性系统与深层象征意义: 休斯《在路上》的文体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1): 4-10, 80.
- [16] 韩艳芳, 陈令君. 及物性系统与中国形象建构: 基于语料库的“中西方”中国梦新闻语篇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1): 19-30.
- [17] 宋海波. 及物性系统与权力关系: 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苍蝇》的文体分析[J]. 国外文学, 2005(4): 97-104.
- [18] 狄金森. 狄金森诗选[M]. 江枫,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QU Chun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1191, China)

Abstract: Emily Dickson has written over 1700 poems, among which there are over 500 poems are about nature and ecolo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approach of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ducts an ecological and tra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poem *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and aims to examine how does the poet express her experience and emotions by language forms, and by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awaken readers to reflect on excessive plunder and destruction to nature, and inspires its audience to return, to connect and to understand nature so that it can realize the tru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o cultivate the ecological awareness to coexist harmoniously with the whole ec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 transitivity system; *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nature; ecology

间性思维视野中的实验艺术创作教学实践研究

程原^a, 李荣涛^a, 张朝阳^a, 张秀娟^a, 陈婷^a, 景雪竹^b, 林启北^b

(a. 集美大学美术学院, 厦门 361021; b.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厦门 361021)

摘要:就美术教育现实的主要矛盾而言,所有问题,一定意义上都与认知局限所造成的思维与智识局限相关。所谓“间性思维”,实际上就是超越既有范式与窠臼,从跨域、跨界、跨学科的高度,获得一种学科互涉、学科间性的普遍联系视野以及更加能动、更加全面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众创时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协作,无论在产业链上,还是在自然与社会生态上,都离不开主体交互、主体间性。在此意义上,“间性思维”,无疑是时代所普遍需要的一种能够不断建构“动态共同体”的思想能力和精神能量,而实验艺术教学,则在当下美术教育体制中,比较集中、比较典型地凸显了这种精神能力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关键词:间性思维;实验艺术创作;教学实践;众创时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23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108-09

任何创造,都不是孤立的,尽管它既可以是团队的成果,也可以是个体劳动的结晶,但在原发性上,它通常发生在对一定目标长期不懈努力的个体心智和行为的启发中——这看似悖论,但却是创造性活动特殊矛盾的一种表现。说其不是孤立的,至少有四层含义:一是任何创造意识都有“前观念”等前在性资源,都是在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二是任何创造性活动的媒介和手段,都要与客观世界物质资料发生关系;三是如马克思所言,任何创造行为的主体,既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四是任何创造,都在动机与目的上预设或预期了自己的对象和关系。我们知道,全球化了的地球村,使得人们的经济、文化、知识、资源等各种关系变得如此紧密,以至成就了我国深受国际高度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识和主张^[1]。换言之,作为当代人类现实情境和生态,任何创造,在动机、资料、手段、过程、目的等一系列关系上,都始终与世界密切关联。因此,个人创造之于共同体

时代,本质上充满了与他人、与系统、与世界的合作、互动与共创。哲学意义上,这个生态链和其循环系统,使得每一个体必须始终考虑他者,既要将自己“他在”和“他化”,也要将他者变为“他我”。只有这样,个性才不是个别的,创造才具有共性价值和普遍意义。这种基于主体间性或是互主体的“间性思维”意识和能力,或许可以说是新时代对以面向未来为特征、以创新为主旨的实验艺术所给定的一个价值要素和特征。

一、实验艺术教学中的间性思维研究

(一)“间性理论”中的“间性思维”与视野

“间性理论”的基础,源于现象学、解释学、人际交往分析等中外现代哲学“主体间性”理论^[2]。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理论作为一个意绪多层的知识与思想意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主要解决认识主体间的关系和知识的普遍性;在社会学上,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价值观的同性问题;在本体论上,则又包容并超越前者而在人与自然共生的本原性上,

收稿日期:2018-04-17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骨干教师教育科研社科类资助项目(JAS160277);集美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资助项目“美术学科发展前沿问题研究”(2016912)

作者简介:程原(1961—),男,河南郑州人,集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设计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学、设计学理论及实践教学研究。

被认为可通过理解和解释等生存活动,来达到世界的同一性^[3]。这既关系到自由与认识何以可能,也关系到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以至使得着眼于主体间性中“关系”研究取向的“间性”研究,已更多地“成为一种理论视野或研究方法”^[4]。简单说,也就是在思维意识上,个人的行为不仅要有自己的认识,同时还要考虑在别人看来是否可以被理解,是否具有共识域和认同性;在社会行动中,则要考虑自身行为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协调;而在处世的根本性上,还要将“天地人”等一切与自身存在休戚相关的事物,作为与自身平等的主体来加以尊重和善待。

这种心物协同、人我互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5],决定了“间性思维是一种关联性思维,包容性思维,要关联他者、包容他者”,而且在艺术创造和文化创新等所有社会实践层面,具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基本特质:“首先必须要解放他者。其次,要敞开心扉、彼此开放。再次,要相互信任。最后,要超越二分思维,间性关系中的主体双方要努力在对方身上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互补点。”^[6]

总体看,“间性思维”作为对命运共同体历史意识的一种学理概括和学术反映,在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延伸和形成了“文本间性”“审美间性”“文化间性”“学科间性”“中介间性”“生存间性”等多种理论视野和方法,并不断扩展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教、心理、翻译等各个领域^[5]。

(二) 实验艺术创作中的“间性思维”教学探索

问题的研究,历来讲究理论与实践结合,逻辑与现实统一,这既是目的意义,也是基本方法。鉴于实验艺术对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特质,以及艺术创作反映现实,服务生活,形塑社会等功能需要,将课题与高校大三下半期或大四上半期艺管等专业 5 周 80 学时的“综合材料艺术创作”课程,和“大四”毕业期为 7 周的“毕业(设计)创作与策展”实践教学相结合展开研究。

在实践教学设计与研究上,分为三段式:一是基于材料媒介引发的主体意识和创意,二是基于主体交互的创作主题生成,三是间性思维作用下的作品实现与评价。

1. 基于媒材引发的主体意识和创意

这一阶段依托于“综合材料艺术创作”课程中的前 64 学时。教学上具体包括课程介绍,概念认知,语言媒介,画种关系等讲解,设置不同规格的实验作业 6 幅。侧重对“媒材—语言—内容”关系转化与传达的同一性认知体验和思维训练。其首要任务是悬置观念、清空成见,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发掘媒材,尤其是从“非绘画性媒材”中发现意义,从而自

主命题、创作和诠释。在此过程中,学生每件作品须经同学“自评互评”,再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自述。所谓“意义”,包括三个方面:语言形式意义的,社会意义的以及两者结合的。在作品构成上,至少要有一个方面来支撑。以下就一般观点,依序对学生的三个方面作品简单示例(案例均取自 2017 年 6 月电子教学档案):

图 1 这件对开作业,媒材、手法包括水墨、假发和渲染、拼贴等,虽被作者冠名《思绪》,但从画面构成上讲,可被视为是由语言形式支撑的作品。而从药瓶、棉签、人工血浆等媒材表达的内容看,图 2 显然是以社会意义成就的作品。至于图 3 似乎更耐人寻味,语媒只有纸巾、塑料袋,排列形式简单,但却体现了形式语言与社会生活意指的结合。



图 1 《思绪》



图 2 《深渊》



图 3 《纸巾》

上述这种划分,既是困难的,也是不精确的。但依据接受美学给予受众对作品完成和实现的权利,用这种划分来表述实验教学的基本情况,不仅具有合理性,重要的是对说明问题相对方便。当然,从另一方面讲,这种预设和划分,事实上与作为创作主体的学生自身的创作动机和诉求存在着相当差距。因为在我们看来主要只是利用媒材构成形式语言的作品,几乎都被学生自己或是在其他同学赋予了种种社会意涵,而非仅仅出于形式美学的考虑。换句话说,单纯的形式探索几乎是不存在的,从而,单纯

的社会性的表现也是不存在的。这凸显了艺术学门中的一个一体两面的根本问题:一是“内容”与“形式”抑或“形式”与“内容”,始终是艺术创作的构成要素和特殊矛盾,折射出艺术“自治”与社会“他治”相因相生的互化关系和原则;二是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任何人、任何创新和创造,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都不是孤立的、无缘的。无论是作者还是受众,都有这样那样的对象关系和社会诉求。而这作为一种基本意识和理解,作为强调心、物、人互在互化关系的一种“间性思维”,十分需要始终贯彻在各个实验环节中。

图4《荒芜中的美好》(4开。材料:KT板、水粉纸、颜料、干花。手法:手绘、拼贴等)

理由:创作起因是一则报道叙利亚的新闻:其中照片是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一张充满纯真笑容的小男孩:他灰头土脸,但眼里却是另外一副景象,如同星辰大海。背景的红色代表战乱,花在我眼里一直美好的象征,这里代表照片中的小男孩。虽家园不在,仍保持着难能可贵的美好纯真。



图4 《荒芜中的美好》

客观讲,图1和图4作品图式在直观上较具形式感,似乎更多的是对媒材媒语的形式追求。但结合其自述的创作理由看,他们都努力在意义的取向上去发现材料媒语,并在心理“意指”上,将对意义的诉求投注到媒材本身可能的“能指”上加以利用。如将头发作为“没有目标的开始,没有明确的终点。思绪混乱,无价值感”且“剪不断,理还乱”的语符,或依据社会成见,将媒体小报视同“包装”兑现成为一种相应心理象征和“物语”,再加上题目的指向,这些又的确是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认同。然而就图4来看,却相当程度地受到了同学们的诟病。因为如果不加以文字性的背景说明,几乎没有人能联想到与叙利亚战火有何关联。反过来讲,与其说它在表达诉求上是“社会性”的,不如说是“形式因”的。这就意味着,画面提供的信息,一方面不足以给观者提供一个通向国际热点的管道,或用接受美学概念说,在其“召唤性结构”上存在有要件缺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对自身的意图与目的,本身也

存在着认知上的距离。进而应该说,这类学生还是比较自我中心,缺乏对观者的重视,对创作是最终要寻求和满足理解的意识不强,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人我关系与间性思维缺乏自觉和要求。

当然,也有心智相对成熟的同学,在作品的语媒形式和意指传达上,力求达到语媒即思想、形式即内容的目标。

图5《生活》(对开。材料:票据、牙签、金粉、红色色粉、细瓦灰、创可贴、棉花、绷带、人工血浆、红豆、绿豆、薏米)

起因:对即将毕业独立承担生活压力的恐慌。

媒语理由:票据,表示生活离不开金钱,做什么都需要钱;牙签,代表生活中所需的钱财所带来的伤害;棉球绷带、创可贴、人工血浆、色粉,表示受伤后的自我疗伤;细瓦灰,土的颜色表示生活的本源;金粉代表着生活中处处需要金钱;红豆绿豆薏米,五谷杂粮表示生活,为生为活就要填饱肚子,它们代表活着的符号。

自评: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本科甚至硕士生比比皆是,即将毕业的我们就要面对生活的重担,为了生存,即使被重担压弯了脊梁,即使遍体鳞伤,也要负重前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就是现实,就是生活。这些大家的确多多少少都能感同身受地感受到。



图5 《生活》

当然,在创作教学中,同学中的确也存在有“因物而起”,没有太多前观念的语言形式,而且在“理解”、“接受”上还存在出乎作者意料的“延异”现象。如:

图6《舆论暴力与人血馒头》(四开。材料:碎馒头,人工血浆,手势等)

起因:在《药》中,鲁迅早就提到过人血馒头。先生主要是为了表达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的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而现在,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舆论中,都存在一种吃人血馒头的人,他们以别人的生命代价来牟利,而对于这种代价又表现出一种麻木和愚昧。

自评:这个作品在讲评的时候,有部分同学认为我的作品也许在传达食品安全问题,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本以为我的表达太直接和明显,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解读空间了,不想大家还能打破这个框架,有新的想法和解读。这也许就是综合材料试验创作的神奇之处,也是艺术创作的魅力和审美认识的多样所决定的。



图6 《舆论暴力与人血馒头》

综上所述,除却部分同学较好地达到了自身的创作诉求外,可见三类问题:一是语媒的选择及表现手法和形式,基本属于个人自我心理的投射和附会,意义表现上比较牵强,不易获得理解和认同;二是语媒材料在形式表现的意义传承与对接上,与所要表达的意图不甚相符,存在一定距离;三是具有意指的作品,在接受理解上,即便出现某种程度的认同或是“共识重叠”,也会出现一定的延异性甚至很大的偏差,即所谓的“一千个读者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分析起来,这些问题的缘由也至少有三:首先是生活阅历不足;其次是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不足;再就是自觉不自觉的个人兴趣为中心,对“受众”在“作品实现”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功夫下的少。其中,每一问题又都与其他问题互为因果,具有内在关联性。因此,培养“受众”观,强化“他我”意识,建构“心物协同”“人我互化”的问性思维,在教学互动中,特别是当自身作品因某被某种合理的“误读”,从而发现超乎自身意图的新意,以及由此引发的兴奋和好奇,使得同学对这些问题在创作中的意义逐渐开始理解和重视。

2. 基于互主体化的创作主题生成

社会生活中,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完全随意的。同样,艺术创作也总是因这样那样的需要来开展。歌德有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为此,从“创作主题”到“主题创作”,就是在特定的限定性或共同体中,来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的想象力,发挥个体的独特才能和魅力。

作为第二阶段,这里有三重任务:深化上述创作要求和教学目的,为同学自身后来的毕业创作做准

备,为艺管专业历年承担的本届各专业毕业作品“主题展”谋划创作主题,以及相应的主题阐释、展序前言等工作铺垫基础。在具体方法步骤上,在第一阶段的第3~4周,即布置和展开创作主题的思考、研讨和遴选。主题产生的程序是:

(1)每位同学至少提供3个以上备选主题。在多日思考的前提下,同学逐一向全体师生介绍选题产生的理由和依据:选题形成关键词,同学逐一介绍并书写在教室黑板上,直至全部同学介绍完毕;所有内容作为原始选题,要专人记录在案并形成电子文档。

(2)每位同学对黑板上所有备选主题逐一发表意见。“好”“坏”都要说出看法,且每人上台标出3个比较认同的选题并说明理由。

(3)班干即时展开票数统计,以票数多少为序,选题集中在10个左右。

(4)对意见比较集中选题,以“生生”对话论辩为主、“师生”引导互动为辅的方式,全体展开分析讨论。分析其内涵、外延的上下位关系,归纳意涵近似者,选择和汰选内涵重复者,从而凸显意义有别且认同度较高者。

(5)投票确认主题。全体同学对产生的5个以内的选题进行投票。每人一票,只能对选题中的一个投票。这一过程,同样鼓励辩论,陈明观点和理由。最终,将得票最高的选题,确定为课程结课的创作主题。

(6)教师引导。共同主题,重在“对共性价值的独到理解和个性表现”,强调意绪—题材发现、语媒—形式发现,以及形式内容的同一性和目标化的视觉建构。

必须说明的是,这一过程,在包括以毕业创作和展览策划为主的下一阶段,还要深化一次。原因是,以“综合材料艺术创作”课程为阶段性载体的实验艺术教学研究,作为艺管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一是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和任务,二是作为该专业一门课的创作主题,从内涵到覆盖面,未必适合全院各专业毕业展的需要。为此,本阶段的主题主要为学院毕业展和创作提供选题资源,还要在更大的范围增减选题:将毕业创作阶段又一轮筛选的6~8个选题及释义,以列表的方式由毕业策展团队分工,分别向各专业师生、党政工团学各口,甚至社会艺术文创界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建议。所得意见有确切的人员言论记录和汇总统计,认同度最高的2~3个选题,最终由艺管专业策展团队全体同学投票产生毕业作品展的展创主题,进而围绕主题展开策划、创作、备展、展览等系列事宜。

自第5周始,在前述论辩和遴选的基础上,以所

确定的创作主题进行创作。14 艺管同学们的选题大多集中在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上,意涵和概念近 60 个,如:

释放,面具,自由,小丑,加载,医,弹簧,阿尔法狗,盒子,迂回,格式化,开端,日常,笼,希望,云上,翅膀,框,挣扎,减肥,挑战,异想,开端,钱,污染,框,垃圾,信息,守护……

由于给予同学的自主性较高,也或许是在自主就业创业背景下,同学的内心远比看上去焦虑得多,最终投票的结果是“挣扎”,而不是让人期待很大、话语空间很大的“加载”之类的选题。

这一阶段的要求,有几个逻辑紧密、前后周延的要点,即:“媒材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思想内容”等四个方面或环节。

需要首先解释和强调的是,媒材即思想,就是要从心物互动,达到心物互化与同构。但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私己的、移情的对象化,而是在变媒材为媒语过程中,要尽可能地考虑他人会怎样感受,于意指的可识别、可解读性上,使自我他在和“他化”,从而变他者为“他我”。这就特别需要努力发现那些被人们熟视无睹,但却又具有某种共同认知体验之物的语义上的能指性。以“玻璃”为例,除去其日常功能不提,一般可理解为是“单纯的”,或是“透明的”;但也可理解为是“脆弱”、“易碎”的;从而也可看成是“尖锐”、“锋利”而“危险”的等意义很不相同的“物语”。正是发现、发掘“蛰伏”或“遮蔽”于不同媒材中的这种有普遍性、共识性的认知体验,才可能与他人联结成为一个可相互理解的语义共同体。注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艺术不追求科普或宣教性的共同体,其独特的魅力也恰在于它的特殊矛盾:以超乎寻常(常识)、出人意料的陌生化方式,“独到”而“有个性”地,展示出对世界的那些让人又“似曾相识”的独特见解和想象。当然,第二、三环节也极为重要:既是运用视觉语媒形塑内容、转承思想,变思想为艺术语言符号的关键点,更是要将语言形式化为思想内容本身的呈现和直观。

就“挣扎”这一共同的主题创作而言,18 名学生据其自身的关注点不同,以及对媒材特质的个性体验和选择,或具象或抽象地表达了内心,时间,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心象或世态。

就总体情况而言,尽管主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但同学并不能够很快、很好地适应这种有条件限定的主题性创作。这种约束,直观上多少的确是限制了同学的表现,作品效果似乎还不如自由命题来的更好。但客观辩证看,这恰恰反映了同学在深度问

题上的经验、认识 and 能力的不足。因为,既要符合命题,又要有生活阅历和艺术学养的积累,还要有个性的视角来对创作主题进行独特的开掘,同时还要能够充分考虑到题材内在意义的社会共性和普遍性,以及由此取得别人的共识和认同,最终通过作品画面达到多面统一。这里的五个维面,即便对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创造者来说,都是不易的。因此,在他们的年龄阶段,在其人生中第一次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实验性的艺术创作,缺乏深度,无法给人带很强的视觉冲击也是正常的。十余年来,可以说每届同学都存在着这一问题。但是,每届同学又的确通过这个过程,通过师生们对作品的相互点评、比较、启发和对自身问题的进一步的觉识,得以真正进入到严格意义的创作体验上来,并因之促进了他们对作品创造、艺术创新的深度理解,为毕业创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3. 间性思维作用下的作品实现与评价

图 7 是 2014 届学生毕业作品。作品直接以该届毕业展的主题“象外之象”再加上“大象无形”命名。不妨将艺管策展团队撰写的该届毕业主题创作展序节录于下:

大学之道,臻于至善,作为研探新知、创造新知的表现,“象外之象”,既是美院应届生毕业创作实践的个性情态,同时也是艺术人文的精神特征。

“象外之象”的命题,源远流长,滥觞魏晋。谢赫《古画品录》将“象外”引入画论,意味深长。作为当代人生世相的特定主题,“象外之象”,既属感觉、亦含观念,既有气氛、又存意境,及至在绳绳不可名中,既营造出一种间离,也创构出一种期待、一种召唤。然艺术的沃土,无疑是辽阔、广袤、普遍联系的现实生活。尽管形式探索依然重要,但走出“形式主义”的窠臼,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已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基本观念和普遍自觉。作为社会的成员,在互动社会中,我们学生的作品也有与社会更多对话的可能……

应该肯定,以综合材料入手的实验艺术创作,在艺管专业步入“大四”毕业期明显进步和趋向成熟。就其对创作主题的自主开掘和自由发挥而言,很难看到他们仍带着“镣铐”。就该届同学《象外之象·大象无形》而言,其作品在展览中首先吸引了师生和社会观众的眼球。油画、国画、水彩、艺管等不同专业教师集体判分时,不约而同地以其为标杆,给予其高度肯定。结合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其原因主要

有这样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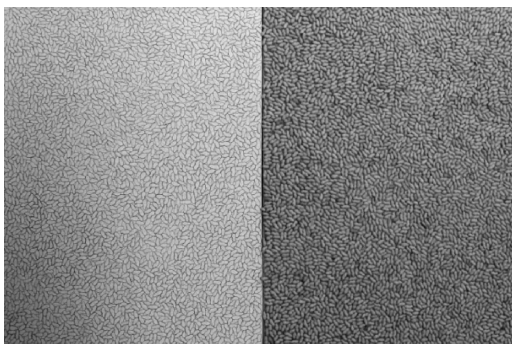


图7 《象外之象·大象无形》167cm×240cm

材料:花生壳、签字笔、铅笔等

一是媒材的语义化、符号化把握精确干练、言简意赅。花生这一媒材,既反映了当今大学生的基本来源,也反映了扩招后毕业生“天子骄子”时代已成为过去,其现实地位和生态就是相互拥挤、相互竞争的芸芸众生。

二是用签字笔描摹的花生轮廓,以及用铅笔在每一轮廓中填写出的学院该届所有专业的同学的姓名,对同学和受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交互性。用本题学术话语说,就是互主体与间性思维特质突出。

三是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要素和要素重复符合逻辑,也接地气。

四是“花生”在民间传统文化中是吉祥、长生喜乐的象征,有“花开富贵好养生”等寓意。但这恰恰与大学生面临的现实压力构成了某种张力,能引发人们的思考,解读空间也较宽阔。宣而不怨,意味丰富;

五是作品富于个性发现和开掘,通过利用普遍而共识的“花生”文化民俗意义,将观众引入自身作品所创构的独创语境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观者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实现了“艺术个性”与“社会共性(普遍性)”的无缝对接;

六是作品表现十分扣题,具备“象外之象”的品质属性,且在引发思考和调动观众自身想象力上,能客观获得受众的心理参与和经验介入,发挥画面背后的“大象”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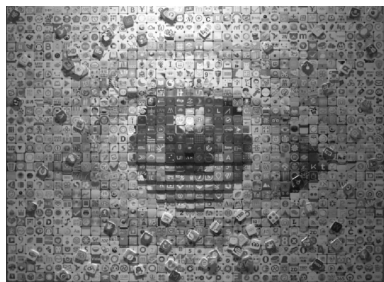


图8 《看着办》,材料:画布,各类APP

应该说,2015届的展览主题“思与境偕”很好。所谓好,是指该主题在主客观两面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对应性,它在艺术反映生活、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上,给予了每一位同学极大的“合法性”和能动性。因而每一位主体的创作和表现,无论直接还是曲折,也都顺理成章地与客观现实形成了一定意义的“镜像”关系。就图8中的一只大大的眼睛而言,它是由大量的各色各类的商家开发的手机软件APP符号构成,反映了现代生活中满眼看到的都是各类营销信息,人们被广告包围着;也隐喻了各种经济的、文化的营销消费使得人们何以成为“手机控”和“低头族”;而且在深层意义上指涉了一个事实: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人们的眼睛正被越来越多的商业乌托邦幻象和无稽的资讯所控制,越来越看不到真正的现实生活。这里有必要节录一下他们的展览前言:

凤凰花又开,一年毕业季。

“思与境偕”即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溶化在一起,情景交融,便构成一种意境。“境”由于“思”的渗入而显出独特光彩;“思”从“境”中透露出来,变得具体可感。“思与境偕”也指明了个人思想与所处时代的一种协同关系,是对“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等一系列创作思维的补充,从而形成了理论观念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我们的每一件毕业作品享有着如此敏感的艺术灵思,而每一个灵魂都或喃喃自语或与观者进行独特的交流。在这里,我们用创新的艺术语言,创造出了源于我们生活的心灵体验,阐释了我们对美的实质的认知和领悟。此刻,我们自信、激动并满是感恩。我们想与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分享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活……

因时代语境的相近性,2016届毕业创作与往届虽有某种相像,但却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表现在他们对自己有着更为自觉、坚定的态度和信念,以及对展览主题“回形针”的选择上。与前述以花生为自我身份定位的作品似乎有着某种重合性:“回形针”同样普通而渺小,功能地位几乎就是“辅助”与“边缘”的代名词;但不同的是,在工作、生活中一旦需要时它却又如此重要;而且这种貌似“铁定”的处境,却并不妨碍他们对未来的信任和对现实的超越。他们的展览前言可以看做就是最好的释义:

有种“铁骨”,既有正直的品质,也有“铮铮”的秉性。当然,如爱因斯坦所见,即便是“光”,在一定的“强引力场”中也会

发生弯曲。也许,回形针般的生命形态,就是一种艺术人生的探索和曲率。但总有一天,你我在回望来路时,定会发现,每一个人在貌似铁定的历程中,虽无不转两三个弯、弯几次腰,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铁定”会有更加宽广、更加精彩的世界!

2017届艺管策划的全院毕业展览主题是“云盘”。对于大数据时代方便却难以触摸、具有风险的比特文化环境,同学多是运用联想和想象展开创作。在思维上有的比较浅显直观,有的则联结记忆、梦觉而比较隐晦。但都这样或那样地表达了对个人、社会、生态的关切和对未来的想象与憧憬。他们在展序中这样表述了“云盘”的主题意涵:

包万象、纳百川,是为“云盘”。作为时代的工具与符号,云盘中的心像,云盘外的世态,既是我们应届生思慕远方、挥洒才华的艺术寄托,更是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的理想表达。

一如人的身心延伸和再解放,“云盘”不仅满足现实需要,而且将过去与未来结成伟大的现实:作为生活共同体,云盘不仅解构象牙塔于平野,释大数据、大天地、大想象于大社会,且游方圆戏陈规于大众化、大时代;云盘也是个人的,酿造你我记忆别史和愿望。在这个超三维、跨时空的寄托里,抑或就是芸芸众生的现实与镜像——“未来主义”一百年前就感到:科技造就新的价值观;而《娱乐至死》针对技术工具主义的告诫,则又令我们对这一象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不断体验和反思。

自我们2006年在福建省首开视觉范畴的艺管专业开始,通过跨媒体、多媒体综合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实验和实验艺术创作,为学生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知行并进地完善业务素质,从而认知、理解和适应国内外当代艺术发展所提出的种种挑战,一直进行着不断的教学探索研究和实践。就“双创”立场观念看,这种培养和激发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实验和实训,作为一种教育教学思想理论和方法,使得本研究负责人指导的学生,还获得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践项目。应该说,在师生实验艺术创作教学的客观化意义上,也是一种从“思维间性”到“作品间性”的“作品实现与评价”。

二、实验艺术的教学原则与方法梳理

(一)实验艺术本质属性分析

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创作体认和研究,在逻辑与事实的内在联系与机理上,对于“实验艺术”的本

质特征与属性有这么几点理知:

1. 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发现”。所谓的“发现”,包括了在不确定性中发现和确定性中发现两大方面。但在具体机理上也有几层含义:①在创作主体方面,包括了对创作意图、创作对象的不明;②在创作客体方面,包括了对创作资料、创作手段,创作接受的不确定;③再就是对主客两者关系的暂时不明;④即便是在有观念、意图预设的实验创作中,表面上创作主体似乎觉得自己的动机、目的和意图比较明确,但由于创作是一种综合互动、互化与互约性的过程,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意外、纠偏、调谐、乃至诸多自我扬弃与否定之否定的情况,因而在事实上,所有预设的、看似明确的创作意图、目标和目的,其实只能是在与客观互动中得以逐步浮现和澄明。

2. 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二,就是“自明”。由于“发现”的过程,必须是在创作者自主、自行、自动,以及不断反复的自检自省、自悟自纠中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其可以称之为是一个“自明”的过程。

3. 显然,实验艺术的第三个本质属性,就是面对“未知”。这点虽然毋须多论,不妨以外延的方式来深化其这样的内涵:实验艺术的根本属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要求每一个体,要对问题、目的和意义自我生成,自主建构,能动开掘,直至价值揭显。

4. 进而实验艺术的第四个本质属性,就是通过“历新”和“创新”而面向“未来”。就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讲,尽管实验艺术在任何类型的资源意义上,都要利用旧有事物,都要面对过去,从而在此意义上,都要借助传统。但根本不同的是,实验艺术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每一创作主体,以其生命存在所给定的不可替代的事实为依据,以其自身当下的、自主的、与其时代无可分离的诉求、刺激为动机,从而对包括自然、社会、文化、科技等既有世界、既有传统做自身创作需要或是“生产资料”意义上的资源性的盘点、检视和利用,而绝不是忽略或无视每一“自我”“我在”这个根本事实和前提,从而复活古人、回到过去、丧失“此在”,成为“传统”的附庸,乃至“影子的影子”。显然,如果不是面向未来和创新,“实验艺术”不成立。

5. 鉴上,实验艺术的第五个本质特征,就是创作者所必须的“自主”性。这点很明白,正像人们对创新、专利等任何发明创造所习惯认同的那样:这一定是“某个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探索的成果。这在逆向推理或逻辑反证上更明确:任何“模仿”与“盗用”,都与发明创造不兼容。换言之,创新实验,其根本条件和前提是自主性;实验创新,则是自主性的

成果和表现。否则,“实验艺术”也不存在。

(二) 实验艺术的教学间性原则与方法论

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决定了实验艺术创作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这里归纳概括以下两大方面或是两个要则:

其一,实验艺术的实验性,决定了在其教学原则、方法上的实验性。其内涵包括:动态性,探索性和开放性,以及具体环节上的随机性,应变性,灵活性和知识的迁移性与跨学科的开拓性。这种动态与灵活性,是其教学方法上的一个不变的原则之一。

其二,缘其于“无中生有”所要求的“历新”、“发现”和“创新/创造”等教学品性特质,决定了其教学上又一基本稳定的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建构和树立学生从个人到群体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这里,教师只是思想语境路向的启发者、检视者和激励者,是经验与知识的助产士,知识与作品成果须由学生自我分娩。

实验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同时决定了实验艺术创作教学在课程设计上的基本内容和一般方法步骤。这里归纳概括以下三个原则要点:

首先,实验艺术的实验性,决定了它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目的上的思想性和思维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以基于某种固定媒材(如笔墨宣纸等)历史生成的技术体系和技法理论为主旨的新的教学系统。尽管理论上比较抽象,但创作思想和思维能力才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指向。传统的教材,工具,媒材,技法等等,总体都是资源和资料。

其次,在教学方法步骤上,鉴于实验艺术的思想认识和创作实践的自主性和发现性,在课程设计上,必须给予学生以充分自主、自由的“行思并进”与“心物同构”的认知体验阶段。这里要强力建构学生的自我主体性,尊重个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体经验和想象力。从学生的应试教育背景看,即便矫枉过正以至“自我为中心”,但也要建立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发现世界的信心和基本意识。而这又是学生在创作上走向“主体交互”与“思维间性”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最后,鉴于实验艺术通过发现、历新而面向“未来”、走向“创新”的本质属性,同时鉴于任何创新和创造,从材料资源到价值关系都不是个人和个别意义的,都必须服务社会、寻求认同、赢得共享,从而,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步骤上,还必须设计安排基于比较共识的价值目标指向上的“限定性”创作实践过程和环节。“主题性创作”不仅是一重要而有效的方法路径,也是实验艺术教学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教学内容,其实质,则更是实验艺术教学的根本目的和

价值取向。因为,无论是主题的生成,还是学生个性化的创作切入,及至作品最后的接受与实现,其间,从“我他互动”,到“心物互化”,直至“人我协同”,充满着主客关系、群己矛盾的处理和心智,而这,正是对创新社会与社会创新的经验的预习,思想方法、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价值意义的目的归结和体现。以至于往大里说,培养每一个体的创新能力,就是建立社会大众的基于创新才智的创业能力——这一客观逻辑所凸显的,应该是“双创”时代所需要的社会化、普遍化的智力资源,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美术教育和实验艺术教学的任务和使命。

(三) 实验艺术的教育哲学意义与要件

就我国高校美术教育发展情况看,无论实验艺术是作为一门学系存在,还是作为美术学科的一门课程存在,似乎还不重要。因为目前它还处在发展期。但其极为重要的是,实验艺术所反映出的盘点既往(包括传统)、开发资源,以面向未来、创新发展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特质,在智识经济和“双创”时代,则是目前我国所有美术院系所亟待发扬光大的价值内涵和品性。在教育哲学水平上,体现了这样的逻辑和架构:

1. 在本体论层面,“面向未知”和“自主——历新——原创”等构成了它的基质;
2. 在认识论层面,“行思并进——探索发现”构成了它的活态特征;
3. 在建构论层面,“开放拓展——创意出新”构成了它的教学间性特质^[7]。

不只这些,与之相因相承的机制机理还有:

1. 在思维方法上,它注重“发散——聚焦——发散”双向反复与递进。
2. 在机制机理上,它具有“人—物——人—人——人—天”跨域整合的原发性和开放性。
3. 在价值取向上,它讲究变“人—物——人—人——人—天”等关系,为“主体·主体·主体”等主体交互与价值共享的关系,而不是前现代所追求的那种“自我/动机——他人/工具——自我/目的”的个人中心主义功利关系^[5]。
4. 在组织教学上,它强调“自组织——被组织”^[8]的非线性结合与结构性的统一^[9]。
5. 在价值形态上,它追求个性创造与表达中的共性揭示和普遍意义。
6. 在创作实现上,它接受他人的参与、互动,乃至由受众的二次创作来完成。
7. 在再生产意义上,它乐于从有关误读和评价中发现新的机缘或增长点。

三、结论

就美术教育现实的主要矛盾而言,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都与认知局限所造成的思维与智识局限相关。所谓“间性思维”,实际上就是超越既有范式与窠臼,从跨域、跨界、跨学科的高度,获得一种学科互涉、学科间性的普遍联系视野,以及更加能动、更加全面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众创时代,个人与他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协作,无论在产业链意义上,还是在自然、社会生态意义上,都离不开主体交互、主体间性。所谓祛除“单边”,抑或是倡导“双赢”“多赢”,都不过是不同语境、不同用词的同义表达。进而言之,在复杂互动的历史演进中,创新出新,则必须通过社会互动、跨域合作来实现。任何现实意义的发明创造,已不再可能仅靠单一学科闭门造车来完成。在人文艺术领域,盖凡卓有贡献的创造,多是那些在思想观念、语言形式等方面打破窠臼,跨媒介、跨体裁、跨领域的兼收并包之作——或让视觉艺术获得了听觉,或令空间艺术获得了时间性——这些无非都是对创新出新具有启发肇始意义的“间性思维”的外化形式和结果。老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在此意义上,“间性思维”,无疑是众创时代所普遍需要的一种能够不断建构“动态共同体”的思想能力和精神能量;而实验艺术教学,

则在当下美术教育体制中,比较集中、比较典型地凸显了这种精神能力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参考文献:

- [1] 国纪平. 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15-05-18.
- [2] 王晓东. 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3] 杨春时. 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与美学建构[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 [4] 梁冬华. 国内美学、文艺学主体间性研究述评[J]. 湖北大学学报,2010(1).
- [5] 程原. 艺术中介间性观:当代艺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学新探[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 [6] 张其学. 二分思维到间性思维:构建平衡的文化生态[J]. 岭南学刊,2010(5).
- [7] 尹艳秋,叶绪红. 主体间性教育对个人主体性教育的超越[J]. 教育研究,2003(2).
- [8] 逸夫(程原笔名). 网络传达设计教育模型探构[J]. 装饰,2002(10).
- [9] 程原. 人的解放:现代教育的艺术建构[J]. 现代大学教育,2003(4).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Experimental Art Creation in the View of Inter - thinking

CHENG Yuan^a, LI Rongtao^a, ZHANG Chaoyang^a, ZHANG Xiujuan^a,
CHEN Ting^a, JING Xuezhub^b, LIN Qibei^b

(a. Art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b.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As far a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the reality of art education is concerned, all the problems are in a certain sense related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inking and intellect caused by cognitive limitations. The so-called “inter - thinking”, is actually beyond the existing paradigm and pattern, from the level of cross - domain, cross - border, cross - disciplinary, to obtain a universally related view that cross - disciplinary and inter - disciplinary, and to develop more activ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values and ways of thinking. In the era of group innov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s or inter - subjectivity is indispensabl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other ones or groups both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in natural and social ecology. In this sense, “inter - thinking” is undoubtedly becoming a kind of thinking ability, and spiritual energy generally needed by times that can build up continuously the “dynamic community”; and in th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the teaching of experimental art highlights more typically and concentratedly the significance and inspiration of such mental ability.

Key words: inter - thinking; experimental art creation; teaching practice; group innovation

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理工科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为例

胡书庆

(郑州大学 文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大学语文课需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告别中学式的机械教学模式;二是以一个特定的文本或话题为出发点,向外做大量延伸,呈现出一种尽量深广的知识背景和意识背景;三是不要仅仅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应注重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的启发。另外,这门课程更适于在大学初始阶段开设。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模式;大人文语境;“游牧式话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24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117-04

理工科大学生也需要一定的人文学习,近百年前,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主要创立者蔡元培就已经很精辟地指出这一点:“就学生方面来说,如果进入一所各科只开设与其它学科完全分开的、只有本科专业课程的大学,那对他的教育将是不利的。因为这样一来,理工科学生势必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使他们失去在这方面的造诣机会。结果他的教育将受到机械论的支配……这将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机械发展的社会。”^[1]实际上,为理工科学生开设大学语文等人文课程也早已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怎样才能找到一套大学语文教学上更为科学有效的方法、使学生真正地接受甚至爱上这门课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大学语文课要与中学式语文教学“划清界限”

经历是最好的老师。在探讨具体问题前,先回忆一下本人讲授大学语文课那几年的经历。刚接手大学语文课时,我们几个同时去代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没教过大学语文课,经过商量,决定先依据某本教材,并大致按着中学的语文教学模式走。于是,对一篇新的课文,从对其所涉及的文学常识的介绍,到阅读、讲解课文,再到对课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分析,

基本就是按照这样的路数进行的。头一两次课,大部分学生还算配合。但不到一个月,上课看其他书者有之,旷课者有之,早退者有之,自始至终认真听课者不多。如果是上午后两节的课,有不少学生到教室只是签个到,然后扭头走人。同去的别的老师情况也差不多一样。有位老师反映,前两次课按部就班地讲解《诗经》《老子》《孔子》等课本内容时,还有一批学生能跟着听,待到讲解《离骚》选章时,学生已经一大半都不到场或中途退场了。大家都颇感无奈。我们又不可能以什么行政条款去约束学生,甚或拿考试成绩什么的相威胁,强制他们来上课。那样不但无趣,而且与人文情怀本身是相抵牾的。而且,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大学人文学科的老师,无权要求学生来听自己的课,不管自己多么希望学生来听自己的课:依靠课堂本身的魅力抓住学生是达成课堂愿景的不二法门。

几次课之后,我决定来一场教学方式的改革。那场小小的改革主要是沿以下几个层面开展的:一是反对本本主义,抛开既定的教材,自己选取想讲的文本,并适当向自己阅读储备的强项靠拢;二是彻底放弃中学式的语文教学模式,大量纳入演讲性元素,天马行空,纵横辟阖;三是反对形式主义,讲述内容

收稿日期:2018-04-17

作者简介:胡书庆(1968—),男,河南开封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西方诗学、哲学。

要以真正凸显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为鹄的,力争使学生在听讲后有切实而内在的收获。渐渐地,学生的到座率及听课的投入程度都较前有了不小的改观。学生与老师的亲和度也增强了,有一些同学还曾就很多话题推心置腹地与老师进行交谈。

大学语文课要抛弃中学式语文教学模式。我们知道,中学语文教学目的主要是应试,从老师到学生,对这一理念都丝毫不怀疑,并且都身体力行。不用说,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合法性。但是,大学语文学习的目的根本上不应该在于应试,而是为了焕发学生的心灵能力,为了提高他们对爱和美的感知力及对世界和自身生命存在的整体理解的能力,为了培养他们健康、阳光的生命感觉,协助他们调动支撑和引领他们前行的内心力量;与此同时,拓宽他们的思路,活跃他们的思维,并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述能力。关键在于,再让大学生们以一种中学时代的心态去学习一种人文课程,注定会令他们厌倦。中学时代的学习模式,只适合在中学时代运用,搬到大学时代必定会失去其原有的效力。这是人不断生长的“自由理性”(黑格尔语)使然。原来,他们尚处于未真正受启蒙的、“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2];而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已经“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智”了。所以,大学语文的教学必须告别中学式的语文教学模式,生成它自己的基本模态。

在所有与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有关的环节上,教材的事情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环节之一了。这个说法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但事实就是这样。本人在正式开讲大学语文这门课前,翻看了好几种市面上发行的大学语文教材。这些教材在大的内容架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或思想文本,但在具体选取的篇章内容上却是千差万别,不像中学语文教材那样由教育部统一规定。所以只要授课者自己的头脑里有文本,或者说自己能找来并确定每一节课所围绕的文本,具体的教材实际上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进一步说,即便是没有锚定什么教材,只要围绕自己所选取的文本讲得吸引人就好。

二、注重话语氛围的营造,讲课的知识背景和意识背景要开阔,最好置于一种大人文的语境下

大学语文课程不但在选取文本时不要受某一教材所列篇目所限,而且在具体讲述时,也不要单纯被一篇文字所限,要能以一个特定的文本或话题为出发点,然后向外做大量延伸,呈现出一种放射性的、尽量深广的知识背景和意识背景。再者,所选的文

本或话题不能太专业了——这类课程的讲堂不是与学生探讨专业领域的知识的,应该能够以泛文化的解读去言说它,或者说能把围绕它的言说置于一种大人文语境中展开。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单一的专业语境,使得学生无法介入,他们就会感到疲倦。给理工科学生上大学语文这样的课程,首先应该做到寓教于乐,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休闲感,既让他们受到了训谕,又能让他们体验到身心的愉悦。他们本来在专业课的学习中就已经非常辛苦了,如果这门课又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疲劳感,那他们会失去对这样一门不存在考试压力的课程的兴趣的。至于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的成败,学生们的感受拥有最终的裁判权。他们是来接受陶冶、寻找身心愉悦的,不是来寻找烦闷、乏味、疲劳的感觉的。无视学生的聆听期待者,必将遭逢被学生冷落的命运。

比如,探讨典型爱情文学文本时,可以在相邻的两次课上分别选取一个中西方文学史上的代表性文本,并把话题适当延伸向中西方爱情主题文学、哲学精神的差异,把东方式的委婉含蓄及现实精神与西方式的直白及“柏拉图式的爱”加以比较。考虑到学生可能对“柏拉图式的爱”的真正内涵还不太理解,可以先把“柏拉图式的爱”的原始语境(柏拉图《会饮篇》)大概介绍一下,然后举例说明其在后来的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具体表现。同样,在探讨典型的自然主题文学文本时,也采取这样的文本策略,并把话题适当延伸向中西方自然主题文学、哲学精神的差异。这样做,会使学生的视野成倍扩展,并使同学们对人类的精神文化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话语方式形容为一种“游牧式话语”。我们不能为之设置一个固定的话语园地,也不能溜进一种特殊专业的“知识游乐区”迟迟不肯出来。如果把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比作人类心智活动的不同“话语垦殖区”的话,当我们的课堂话语路过这些“垦殖区”时,可以捡拾几枚成熟的果子,但不能就此落户成为那里的垦殖者。

这样延伸地去讲,还必须注意自己的话语方式,切忌术语连片、专业性过强。话语方式上要力求感性,浅白易懂,尽量不使用专业性强的术语。当不得不使用到专业术语时要做一些停留,把这些术语的意思简单交待一下。在讲解一些思想性、理论性的知识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精神体验去做些微观的抚触:要为学生打开一些体验性介入的渠道,里面要有生活含量。要使自己的话语方式尽力“莎士比亚化”,而力避“席勒式”。所谓尽力“莎

士比亚化”而力避“席勒式”，就是要注重课堂细节的真实，要编织“剧情”，要通过“剧情”本身去托出观念性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变成某种观念性的东西的“单纯的传声筒”。^[3]在“剧情”的编织中，还要注意加进一些风趣、幽默、诙谐的话语风格元素，绝不能把课堂搞得像开会现场。这样做能使课堂活起来，不再呆板枯燥，使学生时刻被你的话语场牵引着，无暇他顾，由对这门课内容的被动接受发展为主动迎接。他们不但上课聚精会神地听你言说，而且有时还在课间或课后与你展开多种方式的对话和交流。再者，这还能带动学生们在课外适时作一些延展性阅读的兴趣。

三、不要仅仅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应注重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的启发，注重精神旨趣的陶冶

大学语文课堂，不要仅仅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应注重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的启发，注重精神旨趣的陶冶。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掌握所有门类的知识。专攻一种术业，一为把它做精，一为更好地获得谋生的本领。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4]对于生存及温饱而言，发展是后来的事。而人文学习，如果不指望将来靠它吃饭，那它就属于发展的范畴。既然属于发展的范畴，就应当对于前两者予以足够的尊重。在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社会，尤其应该明白这一点。从这个角度上说，面向理工科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目的就不能是为了增添知识，而只能致力于对他们进行思想、精神或心灵意义上的启发，宽广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将养，以及精神旨趣方面的陶冶。

自我认知的根基是人活生生的经验，但间接经验的功用亦必不可少。间接经验的最重要来源是他者所提供的，是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思想和精神积淀所传承的。真正引发人进一步思考的是思想本身，而思考的目的当然不在思考本身，而在于完善生命。人文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更为本质地认识自己，进而去改进自己的生命实践，并作用于共同体以利于天下的完善和人类的文明，一如《易经》所言：“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5]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教育，包括大学语文教学实践，关乎人心和人的生活整体，最终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储存，而在于精神的发扬光大。古人有言：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文教育就是要发挥唤醒这种精神的功能。

衡量大学人文教育功败垂成的杠杆，不是看学生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多少新的知识，而是要看他们的视野、胸襟、情怀比原来开阔了多少、丰富了多少；要看通过人文学习，他们的心灵是不是变得更加博大、深情、美丽了；要看他们对世界及自身的认识和感知是否有了更为深广的知识背景和意识背景；是否对生命存在本身有了更为深远的理解。知识浩如烟海，因而是无法穷尽的，但思想、精神和心灵中的某些基质却可能是永恒的。知识装得再多，只要精神层次没上来，人文学习就是无意义的，人文教育也就是无效的。复旦投毒案的案犯林森浩，出于一些非常狭隘渺小的原因就毒杀了研究生舍友。云南大学的马家爵因与同学不合就挥刀杀害了四名舍友……这些发生在大学校园的犯罪事实说明了什么？有些走上社会的大学生成了社会上的害群之马，行各种不当行为、做各种违法犯罪之事，这又折射了什么？如果大学里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教育，如果人文教育深深作用于学生的心灵深处，是否可以帮助挽回这些悲剧也未可知。如果他们深入接触、领会一些古往今来的人文经典对生命的理解，心胸可能就不至于如此狭隘，内心世界可能就不至于如此丑陋。还有更多的大学生，虽然不会做违法犯罪之事，但生命境界逼仄，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也辜负了这本来富于灵性内涵的生命。精神和心灵意义上的自我提升对他们来说也都很切要。

在上述意义上，个人认为：大学语文这门课，一定要以真挚、生动的话语氛围作为它的灵魂，作为直击学生灵魂的法宝。它甚至不需要板书，不需要课件，不需要学生机械地记录或记忆。确立起一种话语本位主义的课堂。要想知道人文课堂的质量如何，就看学生的眼神。如果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个课堂就是成功的；如果每一双眼睛都像死鱼一样黯然无光，这个课堂就是不成功的。这不是老师有问题就是所讲内容有问题，而且通常会老师有问题。要讲到学生的眼睛能够亮起来，靠的是老师的热情、自己生命里本真的感动、使知识的传达伴随着生成形象和生成意义的力量的能力，等等。

四、大学语文课更适合在大学初始阶段开设

结合个人大学语文教学经历，认为为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可能更适于在大一大二时开，那会比放在大三或以后开效果更好。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出于两重原因上的考虑。

首先，大学初始阶段是提升学生的胸怀、视野、心智、知识背景和意识背景的黄金时期。对大学生生活充满向往的学子们甫入大学校门，对每一门大学

里开设的课程都会有一种由衷的重视,加之他们急需在各个知识领域和生命感知维度为自己充电,富于魅力的大学语文及其他人文教育课程会一下子抓住他们年轻的心。专业课之外,他们同样会在思想的海洋里遨游,会不由自主地在美丽的语言、意境、思想面前驻足、观看、悉心领会。这个阶段,除了能对人文课程产生兴趣的心情因素外,还有专业学习压力相对较小、拓展学习时间相对充裕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如果到了大三及以后阶段,就会大打折扣。在这之前,同学们已经与外部世界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很多现象都已耳濡目染,甚至“三观”都已有所定型。这时候再让他们从事较为纯粹的人文学习,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淡漠的态度。教学中能觉察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根本没把大学语文这门课当回事。老师上课再投入,哪怕声情并茂,声嘶力竭,他们也会要么不到场,要么在课堂上继续看专业课的书籍。个人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这门课安排的时间不太科学。

其次,把语言表达能力提高阶段放在前两年显然也更合适。不管学什么专业,语言表达能力都是一个基本功。这个能力不达标,会给自己的事业发展徒增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试想,一个学子,将来想成就大事业,想提交高水平的学术报告,想书写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没有这个基本功怎么能行呢!?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人物,如达·芬奇、帕斯卡尔、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等等,都在这方面树立过典范。

在中学阶段,由于人文阅读量及练笔时间都非常有限,所以这方面的能力尚处在一个较低层位,不用说这也是延续到大学初始阶段的一种现象。大学

初始阶段就开始各种思维路径的探触和文字表达能力的锤炼,不但会使学生的人生眼界更早打开,意识背景快速宏阔起来,还能使其文字表达能力尽早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有不少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一让写个什么东西总是挠头,写出来后内容贫乏,语言也不流畅,甚至篇章结构也不够合理,等等。这就是缺乏人文学习方面的训练导致的。而待到想要补上这一课的时候,时间、精力却可能又有点跟不上了,甚至连兴趣也早已黯淡了下来。大三以后,基于要为自己的未来事业储备足够的专业技能力量的考虑,学生们对副课的学习会无暇顾及。对于那些“考研党”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围绕着自己的中心任务开展每一天的劳作应该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合理性的,而这个阶段专业课、英语等都已经有点让他们吃不消了,还想让大学语文这样的课引发他们的兴趣,大概只能事与愿违了。

参考文献:

- [1] 刘东. 近代名人文库精粹·蔡元培[C].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315.
- [2]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0.
- [3] 马克思. 致裴迪南·拉萨尔[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鲁迅. 忽然想到[M]//鲁迅自编文集·华盖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0.
- [5] 陈鼓应. 周易今注今译·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15:20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Focusing on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for the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 Shu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For the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e should improve ourselv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saying goodbye to high school teaching model; secondly, extending widely based on a particular text topic so as to present profound knowledge and consciousness back; thirdly, do not only focusing on knowledge imbuing but focusing on ideas, spirit, or soul inspiration. An extra opinion: this course is more suited to offer in initial university stage.

Key words: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model; big humane; “nomadic discourse”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下新建本科院校 实践教学团队建设研究

陈光光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文法系, 郑州 450044)

摘要:专科学校升本之后,在办学层次和定位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模式也应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新建本科院校必须按照教育部标准,准确定位和重新制定与本科教育相适应的人才培养计划,改革原有的专科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调整深化教学内容,特别是深刻理解领会应用型本科的基本内涵,认清实践性教学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突出实践性教学在整个应用型本科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原有师资和教学团队的基础上,整合优化资源,以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为目标,组建符合应用型本科基本定位的新型的实践性教学团队。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团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2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121-04

在“新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如何实现“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如何加强实践性教学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重要地位,探讨如何组建新型实践教学团队,无论是对新建本科院校升本后的建设,还是迎接即将到来的首次本科教育质量考核验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际教育研究机构以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标准将高等院校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综合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型人才;二类是专业应用型大学,主要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三类是职业技能型院校,主要培养第一线从事具体工作的技术人才。^[1]同样,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是分层次的,包括高职教育、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也不相同。高职教育主要是围绕专业办学,培养能够熟练操作的技术型人才;本科教育主要是围绕学科办学,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能够实际操作的技术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围绕专业研究办学,培养具有专业

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研究型人才。所以,无论高职教育还是本科教育,本质上仍是应用型教育,本科教育仍然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实践教学在应用型人才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实现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让学生能将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技能,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应重视实践教学,充分保证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模式,更新丰富实践教学内容,组建优秀的实践教学团队。

实践教学对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就要求我们,弄清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的特点,并在原有的专科职业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特别是如何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开展符合本科教育特点的实践教学,已经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应用型本科建设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一)应用型本科中实践教学的地位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对

收稿日期:2017-09-06

基金项目:河南牧业经济学院2016年度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经济法课程本科教学团队建设”(84000027)

作者简介:陈光光(1980—),男,河南光山人,法学硕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文法系讲师,主要从事刑事法律研究。

“应用型本科”的理解与思考,应用型本科不同于研究型大学,其主要是为社会培养适合需要人才,作为大众教育的产物,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不是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优秀的创造能力的高端研究型人才,而应当是在某一专业领域受过良好教育具备优秀的实际操作能力和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所以,教学在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地位不仅不应该受到削弱,而且应该大力加强,特别是实践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成败的关键。

成熟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经验告诉我们,“应用型”在教学上的体现主要表现为“知识的应用”及“技能化”教学,特别是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需要靠实践教学来完成。总之,实践教学在应用型本科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实践教学是否成功,是否办出特色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成功的关键和检验标准。

(二)实践教学团队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

德鲁克认为,团队是一些才能互补并为负有共同责任的统一目标和标准而奉献的少数人员的集合。^[2]实践教学团队是指以“团队”理念为指导,由一定数量的具有教学技能和专业操作技能,愿意投身实践教学,为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而相互协作的教师所组成的教师群体。我国高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也开始尝试组建各种教学和科研团队,以此提高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和效率。实践证明,高校教学团队的组建能够有效克服以往教师在教研活动中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状况,优秀的教学团队不仅能够充分发挥教师个人的专长,而且有利于整合团队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可以说,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是高校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关键。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促成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培养学生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实践教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和实践教学团队紧密相关,实践教学团队负责设计完善和组织实现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团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三)实践教学团队建设的重要意义

1. 有利于提高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在全国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大环境下,多数教师主要精力投在了科研上,对于教学特别是实践教学的热情普遍不高,客观上导致了实践教学整体水平不高。即便有些教师愿意在实践教学环节投

入精力改革创新,但是,由于缺乏团队支持,单靠个人力量“单打独斗”,往往不易坚持,也很难取得具有较大影响的成绩,对提升整体实践教学水平可谓“杯水车薪”。通过组建实践教学团队,由学校或学院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由具有较高水平和能力的“教学名师”和“中青年骨干教师”担任团队带头人和骨干,吸引其他年轻教师加入,通过“老带新、强强合作”可以增加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横向互动,形成强大的合力,充分发挥团队在实践教学发展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可以有效地带动和提高学校或学院整体实践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育出真正符合“应用型”要求的本科人才。

2. 有利于克服教师个体局限性,发挥团队合作力量

21 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愈来愈细,高校学科门类也越来越多。传统高等教育中以教师个体为单位、单兵作战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实践课程的开发、教材的编写、实践教学计划的制订与组织实施,往往不是某个教师能够单独完成的,即便该教师能够独立完成,但受到个人能力的各方面限制,质量也不高。所以,为培养合格“应用型”人才,本科教育应当组建实践教学团队,由知识和技能互补的教师,通过发挥个人特长和团队成员优势互补,从整体上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3. 有利于带动提高新进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优秀实训师资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引进教师时,只注重教师的职称与学历,对新进教师的实践能力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求,导致很多高校新进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实践能力不强。这种情况客观上也导致了本科院校实践教学不足,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本身在实践操作方面能力都存在问题,更遑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操作能力。从实际情况看,教师实践能力的短板仅凭教师个人的努力和学校的鼓励还远远不够,组建实践教学团队能够以团队建设为平台,实现团队成员教师的交流互动,通过参与实践教学团队的各项具体工作,由团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对新进教师进行传帮带,可以有效促进新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激发其投身实践课程建设的热情,不断提高自身实践业务操作能力,如果能够形成机制长期坚持,必将带动提高新进教师实践教学能力,防止出现师资力量新老断层,为学校长远发展培养储备优秀的实训师资。

三、实践教学团队的组建

实践教学团队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建设两个方面。所谓“硬件”建设,是指教学团队成员数量、学历结构、能力与专长、双能教师比例、专兼职比例与结构等;所谓“软件”建设,主要是团队共同愿景、团队沟通与互动、团队精神与文化、团队环境与组织保障、团队自发行为与创造力等。

笔者认为,实践教学团队的组建是否科学合理,是今后实现团队目标的重要保障。优秀的实践教学团队的组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适中的团队规模

团队的组建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团队成员的个体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团队的规模必须与目标的实现相匹配。团队规模过小时,完成任务所需人才的储备量可能不足,每个成员工作量太大,不利于合理分配工作任务,效率不仅不能提高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下降;团队规模过大时,由于成员太多,管理与协调不易,不容易发挥出个体优势,会影响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难以形成相互信任感和团队凝聚力。所以,优秀的实践教学团队的规模必须适中。有研究表明,高绩效的教学团队规模一般都比较小,成员控制在12人以内为宜。^[3]

(二)合理的团队结构

团队的力量来自于成员间的协作与配合,成员之间在知识、技能、年龄、经验、个性方面的互补性是实现团队工作绩效的关键。因此,实践教学团队必须具备合理的团队结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合理的年龄结构

实践教学工作以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目标,任务光荣且艰巨,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还必须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所以,年龄在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应当占到团队人数的70%—80%;45岁以上的老教师具有长期的教学工作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且在专业造诣上水平较高,不仅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高超的技术技能,还具有广泛的社会人脉资源,在团队中往往起到表率 and 带头作用,能够起到关键性的协调作用,也应该在团队人数中占有20%—30%的比例。年龄上的梯队更有利于发挥团队的整体实力。

2. 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结构

研究表明,异质结构的教学团队更能适应复杂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实践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技术技能和实操经验两个主要的方面。因此,实践教学

团队的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好是“双师双能型”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律师、拍卖师、调酒师、茶艺师等,既具有教学技能还具有实操技能。但是,由于教师个人学历和经历的差异,其专业知识领域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对团队中教师的角色进行合理分工,选择具有相应知识和技能的教师承担特定的实训教学工作,教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成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结构,更好地发挥实训团队整体力量。

3. 合理的职称结构

职称通常代表着教师在专业领域方面的水平。一般而言,高一级职称教师的专业水准要高于低一级职称的教师,高水平实践教学团队的构建必须具有合理的职称结构,团队中起带头作用的教师应当具有高级职称,可以为团队引领方向,协调团队成员工作,起表率作用。团队中骨干力量教师承担团队主要的工作任务,需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才能基本保证实践教学团队的良好运行。

4. 合理的“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

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应当具有复合性。所谓复合性是指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中,“双能型教师”要占到一定比例。所谓“双能型教师”是针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而言,是指那些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既能从事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教学,又能从事产学研合作开发的教师。“双能型教师”不仅能够承担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行业设置专业的教学,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开展社会服务,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而且还能够充分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中去,充分发挥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地方、服务地方的作用。所以,“双师双能型教师”在实践教学团队中应当成为绝对多数,每一位团队成员都应力争成为“双师双能型”教师。

(三)合理的分工与适度的责任

团队力量的发挥和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特长并形成合力,因此,合理的分工与适度的责任是优秀实践教学团队的必备要素。团队应当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并充分考虑每一位教师的专长和特点,根据最优原则将其配置在最能发挥其优势的岗位上,准确定位科学分工,既要考虑教师专业领域和技能专长,还要考虑其个性特征,只有知人善任合理分工,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实践教学团队的作用与力量。当然,除合理分工外,每位成员还应具有高度责任感,团队应当通过制定团队规章制度,规定每位成员的基本责任,对不能胜任或者完不成工作任务的教师,应当规定一定的责任,可以采

取适当的惩罚措施,严重拖累团队目标实现的应当清除出团队,建立人才进能出、权责统一的高效实践教学团队。

总之,实践教学团队建设应当与团队目标相吻合,紧紧围绕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与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来设定,既要加强团队基础硬件设施建设,更要注重团队文化和制度等软件建设。实践教学团队的组建是为了提高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所以,学校或学院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and 条件保障,学院可以制定实践教学团队的评价标准和奖励措施,但不应过度干预团队内部运行,给实践教学团队充分发展的空间。

四、结语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当面向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培养符合社会岗位需求的应用型本科人才。为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当大力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与

水平。实践教学团队建设也应当紧紧围绕提升本专业实践教学水平和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开展,合理设置建设目标,科学配置资源,最终实现团队教师个人发展与团队共同目标完成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 [1]潘懋元,吴玫.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1):5-7.
- [2][美]彼得·德鲁克.未来的管理:25位卓越管理大师关于管理的新思维与新技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47-160.
- [3]吕改玲.我国高校教学团队建设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08:2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Team under the Training Target of Applied Talents in New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CHEN Guanggua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upgrading of junior college, there have been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training level and orientation, and the training target and teaching mode should subsequently change profoundly. Newly undergraduate colleges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curately positioning and reformulating the new talent training plan adapted to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ing the teaching idea, teaching mode, adjustment and deepening contents, especially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and clearly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actical teaching,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aching and teaching team, 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the old resources, to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as the goal, and setting up the new practical teaching tea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ims of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Key words: newly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pplied talents; practical teaching; team

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构建探索

宋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体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体育教育理应兼顾到对人性的关怀,表达出人性的善意和宽容。目前,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但体育教育中缺乏对“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解,存在体育教育功利化、教育内容竞技化、考核评价方法单一化的弊端。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教学之中,不仅有利于青少年自身发展,促进青少年对公民价值、义务的认知,推动社会志愿服务行动,而且对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体育教育;人文精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3.026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3-0125-04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关于人文概念的表述,如《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书经》中“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目前,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但体育精神教育有所缺失。首先是没有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人文精神缺乏理解;其次是片面追求运动成绩,受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影响,缺乏对大众体育教育意义引导。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源远流长,体育作为文化的一种,理应兼顾到对人性的关怀,表达出人性的善意和宽容。在21世纪,我国已成功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在此基础上,引导广大群众了解、认识体育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对2022年我国举办冬季奥运会显得尤为重要。

一、体育教育与人文精神

(一)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认识是体育的目的,但是当代体育文化强调人们在体育赛场上不断自我超越,忽视人在体育中的主体地位及人的价值。体育逐渐被作为实现经济、政治等目的的手段而偏离了通过体育进行人文教育的主旨。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元素,人们追求不断超越自我,突破极限。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中所形成我国体育文化,其主体尚不鲜明,

也未形成稳定的人文精神层面,这就使得我国的体育文化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抵御社会不良文化渗透和侵袭的能力较弱^[1]。在我国社会转型过渡的大背景下,社会变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生活的秩序紊乱和发展不平衡,致使社会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人文精神一直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是打破阶层、共同造福社会的一种“调和剂”。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异客观存在,是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的时期。人文精神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和了解,缓解由于社会群体分化所带来的矛盾。同时,在补救和预防社会问题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人文精神的培养对人格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将爱心和责任心教育融入体育教育之中,利用体育课堂加强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培养责任意识、群众意识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应引起社会各阶层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对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有全面的认识,认清体育教育、职业道德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切实提高体育教育质量。

(二)青少年人文精神教育的必要性

作为一项崇高的社会事业,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可以通过教育把利他主义、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结合于大中小学以及市民的育人教

收稿日期:2018-04-10

作者简介:宋亮(1980—),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体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育中,以体育这一行之有效的的手段,在全社会进行体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弘扬。体育中的人文精神教育,既是内化体育运动中所提倡的理性和基本伦理原则,又是传递爱心,培养高尚情操,热爱社会,为社会无私奉献的过程。因此,体育教育内涵的人文精神是传播体育运动精神的载体,更是传播文明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体育运动中的公平、公正、公开向来被大众视为社会道德标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运动员,就是要与人为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非与人为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在体育运动中,不仅要遵从游戏规则,还要恪守道德,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体会失败给与的经验。体育运动不仅丰富了个人精神生活,也促进了个体心理建设。也就是说,参与体育运动,不仅仅是能够锻炼人的身体,并且是能促使人的身心全面发展。

通过体育运动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培养是行之有效的。通过体育教育不仅可以为青少年提供社会生活所需的行为方式与规范,而且可以使青少年领会到互相尊重、乐于奉献的社会态度,发展对道德问题的判断能力以及自主性习得,同时促进他们个性的形成与发展,还可以在内化奉献、规范和道德的过程中,使青少年深刻认识到志愿精神对人类和社会的意义。

二、当前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缺失的主要表现

(一)体育教育中缺乏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解

人文精神强调公平。要在实践中真正把握人文精神的实质并非易事。缺乏理性,是体育运动中人文精神不完善的一大表现^[2]。比如说,一些运动员、教练员为了争取成绩,在比赛中服用禁药、贿赂裁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体育运动拼搏进取的精神当中,本源应是对人性的关怀。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如果体育运动中没有知识、情义和道德,那么人与人的体育竞赛跟动物争食就没有本质区别。奥林匹克宪章中,强调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关于“生活哲学”“和平友好”“人的和谐发展”等。从当前的体育教育过程看,多是奥林匹克历史,运动员奇人异事等故事性题材,而关于人文精神的教育少之又少。这些教育对人们从感性的角度认识和了解体育运动有很大的帮助,但如何通过体育教育获得公平竞争、遵守规则、运动风范、团队协作精神等内化提高,从而在中国社会发挥真正的作用则是更为复杂而艰深的课题。现存体育教育无论从质量和形式都值得思考^[3]。

(二)当前体育娱乐化,体育教育缺失引导功能
当今体育娱乐化的影响日益显著。体育报道低俗化,体育明星娱乐化,严重影响了体育的正面教育、引导作用。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受到不良风气的熏陶,对未来人格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体育运动对青少年教育、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体育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被玷污、扭曲、缺失,将会极大影响教育效果。从此方面来说,体育运动要严守社会道德准则,体现人文价值。

(三)体育教育功利化,教育内容竞技化、考核评价方法单一化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体育教学中教学内容、考核方法存在以物质追求为导向的现象;同时,学生在学的过程中过度关注考核结果,使学校体育教学也变得物质化。带有功利化色彩的体育教与学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突出表现。

首先,从体育教育内容上看,教学内容竞技化。学校体育教学所开展的项目主要包括足球、篮球、排球、长跑等竞技类体育运动,但内涵丰富的民族、民间体育运动项目开展较少,这与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其次,考核评价方法偏向注重技术的掌握。教学内容的竞技化使得教学任务重点在于让学生掌握不同体育项目的技术。这意味着体育教学一定程度上演变成机械动作的重复操练,致使学生缺乏创新性、情感、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凸显出体育育人的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掘和应用。考核评价方法的单一化,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妨碍了学生的多元化发展。

三、构建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意义与价值

(一)有利于青少年个体全面发展

萨马兰奇曾经这样形容过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体育运动通过教育让人们克服困难去斗争,通过教育使人们懂得自我控制和秩序的重要性,通过教育要求人们具有集体责任感,通过教育促进人们客观、现实地与他人比较,总之离开了教育,奥林匹克主义就不能达到其崇高的目的。”

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构建,可以丰富青少年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有助于青少年认识社会、完成社会化进程、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实现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体育运动让青少年在参与中成长,在运动中收获,不仅有利于帮助青少年培养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观念意识,也有利于实现青少年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

(二)有利于青少年对公民价值、义务的认知

人文精神关爱、扶助弱势群体,体现社会成员间

的互相关爱,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对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体育运动参与者通过体育教育培养的热情、友好的态度,可以有效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和谐宽容;还可以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生存与发展的权益,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另外,通过体育教育构建人文精神,有助于促进人与社会的沟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教育之中,培育和提升青少年奉献社会的精神境界,有利于完善道德教化的强有力的力量,正确认知公民的价值与义务。

(三)有助于推动志愿服务行动,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人文精神有利于将志愿行动落到实处。志愿服务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随着公共事业组织的独立而发展起来的。志愿服务不仅是思想、理念的问题,更是行动的问题。当前我国的体育志愿服务活动主要是由政府或党团组织在整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志愿服务产生“行政化”。另外,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匮乏,缺乏更加丰富的参与形式以促进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教育当中,使之成为生活自觉,才能有效的促进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精神文明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通过体育构建人文精神,本身就是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将人文精神寓于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使精神文明建设内容更加具体,通过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构建,缓解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向心力、凝聚力,能够有效地承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构建体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建议

(一)将人文精神融入体育教学内容之中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已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传统的人文精神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而有所发展,体现了我们对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发展兴趣爱好,参与和接触社会,实现扩大社会交往的愿望。这种现代人文精神显示了社会公民精神境界的提高,并且与文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呼应。体育教育中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被视为守护社会良心的底线。而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常用来界定人际关系中所需要遵守的准则、原则和规定。可见,体育运动中蕴含的道理与伦理道德要求高度契合。体育教育中应包含情操高

尚,维护正义等人文素质。当下体育教育更多地注重成绩与利益,但功利体育不应成为未来体育发展的方向,体育教育有责任推崇人文理想,启人心智。因此,体育教育需要增加人文内容,更加关注学生本身的需求,健全学生品格、能力的培养。例如,将体育游戏穿插到体育教学当中,增强体育教育的娱乐性和生动性,使学生在掌握体育技能的同时,获得更为深刻的参与体验,形成主动参与、善于思考、积极创新和团队合作的意识。另外,要引进具有人文意味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民族民间体育活动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意味,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把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引入体育教学当中,可以加强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审养,使学生更多地关注体育的文化性,关注人和体育文化的关系。

(二)体育文化积淀深厚,注重体育思想的教育培养

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它已成为沟通世界人民的桥梁。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齐聚一堂,通过身体的较量来传递对美的追求,对自身极限的挑战,对“更高,更快,更强”的向往。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源远流长。思想是文化的内核,体育思想是体育文化的内在支撑。体育教育的根本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身体发展有赖于体育活动训练,精神意识的养成要通过体育思想的传承来实现。将学生身体发展和精神意识的塑造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效解决目前体育教学中存在的“一条腿”走路模式。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注重讲解思想文化内涵,让学生对体育项目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主动参与发掘体育项目体育精神、文化差异,形成对体育项目新的认识,从而指导体育学习实践活动。

(三)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避免考核评价方式单一化

当今社会,青少年越来越强调独立、自我。每个学生思想意识、身体基础、体育技能不尽相同。因此,注重因材施教,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才能更科学地进行体育教育。革新传统体育教学方式,创新发展符合当前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根据学生情况,分类实施教学。另外,针对当前对于体育教学考核评价以技能掌握,标准化设定的单一方式,创新考核评价方法。增加思想品德、精神意识考核。通过平时表现对学生意志品质、吃苦耐劳、拼搏努力等方面内容进行评估。对学生体育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行评价。

构建体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首先要坚定人文精神回归是体育教学的必然选择。改革体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为学校体育教育注入人文精神的元素,使体育教育的人文内涵变得更为充盈而厚实,从而实现体育教学和教育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提高体育的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 [1] 卢元镇. 中国体育社会学[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
[2] 童绍岗,周宁. 人文体育[M].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3] 郝勤. 体育新闻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Physical Education

SONG Li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are of human nature and express the goodwill and tolerance of human nature. At present,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but there i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oriented" ideolo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drawbacks in the utilitarianization of sports education,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the singularity of assessment methods. Incorporat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will not only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promote the youth's perception of the values and obligations of citizens, and promote social volunteer service, but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humanistic spirit

(上接第14页)

- [4] 弗·卡普拉. 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5] 康拉德·罗伦茨. 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6]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1.

- [7] 赫胥黎. 天演论[M]. 严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 许渊冲. 梦与真——许渊冲自述[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Cultural Spanning and Textu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s Specter*

ZHANG Yu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the ultimate target that the cultural spanning and textual transformation aiming 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cultural spanning and textu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completed firstly. They seem to be simple, but difficult in reality. The difficulties of spanning and transformation are many, there are two main points to attribute: the non-equilibriu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dominate the trend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language leads to semantic asymmetry. Taking the Chinese editio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ao Yuanming's Specter* as a case study, the text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topics of cultural spanning and textual transformation by providing lots of evidence,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the cultural spanning and the textual transformation may face various barriers, but as long as we are seeking the commonality, pursuing the shared feeling and empathy, we can eliminate obstacles and complete the cultural spanning and textual conversion. Ultimately, the paper brings out the theme that as the spokesman who seek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as a life style for human beings and as a cultural symbol, Tao Yuanming not only belongs to China, but also belongs to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 Tao Yuanming; cultural spanning; textual transformation